

簡帛
研究

第一輯



簡 帛 研 究

第一輯

李學勤 主編 林劍鳴 謝桂華 副主編

法 律 出 版 社

• 北 京 •

(京)新登字 080 號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簡帛研究/李學勤主編.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 8

ISBN 7-5036-1397-1

I. 簡…

I. 李…

Ⅲ. ①簡(考古)-研究-文集 ②帛書-研究-文集

IV. K877.5

法律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宣武區廣內登萊胡同 17 號)

冶金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9.5 插頁:4 頁

字數:251 千字 印數:1—500 冊

定價:13.00 美元

主 編：李學勤

副 主 編：林劍鳴 謝桂華

責任編輯：彭錦華

封面設計：李生命

前 言

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多次古代文物的發現，特別是文字材料，對學術的影響尤為深遠。其中時間最近的是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包括著名的殷墟甲骨、樓蘭、敦煌等簡牘和敦煌卷子，震動了海內外的學術界。本世紀二十年代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發軔以後，田野工作收穫甚多，近二十年來重大發現更是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給。以前王國維先生曾稱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為“發見（現）時代”，現在可以說我們當前正處於前所未有的“大發現時代”。

上述殷墟甲骨、樓蘭等簡牘及敦煌卷子的研究，都早已成為專門的學問，據有重要的地位。七十年代以來考古發現中可與之相埒的，是各地出土的大量簡牘、帛書。簡帛前此也有發現，如1930年的居延簡、羅布淖爾簡，1942年的長沙子彈庫帛書及五十年代的幾批楚簡等等，但都沒有近年出土的那麼豐富和集中。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內容上，新出簡帛都超越了過去。

新出簡帛的研究，業已從多方面推動了學術的發展。在這裏，我們祇能舉出少數幾個例子。

1972至1974年，居延新發現漢簡近兩萬支，即學術界所艷稱的居延新簡。經過一段時期的整理和考釋，現在已有《居延新簡》、《居延新簡釋粹》等書問世。這批新簡與1930年的結合起來，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漢代西北邊郡的制度和狀況。新簡的探討不僅導致對所有居延簡的重新研究，而且帶動了整個邊遠地區漢晉簡的研究工作。

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墓出土大批帛書及竹木簡，內容多屬珍秘佚籍。這座墓葬於漢文帝前期，帛書的寫成有的可能早到秦或漢初。《馬王堆漢墓帛書》預定共6冊，現已出版一半，另外還有不少材

料分別發表。其中如《周易》經傳和通行本大有不同，對《周易》研究極有裨益；《老子》乙本卷前佚書悉即《黃帝四經》，揭示了久已失傳的黃老之學的真相；《五星占》和《天文氣象雜占》是科學史的珍貴材料，說明當時科學知識的進步；《五十二病方》與卷前佚書，對中醫學理論和歷史的探索又有特殊的意義。諸如此類，難於縷述。

1975年，雲夢睡虎地11號墓出土簡約一千二百支，這是首次發現秦簡，從而消息不脛而走，引起學者們廣泛重視。簡的中心是秦律，還有與之相關的《律說》（發表時題《法律答問》）、《封診式》等。由於內涵涉及當時社會的許多方面，能夠彌補文獻的不足，釋文一經公布，便有很多學者撰寫論作，至今每個月都有研究秦簡的作品出現。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一發現從根本上改變了秦史研究的面貌。1989年，在雲夢龍崗再一次發現了秦律竹簡。

1983和1988年，江陵張家山247號、336號墓先後出土了漢律竹簡。前者包括《二年律令》和有關於《奏讞書》，釋文最近即將發表。247號墓年代是呂后時期，“二年”就是呂后二年，所以這些律令最適於同秦律聯繫對比。張家山簡漢律的刊佈，一定會使這一時期歷史的研究進入新的階段。

這樣幾個例子，已經足夠表明簡帛研究的重要意義，同時也告訴我們，今天簡帛研究是學術界迫切需要的一門新興學科。簡帛研究的開展，會對很多學科有重大而且深遠的作用。事實上，這一學科是羽毛豐滿的，只要看每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的年會都有大量這方面的論文，每本《中國考古學年鑒》都為簡牘、帛書論著目錄設有專欄，就能有足夠的認識。

中國簡帛的研究，也受到外國漢學家的充分注意，有關論著很多。對國內的新發現，外國學者迅速作出反應。例如1976年春，雲夢睡虎地簡的消息剛在中國報端披露，日本《讀賣新聞》等幾大報紙立即報導，隨後就有不少學者撰文研究。在美國，還特地舉行過關於馬王堆帛書的工作會議。中外學者間的往來交流，也是相當頻繁和普遍的。

因此，我們迫切需要為簡帛研究開闢一處專門的園地。現在呈獻在大家面前的，是我們嘗試邁出的第一步。首先需要說明的，我們在標題上採用了“簡帛”字樣，是想強調內容兼顧各種簡牘和帛書。我們希望這一園地的範圍儘可能廣闊一些，使各方面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能自由地參加進來。學科越分越細是目前學術的一般趨勢，但越劃分，也就越有彼此溝通融會的必要。同一問題的商榷討論，更能促進研究的進步。

簡帛研究是十分務實的學問。一支簡、一片帛的綴合，一個字、一句話的解釋，每每要耗費很大的功夫。新發現的簡帛這樣衆多，整理發表便要投入很多人的精力心血，更不要說深入研究了。歷史上發現的簡，如西漢的孔壁中經，西晉的汲冢竹書，直到如今也沒有研究完畢，其對學術的影響仍然存在。新出簡帛很多還沒有發表，有的雖已刊佈，但還沒有人仔細研究，今後新的材料必然又將不斷湧現。看來簡帛研究的前景是非常遼闊的。相信只要我們共同努力，《簡帛研究》會繼續出版下去，對學術的振興發展有所貢獻。

懇切期待各位讀者能對《簡帛研究》提出批評和意見。

李學勤

1993年5月

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政 煊 學 書



簡帛研究

選堂題



目 錄

前言	李學勤(1)
簡牘學與歷史學	何茲全(1)
湖北楚簡概述	陳振裕(4)
包山楚簡研究二則	劉彬徽(12)
讀簡帛文字資料札記	袁錫圭(26)
秦漢簡帛與秦漢史研究	魯惟一著 張書生譯(31)
讀秦漢簡牘札記	高 恆(40)
秦《戶律》和《具律》考	彭 浩(48)
睡虎地秦簡《日書》“反支篇”及其相關問題	劉樂賢(56)
從放馬灘《日書》(甲種)再論秦文化的特點	林劍鳴(62)
雲夢龍崗秦代簡牘述略	梁 柱 劉信芳(74)
馬王堆帛書《周易》	
——兼談湖南出土的八卦紋銅鏡	周世榮(79)
馬王堆《刑德》乙本九宮圖諸神釋	
——兼論出土文獻中的顓頊與攝提	饒宗頤(89)
帛書《刑德》略說	陳松長(96)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畫“城邑圖”及其有關問題	
	徐蘋芳(108)
談銀雀山簡《天地八風五行客居五音之居》	饒宗頤(113)
再論“檢”	大庭脩著 徐世虹譯(120)
新舊居延漢簡冊書復原舉隅(續)	謝桂華(145)
漢簡遣書考述	李均明(168)
漢簡所見邊郡軍事與民政系統的職權關係	徐樂堯(173)

“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考·····	永田英正(177)
甲渠塞臨木部候長考——兼論候長的職責·····	劉 軍(184)
漢代邊塞軍隊的給假、休沐與功勞制	
——讀《居延新簡》札記之二·····	邢義田(192)
“居延新簡”商榷·····	馬先醒(206)
居延“愚吏”簡校箋·····	魏啟鵬(212)
敦煌馬圈灣漢簡中的一組律令冊·····	吳初驥(215)
敦煌新出簡牘輯錄·····	何雙全(221)
西北新近發現的漢代行政文書	
·····	魯惟一著 孫曉 卜憲群譯(236)
絲綢之路與漢塞烽燧·····	岳邦湖(254)
定縣八角廊漢簡儒書小議·····	李學勤(257)
簡帛研究動態	
首屆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東 山(266)
附：首屆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	
目 錄 ·····	(270)
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討論會述略·····	陳松長(274)
漢簡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概況·····	陳 波(283)
懸泉遺址發掘又獲新成果·····	柴生芳(287)
懸泉置發掘結束簡牘整理即將進行·····	玄 權(290)
後記·····	謝桂華(291)

簡牘學與歷史學

何茲全(北京師範大學)

近七十年前(1927),蔡元培和傅斯年等人創建歷史語言研究所時,傅斯年在所寫《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強調“近代的歷史學祇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

他認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便退步。他把有沒有新材料、新方法、新工具對一門新學問的關係,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他極推崇顧炎武和閻若璩,他說顧亭林“搜求直接的史料以訂正史文”,閻百詩“以實在地理訂古載”,說他們這種搜尋金石刻文以考證史實,親看地勢以察古地名的精神和所走的途徑,為我們立下了不朽的遺訓。

他對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定的任務,是尋“求新材料”。他所謂的新材料,具體的說就是新發現新出土的簡牘、文書、甲骨和金文。他要求史語所的工作,第一步是沿京漢鐵路綫,對燕都故都、安陽殷墟進行發掘,尋找新材料;第二步洛陽;第三步從洛陽西行,西安、敦煌、吐魯番、疏勒到中亞細亞。凡此所為,都在尋求新材料。他重視材料,重視新材料,“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這仍是史學即史料學那一套。

“歷史學祇是史料學”,這是錯誤的。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是人類古

往今來的社會，古往今來的社會歷史。歷史科學的任務是：實事求是的探討人類社會的客觀真實，在認識客觀真實的基礎上認識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人類社會歷史既然是有規律的，歷史學在認識了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後，就可以鑑往知來，給人以預見歷史發展方向的可能性。這是歷史科學的任務。

歷史，已經過去了。人們研究歷史、認識歷史，祇有靠文獻，靠史料記載。文獻、史料記載，是會有錯誤的。錯誤可能來自執筆人的偏見，可能來自私心，可能來自誤傳未接觸實際，可能來自階級局限性，可能來自時代局限性。總之，歷史記載，史料，會有錯誤。爲了弄清歷史事實，就須要對史料進行考訂，就要研究史料。這也是史學。但這離“歷史學祇是史料學”相距至少有十萬八千里。

人類對客觀社會的認識，主要來自實踐。實踐越豐富、越高，人類認識客觀社會的能力就會越高，對客觀社會的認識就會越深刻，人類對當代社會認識越深刻，對社會歷史的認識也就會隨之越深刻。人類對社會歷史的認識，最根本處也是來自實踐。不斷的實踐，反復總結、提高，建立起認識社會歷史的能力。這樣的高度洞察社會歷史、認識社會歷史的能力，才能產生歷史科學。歷史學不是史料學，史料學產生不了歷史學。

我們說歷史學不是史料學，是要擺正它們的關係，決不是輕視史料，更不是輕視新史料。歷史學雖然不就是史料學，史料對於歷史，對於研究歷史，發展歷史科學，畢竟還是頭等重要的事。沒有記載，沒有史料，歷史科學是建立不起來的。沒有史料，歷史研究就無法進行。

從這個意義上說，史料仍是重要的。尋求新史料更是重要的。多一分材料，就多一分尋求歷史真實的依據。依據越多，歷史真實的可靠性就越大。尋求新材料，發現新材料，是史學研究的頭等大事。但這和“歷史學祇是史料學”無關。

簡牘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新材料。簡牘對研究漢代歷史的重要，就如金文、甲骨文對研究商周史的重要。

簡牘學包括兩部大學問，一是簡牘本身的整理研究，一是以簡牘

為材料開拓中國史的研究，這是簡牘的使用。狹隘的簡牘學，也可以說祇是簡牘本身的整理和考訂。但簡牘學不能離開歷史學。沒有歷史知識就無法對簡牘進行整理和考訂。說重一點，沒有歷史知識，就沒有資格對簡牘進行整理和考訂，勉強去作，必然是事倍功半，作不出好成績。反過來對一個歷史學家來說，也是一樣。不研究簡牘，不掌握簡牘，祇想吃現成飯，等搞簡牘的把簡牘整理出來自己使用，自己的史學研究境界就定然受限制。

在這個意義上，簡牘學和歷史學是一家，簡牘學家和歷史學家是一家人。

存世的歷史文獻是有定數的，地下埋藏的甲骨、金文、簡牘卻是無限量的，可能是極豐富的。中國歷史學的開展，有賴於地下埋藏的簡牘。

傅斯年的“近代歷史學祇是史料學”是錯誤的。但他重視新材料，重視考古發掘，把史學的進步和退步完全繫在有無新材料上，這精神、這氣魄是可佩的。今天我們應有更大的氣魄更高境界的認識。在簡牘學和歷史學是一家的認識下，發掘新材料，開展史學研究，開展簡牘學研究。

湖北楚簡概述

陳振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新中國成立後，隨着科學的考古調查、發掘工作的開展，發現了大批城址、遺址、墓葬等楚文化遺存，出土了豐富多彩的、數量眾多的楚文物，積累了大量的實物資料。使人們對獨具特色的楚文化有了更多的瞭解，並掀起了楚文化研究的熱潮。

楚文化的研究，雖然自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已開始古器物的研究，但自建國以來大量考古資料的積累，許多學者首先是建立東周楚墓的年代學系列；爾後又將楚文化遺存、楚文物與歷史文獻相結合，進行楚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研究，並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果。當然，在楚文化研究中，由於楚國史書早已佚失無存，因而學者們對於記有當時楚國歷史文化等方面一些情況的簡帛資料，自然更為珍視。

目前已發現的戰國時期的楚國竹簡，以湖北出土的數量最多，內容最豐富，對於研究楚國的歷史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因此，本文僅就湖北楚簡發現的情況及其主要內容，作簡要的概述。

一、發現概況

東周時期的楚國竹簡，主要發現於湖南、河南和湖北等三個地區。最早的考古發現是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長沙五里牌406號墓出土一組內容為遺策的楚簡^①。1953年，在湖南長沙仰天湖發現一組內容為遺策的楚簡^②。關於長沙楊家灣八號墓出土的一組竹簡^③，過去均認為是戰國時期的楚簡，但從陶薰等隨葬器物分析，其年代應為西漢初年，故本文未將其列為楚簡。1957年，又在河南信陽長臺關

一號墓發現兩組竹簡，第一組的簡文內容為一部竹書，第二組的簡文內容係遣策¹。1980年，還在湖南臨澧九里一號楚墓，發現一組內容為遣策的楚簡²。另外，1984年在湖南常德德山和1987年在湖南慈利石板村M36發現兩批楚簡。

湖北發現戰國時期的楚簡，是從六十年代開始的。1965年12月，第一次在江陵望山一號墓首次發現一組簡文內容為卜筮祭禱的竹簡；第二次是1966年元月，望山二號墓又出土一組簡文內容為遣策的楚簡³。這兩組簡的數量較多，但保存較差。1973年，在江陵藤店一號墓發現一組遣策內容的楚簡⁴，保存很差，殘存二十四枚。1978年，在江陵天星觀一號墓發現二組竹簡，一組簡文內容為卜筮祭禱，另一組簡文內容為遣策⁵。1978年，還在隨州曾侯乙墓出土一組內容為遣策的竹簡，共二百四十枚，計六千六百九十六字⁶。1981年5月，在江陵九店磚瓦廠的一座小型楚墓出土一組簡文內容類似秦簡《日書》的楚簡⁷。1987年，在荊門市包山二號墓發現簡文內容分別為文書、卜筮祭禱和遣策等三類楚簡，共四百四十八枚，計一萬二千四百七十二字，保存基本完好，它是迄今發現楚簡數量最多，內容也是最豐富的⁸。1986年5月至1987年6月，在江陵秦家嘴發掘四十九座楚墓中，有三座墓出土楚簡⁹。一號墓出土殘簡七枚（段），內容為“祈福於王父”之類的卜筮祭禱之辭。十三號墓出土殘簡十八枚（段），簡文內容是“占之曰吉”等卜筮祭禱之辭。九十九號墓發現十六枚（段）竹簡，簡文內容分為兩類：一是“貞之吉，無咎”的卜筮祭禱之辭；二是少量遣策。1991年，在江陵鷄公山四十八號墓接近槨蓋板的填土中，出土一組簡文內容為遣策的楚簡¹⁰。1992年，在湖北老河口市二座戰國墓各發現一組內容為遣策的楚簡。1993年，在湖北黃州市發現一組內容係遣策的楚簡。

從上所述，湖北有十四座戰國時期的楚墓發現了楚簡，其中多重棺槨的大、中型墓各三座，單槨單棺墓七座，單棺墓一座。這些墓出土竹簡的組數並不盡相同，荊門包山二號墓發現三大類六組竹簡，江陵天星觀一號墓與秦家嘴九十九號墓各出土兩組竹簡，其餘的十一座

墓都祇出土一組竹簡。各墓出土的竹簡數量也有差別，其中以多重棺槨大型墓的數量最多，多重棺槨中型墓次之，單槨單棺墓與單棺墓的數量較少。這些竹簡，除江陵鷄公山四十八號墓是放置於近槨蓋板的填土中，以及九店楚墓是置放於墓坑的壁龕裏之外；其餘十二座墓均放置於槨室內，一般都放置於邊箱，少數置於頭箱，未見放於棺裏，而包山二號墓是分東、南、西、北等四室放置的。

十四座墓出土的竹簡，祇有荊門包山二號墓與隨州曾侯乙墓發現的竹簡保存較好，並有不少整簡。鷄公山四十八號墓的竹簡因在填土中而保存較差，其餘的十一座均因槨室裏積水浮動與漆木器等器物的疊壓而殘缺較甚，僅有少數整簡，大多殘斷，有的殘長僅1厘米。這些竹簡的編繩均已腐朽，除其中包山二號墓的部分竹簡尚可大致復原其順序之外，其餘的竹簡已不清楚原來編聯的順序。由於絕大多數竹簡保存不好，出土時大多呈深褐色。

據初步觀察，這些竹簡從成竹劈破成條以後，還經過去節殺青，刮削整治等工序處理，絕大多數製作都較精緻。竹簡上均有三角形的小契口，用以固定編聯竹簡的絲綫。雖然絕大多數的竹簡已殘斷，但從整簡或簡上殘存的痕跡判斷，每枚竹簡上的小契口有上、中、下三個與上、下二個等兩種；而且上、下契口頭端與尾端都有一定的距離。幾組竹簡出土時，小契口上還殘存有絲綫，從絲綫上下兩字的間距較大分析，當時編聯成冊應是在簡文書寫之後完成的。這些竹簡上的文字，祇有包山二號墓的文書類竹簡與曾侯乙墓1號簡係墨書於篋青上的，其餘均墨書於篋黃上，而且，在竹簡的頭、尾端一般都不書寫文字。由於各墓出土竹簡的情況與各類簡文內容的不同，每枚竹簡的字數多寡有異，而且同一組竹簡或同一枚竹簡上字距疏密也並不完全一致。還有一些大、中型墓中出土的竹簡，簡文的筆法也不甚一致，係出自多人之手；當然，有些小型墓的竹簡，簡文卻是一人書寫的。

迄今湖北十四座墓發現的大批楚簡，為研究戰國時期楚國的簡冊制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實物資料。

二、簡文內容

十四座墓出土的竹簡，主要內容可歸納爲卜筮祭禱、文書、日書和遣策等四類。其中以發現遣策的數量最多，有十座墓，共計十三組竹簡；其次是卜筮祭禱的竹簡，有六座墓，共六組；其餘兩類內容的竹簡，都是各有一座墓出上一組楚簡。現按各類竹簡的內容分別概述如下。

（一）遣策

內容爲遣策的楚簡，首見於江陵望山二號墓。雖然大部分墓因竹簡殘缺太甚而無法復原，但從保存較好的幾批楚簡分析，簡文所記器物的先後次序及其與墓中隨葬品的關係，大致可分爲三種：

第一種，分室放置，並與所記的隨葬品放在一起。這類遣策的竹簡，可以荊門包山二號墓的竹簡爲例。這座墓出土遣策的竹簡二十七枚，分四組放置於東、南、西三室，並明確記有年、月、日。其中第一組簡共八枚，置於東室隨葬品之中。主要記載各種食品與食器，而且簡文稱東室爲“飮室”，稱食品爲“飮室之飮”，稱銅器爲“飮室之金器”。第二組簡共二枚，放置於南室隨葬品之下，主要記載青銅禮器與漆木禮器，而且遣策稱青銅器爲“大兆之金器”，稱漆木禮器爲大兆之“木器”。第三組簡共十五枚（僅十一枚有字），置於南室隨葬品之上，首簡記有“大司馬熙戡救郟之歲，自月丁亥之日，左尹竈甬車一乘”，可作爲考證此墓的絕對年代，這組簡文主要記載車馬器和兵器，第四組簡共六枚，放於西室隨葬品之下，主要記載墓主人的衣物與牀上生活用品等，簡文稱西室爲“相（箱）尾”，稱所記之物爲“相（箱）尾之器所以行”。關於“尾”字，林澧先生釋讀爲“徙”字^⑧。這四組竹簡分別放置，除第四組簡所記的部份器物放置於北室之外，絕大多數簡文所記與該室的隨葬品基本相符；而且簡文還詳記各種食品的名稱、數量、及盛放器皿的名稱，各種車輛的飾件名稱、質地及馬冑、馬甲、馬飾的名稱，並記載車上的旌旗與所用的各種兵器的名稱。

第二種，不分室放置，竹簡先記年月日及這批竹簡的性質，簡文祇記部份隨葬品。這類遣策，可以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竹簡爲例。這座墓共出土竹簡四百二十枚，放置於北室兵器、皮甲等隨葬品中。一

號簡記有“大莫敖鳩嚙適補之春，八月庚申，寧起執事人書八車”，指出這組簡的確切年月及其性質是用於葬儀的車輛登記簿。這組簡祇記載用於葬儀的車馬兵甲，而其它隨葬品均未記。簡文關於車馬兵甲的記載十分詳細，例如某御者駕御某人之車，車上有那些車馬器與兵器裝備，有的簡還對某車上所配備的人甲與馬冑也作了詳盡的記載，還有些簡對駕車的馬是誰贈送及馬匹數也作了記載。

第三種，不分室放置，有紀年簡，簡文分別記載各類器物。這類簡可以望山二號墓為例。這座墓的 1 號簡為“匚周之歲分(八月)，卒□□□車輿器之筭”，爾後幾枚簡係記載車輿名稱、數量及車馬器等，其後各簡是分別記銅、陶、漆、木、竹和絲織物等的器名與數量，其中又以記衣衾等絲織物名稱的竹簡數量最多，而且都是先記各種質地的器物，再記具體器物名稱與數量。例如 46 號簡：“金器：六釡二，又(有)盂(蓋)。鉶登(盤)，又(有)盂(蓋)。二卵缶，又(有)盂(蓋)。二盤。二鈹(匱)。卵盞三□”。這座墓早年被盜，因而簡文所記與出土物相對照，有些相符，也有些不符；不符的又有數量不符、實物未見與簡文末記等三種情況。

(二) 卜筮祭禱

這類楚簡是為墓主卜筮祭禱的記錄，首次發現於江陵望山一號墓。目前出土的六組簡中，江陵秦家嘴的三組殘缺太甚，天星觀一號墓的一組資料尚未全部發表，無法進行分析；因此，這裏以荊門包山二號墓與望山一號墓的資料，對這類楚簡作簡略的概述。

望山一號墓的竹簡，係為墓主熊固卜筮祭禱的多次記錄。這組簡的卜筮祭禱程序，是先記卜筮時間，後記卜筮的工具，再記所問事項與卜筮的結果，最後還記錄所採取的許多祭禱的措施為熊固驅邪趕鬼。

這組簡的卜筮祭禱的時間，分屬於兩年三個月的不同日名與時辰，其中祇有少數簡文將年、月、日全部記錄；而大多數簡文未記年名，祇記月名與日名，或祇記日名與時辰。貞人有軹腹志、苛蟻、𡗗、豹、登(鄧)道、苛愴、𡗗(許)佗、疋、𡗗𡗗𡗗等人，並以𡗗豹卜筮的次數

最多。卜筮的用具，有愴蒙、少（小）筮（筭）、𦵏、𦵏、黃龜（龜）等等，以蓍草最爲常見。

簡文關於卜筮的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出內（入）寺（侍）王𠄎”；二是能否獲得爵位；三是關於疾病的吉凶，並以第三方面的簡文數量最多。祭禱的簡文，主要是爲墓主惡固治病驅祟。祭禱的物品，主要有佩玉、酒食、白犬、牛、馬、豬、羊等。祭禱的方法，有選禱、賽禱、饋祭、月饋、內齋和野齋等多種形式。

包山二號墓有五十四枚簡，是爲墓主左尹邵蛇卜筮祭禱的記錄。其程序與望山一號墓大同小異，這組簡保存較好，許多記錄也更爲全面。卜筮的時間，一般都記有年、月、日。貞人有苛光、晉吉、墜（陳）乙、觀綳、五生、觀義等十一人，這些貞人爲邵蛇卜筮祭禱的次數不盡相同。卜筮的用具，有長靈、騷靈、寐蒙、璫蒙、訓鼈、央筮、共命、丞惠、長𦵏等等。卜筮的內容，也是出入侍王、可否獲得爵位和關於疾病的吉凶等三個方面。祭禱的對象，有楚國的遠祖老僮、祝融、蜺蜚、熊繹、武王等，近祖以邵（昭）王列於首位，以及其先君；還有后土、司命、大水、宮、社、行、高丘、下丘等各種神祇、山川、星辰等。祭禱的物品，有牛、白犬、豕、酒飴等等。祭禱的方法，有罷禱、舉禱、賽禱等。

包山二號墓的這類簡文中，祭禱楚國遠祖老僮、祝融、熊繹、武王等人，可與《史記·楚世家》相互印證，對於研究楚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這些卜筮祭禱楚簡的發現，是與楚國巫風盛行有着密切關係的。王逸在《楚辭章句》中說：“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祀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的十一篇《九歌》，前十篇每篇祭一個神，末篇《禮魂》是禮成送神之辭。楚國重大的政治與戰爭決策，也要根據占卜的結果來決定。《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了楚吳水師在今安徽博望坡進行大戰之前，楚軍主帥司馬子魚就是依據占卜的吉凶來決定是否開戰的。《史記·楚世家》記載了楚昭王二十七年，昭王率軍救陳病於軍中，也是進行多次占卜以定其吉凶。

（三）文書

這類竹簡僅在荊門包山二號墓發現，放置於北室器物中。它是各地官員向楚國中央政府呈報的文件，係若干獨立事件或案件的記錄。其中的一（〇）二枚簡，有《集筭》、《集筭言》、《受期》、《疋獄》等四個篇名，分別是有關驗查名籍的案件記錄、名籍糾紛的起訴及呈送主管官員的記錄、受理各種訴訟案件與審理的時期及初步結論的摘要記錄、關於起訴的簡要記錄。還有九十四枚簡沒有篇名，主要内容有關於貸黃金或砂金以糴種的記錄；一些案件的案情與審理情況的詳細記錄，並呈送給左尹的情況匯報；各級司法官員經手審理或復查過的訴訟案件的歸檔登記。而且還有不少地名和官職名稱，其中，關於楚郢都就有五個。這些有關楚國司法的新資料，對於研究當時楚國的司法制度和社會狀況，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四）日書

這類簡迄今在楚簡中也祇有一組，出於江陵九店的一座小墓的墓坑壁龕裏。簡文資料正在整理研究之中，其主要內容類似雲夢睡虎地十一號秦墓出土的《日書》秦簡^⑥，可與文獻所記的楚人信巫好祀相印證。

在東周列國中，迄今以楚國出土的簡牘資料最為豐富，而湖北的發現又居首位。這些楚簡的內容涉及面相當廣泛，主要有關於楚國當時的社會狀況、官職名稱、司法制度、土地制度、戶籍管理、埋葬制度、生活習俗，以及考定各種器物的名稱、用途和製作工藝等方面，尤其是關於楚國遠祖的記載，對深入地研究楚國歷史，無疑是十分重要的。

這些楚簡的發現，可以看出楚國的簡牘制度已經形成，而且對秦漢的簡牘制度也有一定的影響。不僅江陵九店出土的楚簡在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中仍然沿襲下來，而且在遺策的簡文所記的隨葬品排列有序的情況，在雲夢大墳頭一號西漢墓出土的木牘^⑦和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西漢墓出土的竹簡^⑧，仍可見到。

注釋

①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1957年。

②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槨墓》，《考古學報》1957年第1期；史樹青：《長沙仰天湖出土楚簡研究》，羣聯出版社，1955年。

③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沙楊家灣 M006 號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12期。

④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⑤湖南省文物局：《1979年以來湖南省的考古發現》，《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⑥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

⑦荊州地區博物館：《湖北江陵簾店一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73年第9期。

⑧湖北省荊州地區博物館：《江陵天星觀1號楚墓》，《考古學報》1982年第1期。

⑨湖北省博物館：《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⑩楚文化研究會：《楚文化考古大事記》，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⑪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⑫荊沙鐵路考古隊：《江陵秦家嘴楚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88年第2期。

⑬張緒球：《宜黃公路仙江段考古發掘工作取得重大收穫》，《江漢考古》1992年第3期。

⑭林滢：《讀包山楚簡札記七則》，《江漢考古》1992年第4期。

⑮雲夢睡虎地秦墓整理小組：《雲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⑯湖北省博物館：《雲夢大墳頭一號漢墓》，《文物資料叢刊》第4輯，文物出版社，1981年3月。

⑰紀南城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整理小組：《湖北江陵鳳凰山一六八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9期。

包山楚簡研究二則

劉彬徽(湖南省博物館)

1991年出版的《包山楚墓》、《包山楚簡》兩本考古發掘報告^①，是在1987年發掘包山楚墓之後短短四年多時間裏問世的。其整理出版速度之快，在楚文化考古史上乃至我國考古史上都是空前之舉。現在學術界對這批重要材料(包括楚簡)已極為重視。毫無疑問，這必將引發楚文化研究的新的熱潮。

筆者有幸作為參加這批楚墓的發掘和包山楚簡整理工作者中的一員，在整理工作的同時和報告編寫組的同仁各自撰寫了一些論文，並已收入報告內作為附錄。作為考古發掘報告，收入一批研究論文，這也是考古發掘報告新的特色，然畢竟時間有限，這些論文祇能是初步研究；況且筆者又遇到了特殊情況，在整理編寫工作還未結束的時候，被迫調離了原單位，從而不得不中斷了研究。現在感到還有必要繼續從事這批材料的研究，限於本文篇幅，僅就這批楚簡研究中的兩個問題作一次再研究，希望能進一步引起討論，並祈方家指正。

一、關於包山楚簡所反映的曆法問題

包山二號楚墓出土的一萬多字竹簡(另有竹牘一枚)，為曆年來出土楚簡最多、最重要的一批，其中有大量的紀年、紀月、紀日材料。筆者在參加整理工作之時，特別注重這一材料，因為它不僅關係到楚國曆法、我國先秦曆法的研究，而且在當時還不明白墓葬絕對年代的情況下，通過對這批年曆材料的研究，可望獲得突破。為此，筆者花費了不少時間、精力加以研究，並撰成《楚國紀年與楚曆月建研究》一文，參加於1988年秋在湖北舉行的楚國歷史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

此文提出了楚曆建丑的新見解，論定包山二號楚墓的下葬年代為公元前 316 年，《包山楚墓》一書中對二號楚墓的年代便採納了筆者這一創見，並將此文收入該書附錄之中²。

在《包山楚墓》一書中除筆者的這一論文外，還收錄了另一篇論楚曆的文章：《包山楚簡所反映的楚國曆法問題——兼論楚曆沿革》（以下簡稱《楚曆問題》）³，該文對筆者提出的建丑說和包山二號墓年代等見解作了進一步論證，有的為拙文所未論及，為筆者之論點增加了不少有力的論據，其功不可沒；但在談到楚曆沿革時，提出的所謂“並行兩曆”說，卻是筆者不能苟同的，這牽涉到對楚國曆法、我國先秦曆法的重大問題，有必要展開討論。

《楚曆問題》在“楚曆沿革新證”一節中作了論述之後認為：“長沙楚帛書和屈原（詩句）提供的是楚用寅正夏曆，而前述包山簡、牘提供的卻是楚用丑正殷曆，兩者均證據確鑿，說明至少是在戰國中、晚期，楚確曾並行着兩種曆法。包山竹簡多數為官修文書，且以國之大事紀年，可證丑正曆為官方用曆。寅正曆之四時劃分利於農事，或為民間用曆”，在其結語中肯定“民間則並行寅正夏曆”⁴。所云楚曆建丑，確實證據確鑿，已有拙文論之於前，該文論之於後，毋容置疑。但所云民間並行建寅夏曆，亦認為“證據確鑿”，就很難說了。在未分析該文列出的證據之前，不妨先指出兩點：一是戰國時期的曆法雖因歲首之月不同而有建寅、建子、建丑之分，但都是四分曆，其紀日干支均相同，如果說並行兩種曆，就會有兩種曆譜，有兩種干支紀日。有如今日的公曆、農曆，所記同一天而兩者的月、日均不同。在戰國時期絕不會同時存在兩套紀日干支，無論官方、民間祇可能有一套曆譜。二是如若承認有官曆、民曆之分，而屈原身為楚國王族，又在朝廷擔任過要職，卻不用官曆而用民曆（按該文之見解），這怎麼解釋？

據屈原詩句斷定楚用夏正曆法，此說由來已久，從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以來，歷代論者不乏其人，近現代一些楚辭研究專家亦多宗此說⁵，故《楚曆問題》一文對此深信不疑，然而在楚曆建丑證據確鑿面前難以排解此說，故而提出並行兩曆說，在此之前主張楚曆建亥論

者也已提出過這一看法^⑥。在筆者看來，要麼楚曆建丑、要麼楚曆建寅，二者必居其一。這關係楚國歷史上的曆法問題，已超出單純考古學研究範圍。現在筆者要否定楚曆建寅說，否定楚曆並行兩曆說，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必然招來楚曆建寅論者的批評。但是不囿成說，敢於提出新見，乃學術中百家爭鳴的正常現象，孰是孰非，自有公論，不妨在此再作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⑦。

《楚曆問題》認為屈原詩句“攝提貞於孟陬兮”“較確切地說明了其用曆為寅正夏曆”，此點留待後論，該文接着又認為：“屈原的其它有物候的詩句，同樣提供的是夏正曆法信息。《楚辭·懷沙》：‘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孟夏為夏曆四月，其時楚地正值草木莽莽的盛夏之際……”。這是沿用了諸多楚辭學者論楚用夏正曆的依據，筆者在過去也對此大惑不解，經過反復研索，覺得這些詩句與楚曆建丑說並不矛盾，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

問題的癥結在於要將曆法與季節的關係予以區別。曆法是關於年月日的記時制度，戰國的曆法自古以來就是陰陽合曆，戰國時期的曆法就是陰陽合曆，它要兼顧太陽、月亮的運行。而季節祇依據太陽一年運行的變化而定，二分、二至和二十四個節氣就是這樣產生的；戰國時期二十四節氣的天象、物候恰與夏正曆相合，這正是引起所謂一個國家引用兩種曆法的說法的認識論來源。如按此說，秦用顓頊曆以夏正十月為歲首，而季節卻是用夏正曆，也應該是並用兩曆，這是說不過去的，事實上也無人說到秦用兩種曆法。為什麼楚以夏正十二月為歲首卻又提出兩曆說呢？這顯然已混淆了曆法與季節、物候的關係。還要指出一點，此文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孟春名冬祭，孟秋名夏祭呢？”這就必須說明丑正的殷曆與季節對應關係，楚曆冬祭雖為楚曆歲首之月，對應於夏正曆為十二月，但仍屬季冬，而非孟春，夏曆仍屬季夏，而非孟秋；即是說，楚曆歲首與夏曆不同，但季節的劃分與夏正曆全同，對此已有不少學者早就論及^⑧，不再復列。如此說來，據屈原詩句不能證明楚用夏正曆，而祇能說這些詩句祇是反映了當時已普及於官方、民間的二十四節氣與物候的風俗，雖然這些節氣、物

候風俗在秦漢以後至今已成為夏正曆(包括今之農曆)的組成部份,但在戰國時期卻不能用來作為判明何種曆法(月建不同)的依據,即是說,戰國時各諸侯國儘管使用着歲首不同的建正曆法,而二十四節氣的劃分與季節物候風俗則是共同的^⑧。這正是中華民族文化多元一統格局的具體而微的一個例證。

1942年長沙出土的楚帛書,不少學者認為楚帛書所反映的曆法為建寅之夏正曆,《楚曆法問題》一文亦以帛書為楚民間用夏正曆的確鑿證據之一。筆者在《楚帛書出土五十周年紀論》一文中對其反映的曆法已有所論及^⑨,但語焉不詳,個別論說也有可修改之處。楚帛書能否反映楚曆法?能否以之作為判斷楚民間用夏正曆的依據?這無疑是比合理解釋屈原詩句非反映楚用夏正曆法更為難解的一道難題,但不解決這道難題,前述二者必居其一,必用丑正曆法之說就會半途而廢,並行兩曆說就仍有可取之處。

討論楚帛書用何曆的文字指帛書的第三部份——《月忌》^⑩,這些文字分列於帛書的四周,按順時針方向依次寫有十二個月名和月神名並各月宜忌,學者們已指出這十二月名與《爾雅》之十二月名相符,僅字體或筆劃有差異,茲羅列於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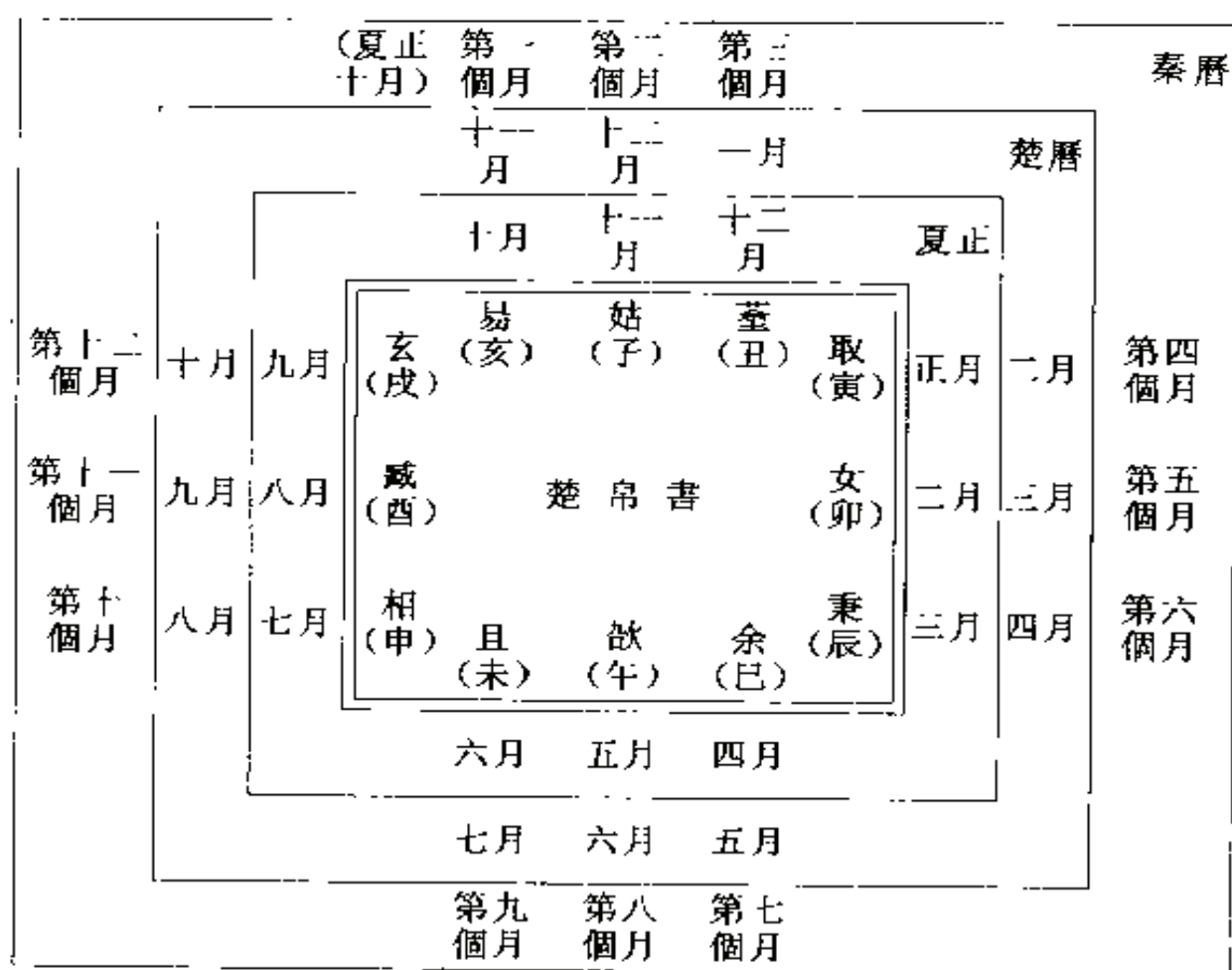
帛書:取女秉余欲虐相滅玄易姑莖

爾雅:陬如病余臯且相壯玄陽辜涂

取與陬同,《爾雅》云:“正月為陬”,楚帛書的“取”月正好位於四季搭配中的寅次,與夏正建寅相合,於是便認為楚帛書用夏正曆法。但這種推論本身就有問題。

第一,楚帛書祇記有月名,並未在各月名之上標上月序,“取”月上並未標上正月,其他月名上都未有月序之數字,僅在正文的甲、乙二篇文字裏有一、二、三、四、五月的序數。因此從帛書文字本身並不知道取月就是正月,我們知道,《爾雅》成書年代為戰國末年^⑪,其年代顯然晚於楚帛書。《爾雅》的作者是以夏正曆法來理解十二個月名的,故有“正月為陬”之說。在楚帛書年代時期,楚曆建丑,秦用顓頊曆雖不改夏正曆月名,但歲首之月為夏正曆的十月。即是說,秦曆的第

一個月相當於夏正曆的十月。這樣，按夏正曆“正月爲陬”，指夏正曆的第一個月，則秦曆的第一個月也應是陬月，可以理解爲夏正十月爲陬月。如果說“正月爲陬”祇能指夏正曆的正月，秦用顓頊曆，則夏正正月相當於秦曆一年中的第四個月，如此理解，則按秦曆可以認爲是秦曆四月爲陬，與之同例，楚用丑正曆，則可以指楚曆第一個月冬欒爲陬月，也可按夏正曆理解爲楚曆第二個月爲陬月（即相當於夏正的正月）。茲按帛書十二月名圖示如下：



注：秦曆不改夏曆月序，它的第一個月仍稱十月，此處所寫乃指一年中月序的序列而言，即秦曆以夏正十月爲它一個年度中的第一個月。又，楚帛書的方向以南爲上，爲便於說明曆法問題，改以北爲上。

按圖所示，楚帛書的月名在一年中的順序以何月爲歲首之月，不同的曆法有不同的排列順序，決不能僅用《爾雅》的夏正曆作爲唯一的解釋，這是不用多言即很明白的事。

第二，楚帛書有易月，《爾雅》“十月爲陽”，陽即易，而按楚曆則十一月爲易月。無獨有偶，《禮記·月令》：“仲冬之月，……命之曰暢月”（《呂氏春秋·十二紀》同）。暢與陽皆從易得聲，是爲同音異體字⁹³。仲冬之月即十一月，按《禮記》說則“十一月爲陽”，與《爾雅》的“十月爲陽”相差一個月，即晚一個月，楚曆建丑的月序也比夏正曆推後一個月。這是表明楚帛書用楚丑正曆的依據之一。

第三，楚帛書之姑月宜忌記載爲：“利𢇛（侵）伐，可以攻城！可以聚衆；會者（諸）侯，型（刑）百事，殤（戮）不義”；所記祇有“宜”而無“忌”，而且是大吉大利之月。故饒宗頤先生云：“至若十一月之辜月，則最爲良月”⁹⁴，據顧炎武《日知錄》云：“古之奇數之月爲忌，偶數之月爲良”⁹⁵，按夏正曆，辜月爲十一月，非偶數月，何得爲良月？故學者云：“楚帛書以十一月爲良月，諒必持之有故”⁹⁶。這持之有故的原因何在？如果按楚帛書用丑正曆計算，辜月爲十二月，正好爲偶數之月，乃得爲良月。看來，這就是持之有故之謎的謎底。

第四，關於楚帛書用夏正曆的又一理由是月忌篇陬月下的文字釋讀爲：“陬，乙則至，乙（應書寫爲乙或巳，抄寫者誤爲乙）即玄鳥，也就是燕子等都無異議”，“陬在楚地當指寅正孟春”。說對此“無異議”，不確，早已有學者指出此“乙”字應釋爲“巳”，讀爲“犯”或“範”⁹⁷。因之，據燕子何時來楚地論證用何曆，就失去了依據。

第五，關於屈原自述之詩句“攝提貞於孟陬兮”，論者謂“確切地說明了其用曆爲寅正夏曆”。我在拙文裏（《包山楚墓》附錄二一）已論陬月爲第一個月，無論周正、殷正、夏正的第一個月皆爲陬月，有《史記·曆書》云夏正十一月（周正正月）爲畢聚（即陬）之月等材料爲證。這自然還是一個有待爭議的看法。在此還可據帛書作又一種解釋，即可理解“孟陬”爲孟春之陬月。前面已提到，楚雖然以夏正之十二月爲第一個月（月名冬柰），但四季搭配與夏曆同，即冬柰之月（楚曆第一個月）仍屬季冬，則楚之陬月仍爲孟春第一個月（月序則爲丑正第二個月），故可以稱之爲孟陬（孟春陬月之省稱）。若此解可從，則屈原當降生於楚丑正曆的第二個月（即陬月），因仍爲春季首月，故可簡稱之

爲孟陬。因此，無論是那種解釋，決不能祇理解爲夏正曆之孟陬，而同樣可理解爲丑正曆的孟陬。如此說來，用屈原自述生辰詩句亦無法證明楚並用夏正曆²⁹。

第六，楚之星歲紀年，據筆者對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和《刑德》的研究，楚以太歲紀年之太歲名，比之夏正曆之歲名早了一年，證楚不用夏正曆，而以它的上一年十二月爲歲首，故歲名相差一年³⁰，這也可作爲楚帛書用丑正曆而不是夏正曆之一有力外證。

綜上所論，可證楚帛書所反映的楚曆並不是過去若干學者認定的夏正說，而同樣應爲筆者所主張的楚用丑正曆之說，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要推翻陳說是要有點勇氣的，不但要有勇氣，還必須有可使人信服的論證。雖然筆者已深信己說，但還有待學術界認定，權作學術爭鳴中的一家之言，期望能引起進一步的討論。

至於戰國以前的楚曆用行何曆？何時改用以冬祭爲歲首的丑正曆？由於材料不夠，還是一個有待考古發現的新材料來加以論證的問題。論者肯定在此以前“曾用行過以屈祭爲歲首的天正曆”，可備一說，是否如此，還有待進一步的證明。秦滅楚以後，在原楚地取消丑正曆，但“不改楚曆歲首及月序，更易於使楚人接受秦曆”，雲夢出土的秦楚月名對照表，也是由於“改了楚曆之建正，才有必要有相應的對照表”，論者指出這點很好，正合己意。

二、關於包山楚簡所反映的楚鼎制問題

包山二號楚墓共出土銅鼎十九件，並在遣策中記錄了其名稱、數量、用途，爲我們研究楚鼎制提供了一份極好的典型材料。在筆者的論文《論東周時期用鼎制度中楚制和周制的關係》³¹、專著《楚系青銅器研究》一書³²均有所討論；收入《包山楚墓》附錄的論文中也有討論楚鼎制的一些值得注意的見解，但有些看法尚可商榷，有必要再作較深入的分析。

爲便於討論，先照錄有關銅鼎記載的簡文。簡 265 號：“大兆之金器：一牛鑄，一豕³³鑄，二喬（鑄）鼎，二盞廌（薦）之鼎，二貴（饋）鼎，二登鼎，二監，二卵缶，二迅缶，一湯鼎，一聃耳鼎，二餅銅，二官匡，一簠

鐵鼎，二少鉶，二椹鐵（盞），一盤，一鉶（匪），一鉛鐵……^②。”

簡 251——254：“食室之金器……鼎……‘一鼎……’。”

“大兆之金器”共十三件。關於“兆”字，或“借作眇。《說文》：祭也。字亦作桃，《廣雅·釋天》：‘桃，祭先祖也’。大眇^③，大祭。”^④或“讀如桃……引申作葬解，‘大兆（桃）’即大葬……即大葬之日盛葬奠所用之銅祭器”^⑤。說解不一，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認為均指祭器，肯定這一點至關重要，下詳。

遣策所記與墓內實物對照，一牛鑪、一豕鑪指出土的兩件大鼎（2：124，2：146），乃煮牲之鑪鼎，出土時牛鑪內有牛骨，器底有煙痕；豕鑪內無物、底無煙痕，有鑄沙，論者謂前者為實用器，後者無燒煮痕跡，非實用器。

“二鑪鼎”，論者謂指出土的兩件鐵足銅鼎。鑪鼎之名最早出現於春秋晚期之楚鼎銘文中，屬楚系銅鼎第二個類型^⑥，對照出土實物，應指發掘報告中所稱之“螭鈕鼎”^⑦。出土時其中一件內有牛骨，兩器底均無黑煙痕。

“二薦鼎”、“二饋鼎”，論者謂指墓內出土的環耳卧牛鈕鼎，不確。第一，數量不符，簡文這兩種鼎為二對共四件，而實物祇二件；第二，這兩件環耳卧牛鈕鼎的器形較小，出土的方耳卧牛鈕鼎比這兩件器形大些。薦、饋之名見於楚昭王之諱鼎、簋^⑧，乃楚王和高級貴族之重器方有此稱。如此看來，應指出土的四件方耳卧牛鈕鼎，數量相符，器形也大。況且，還有江陵望山二號楚簡記載為佐證。望山二號楚簡有饋鼎之記載^⑨，出土之鼎耳亦為方形耳。這四件方耳卧牛鈕鼎器底均有黑煙痕。

“二登鼎”，指出土的兩件束腰平底鬲鼎^⑩，出土時一件內有牛骨，兩件器底均無煙痕。

“睥耳鼎”，指出土的一件蓋上有方孔套於器耳中者。“一簠鼎”，論者未考所指，似應指出土的三件環耳環鈕鼎中有煙痕的一件，三件中另兩件為大小相同的對鼎。

“食室之金器”中的鼎，有一鼎名前之數量詞殘缺，論者謂可能為

一鼎，則食室之金器爲兩件鼎，並謂乃指出土的兩件最小的對鼎，但這一對鼎既小又底無煙痕，非實用器，而食室之金器應爲實用器，以此推測，或指出土的兩件底有煙痕的環耳卧牛鈕鼎（大小相同的對鼎）。

大祭之金器十三件加食室之金器二件，共十五件，比出土實物十九件少四件，論者謂爲漏記，但也可能是竹簡殘斷缺失，這未見竹簡記錄的四件當指出土的兩件鐵足銅鼎和兩件最小的鼎（均爲大小相同的對鼎）。簡文所記之二某鼎均指大小相同、形制相同的對偶鼎（簡稱對鼎），大兆之金器所記共有四套對鼎，即有蓋圓腹鼎三對（二喬鼎、二廌鼎、二饋鼎）和平底鬲一對（二登鼎），兩件單鼎。若加上竹簡缺載的二對鼎和食室之鼎一對，則有蓋圓腹鼎共六對，連同平底鬲一對，是爲七對。

以上就楚簡遣策記載與出土實物進行對照、疏理，這就爲討論其所反映的鼎制問題奠定了科學資料基礎。

關於楚墓鼎制及與周制的關係，筆者已提出了簡明概括的新見解，即：

中原地區的周制列鼎序列的構成按單件依次遞減。

楚國地區的楚制列鼎序列的構成按雙件（對鼎）依次遞減。

這個看法在拙作與拙著中已作了詳細論證，在此不再復述^①。依此新認識，包山楚墓的鼎制亦應作如此觀，即其正鼎——六對有蓋圓腹鼎均按雙件（對鼎）依次遞減，並用以表示墓主的身份等級（一對鬲也是正鼎，亦爲其身份等級標志之一）。

但在這個問題上仍有不同的看法與見解，還需要進一步展開討論。

收入《包山楚墓》附錄一五的論文《由包山二號楚墓看楚系高級貴族墓的用鼎制度——兼論周代鼎制的發展》，對此墓的鼎列計算仍按周制奇數列鼎推論：“七件‘今式’實用鼎爲一套，五件‘古式’非實用鼎爲一套，分別與所葬二件鑄鼎相配，正好爲兩套正鼎”^②所云今式鼎七件，即指三對器底有煙痕的鼎加一件單鼎，古式鼎五件即指二

對無煙痕的鼎加一件單鼎。並據《儀禮·既夕禮》鄭注：“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也”，認為：“‘今式’一套七鼎應屬人器；‘古式’一套五鼎應為鬼器”^⑧。以上推論存在兩個值得討論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如此計算奇數鼎列對不對？第二個問題，什麼是鬼器、人器？如何看待二者的區別？解決這兩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對“大兆之金器”這一條簡內容如何理解。

先談第一個問題，“大兆之金器”一條，所記銅鼎等祭器是有序的，首記煮牲的鑊鼎，次記二套正鼎（請注意，此處所云兩套正鼎與上面所引兩套正鼎的看法有異），即有蓋圓腹的正鼎三對（二喬鼎、二薦鼎、二饋鼎）和第二類正鼎一對（二登鼎）。之後記水器、酒器——二監、二卵缶、二迅缶、一湯鼎，之後還有食器二盒匱等，兩件單鼎排在水器、酒器和盛食器之後，從其排列順序即可判定這兩件單鼎並非正鼎，而應為陪鼎或羞鼎。《周禮·天官·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鉶羹是置於羞鼎中的，大羹則置於升鼎”^⑨（升鼎即正鼎）。在大祭之禮器中必有羞鼎，可知這兩件單鼎不應計入正鼎之列。這樣，據大兆之金器簡文，正鼎一為六件對鼎（三對），一為二件單鼎，筆者同意論者提出的漏記的四件對鼎（二對）計入正鼎鼎列的看法，則這套有蓋圓腹正鼎鼎列增為十件（五對）。即一套正鼎為五對，另一套正鼎為一對，均為偶數鼎列，顯然應為筆者主張的楚鼎制乃係雙數（對鼎）鼎列構成，而非奇數鼎列構成。

次談鬼器與人器的問題。《禮記·檀弓》：“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這明白地告訴我們，祭器就是人器，那麼，“大兆之金器”一條簡文所記之銅鼎和其他禮器均為人器，而此簡所記之銅鼎，既有器底有煙痕之實用器，又有無煙痕之非實用器，即使如此，均為祭器、人器。因之，論者所云以器底有無煙痕之實用器、非實用器來區分鬼器與人器，無論從文獻記載抑或出土實物看都是不確的。

致於祭器中有器底無煙痕似新鑄的且有鑄沙、鑄漏無使用痕跡之器，這確是頗為費解的問題，也是導致論者認為乃鬼器的認識的依據之一，這個問題不探究清楚，則這些器的人器說尚易被人懷疑。筆

者以爲可能的解釋是：此墓墓主昭蛇死前二年方才獲得爵位，其身份等級比獲得爵位前上升了一大步，那麼，原先用於祭祀與宴享用的禮器，顯然已與他新的地位、等級不相符合了，而應增鑄與他身份相符的禮器，似新鑄無煙痕之器就是增鑄的，指其中一件鑊鼎、二件登鼎和二件喬鼎等。過了不久，墓主就死了，成爲他的隨葬品。這些新增的禮器或未使用或使用不久，故而像新鑄的一般，在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的情況下，銅禮器的實用功能已退化了，主要用於祭祀等禮儀場合，從都用於祭祀活動看，也可以認爲仍是實用器，不論有煙痕抑或無煙痕者，應都看作是實用器。這就是這些新鑄的器物既有爲實用器所無的紋飾、而又鑄造比較粗糙的原因，不能以此作爲區別鬼器與人器的依據，都應肯定爲祭器、人器。如此看來，論者所謂“今式”鼎爲人器，“古式”鼎爲鬼器之說並不確切，應如筆者所主張的五對正鼎和另一套一對正鼎（登鼎）均爲人器，不存在鬼器與人器之區別。

接下來還要討論一下此墓鼎制與墓主人身份的關係。論者謂：“兩套正鼎，即人器大牢七鼎一套、鬼器少牢五鼎一套，與墓主人‘大夫’等級所應享受的葬器標準正合”，“鬼器五鼎正合大夫用少牢之常制”，“人器大牢七鼎是大遣奠時禮加一等”。上面已論述不能如此計算奇數鼎列，則墓主人的鼎制規格自當另作解釋。

筆者經過研究，認爲：“楚高級貴族（包括左尹以上至楚王，相當於周制的諸侯和卿）使用甲類正鼎鼎列（即本文前述之有蓋圓腹鼎）爲對鼎 5 對（10 件）以上，楚王墓可多達 10 對以上。同時使用乙類正鼎（即本文所述之登鼎）爲銅斛 2 件、7 件、9 件等”⁹⁸。以此標準衡量，此墓墓主非中等貴族大夫等級，而是相當於周制卿這一等級的高級貴族，這與此墓的墓葬規模之大，出土遺物之多且不乏精美者也是十分相稱的，遠非大夫等級可比，判斷此墓墓主非大夫級而相當於卿級（下卿），與前述對楚鼎制的重新解釋密不可分，故而在此作出必要的說明⁹⁹。

以上對包山楚簡所反映的楚鼎制問題作了新探討，不難看出，楚鼎制既有繼承周制的方面（都有大小相次的鼎列），又有創新、發展的

方面(周制以單件構成奇數鼎列,楚制以雙數對鼎構成鼎列),這也是學術界所艷稱的楚文化具有開創性特色的表現形式之一吧。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春秋中期以後的楚國“實際其文化已有很高的發展。楚人青銅器受中原因素的影響,隨着楚國力量的壯大而遞減,漸而建立自己的風格,對周圍各諸侯國起着越來越大的影響作用,以緻把周朝一些同姓諸侯如蔡國都囊括在其影響圈內”^①。楚鼎制的特點的形成也是楚人“建立自己的風格”的一個方面。我們有責任從各個方面探索出楚文化的光輝成就及其特出的貢獻,祇有這樣,纔能“把楚文化形成和發展的奧秘,把楚文化在我國古代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真正揭示出來”^②。

最後,還想提一點當不算“蛇足”的想法,在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面對商海澎湃,也應有學海的波濤迭起,這同樣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學術研究貴在創新,真理愈辯愈明,筆者在此文中把自己的看法及其他論者的不同看法都奉呈於讀者面前,孰是孰非?筆者雖自信已說之不誤,然真理是客觀的,不依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希望能引起進一步的討論、研究,祈盼學術界同仁和廣大讀者賜正。

注釋

①均由文物出版社1991年出版。(實際上,《包山楚簡》乃《包山楚墓》一書中楚簡部份的單出本)。

②此文修改定稿時已調湖南省博物館,故署名下的單位為湖南省博物館,題目按編輯者意見改為《從包山楚簡紀時材料論及楚國紀年與楚曆》,文見該書附錄二一。

③見該書附錄二〇,此文作者王紅星為包山楚墓發掘工作與報告編寫工作總負責人,為報告的快速出版作出了貢獻,對筆者的工作也給予了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謝忱。學術上不同意見的討論是正常的,這絲毫不影響此文作者在整理研究中取得的重大成就。

④出處同③,以下凡引自該文者不再注明。

⑤主夏正說者古今學者甚多,僅有個別持異議者,可參閱游國恩主編的《離

騷集義》(中華書局 1980 年)等書。

⑥《關於楚國曆法的建正問題》，《中國史研究》1988 年 2 期。

⑦在拙文(出處見注②)裏未討論屈原詩句和楚帛書中的曆法問題(僅提到屈原生辰詩句的建正問題)，故有必要進行再研究。

⑧例如陳夢家：《戰國楚帛書考》，《考古學報》1984 年第 2 期 156 頁載三正關係表：

〔夏正〕			〔殷正〕		〔周正〕		〔月建〕
孟春	正月	陬	二月		季春三月		寅
仲春	二月	如	三月		孟夏四月		卯

(以下類推，不再引述)。

⑨周正曆的四季劃分比夏正、丑正(殷正)早一、二個月，所指天象、物候也早一、二個月，如此而已。

⑩楚文化研究會 1992 年年會論文，已收入《楚文化研究論集》第四集，該書由中州出版社出版。

⑪關於帛書的結構、內涵與性質問題請參閱李學勤：《長沙楚帛書通論》，《楚文化研究論集》，荆楚書社 1987 年。

⑫參看徐朝華：《爾雅今注》前言，南開大學出版社 1987 年。

⑬何琳儀：《長沙帛書通釋》，《江漢考古》1986 年第 2 期。

⑭、⑯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1985 年版 134 頁。

⑮顧炎武：《日知錄》(轉引自楊伯駿《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 1981 年版第 202 頁)。

⑰讀“犯”見李學勤：《再論帛書十二種》，《湖南考古輯刊》第 4 集，岳麓書社 1987 年。讀“範”，見注⑬之文。

⑱在拙文(見注②之文)裏曾以楚丑正曆推算出屈原之生辰，如按本文所提第二種解釋，則還可作第二種推算方法，擬另文探討。



⑲筆者參加 1992 年馬王堆漢墓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研究》，收入《馬王堆漢墓研究論文集》，該書即將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⑳此文載《中原文物》1991 年第 2 期。

㉑此書即將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為該社所出《楚學文庫》叢書之一(列入國家八五計劃中的重點書目)。

㉒包山楚簡釋文由筆者通稿，通稿本上的釋文此字由我釋為“豕”字，在筆

者調離原單位後，定稿者改此字爲“升”字。此字肯定不是“升”字，故仍按筆者釋文定爲“豕”字。

②③對此簡釋文爲利於印刷，有的字經寫今體字，如鼎字，原篆爲爲貞之簡體字，不再注明。有的器名省一字，如薦鼎之前字，簋鼎之中間一字在後面引用時省去了。

②④引自《包山楚簡》注釋(579)。

②⑤《包山楚墓》附錄一九：《包山二號楚墓遺策初步研究》，以下凡引用考釋看法，未注明出處者均見此文。

②⑥楚系銅鼎的類型劃分與序列在拙著《楚系青銅器研究》一書中有詳論，限於此文篇幅，不再詳述。

②⑦《包山楚墓》第 98—99 頁。

②⑧張政烺：《邵王之謚鼎及簋銘考證》，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三分冊。

②⑨朱德熙、裘錫圭、李家浩：《江陵望山一、二號楚墓竹簡考釋》，此文收入《江陵望山與沙塚楚墓發掘報告》，將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③⑩釋文登字原篆下有皿旁，“登”字與“升”字通，登鼎即升鼎，說詳拙作《楚辭略考》，載《楚文化研究論集》第 2 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③⑪請參閱注②⑩、②⑪之拙文與拙著。

③⑫、③⑬均引自《包山楚墓》附錄一五的論文，以下之引文凡未注明出處者均見此文。

③⑭俞偉超：《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3 頁。

③⑮見拙著《楚系青銅器研究》一書。

③⑯此墓墓主的身份等級，還可作詳細討論，擬另文再論，在此祇能作簡明而必要的說明。

③⑰李學勤：《中國青銅器的起源與發展》，《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青銅器》一書序言，文物出版社 1986 年。

③⑱蘇秉琦：《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問題——在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閉幕式上的講話》，載《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18 頁。

讀簡帛文字資料札記

裘錫圭(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

一、睡虎地秦簡四則

(一)

《睡虎地秦墓竹簡》的《法律答問釋文注釋》中有如下一條(《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注釋部分 135 頁,文物出版社,1990。以下引此書時略去書名):

“者(諸)侯客來者,以火炎其衡厄(輓)[注一]。”炎之可(何)?
當者(諸)侯不治騷馬[注二],騷馬蟲皆麗衡厄(輓)鞅鞅輶鞅
[注三],是以炎之。

[注一]炎,用火熏。衡,車轅前端駕馬的橫木。

[注二]當,通倘。騷,《說文》:“擾也。”騷馬,即騷馬蟲,寄生馬體的害蟲。

[注三]麗,附着。……

簡文“騷馬”二字原加重文號,釋文已將重文補出。注釋認為“騷馬,即騷馬蟲”。如果確實如此,簡文為何不在“蟲”字下也加重文號呢?“騷馬蟲”的說法也嫌於古無徵。

《說文·五上·竹部》有“箒”字,訓為“搔馬”。桂馥《說文解字義證》解釋說:“搔馬也者,《廣韻》‘箒,刮馬篋也’,《玉篇》‘箒,馬箒也,所以刮馬’,徐鍇曰‘箒,竹有齒,以搔馬垢污’。”(引者按:徐說見《說

文解字繫傳》)“騷”、“搔”同音,簡文“騷馬”似當讀爲“搔馬”。“治”字古訓“正”(《禮記·大傳》“上治祖禰”注:“治猶正也。”),訓“理”(《儀禮·喪服》“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注:“治猶理也。”),其意義與一般的“作”或“從事”有別。例如“不治室屋”、“不治宮室”,並不是說根本不要住房,而是說不好好整治住房。“不治騷(搔)馬”大概也不是指根本不搔馬,而是指不好好搔馬或搔馬不得法而言的。“騷馬蟲皆麗衡軛……”,似當讀爲:“搔馬,蟲皆麗衡軛……”。由於搔馬不得法,例如在接近車子的地方搔馬,搔馬之時馬身上的蟲就跑到衡軛等物上去了。

(二)

《秦律雜抄釋文注釋》有如下一條(見 80 頁):

游士在,亡符,居縣貲一甲;卒歲,責之。

注釋解釋“游士”說:“游士,專門從事游說的人。《商君書·農戰》:‘夫民之不可用也,見言談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算地》:‘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游而輕其君。’都主張對游士加以嚴厲限制。”

戰國時代游士的情況頗爲複雜,恐怕不能把他們全都說成“專門從事游說的人”。例如荊軻,《史記·刺客列傳》說他“嘗游過榆次”,“游於邯鄲”,“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是一個很典型的游士。他在自己的本國,曾“以術說衛元君”;可是在游於各國的過程裏,卻顯然不是“專門從事游說”的。這從《史記》的有關記載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也許可以把“游士”解釋爲“外來的、沒有固定戶籍的人士”。

(三)

《秦律雜抄釋文注釋》有如下一條(見 85 頁):

工擇榦〔注一〕,榦可用而久以爲不可用,貲二甲。·工久榦曰不可用,負久者〔注二〕,久者謁用之,而貲工曰不可用者二甲〔注三〕。

〔注一〕榦,《說文》:“築牆耑木也。”即築夯土牆所用的立木。

〔注二〕負,虧欠。久,此處指裝設夯牆用的模板,與上面兩個

“久”字讀爲“記”不同。《考工記·廬人》：“灸諸牆以視其橈之均也。”《說文》引作“久”，《考工記》注：“猶柱也。”意即支柱，所以夯牆時用木榦支柱模板也叫做“久”。

〔注三〕而，此處用法與“乃”字同。

注釋對這一條裏的四個“久”字作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恐怕不合理。把“負久者”的“負”解釋爲“虧欠”，把“久者”的“久”解釋爲“裝設夯牆用的模板”或“夯牆時用木榦支柱模板”，似乎也都比較牽強。

按照目前的文字，上引律文的確很難講通；所以注釋者不得不作比較牽強的解釋。我們懷疑其中有抄錯的字。睡虎地 11 號墓所出竹簡中屢見錯字，大都已爲《睡虎地秦墓竹簡》的作者所指出。例如：《秦律十八種》1 號簡把“澍”字誤寫成從“水”從“封”，2 號簡誤“旱”爲“早”（釋文注釋部份 19 頁），13 號簡誤“早”（皂）爲“旱”（同上 22 頁），《法律答問》8 號簡第一個“傳”字誤爲“傅”（同上 81 頁）。其他例子尚多，不具引。上引律文“工久 曰不可用”句中的“久”，可能也是錯字。上一句說“工擇榦”，這一句似也應說“工擇榦”。大概由於上下文多“久”字，就把“擇”字也誤寫成了“久”。《秦律十八種》102 號簡：“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髹書之。”（同上 44 頁）104 號簡：“公器官□久，久之。不可久者，以髹久之。”（同上 45 頁）據前一簡，後一簡“以髹久之”之“久”，應是“書”字之誤，情況與此相類。

上引律文所說的工當是用榦者，久者當是事先在榦上作出可用或不可用的標記（即所謂“久”）的人。律文似乎是以久者爲主要對象的，但是大概尚有相關的律文沒有抄出，所以文義不是很顯豁。“工擇榦，榦可用而久以爲不可用，貲二甲”這一條，如果像我們所想的那樣，是以久者爲主要對象的話，“榦可用”後面似乎可以增加一個逗號。

秦簡律文中的“負”字一般當賠償講。《秦律十八種》所收的一條“倉律”的注釋，把“其不備，出者負之”的“負”解釋爲“賠償”（26 頁注

一三),是很正確的。如果“負”的賓語指人,“負”就有“使……負擔”、“使……賠償”的意思。如《秦律十八種》所收的一條“金布律”說:“縣、都官坐效、計以負賞(償)者,已論,嗇夫即以其直(值)錢分負其官長及冗吏……”(80 號簡,釋文注釋部分 39 頁)“分負其官長及冗吏”的意思,就是讓這些人分別負擔賠償額。我們所討論的律文中的“負久者”之“負”,其意義應與“分負”之“負”相同。

按照以上所說,上引律文的內容似乎可以這樣理解:如果工人發現久者加上不可用標記的榦實際上可用,久者應罰二甲。工人認為久者加上可用標記的榦不可用(久者也有可能以不加標記表示榦可用。如果是這樣,“加上可用標記”就應改為“未加不可用標記”),應讓久者賠榦。但是如果久者能向上級證明原榦確實可用,認為不可用的工人就應罰二甲。

(四)

《秦律十八種》中用了三個“稍”字,分見於下引三條律文:

……及隸臣妾有亡公器、畜生者,以其日月減其衣食,毋過三分之一,其所亡衆,計之,終歲衣食不足(引者按:簡文此字左從“足”,右從一個形體複雜的偏旁,但字義與“足”同,為印刷方便徑寫作“足”)以稍賞(償),令居之……(77—78 號簡,釋文注釋部分 38 頁)

官嗇夫免,復為嗇夫,而坐其故官以賞賞(償)及有它責(償),貧窶毋(無)以賞(償)者,稍減其秩、月食以賞(償)之,弗得居……(82—83 號簡,同上 39—40 頁)

縣所葆禁苑之傅山、遠山,其土惡不能雨,夏有壞者,勿稍補繕,至秋毋(無)雨時而以繇(徭)為之。(119—120 號簡,同上 47 頁)

整理者對上引第一個“稍”字加注說:“稍,《廣雅·釋詁一》:‘盡也。’”(同上 39 頁注四);對第二個“稍”字加注說:“稍,逐漸”(同上 40 頁注二)。第三個“稍”字無注,譯文把“勿稍補繕”譯為“不必逐步補修”(同上 48 頁),可見也是把“稍”訓為“逐漸”的。

在古漢語中，“稍”用作狀語多當逐漸講。訓“稍”爲“盡”雖有根據，但用例極罕見。上引第一個“稍”字似仍以訓作“逐漸”爲妥。整理者把上引第一條中的“以其日月減其衣食”句，譯爲“應從丟失之日起按月扣除隸臣妾的衣食”(39頁)。我們懷疑這一句的意思是按日按月扣除衣食，有些隸臣妾的口糧大概是按日發的，需要按日扣除。不管採取哪一種解釋，這種辦法所具有的逐漸償清欠項的性質是不會改變的。“終歲衣食不足以稍償”的“稍”，用法跟上引第二條“稍減其秩、月食以償之”的“稍”其實很相近，都是就償清欠項的方式說的。如果律文祇說“不足以償”，大家都能明白是“還不夠用來還清欠項”的意思。現在說“不足以稍償”，意思就是“還不夠用來逐漸還清欠項”，並沒有什麼不好理解之處。所以對上引三條律文中的三個“稍”字，似乎沒有必要作兩種解釋。

二、馬王堆竹簡 《合陰陽》一則

《馬王堆漢墓竹簡〔肆〕》所收的《合陰陽》的釋文中，有一處把“旦”字釋成了“早”字。

我曾在拙作《文字學概要》中說：“已發現的秦代和西漢的簡冊和帛書，在表示‘早’這個詞（按：指早晚之“早”）的時候，大都借用‘蚤’字，偶爾也借用‘棗’字，卻從來不用‘早’字。”（187頁，商務印書館，1988）。下面舉一些這樣說的根據。

睡虎地 11 號墓所出秦簡中有四個“早”字，一個是“旱”的誤字（《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注釋部份 19 頁，《秦律十八種》3 號簡），其他三個都用作廩皂之“皂”（同上 20 頁，《秦律十八種》7 號簡。22 頁，《秦律十八種》14 號簡。86 頁，《秦律雜抄》30 號簡。釋文都徑釋爲“皂”）。簡文非《日書》部份祇有一處說到早晚之“早”，用的字是“蚤”（同上 160 頁，《封診式》82 號簡）。《日書》部份有三處說到早晚之“早”，兩處用“蚤”字（同上 200 頁，《日書甲種》129 號簡正。242 頁，

《日書乙種》135 號簡)，一處用“棗”字(同上 183 頁，《日書甲種》14 號簡正貳)。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四川辭書社 1985 年出版，下文簡稱“字形表”)，在“早”字條西漢時代欄內未收一字(442 頁)。“蚤”字條西漢時代欄共收九例，大部分用作早晚之“早”(954—955 頁，參看 1582—1583 頁)。《字形表》收字雖為舉例性質，所反映的西漢時代“早”、“蚤”二字的使用情況，仍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在居延等地出土的西漢時代簡中，早晚之“早”一般寫作“蚤”，例如記時之詞“早食”就都寫作“蚤食”(《字形表》955 頁第一行所引“居延簡甲 769”的“蚤”字便是一例，參看同書 1582 頁末行所引有關文句)；“早”字雖也屢見，但一般用作“皂”，如居延簡 179·2A 的“早布複袍一領、早布裨衣一領”等。所以王夢鷗《漢簡文字類編》“日部”中未收“早”字，“白部”中則收了用作“皂”的“早”字(71 頁，藝文印書館，1974)。

直到東漢時代，仍有不少人以“蚤”為“早”，如班固《漢書》用“蚤”字(參看上引《文字學概要》272 頁)，漢碑“早”、“蚤”並用(參看劉球《隸韻》卷六·二十二皓韻“早”字、顧藹吉《隸辨》卷三·三十二皓韻“早”字)。

我們當然不敢說，在秦代和西漢時代根本不存在用“早”字來表示早晚之“早”的現象。不過從已有的資料來看，在那個時代，尤其是在秦代和西漢前期，即使存在這種現象，也一定是非常不普遍的。

前面所說的《合陰陽》釋文中的“早”字，見於下引一段文字中(《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釋文注釋部分 156 頁，文物出版社，1985)：

昏者，男之精將；早者，女之精責(積)。吾精以養女精，前脈

皆動，皮膚氣血皆作，故能發閉通塞，中府受輸而盈。

馬王堆漢墓屬西漢前期。此文以“早”對“昏”，是我們提出的“已發現的秦代和西漢的簡冊和帛書，在表示‘早’這個詞的時候……從來不用‘早’字”的說法的一個反證。但是如果核對一下《合陰陽》的圖版，

就能發現被釋爲“早”的那個字原來寫作旦（上引書圖版部份 103 頁 127 號簡），“日”下的豎筆並沒有像一般的“早”字那樣延伸到橫畫之下。

漢代人寫“旦”字，“日”和“一”之間往往加短豎。例如：羅福頤《漢印文字徵》所收的兩個“旦”字（7·4 上，文物出版社，1978）、前面引過的《漢簡文字類編》所收的三個“旦”字（50 頁），全都有短豎。陸錫興《漢代簡牘草字編》收了九個“旦”字，有八個有短豎（131 頁，上海書畫出版社，1989）。《字形表》收了九個漢代的“旦”字，有七個有短豎（452—453 頁）。所以我們所討論的、《合陰陽》中的那個字，沒有問題應該釋作“旦”而不應該釋作“早”（《漢代簡牘草字編》130 頁收入“早”字條的“居 214·39”一例，從原簡圖版看，“日”下豎筆超出橫畫的部分極短，似乎也有可能是“旦”字。此簡圖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居延漢簡甲乙編》乙編圖版壹伍柒，中華書局，1980）。

前面所引的那段《合陰陽》釋文的標點，似乎也有問題。這段文字可能應該像下面這樣標點：

昏者，男之精。將旦者，女之精。責（積）吾精以養女精。前脈皆動，皮膚氣血皆作，故能發閉通塞，中府受輸而盈。

“將旦”就是天將明的意思。這段文字有韻。前三句句末的“精”和最後一句句末的“盈”都是耕部字。古漢語的句子，主語加“者”的一般是判斷句，從語法上看，以“男之精”、“女之精”作判斷句的表語，是很合適的。以“將”字“積”字屬上爲句，就不大合適了。“積”字上屬後，下面一句變成“吾精以養女精”，也有些別扭。所以我們把這一段的標點作了如上改動。至於“昏者，男之精。將旦者，女之精”這兩句究竟應該怎樣解釋，還有待研究。

三、馬王堆帛書《九主》一則

《馬王堆漢墓帛書〔壹〕·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釋文》中的《九主》篇釋文有如下一段（《馬王堆漢墓帛書〔壹〕》釋文部份 30 頁，帛書

381—382 行，文物出版社，1980）；

伊尹暨（既）明八音之所道生，請命八音□。〔法〕君明分，誅（法）臣分定，以繩八音，八音畢名。過在主者四，罪在臣者三，臣主同罪者二。〔後曰〕：“四主之罪，何也？”……

今按：“請命八音”句與下文“八音畢名”相應，語氣已完，“八音”下缺字似不應屬上為句。此缺字尚殘存左側豎筆（見上引書圖版 381 行），從殘筆形狀看有可能本是“曰”字。如這一推測符合事實，上引文字似可如下釋讀：

伊尹暨（既）明八音（謫）之所道生，請命八音（謫），曰：“〔法〕君明分，誅〔法〕臣分定，以繩八音（謫），八音（謫）畢名。過在主者四，罪在臣者三，臣主同罪者二。”〔後曰〕：“四主之罪，何也？”……

過去我參加整理帛書時沒有看到這一點，現在提出來供大家參考。“音”即“謫”字右邊所從之字，“八音”當讀為“八謫”，《九主》篇釋文的注〔二五〕已經指出（見上引書 32 頁）。

《九主》篇上文中“請明臣法，以繩適臣之罪”和“〔請明〕主法，以繩適主之罪”兩句（上引書 29 頁，帛書 354、355 行）。釋文前一句有注說：“適，疑當讀為謫。繩謫，猶言繩責。”（同上 31 頁注六）此說可通，但原文似乎還可作另一種解釋。

《九主》肯定法君、法臣，而否定篇中所說的其他八種君臣。“以繩適（謫）臣之罪”、“以繩適（謫）君之罪”，當與下文“以繩八音（謫）”（已見前引）同義。疑“適”（謫）當與“君”、“臣”連作一詞讀。“謫君”、“謫臣”是對法君、法臣之外的那八種被指謫的君臣的通稱，也就是所謂“八謫”。

秦漢簡帛與秦漢史研究

魯惟一(英國劍橋大學)著

張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

三十多年前,我有幸參加過已故森鹿三教授在日本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開辦的一系列研究班。他是那時日本研究第一批發現居延簡牘的最資深的學者,同時他也匯聚了一批有能力解讀這些簡牘的優秀同仁。那時擺放在我們面前的僅有在敦煌發現的數量不多的材料中幾張已出版的圖版,以及勞幹剛剛出版的《居延漢簡圖版之部》(臺北,1957年)和《居延漢簡甲編》(北京,1959年)中的居延簡牘圖版。

我們在工作中遇到不少困難。勞幹的書對於簡牘的編排雜亂無序,而且它們的編號沒有用一定的方法與發現的地點聯繫起來。關於漢代的軍事組織祇有最起碼的知識,因此我們必須加緊學習它的軍事技術知識,學習官署和國防前綫邊防部隊的工作的運轉程序。可是,我們還沒有弄清楚木牘和竹簡怎樣用來書寫文字;我們也弄不清楚各種不同形式的木牘各有什麼不同的用途。在那個時候要與中國大陸的學者們建立聯繫是不可能的;我們也不能直接找勞幹研討問題;至於要想去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看看在密封保管下的此類文書的原件,也是沒有什麼希望的。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我們研究的對象是漢帝國邊疆上人們手製的文書的斷簡殘片,而產生文書的這樣的背景必然是不尋常的。除此之外,在案卷中見不到兩片以上被捆繫在一起的完整的文書以表明那些個別的簡牘是怎樣聯合起來形成一份單件文書的。

當 1992 年大庭脩教授在日本關西大學召開專題討論會的時候，情況就截然不同了。這時，有了豐富的材料，它們不僅有出自敦煌和居延遺址的文書，也有出自漢帝國內地的文書。其中有些材料顯然與先前的發現屬同一種類型，也記述的是同一種題材；但是另有許許多多從馬王堆發現的絲織帛書和木製簡牘，這是完全不同的一種類型，其內容有宗教的、文學的和哲學方面的材料，也有歷史典籍，以及天文、醫藥和兵書方面等科技材料。另外，這些新發現的材料包含有數量很大的完整的材料，它們或仍是被綑紮在一起，或者是被發現於能恢復其原狀的環境中；因為有些文書內容是完整地書寫在一份單件的帛書上，它們的段落之間的次序是無可置疑的，而和木牘上的相關內容如出一轍。

由於人們已經對秦漢史的許多方面進行了持續不斷的研究，我們今天自然會受益非淺。中國、日本和臺灣的學者們研究了諸如漢政府的組織、漢代外交關係史以及其邊境人民的生活狀況等等問題；並且他們又是把這種種問題和早期中華帝國史的大背景聯繫起來加以研究的。因此，現在就有可能深入研究某些完整的文書了，例如對於皇帝詔書的內容、信號規則和種種法律文書等等都可加以深入研究。對於這些新文物的發現過程及其出土地點，我們已擁有完全可以信賴的記述，而這是早期居延文物所無法比擬的。

在這樣的背景下纔有可能召開一次國際水平的學術會議來探討對這些文書的研究工作近年來的發展情況。會議的進程表明，我們在弄清大量的技術問題及其細節方面，在校正釋讀某些簡牘方面，以及在補充早期出版物的結論方面，都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其成果具有後來居上的性質，這通常是因為我們對某一個問題現在有可能從不同的方方面面加以探討。例如，有一些居延發現的簡牘曾經被認為是授爵或授勳的記載；現在它們就可以為關於規範這種活動的某些規則的文書所補充。比如，在磨嘴子所發現的給予老者以特權的一份詔令現時就有一種相類似的文書可以配合着看；又如在居延某遺址處所發現的信號規則現在就可以與某一邊防哨所實際

上保存的一些殘餘木頭信號做比較研究。何四維教授在他 1955 年出版的《漢律殘篇》中吸收了一些居延漢簡的內容；後來在他的《秦律殘篇》（1985 年）中就能夠在他原來的基礎上增添他關於雲夢睡虎地法律資料的注釋內容；而李學勤教授在這次學術會議上的論文中就曾經指出，這兩本著作已被湖北江陵發現的文書有所充實。這次學術會議討論的情況還表明，對於地下情況的研究還揭示了漢代防禦綫路和哨所體系中的某些複雜情況。考古學發現了某些安裝在哨所牆上的裝備，而它們現在是可以與簡牘上所用的某些術語對照着看的；確認某些指揮哨所的名字則又與馬圈灣簡牘的研究結果，與玉門關為什麼從原來的地址遷往別處的結論是有關係的。

在對某一特殊問題做深入研究中所引起的許多其他一些事例已經有可能用來肯定好多一般性的原則。首先，在對中國早期歷史做任何研究時都必須把各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結論結合起來。人類學的概念應該用來理解中國最初階段的文學中的許多引喻；歷史學家有時必須借助於社會學的方法來分析引起社會騷動和改朝換代的原由；經濟史學家可以為解釋某一王朝的興亡多做貢獻。就我們本行來說，歷史學家如果想更充分地理解文書的內涵，他們也應該求助於文字學家和考古學家的知識；而若要對文書做出歷史的解釋，則需要他們從中國的制度史和外交政策上把握問題——這祇是就帝國政府的兩個方面而言之而已。

其次，這些文書材料顯示了它們作為考信編年史史實的文獻的價值和重要作用。早期中國的歷史學家們長期以來就密切注視截至他們時代為止所為之束手的嚴重的困難條件。這是由於他們無可奈何地祇能依賴單一的文獻記載，而缺乏其他的旁證來檢驗史書敘述上的準確性和可信程度。當然，對於秦漢史的基本史籍——即《史記》、《漢書》和《後漢書》——的注疏考證已取得很大的成績。或許從宋代以來注疏家們就已確認這三種史書中所不可避免的禁忌和先入之見，以及它們的文字前後抵觸之處；同時，歷史學家們很早就注意到，由於這三部史籍編纂的意圖，它們取材的標準和討論問題的旨趣

都受到偏見的影響。由於讀者祇能聽任史書編者的支配，祇能聽任他們是奉命行事這一事實的支配，所以歷史的許許多多方面對於讀者來說仍然是一片茫然。

第三，當看來是險象環生的氣息正在影響西方某些歷史著作時，集中地研究這些文書是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其起因蓋在於有所謂“後近代史”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拒不承認歷史實際能重新確認，不承認歷史事實能予以重建，也不承認思辨的作用能取代對現有的證據作批判性的考證。幸而這種方法尚未出現在對古代中國的研究上。

大量手稿的發現呈日積月累之勢，其中有出自行政需要而製成的木牘，有墓穴中發現的竹簡或帛書，它們都引發了幾個帶有普遍興趣和一般應用上的問題。這裏我們祇想注意探討兩個問題，即這些文書所製成的方法和為什麼它們會被埋在墳墓裏面。

按情理推測，一個帝國政府——不管它是在長安、在拜占庭或在羅馬——的許多官署都會對許多它們收到或發出的報告要求有雙份複件；對於不論上、下級官署來說，它們都需要為自己所負責的官方賬目報告或庫存報告留一份底本，以備上面的檢查和自己回答問題。同樣地，一覽表也需要有副本，因為上級官員需要據此向下級分發東西。從本質上說，這些複製件也必須精確無誤，內容上必須完全相同，因為這和帝國賴以進行統治的皇帝的詔書、“律”、“令”的產生是一模一樣的。當我們推測，在居延發現的一組簡牘^①是來源於兩份副本回執（其一是收據的回執，其一是定期分配穀物下達後的回執），這一說法未經證實。也應該記住，同一件報告的一批副件未必會一定放置在同一地點。倒是有這樣的可能，即一份副件已到達了目的地，其另一副件卻仍然留在原發件地方的卷宗裏。但是，我們尚未發現有這樣的情況。另外一份副件材料卻具有迥然相異的性質，這就是指寇恩的個人卷宗^②；這裏必須為了法律程序的目的而逐字逐句複述原文；但是毫無疑問，這兩份副本是分別留置在不同的案卷中了。

另外一些原則則用到了其他種類的文書上，它們是不需要精確認定其同一性的。例如，在馬王堆發現的《老子》有兩種歧異很大的本

子；而且對這種情況不應大驚小怪，雖然有幾種本子的《日書》有時會合葬一墓³，但它們決非一種內容。這些不同的版本具有相同的效力，而其最基本的内容則是相同的（例如，關於吉日凶日的建除體系即是如此），但是有不同的增補内容。

不同版本出籠的過程引起了許多尚難以解答的問題，但是，如果需要確認某些行政文書的一致性時，也應該決定採取一些什麼步驟來予以實現。這個問題的其他方面是涉及某些著作的複本問題，因此它又與版本的流傳和目錄學有關。很難想像是某一位讀者公然宣稱，某種文書是某某抄寫員的手迹，或者是一批抄寫員口耳相傳下來的記述，但是否可以設想，後來有些佛經卻是這樣傳下來的，因為關於佛經的知識被認為是口誦心維而流傳下來的。《老子》的兩種文本的出現可能是這樣的：那時還沒有形成嚴格的規章或監督制度來預防書寫的失誤，而雕刻某些選文於石碑上的制度，以及用拓片拓出欽定和經典版本之風氣都還沒有出現。由於當時的作品尚未嚴格要求一定要符合中國經書的標準，所以可以設想那位文書抄寫員對他所抄寫的書是有多大處理的伸縮餘地的。有證據表明，奴性的順從必須按照所給的材料依樣畫葫蘆地抄寫；例如，《史記》中就有一卷的某些小段落被寫得錯亂了；不管是帛書或紙製書都是用豎行直寫，而以模仿原來的簡牘分片刻寫的辦法為能事；而且堅持照佛經上每行寫 17 個漢字為準。我們期待有更多的發現能進一步幫助解決這個問題。

再有一個問題，雖然它不關涉敦煌和居延所發現的行政方面的材料，但是仍然值得稍稍予以考慮。這就是說，為什麼這些竹帛書籍都隨葬在墳墓裏⁴；雖然眾說紛紜，但他們所持理由祇能適用於已知的某些情況，而不能放之於一切已知情況而皆準。有些隨葬之書是用於表現死者的職業（例如法律文書），或者表示他應在陰間仍然享有某種特權待遇（例如皇帝下令所給予老年人的待遇）；有些書是意在供死者消閑享受，以排遣他在地下的長年孤寂（例如文學和歷史書籍）；有些書則含有具體的實際用途，以備死者急用之需（如日書、醫藥、兵書等）。看來它們不僅僅是一些斷簡殘篇，祇供殉葬時趕時髦應

景之用，而是這些一系列隨葬品要給冥世當局以深刻的印像，使之體認到死者的財富及其相應的特殊榮寵。如果是一位皇帝晏駕，書籍就不包括在殉葬的明器項目之內^①。

由於缺乏檔案材料，例如帳簿、稅收統計表或土地法的具體實施情況，攻研秦漢兩代的學者們特別感到不便。由於敦煌和居延簡的大量發現，我們現在已擁有各種材料，比如有關於皇帝的命令下達和實施情況的材料；有關於官方通信聯絡的材料；有關於稅收方法和人員徵募的材料；有關於供應和設備的徵集和分配的材料。這些材料都與秦漢帝國大多數人口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它們在簡牘上所顯示的內容要遠遠比例如歷史學家所寫關於高級官員的傳記或“天文志”、“禮儀志”的內容生動而逼真得多。我們因此得非常慶幸有這些材料的發現，雖然它們往往很片斷，但仍值得學者們認真關注；因為這是我們所擁有的渴望已久的材料，從而使我們比研究其他歷史時期的同仁們（例如研究先秦史的或研究漢唐之間時期歷史的同仁們）要幸運得多。近年來發現的木牘、竹簡和帛書大大地促進了漢代歷史的研究，它對於我們的用處不下於甲骨文、克里特島“綫形文字乙”和以色列“死海古卷”的發現。

注釋

①見魯惟一：《漢代行政記錄》（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67年），第2卷第317—355頁，文書W2和圖版13，41—44。

②關於這方面的情況，見《文物》，1978年第1期；其錄文見第28—29頁，32—34和35—41頁為注釋，圖37—40為照相；又見何四維：《公元28年的一場訴訟》，載沃爾夫岡·鮑爾編：《中國-蒙古研究：赫伯特·弗蘭克紀念集》（威士巴登：弗朗茨出版社1979年），第23—34頁。

③例如，在睡虎地和放馬灘即是。

④關於這個問題，見何四維：《墓穴中殉葬文書》，載《亞細亞研究》，第18/19號（1965年），第78—89頁。

⑤《後漢書》，志第6《禮儀下》（北京：中華書局編，第3146頁。）

讀秦漢簡牘札記

高 恆(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

作者研究中國古代法制史，常閱讀秦漢簡牘。有所收獲則札記之。現擇數則就教專家。

一、家人、室人、同居、戶

家庭關係是一種重要的社會關係。尤其在中國封建社會，實行父家長專制的、親屬間共同生活的家庭，是人們進行物資生活資料生產的基本組織形式。家庭的穩固與否，直接影響着封建國家賦稅、徭役的徵課，影響着社會的安定。因而封建法律對於家庭，以及與家庭有關的問題作了許多規定。然而，從《睡虎地秦墓竹簡》(以下略稱《秦簡》)中見到秦律令有關家庭的法律如此縝密、周備，這是沒有料到的。從幾個有關的法律名詞中就可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家人

《秦簡·法律答問》：“家人之論，父時家罪毆(也)，父死而誦(甫)告之，勿聽。”“家”，即家庭。“家人”，即家屬。《易·家人》疏：“一家之人”。該條律文規定，父在世，子犯的“家罪”，父死後有人對其子提出控告，官府不予受理，不治罪。所謂“家罪”，即父殺傷他人，子應連坐的罪責，以及與父同居時，子殺傷、盜竊父的奴婢、牲畜應承擔的罪責^①。關於不追究“家罪”的規定，實際上是維護作為家長的父，對於家庭所享有的特殊權利。因為父死後，子就成為統治家庭的家長了。不追究他在其父生前所犯的“家罪”，也有利於“家庭”的鞏固。

室人

“室人”一詞，《秦簡》中多見。《秦簡·法律答問》：“可(何)謂‘室

人’？‘室人’者，一室，盡當坐罪人之謂殿（也）”。注云：“《禮記·昏義》注：‘謂女姑女叔諸婦也’。”此說不當。這裏的“室”，即房屋。“室人”，即房屋內的人。同一室的人，不一定是親屬，更非“諸婦也”。這一條《法律答問》對於“室人”的解釋，可能是就某一具體條文中的“室人”而言。秦律的其它規定說明，“室人”並不一定因和案件當事人同室而連坐。如《秦簡·封診式·出子》：“又訊甲室人，甲到室居處及腹痛子出狀”。此“室人”，僅是一證人而已。《法律答問》中其他兩處的“室人”皆是案件的當事人，也不是因同室的其他人犯罪而連坐者。一則“答問”云：“或自殺，其室人弗言吏，即葬埋（葬）之，問死者有妻、子當收，弗言而葬，當貲一甲。”此“室人”是自殺者親屬，有責任向官府報告自殺者的情況。不報告而受罰，是因本人違法，而不是連坐。另則“答問”云：“小畜生人人室，室人以投（殳）挺伐殺之，所殺直（值）二百五十錢，可（何）論？當貲二甲”。此“室人”，即屋內主人。他受罰也是因本人違法，而不是連坐的問題。

同居

“同居”是一個重要法律名詞。清末法學家沈家本曾著《同居考》一篇，對於漢代以降的同居制度作了詳細考證。當時他認為，“同居”二字，始見於漢惠帝詔，是“《漢律》名詞”^②。現在知道，“同居”也是漢承秦制，《秦簡》中多見。

如何釋“同居”，對訟訴當事人往往有直接的利害關係。如秦《戍律》：“同居毋并行。縣嗇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貲二甲”。按此規定，同居中應服徭、戍者在同一時期，祇需一名應徵服役即可，其他人可暫緩。這樣規定無疑是爲了照顧農戶的農業生產。從《秦簡》可以看到，秦時的“同居”制度大抵有以下內容：

1. 同居同籍。

《秦簡·法律答問》：“可（何）謂‘同居’？戶爲‘同居’。”戶，指戶籍。凡同一戶籍，就爲“同居”。按此解釋，同居與同籍一致。《漢書·惠帝紀》顏師古注：“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沈家本對此說提出批評：“小顏

唐人，乃不本《唐律》爲說，而漫云‘同籍同財’。《疏議》明言同居不限籍之同異”。顏說確有違《唐律疏議》，但與秦律相合。

②同居當同母。

《秦簡·法律答問》：“可（何）謂‘同居’？‘同居’，獨戶母之謂毆（也）。”就是說，“同居”應是同一戶籍同母的人。當然，收養、過繼之子雖不同母，也可“同居”。《法律答問》中有一則說：“士五（伍）甲毋（無）子，其弟子以爲後，與同居，而擅殺之，當棄市”。此“與同居”之後，就非此戶之母所生。秦律關於“同居”應是“獨戶母”的規定，反映了商鞅變法時實行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的政策。還有一條“答問”也體現了這一精神。如“答問”說：“人奴妾盜其主之父母，爲盜主，且不爲？同居者爲盜主，不同居不爲盜主。”由此可見，父、子也不一定同居。

③同居同財。

“同居同財”，秦時已實行此制。如關於“人奴妾盜主”的規定，也反映出這一內容。父子同居，由於是共財，因而人奴妾盜主之父母之財，也就是“盜主”。

④同居連坐。

中國古代實行因一人犯罪而株連其親屬、鄰里，或其主管者的刑罰制度。而“同居連坐”是其重要內容。從《秦簡》中知道，秦律對於這項制度有明確規定。《秦簡·法律答問》：“律曰‘與盜同法’，有（又）曰‘與同罪’，此二物其同居、典、伍當坐之。云‘與同罪’，云‘反其罪’者，弗當坐”。此律文說明，一，凡律文中寫有“與盜同法”、“與同罪”，同居者就應連坐。這是一條關於“同居連坐”的原則規定。二，凡律文中寫“與同罪”，但又說“反其罪”者，同居不連坐。所謂“反其罪”，即“反坐”刑罰原則，如誣告者反坐與其誣告相同的罪。按此律文規定，凡是“反坐”罪，不連坐同居。《秦簡·法律答問》中另有一條正是如此寫的：“甲誣乙通一錢黥城旦罪，問甲同居、典、老當論不當？不當”。“通錢”，作“行賄”解。誣告他人行賄的罪，不連坐同居。

二、效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古代文化空前繁榮。這種狀況也為中國古代法學的發展創造了條件。認真研究《秦簡》之後，人們會清楚地看到先秦名學的形成與發展，對於法學有深刻、廣泛的影響。先秦名學為古代法學，以及法律制度的發展、變革奠定了理論基礎。作者曾撰文對此問題作過專門論述^③。這裏僅簡介名學中的幾個重要範疇的理論在《秦簡》中的反映。

效

《秦簡》中有三十餘種律令。律名多是以該律所調整的事物的名稱、或頒行該律機構的名稱而立。而祇有一種律名是以一抽象名詞“效”為名。這是一篇關於核驗官府物資財產的法律。名稱雖然抽象，但很貼切。“效”字顯然是從當時流行的名辯學中借來的。《墨子·小取》：“效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名家認為，立論需先立一個標準，然後按這一標準檢驗命題，凡符合這個標準（中效）的命題，就是正確的；否則，就不正確。秦立法者以“效”作為有關核驗官府物資財產法律的篇名，其用意顯然與名學家相同。

譬

“譬”，又稱“辟”，名學中的一種推論形式。為了闡明某一事實或原理，而找出另一已知的、與其相似的事實或原理，作類比推理說明。這種推論稱做“譬”。即名辯家惠施說的，“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④秦律中常用“譬”的方式闡明法律問題。例如：

盜封嗇夫可（何）論？廷行事以僞寫印。

鉞、戟、矛有室者，拔以闕，未有傷毆（也）？論比劍。

或與人闕，決（決）人唇，論可（何）毆（也）？比痕瘡。

臣強與主奸，可（何）論？比毆主。

決折脊項骨，可（何）論？比折支（肢）。

以上數則“法律答問”回答問題的方式相同，都是“以其所知喻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僞寫印”、“拔劍闕毆”、“毆主”等罪，如何處刑都有明文規定。因而，當發生類似犯罪時，祇需簡單回答“論比劍”、

“比毆主”等，就知道對類似犯罪如何判刑了。秦立法者在運用“譬”的方式回答問題時，還注意到了名家所說的“譬”應“以類行”、異類不比”^⑥的原則。如“盜封嗇夫”與“偽寫印”、“強與主奸”與“毆主”等，從現代刑法學的角度來看，無論在犯罪的客體和客觀方面，還是犯罪的主體和主觀方面，以及犯罪的手段都是“最相類似”。因而所回答的問題是準確的。

人類社會關係繁雜紛呈，法律不能一一作出規定。秦立法者運用名學中“譬”的推理，簡明、確切地解答了法律條文尚未規定的某些犯罪應如何處刑的問題，為古代法制的進一步完善創造了一個條件。名學中的其它範疇理論，如“故”、“類”等，對於秦律的制定都有重要影響，本文不能一一論述。總之，一部《秦律》，堪稱具體運用邏輯學的典範。這方面的內容尚待進一步爬梳整理。

三、丞署文書

“丞署文書”，丞，縣丞。此為秦漢行政制度。《後漢書·百官志》（五）載，縣、道“丞各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然而“丞署文書”，不可理解為丞於“公文末尾簽署”其名。漢簡中所見，凡縣廷發出的行政、司法文書，多是以縣丞（也有以縣令、丞連名）的名義發出的，而於文書末尾簽署的則是縣屬機構經手主管的屬吏和辦理文書的書佐^⑦，不見有由縣丞於末尾署名的文書。如《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5·19：^⑧

永始五年閏月己巳朔丙子，北鄉嗇夫忠敢言之，義成里崔自當自言為家私市居延。謹案自當毋官獄徵事當得取傳，謁移肩水金關，居延縣索關，敢言之，閏月丙子，牒得丞彭移肩水金關、居延縣索關、書到，如律令。

掾晏令史建

此文即以牒得縣丞名義發出的。文書末尾簽署的是掾與令史。其它如 218·2、560·17、16·10、495·12+506·20A 簡等，均是以縣丞或守丞、行丞事者發出的。170·3、57·10A、B 簡，則是以令和丞的名義發出的，而文書末尾簽署的是縣屬吏掾、令史、佐等等。據此，所謂“丞署文書”，即以縣丞名義發出文書。此係秦制。《秦簡·封診

式》所載爰書《封守》、《告臣》、《黥妾》等說明，凡縣廷發出的各種司法文書，均是以縣丞的名義。

四、定名縣爵里年。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39·46：鞠轂，書到，定名縣爵里年。

唐顏師古云：“名，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⑧年，年齡。《急就篇》：“籍受證驗記問年”。“定名縣爵里年”，為秦漢制度。凡追查法律責任，或審判案件，均要求先訊問當事人的“名、縣、爵、里、年”。其意義在於：一、驗明身份。二、便於確定當事人的法律責任。秦漢時，有官爵者享有一定司法特權。法律還規定幼少老耄者，可減免刑罰。

此也為秦制。《秦簡·封診式》中的《有鞠》爰書載明，審訊當事人時，務必先“定名事里”。“事”，《說文》：“職也”。

五、毋官獄徵事。

495·12, 506·20A、B：

建平五年十二月辛卯朔庚寅、東鄉嗇夫護敢言之，嘉平
□□□□案忠等毋官獄徵事，謁移過所縣邑門亭河津關毋
苛留敢言之。

十二月辛卯祿福獄丞博行丞事移過所如律令。

/掾海，守今史衆祿福獄丞印

這文件是縣廷根據鄉嗇夫的申請，為本縣居民開出的通行證明文書。鄉嗇夫在申請中務必說明該居民“毋官獄徵事”。這類簡文，如 15·19, 81·10, 218·2, 218·36, 334·20A, 340·6, 340·14A, 340·41 等簡，為居民個人開出的通行證明文書，均有“毋官獄徵事”語。意為該居民無獄訟方面的官事，不拖欠賦稅、徭役。此係秦制的發展。《秦簡·封診式》中有關“爰書”，均要求說明當事人有無“它坐罪”？“何罪赦”？

六、毋留，如詔書律令。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79·9：

匿界中。書到，遣都吏與縣令以下逐捕搜索部界

中，聽亡人所隱匿處，以必得爲故，詔所名捕重事，事當奏聞。毋留，如詔書律令。

“毋留”，即無“稽留”。《後漢書·章帝紀》：“詔書既下，無得稽留”。稽留詔書爲一罪名，應負法律責任。《秦簡》有《行書律》，對此有專門規定。《唐律·職制》對“稽緩制書官文書”規定尤爲具體。

七、弛刑。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227·8：

髡鉗城旦孫□坐賊傷人，初元五年七月庚寅論。初元五年八月戊申以詔書施刑。故騎士居延廣利里□

完城旦錢萬年坐蘭渡塞，初元四年十一月丙申論。初元五年八月戊申以詔書施刑。故戍卒居延市□

“施刑”，即“弛刑。”^①李奇云：“弛，廢也。謂若今徒解鉗鐵赭衣，置任輪作也。”^②至於弛刑的身份問題。陳直先生說：“居延木簡中，徒與弛刑，其區別徒帶有罪名，弛刑不帶罪名，或稱爲弛士”。^③需補充一點，被弛刑者仍是刑徒僅不帶刑具而已。^④

注釋

①《秦簡·法律答問》：“可（何）謂‘家罪’？‘家罪’者，父殺傷人及奴妾，父死而告之，勿治”；“可（何）謂‘家罪’？父子同居，殺傷父臣妾、畜產及盜之，父已死，或告，勿聽，是謂‘家罪’”。

②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同居考》，中華書局，1985年版。

③高恒《論中國古代法學與名學的關係》。載《中國法學》1993年第1期。

④引自《說苑·善說》。

⑤《墨子·經下》。

⑥參見陳夢家《漢簡綴述》，第104頁。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⑦以下凡未注書名者，即《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簡號。

⑧《漢書·宣帝紀》顏師古注。

⑨陳直《漢書新證》第368頁：“弛刑二字，在兩漢中，或有作施刑者，是假借字”。此說甚是。

⑩《漢書·宣帝紀》李奇注。

①《漢書新證》第 372 頁。

②參見《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元年十月、三年十二月詔令。

秦《户律》和《具律》考

彭 浩(湖北省荊州博物館)

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最主要的內容是亡佚已久的秦代法律，它們對秦代社會和中國法制史的研究無疑有十分重要的價值。秦律的律目在《秦律十八種》和《秦律雜抄》中保留了二十九種，它們是：田律、廩苑律、倉律、金布律、關市、工律、工人程、均工、徭律、司空、軍爵律、置吏律、除吏律、效律、傳食律、行書、內史雜、尉雜、屬邦、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勞律、臧(藏)律、公車司馬獵律、牛羊課、傅律、敦表律、捕盜律、戍律。在閱讀了睡虎地竹簡後便不難發現，這二十九種律目並不是秦律的全部，其主體部分，如盜、賊、囚、雜、具、戶、興等律不見於已知秦律的正式法律條文，祇是在《法律答問》和《封診式》中保留了部分內容。其中可見一部分直接引述的律條本文，還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是討論相關的法律問題。它們還包含了哪些律目與律文呢？這要從商鞅之法說起。

《晉書·刑法志》認為，商鞅之法源於李悝的《法經》，“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唐律疏義》亦有類似看法：“……魏文侯師里(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為律。”這兩種看法都把商鞅之法的律目與《法經》六篇等同起來。如果我們考查一下商鞅變法的基本內容，便會發現上述二書的說法尚不夠全面。《史記·商君列傳》對商鞅之法作了簡要的概括：“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

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門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貪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榮華”。上述商鞅之法的內容大大超出了李悝《法經》六篇的範圍，可見它還有其它的律目。

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大約是戰國晚期到秦始皇時期制訂的，出土竹簡的墓葬的年代是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 217 年）或稍後。由此可知，睡虎地出土的秦律是秦始皇三十四年統一全國律令之前秦國通行的法律，是商鞅之法的繼承和發展，並隨着統一戰爭的進行，在秦國以外的地區逐步推行。據現有知識可以判斷，《法律答問》中的部分內容可以納入《法經》六篇的範圍，還有一部分內容卻是《法經》六篇之外的，這說明秦律應還有其它的律目。例如，“嗇夫不以官爲事，以奸爲事，論可（何）毆（也）？當遷（遷）。遷（遷）者妻當包不當？不當包。”^①這條答問應與遷律有關。又如，“隸臣妾毆（繫）城旦舂，去亡，已奔，未論而自出，當治（笞）五十，備繫（繫）日”。這條答問可能是對亡律的補充和解釋。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一些。本文將討論《法律答問》中所包含的《戶律》和《具律》的內容。由於材料的限制，目前還不可能全部復原它們。

進入封建社會，戶成爲社會生產的基本單位，是國家賦稅、徭役、軍隊的基本來源。因此，國家在法律上對於戶籍的管理作了種種規定。目前所見最早的《戶律》是魏安釐王二十五年（公元前 252 年）頒行的，睡虎地竹簡的抄寫者特別注明是《魏戶律》。以往一般都認爲，《戶律》是西漢時期蕭何制訂漢律時新增加的，恐不符合歷史事實。睡虎地的秦律中沒有《戶律》，應如何解釋呢？我們認爲，這是抄寫者節略所致。有許多材料可以說明秦律是有《戶律》的。秦獻公十年（公元前 375 年），秦國“爲戶籍相伍”，已經開始登記戶籍並編爲什伍。商鞅變法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建立一套較完整的戶籍管理辦法。“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生]者著，死者削”^②，並規定了編戶什伍相司連坐、分戶、名田宅等制度。這都說明，秦律中設有《戶律》。睡

虎地秦律中有《傳律》，有人認為應屬《戶律》或者是它的分律。其實，《傳律》是關於傳籍的專門規定。一個人傳籍後便進入成年，要為國家承擔種種義務；到了一定年齡後，由於體力衰弱，便可不再為國家承擔義務。稱為免老。其中的情況比較複雜，因而《傳律》的內容不會很簡單，不可能是《戶律》的一部分。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包含有《戶律》的以下內容。

1. 什伍 “可(何)謂‘四鄰’？‘四鄰’即伍人謂毆(也)。”“大夫寡，當伍及人不當？不當。”“伍人相告，且以闕罪，不審，以所闕罪罪之。”“賊人甲室，賊傷甲，甲號寇，其四鄰、典、老皆出不存，不聞號寇，問當論不當？審不存，不當論；典、老雖不存，當論。”“吏從事於官府，當坐伍人不當？不當。”第一、二條是編戶為什伍的規定，爵位為大夫者數量少就不編入什伍。爵位在大夫以上者是否編入什伍，尚不得而知。第四、五條則指出，里、鄰之間遇事須相互救援，否則將坐罪。這與商鞅之法的有關規定是一致的。

2. 匿戶 “可(何)謂‘匿戶’及‘敖童弗傅’？匿戶弗繇(徭)，使，弗令出戶賦之謂毆(也)。”“或自殺，其室人弗言吏，即葬埋之，問死者有妻、子當收，弗言而葬，當貨一甲。”匿戶即隱匿戶口，不如實向政府申報。第一條答問說明，秦律有占戶的規定。各戶須按規定交納戶賦。孩童到了一定年齡須正式傳籍，即標誌已經成年，要承擔國家的徭役。成年人死亡後必須報官，注銷戶口。

3. 匿民田 “部佐匿者(諸)民田，者(諸)民弗智(知)，當論不當？部佐為匿田，且可(何)為？已租者(諸)民，弗言，為匿田；未租，不論□□為匿田。”商鞅變法有“名田宅”，以爵受田之舉，與答問所說的情況類似。它是政府向農民征收租賦的必要措施。匿田是為了逃避賦稅，而田宅的授予與查核往往是聯繫在一起的。因此，這條答問應與《戶律》的相關規定有密切關係。

4. 棄妻不書 “‘棄妻不書，貨二甲。’其棄妻亦當論不當？貨二甲。”此項規定，家庭內人口如發生變化要向政府申報，解除婚姻亦是如此。

5. 徙居 “甲徙居，徙數謁吏，吏環，弗爲更籍，今甲有耐，貨罪，問吏可（何）論？耐以上，當貨二甲。”秦律規定，遷徙者要向政府有關部門申報更動戶籍屬地，這與當時的什伍制度相關連的。

《具律》之名源自《法經》，它原來的內容已不可考。《晉書·刑法志》指出，漢律中《具律》的主要內容是“具其加減”。此外，再也沒有更多的說明。沈家本在研究漢律《具律》時，以唐律爲藍本，首先列舉刑制，“論其體裁，自應以刑制居先，而別條分列於後”。秦律的《具律》是否也是“刑制居先”呢？睡虎地的秦律中沒有專門的刑制律文，儘管《法律答問》中也有幾條關於刑名的解釋，還不足以推論秦律設有專門的刑制條文。從睡虎地秦律中輯錄出來的刑名有二十餘種，散見於數十條律文中，許多學者已對刑名作了專門的研究^④，有人以爲秦律的《具律》應是以刑名爲全篇之首。從現存秦律律文來看，刑名往往是與罪事相聯繫的，同一刑名在多條律文中反復出現，既缺乏充分的概括，也沒有以刑名統領罪事。這種一事一罪，以事列罪的現像說明，秦律的《具律》並沒有專設刑名的律文；同時，也反映了秦律是我國封建社會初期的法律。我國的封建法律是從魏新律開始才有專門的刑名律目和律文^⑤，並爲後來歷代法律所沿襲。

根據對《法律答問》的分析，睡虎地秦律的《具律》包含以下主要内容。

1. 對小未盈六尺者的論罪 “甲小未盈六尺，有馬一匹自牧之，今馬爲人敗，食人稼一石，問當論不當？不當論及賞（償）稼。”“女子甲爲人妻，去亡，得及自出，小未盈六尺，當論不當？已官，當論；未官，不當論。”“甲盜牛，盜牛時高六尺，陂（繫）一歲，復丈，高六尺七寸，問甲可（何）論？當完城旦。”秦律把高不盈六尺者作爲未成年人，是不具有完全行爲能力者，在法律上屬於相對刑事責任時期。在犯有較輕罪行時，一般不承擔刑事責任，如上述第一例。如犯有較重的罪，則要先行拘捕，待成年之後再行論罪，如上述第三例。因盜牛罪的處罰與盜不盈六百六十錢到二百二十錢相同，故第三例中的甲要被先行拘捕，待成年後再論罪。《倉律》規定：“隸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

隸妾、春不盈六尺二寸，皆爲小。”這些未成年的男女刑徒，大概就是依據秦律的上述規定論罪的。第二例說明，由於未成年，甲爲人妻而逃亡，如婚姻未得官方認可，則不予追究其刑事責任。漢律把年齡作爲確定完全行爲能力的標準，明確規定了相對刑事責任的年齡界限，並規定了從輕處罰的原則，如，“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⑧與秦律相比，這是明顯的進步。

2. 赦前盜千錢 “或以赦前盜千錢，赦後盡用之而得，論可（何）毆（也）？毋論。”秦律對罪犯的赦免似乎是根據罪行大小區別對待，如“群盜赦爲庶人，將盜戒（械）囚刑罪以上，亡，以故罪論，斬左止爲城旦，後自捕所亡，是謂‘處隱官’。它罪比群盜者皆如此。”秦律規定，群盜犯罪處刑較常人加重，群盜赦免後爲庶人，但須充任類似司寇的工作監領其它刑徒，如刑徒逃亡，則以故罪論群盜，斬左止爲城旦。可見赦免後的群盜並未獲得完全的自由，如有過失還要合併赦前犯罪合併論罪，從重處罰。

3. 赦後亡 “會赦未論，有（又）亡，赦期已盡六月而得，當耐。”

4. 罪犯死亡後不追訴 “甲殺人，不覺，今甲病死已葬，人乃後告甲，甲殺人審，問甲當論及收不當？告不聽。”“葆子以上未獄而死若已葬，而誦（甫）告之，亦不當聽治，勿收，皆如家罪。”以上兩例說明秦律對已死亡的罪犯不再追究罪責，也不累及妻、子。因被告死亡，原案不易查清。所以，這種規定是符合司法實際的，也是秦律追訴時效的具體反映。

5. 有罪先自告得減罪 “司寇盜百一十錢，先自告，可（何）論？當耐爲隸臣，或曰貨二甲。”司寇是一種刑徒，如再次犯罪將加重論罪。本例的司寇再次犯罪後自首，而得減罪，祇按一般人盜竊罪論處，或改判貨二甲。

6. 以爵減刑 “將上不仁邑里者而縱之，可（何）論？當毆（繫）作如其所縱，以須其得；有爵，作官府。”此例說明秦律有以爵減刑的規定。

7. 內公孫毋爵者有罪得贖 “內公孫毋爵者當贖刑，得此公士

贖耐不得？得比焉。”內公孫作為宗室，在犯罪論處時有減刑的優待。

8. 真臣邦君公有耐罪以上得贖 “真臣邦君公有罪，致耐罪以上，令贖。”“臣邦真戎君長，爵當上造以上，有罪當贖者，其為群盜，令贖鬼薪鋸足，其有府（腐）罪，[贖]宮。其它罪比群盜者亦如此。”秦律規定，已臣服的少數民族首領犯罪後可以贖罪。本例的內容或許與《屬邦》的關係更緊密一些。

9. 葆子獄未斷誣告人 “葆子獄未斷而誣告人，其罪當刑為隸臣，勿刑，行其耐，有（又）毆（繫）城旦六歲”。“葆子獄未斷而誣[告人、其罪]當刑鬼薪，勿刑，行其耐，有（又）毆（繫）城旦六歲。”葆子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⑦。上述的葆子都連續犯罪，屬累犯，本應合併加重論罪，但實際上是從輕論罪，僅處耐刑和繫城旦六歲。

10. 二罪併論 “人臣甲謀遣人妾乙盜主牛，買（賣）把錢偕邦亡，出徼，得，論各可（何）毆（也）？當城旦黥亡，各異主。”“誣人盜直（值）廿，未斷，有（又）有它盜，直（值）百，乃後覺，當異域（贓）以論，且行其罪。有（又）以誣人論？當貨二甲一盾。”“上造甲盜一羊，獄未斷，誣人曰盜一豬，論可（何）毆（也）？當完城旦。”第一、三例均為二罪合併論處。第一例中，甲有謀遣人盜牛（與盜牛同罪）和逃亡罪，乙有盜牛和逃亡罪。按秦律規定，盜牛罪處完城旦，現二罪併論，處黥城旦。第二例實際上是按兩次犯罪分別論罰，合併執行。

11. 累犯從重論罪 “當耐為隸臣，以司寇誣人，可（何）論？當耐為隸臣，有（又）毆（繫）城旦六歲。”“完城旦，以黥城旦誣人，可（何）論？當黥。”“當黥城旦而以完城旦誣人，可（何）論？當黥劓（剗）。”以上是誣告之例，同時又反映了秦律對累犯的處罰規定。誣告者原已犯罪但未論處，後因誣告又犯新罪，屬於累犯，在原應處罪上加重論罪。

12. 犯罪連坐 “‘盜及者（諸）它罪，同居所當坐’。可（何）謂‘同居’？戶為‘同居’坐隸，隸不坐戶謂毆（也）。”“律曰‘與盜同法’，有（又）曰‘與同罪’，此二物其同居、典、伍當坐之。云‘與同罪’，云‘反其罪’者，弗當坐。”“甲誣乙通一錢黥城旦罪，問甲同居、典、老當論不當？不當。”秦律的連坐有兩種情況，一是任何犯罪都要連坐同居；二

是法律同時規定了“與盜同法”和“與同罪”的犯罪連坐同居、典、伍。

13. 憲盜別檄而盜加罪 “害(憲)盜別檄而盜,駕(加)罪之。”
·可(何)謂‘駕(加)罪’?·五人盜,臧(贓)一錢以上,斬左止,有(又)黥以爲城旦;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劓(劓)以爲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爲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遷(遷)之。求盜比此。”憲盜和求盜都是專司捕盜之吏,如犯盜竊罪要加罪論處。這條答問把盜竊罪分作過六百六十錢,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三等。秦律對一般的盜竊罪的論罪標準如下兩條:“士五(伍)甲盜……臧(贓)直(值)過六百六十,黥甲爲城旦。”“士五(伍)甲盜,……臧(贓)直(值)百一十,……甲當耐爲隸臣。”由此可知,憲盜參與五人行盜視如“群盜”,加處斬左止;如五人以下行盜,按一般盜竊罪加一等論罪。

睡虎地秦律中的《具律》的基本內容包括確定刑事責任能力的標準、免罪、減罪、加罪的具體規定。這部分內容以“具其加減”爲主,並爲後來的漢律所繼承。當然,以上所討論的僅是《具律》的部分內容,但它們確是《具律》的基本內容。

注釋

①本文引用的睡虎地秦墓竹簡見於《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版。

②《商君書·境内》。

③沈家本:《歷代刑法考·漢律摭遺》卷九,具律一。中華書局,1985年第1版。

④黃展岳:《雲夢秦律簡論》,《考古學報》1980年第1期。

栗勁:《秦律通論》,第五章秦律的刑罰體系。山東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劉海年:《秦律刑罰考析》,《雲夢秦簡研究》,中華書局,1981年第1版。

張晉藩:《中國法制史》,第五章第二節秦律的刑罰制度。羣衆出版社,1985年第1版。

⑤《晉書·刑法志》引魏《新律》序:“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

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

⑥《漢書·惠帝紀》。

⑦張政娘：《秦律“葆子”釋義》，《文史》第九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

睡虎地秦簡《日書》“反支篇”及其相關問題

劉樂賢(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睡虎地秦簡《日書》“反支篇”由兩條竹簡組成，其全文如下：

反枳(支)：子丑朔，六日反枳(支)；寅卯朔，五日反枳(支)；辰巳朔，四日反枳(支)；午未朔，三日反[枳(支)]；申酉朔，二日反枳(支)；戌亥朔，一日反枳(支)。復卒其日，子有(又)復反枳(支)。一月當有三反枳(支)。^①

這篇東西以“反枳(支)”為標題，講的是如何確定哪一天為反支日。從簡文看來，確定反支日的依據是每月朔日(第一日)的地支，有了這個地支以後再根據一定的規則就能準確地推算出每個月的三個反支日。反支在不少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中都出現過，看來在古代是一項比較重要的擇日項目。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它作一些簡要的論述。

一、“反支”的各種寫法

文獻中的反支，在《日書》此篇寫作反枳，枳、支是通假字。^②銀雀山漢簡的漢元光元年曆譜把反支寫作反，大概是一種省略的叫法。此外，李學勤老師考證《日書》的“艮山圖”時，指出該圖說明文字“從上右方數朔之初日及枳各一日……”的“枳”也是“反枳”的省略^③。需要指出的是，漢元光元年曆譜九月的“甲子”、“丙子”二日下標有一個“子”字。根據推算，這兩天正好是反支日，這兩個“子”字的含義很令人費解，它們是否是反支的另一種特殊表示法，現在尚難斷定。

二、秦漢反支的差異

整理小組對“反支”作了一個簡略的注釋：“《後漢書·王符傳》

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按：《陰陽書》這一段文字，陳夢家先生在《漢簡綴述》中有更詳細的解釋^④。他曾用列表的方式對反支作了更清晰的描述：

戌亥	申酉	午未	辰巳	寅卯	子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從上表看來，如果某一月的朔日之地支是戌或亥，那麼該月第一日、第七日、第十三日、第十九日、第廿五日等五天都是反支日，其餘各種朔日情況相同。由此看來每月必定有五個反支日，這與上面《日書》“反支篇”最後一句“一月當有三反枳(支)”顯然不同。怎樣看待這種不同？首先得驗證一下陳氏的表是否正確。反支在漢代好幾種曆譜中都曾出現，但大多殘缺不齊，難窺其全豹^⑤。所幸銀雀山漢武帝元光元年曆譜殘損較少，又標有全年十三個月(有一個閏月“後九月”)的所有反支日^⑥。從該曆譜來看，除了第二月祇有四個反支日(該月是小月，祇有二十九天)外，其餘十二個月每月都有五個反支日。由此看來，陳氏的表是正確的。那麼是不是《日書》“一月當有三反枳(支)”的“三”字是“五”字的誤寫呢？我們以前曾持這種看法^⑦。但是最近通過對反枳(支)篇的反復推敲，我們改變了看法。原來《日書》“反支篇”中有一句重要的話，我們以前沒有重視。“反支篇”原文講完以各種地支爲朔日的反支日後緊接着有“復卒其日，子有(又)復反枳(支)”一句。這句話是什麼意思？關鍵在於“日”指什麼。我們知道，“反支篇”用的是干支紀日法(實質上是地支紀日法、天干不影響反支的推算)，確定反支日的依據是朔日的地支。而地支是以十二爲單位進行輪迴的。所以我們認爲“復卒其日”，乃是再接着數完十二地

支中剩下的那些日子。舉例來說，假如朔日的地支是子，第6日巳日是反支日，然後再接着數完十二地支中巳日以後的日子，那樣就輪到了下一個子日，所以簡文接着說“子有(又)復反枳(支)”。這樣一來，每月就祇有三個反支日了。因為每月祇有三十天左右，十二地支最多祇能輪流用三次。如此看來，《日書》“一月當有三反枳(支)”的話也是正確的。可見，秦簡《日書》與漢代曆譜中的反支日在具體推算上是有差異的。那麼是不是說漢代及以後的一月五反支是由秦簡一月三反支發展而來的呢？要回答這一問題，還得先弄清楚“反支”二字的本義。

三、反支溯源

《欽定協紀辨方書》卷六“反支”條下云“按反支之義惡其將盡也。戊亥朔，本日即支將盡矣；申酉朔，則在二日；午未朔，則在三日。胥同此例也。”這種說法是難以令人滿意的。戊亥為朔日，則第一日（即戊亥日）的地支固然“盡”了；然子且為朔日時第六日（即巳日）的地支何嘗“將盡”了呢（其後還有午、未、申、酉……）？

在這裏，我們以漢元光元年曆譜為依據對反支的本義提出一種新的解釋。為了便於觀察，我們對該曆譜的月序略作調整，並省略掉了與反支無關的各日，製成一表：

月份 朔日 反支日期

地支

12	子	六日	十二日	十八日	廿四日	卅日
		癸巳	己亥	己巳	辛亥	丁巳
2	子	六日	十二日	十八日	廿四日	
		癸巳	己亥	己巳	辛亥	
10	丑	六日	十二日	十八日	廿四日	卅日
		甲午	庚子	丙午	壬子	戊午
9	寅	五日	十一日	十七日	廿三日	廿九日
		戊午	甲子	庚午	丙子	壬午

7	卯	五日 己未	十一日 乙丑	十七日 辛未	廿三日 丁丑	廿九日 癸未
5	辰	四日 己未	十日 乙丑	十六日 辛未	廿二日 丁丑	廿八日 癸未
3	巳	四日 庚申	十日 丙寅	十六日 壬申	廿二日 戊寅	廿八日 甲申
1	午	三日 庚申	九日 丙寅	十五日 壬申	廿一日 戊寅	廿七日 甲申
11	未	三日 辛酉	九日 丁卯	十五日 癸酉	廿一日 己卯	廿七日 乙酉
後 9	申	二日 乙酉	八日 辛卯	十四日 丁酉	廿日 癸卯	廿六日 己酉
8	酉	二日 丙戌	八日 壬辰	十四日 戊戌	廿日 甲辰	廿六日 庚戌
6	戌	一日 丙戌	七日 壬辰	十三日 戊戌	十九日 甲辰	廿五日 庚戌
4	亥	一日 丁亥	七日 癸巳	十三日 己亥	十九日 己巳	廿五日 辛亥

如果將上表再略作簡化，祇取地支的對應關係，則又可歸納出下面一表：

朔日 地支	反支日地支				
子	巳	亥	巳	亥	巳
丑	午	子	午	子	午
寅	午	子	午	子	午
卯	未	丑	未	丑	未
辰	未	丑	未	丑	未
巳	申	寅	申	寅	申

午	申	寅	申	寅	申
未	酉	卯	酉	卯	酉
戌	戌	辰	戌	辰	戌
亥	亥	巳	亥	巳	亥

顯然，朔日爲子，則反支日必爲巳、亥；朔日爲丑，則反支日必爲午、子。其它依此類推。將上表再作歸納，就會發現以上十二地支爲朔日，其相應的反支日之地支祇有巳、亥，午、子，未、丑，申、寅，卯、酉，辰、戌等六種對應組合。而這六種組合中，巳與亥，午與子，未與丑，申與寅，卯與酉，辰與戌每組之間都恰好相差六個單位。如將十二地支均勻分布在一個圓盤上（如六壬式盤），則此六組地支恰好是相對稱的（例如巳與亥是相對稱的）。如此看來，反支的本義可以這樣理解：“支”是指地支，“反”是指地支的位置相對立。十二地支中，本來就祇有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六種對立關係。所以，我們從漢元光元年曆譜中看到總是每隔六天注一反支日，一個月三十天共有五個反支日。

從以上的分析看來，反支的本義就是指對立的地支。以漢元光年曆譜爲代表的一月五反支日符合反支的本義。如此，則不能說一月五反支是從一月三反支發展而來的。相反，我們懷疑，最初的反支日很可能是一月五反支，到睡虎地秦簡《日書》時代的一月三反支乃是爲了減少每月中反支數目而做的調整。到漢代，又恢復了原來的規定。我們希望將來能在戰國或戰國之前的墓葬中能發現一月五反支的材料。

四、反支日的禁忌

需要注意的是，《日書》反支篇的記載並不完整，它指明了與各種不同朔日相對應的反支日在第幾日，每月有幾個反支日。但是，它並沒有說明值反支日該幹什麼和不該幹什麼。關於這一點，在傳世典籍中還有所記載。《後漢書·王符傳》：“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王符《潜夫論·愛日篇》載明帝“乃勅公車受章，無避反支”。可見，在漢代反支日有不受章奏的禁忌，祇是由於它不利於當時王朝的行政管理，

故皇帝下令不避反支。又《漢書·游侠傳》顏師古注引張竦會反支日不去，反爲賊所殺，《顏氏家訓·雜藝》評曰：“反支不去，竟以遇害。”可見，反支日又有不可行走的禁忌。漢代醫書《黃帝蝦蟆經》又有反支日不可灸刺、服藥之說。^④後來的選擇通書如明顧乃德編《發微大統曆正通書》、清李光地等編《星歷考原》等則都祇說“其日忌上表章”。《協紀辨方書》沿用通書之說並指出：“推此而言，則結婚姻、納財等事亦必有應忌者。而曆例止言忌上表章，蓋古之陰陽書傳者蓋少，而曆例則據《後漢書》‘公車不受章奏’而言忌上表章也。”惜“反支篇”有缺佚，不能驗證《協紀辨方書》的推測是否準確。

最後要說明的是，後代的數術書籍中又有所謂年反支、月反支者，因與本篇關係不大，這裏不加討論。

附記：本文是根據筆者博士學位論文《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中有關部份改寫的。在論文寫作過程中曾得到李學勤、曾憲通二位老師的指導和關懷，在此特表謝意。

注釋

①《睡虎地秦墓竹簡》第227頁（釋文部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②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中“取桃東枳”即取桃東枝，枳，枝通用，猶本篇枳、支通用。

③李學勤《睡虎地秦簡中的〈艮山圖〉》，《文物天地》1991年4期。

④陳夢家《漢簡綴述》之《武威漢簡補述》部分，中華書局1980年版。

⑤參見張培瑜《出土漢簡帛書上的曆注》，《出土文獻研究續集》第135至147頁，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⑥參見吳九龍《銀雀山漢簡釋文》及所附《漢元光元年曆譜》復原圖，文物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⑦李學勤老師也持這種意見，見③“所引文”。

⑧《黃帝蝦蟆經》，中醫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又請參閱《醫心方》卷二所引《黃帝蝦蟆經》。

從放馬灘《日書》(甲種) 再論秦文化的特點

林劍鳴(法律出版社)

1986年4月在水放馬灘發現的秦簡《日書》甲種本，經過秦簡整理小組整理、考訂，其釋文已發表在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之《秦漢簡牘論文集》中，從而使廣大簡牘研究家和愛好者得睹又一種簡牘《日書》全文。在同一論文集中，又有這一珍貴資料的第一手整理者何雙全作的《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對新公布的《日書》及釋文內容進行極有見地的嚴密考索、評述，實為一篇簡牘研究之力作。拜讀《釋文》及《考述》後獲益良多，啓迪匪淺，同時引起對放馬灘《日書》的極大興趣。因而不忖班門弄斧，就雙全同志所論之未盡之意，補充發表一點淺見。

天水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的發現和有關資料的公布，對研究中國古代，尤其是戰國、秦漢時代的文化提供極其可貴的資料。至目前為止，我們已知有四種版本的《日書》簡。其實，若仔細尋索簡牘中的《日書》資料，絕不止這四種，就在1972年—1974年及1976年，1982年新出土的一萬九千餘枚居延漢簡(通稱《居延新簡》)中，也有不少《日書》殘簡，如：

“𠄎五月不肥命 天候在中 五月移徙吉凶 西北殷光

𠄎𠄎功𠄎𠄎𠄎……吏卒失亡 正北吉昌。”(E·P·T5: 57A^①)

“𠄎戊

丑	酉	申

 壬

𠄎(簡而右側有一圖像)”

(E·P·T5:79)

“□·□□良日己丑己巳丁丑辛巳乙酉己丑丁酉□”(E·P·T6:99)”宗廟齋

廿二日丁卯開

廿三日戊辰閉月虛下臨□

廿四日己巳建重

廿五日庚午除”

(E·P·T8:12)

這一類內容的殘簡還可以舉出不少，從殘存的簡文看，也應是《日書》一類文書。因此，在已出土的各種簡牘中《日書》的資料決不止四種，零星的資料尚有很多，若認真搜尋、綴合必將有所發現。這方面的工作，應是《日書》學者們不致忽略的吧？

不過，就日前所發表的資料來說，還祇有《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日書》甲、乙本，和放馬灘《日書》甲種本最為完整，具有研究價值。研究《日書》仍是以這三種版本為主要依據，從最新出土的放馬灘《日書》已公布的 73 枚甲種本釋文中，對照以前發表的《睡虎地秦墓竹簡·日書》甲乙兩種版本，無疑會發現兩批三種《日書》簡牘文字內容大同小異。其中“大同”顯而易見，正如何雙全同志指出的：“這兩部《日書》如一對同產兄弟，是那樣相似”^②。在“小異”方面，何文也有精闢論述。最後，雙全同志得出結論說：“《放》是純秦《日書》，《睡》簡是純楚《日書》，儘管有秦的成分，但主體不同於秦，他代表的是秦代楚人的思想。”得出了“秦人重政治輕鬼神，而楚人重鬼神輕政治，鬼神觀是非常嚴重的”結論^③。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筆者也曾撰文妄論秦國、秦地、秦人“重功利，輕仁義”的價值觀^④。《放》簡《日書》的發表，更進一步為這一觀點提供了佐證。若從《放》簡《日書》和《睡》簡《日書》兩者異同的比較中研究這個問題，則不無裨益。

首先，從總體內容上看：“《放》簡少而略；《睡》簡多而複雜”。確是如此。若再深入研究，就會發現兩者簡、繁中透露出秦、楚不同的文化特點的信息。現在，先將三種《日書》章目對照於後：

《放》簡《日書》	《睡》簡《日書》章目	
甲種本章目	甲種本	乙種本
月建 建除 亡者 吉凶 擇行 擇男 生子 禁忌	除 秦除 稷辰 玄戈 歲 星 病 音 室 忌 土 作 毀 直 室 門 行 歸 引 到 室 生 子 人 字 娶 妻 作 女 吏 夢 詰 盜 者 禹 須 衣 馬 忌 上 枳 反 馬 祝 祝	(除)無標目 徐 秦(相當稷辰) 木日 馬日 牛日 羊日 豬日 犬日 鷄日 見 人 (星)(無章目) 人口 男子日 室忌 蓋屋 蓋忌 垣牆日 除室 褻冠 初人 寄 室 見 引日 引者 入宮 引忌 引祠 引行祠

《放》簡《日書》 甲種本章目	《睡》簡《日書》章目	
	甲種本	乙種本
		<div> <div>□</div> <div>祠</div> <div>祠</div> <div>亡日</div> <div>亡者</div> <div>見人</div> <div>有疾</div> <div>病</div> <div>夢</div> <div>穿戶寄</div> <div>嫁子</div> <div>不可娶妻</div> <div>入宮</div> <div>生</div> <div>失火</div> <div>盜。</div> </div>

從以上簡單的對照中可以看出：《放》簡章目較《睡》簡少得多，這是不言自明的。而值得注意的是《放》簡《日書》所保留的均係百姓日常生活實際所需解決的問題，如擇日，求亡者，問吉凶、生子等等，而與《睡》簡《日書》相較所少的內容，一大部分皆係與鬼神有關。如《睡》簡《日書》甲種“詰”幾乎通篇皆言鬼：“鬼害”、“人毋故鬼攻之不已”、“鬼惑之”、“鬼恒從人游”^⑤。又如《睡》簡《日書》甲種本雖言疾病，亦通篇鬼、祟：“甲、乙有疾：父母為祟。”“丙、丁有疾：壬父為祟”；“庚、辛有疾：外鬼傷死為祟”^⑥等等，不勝枚舉。而這些章目在《放》簡《日書》中根本闕如。以至在這裏找不到“鬼”、“神”、“祟”這一類的字眼。

如果說僅從《放》簡章目闕如的內容難以證明其對鬼神忽視的話，那麼從《放》簡《日書》與《睡》簡《日書》共同皆有的章目比較，則可更有力的說明問題。現在，我們取《日書》中最重要的、而且在已公布的三種《日書》中皆有的“建除”為例，試從它們細緻不同之處，發掘它

們各自反映出的文化特點。為醒目起見，依然列表如下：

《放》簡《日書》 甲種本“建除”	《睡》簡《日書》建除	
	甲種本	乙種本
建日，良日矣。 可為齋夫，可 以祝祠，可以畜 六生。不可入黔首。 (13)	建日：良日也。 可以為齋夫，可 以祠。利棗(早) 不利莫(暮)。可 以入人、始寇(冠)、 乘車，有為也，吉。 (743·2)	建日：利□□ □□□□□□ □□□利寇(冠)， 帶劍，乘車□ (933·1)
除日，逃亡不得 癘疾死。可以治齋 夫，可以癘言， 君子除罪 (14)	除日：臣妾亡， 不得。有癘病， 不死。利市責勞 □□□除地、飲 (飲)樂、攻盜， 不可以執。 (744·2)	徐日：可以請 謁，有□□□ □□□□□□ □□□□。 (934·1)
盈日，可築間牢， 可入生。利築 宮室，為小齋夫， 有疾難療。 (15)	盈日：可以築間 牢，可以產，可 以築宮室、為齋 夫，有疾難起。 (745·2)	吉、實日，皆 利日也，無不 可有為也 ^⑦ (935·1)

《放》簡《日書》 甲種本“建除”	《睡》簡《日書》建除	
	甲種本	乙種本
平日，可取妻、 祝祠，賜客， 可以入黔首。作 事吉。 (16)	平日：可以娶妻， 入人，起事。 (746・2)	同上
定日，可以臧 爲府，可以祝 祠。(17)	定日：可以臧， 爲宮府，室祠。 (747・2)	審日：可以入 馬牛、臣囡 ^⑧ (936・1)
執日，不可行， 行遠必執而於公。 (18)	摯日：不可行。 以亡，必摯而入 公而止。 (748・2)	敷日：可以入 臣妾、駕駒□ 囡 ^⑨ 。 (937・1)
彼日，毋可以有 爲矣。雖利彼水。 (19)	被日：毋可以有 爲也。 (794・2)	衝日：可以攻 軍、入城及行。 不可祠 ^⑩ (938・1)
危日，可以責人 及執人繫人外政 (20)	危日，可以責摯、 攻擊 (750・2)	剽日：不可以 使人及畜六畜， 它毋有爲也 ^⑪ (939・1)

《放》簡《日書》 甲種本“建除”	《睡》簡《日書》建除	
	甲種本	乙種本
成日，可以謀事， 可以起衆，及 作有爲矣，皆吉。 (21)	成日：可以謀事、 起□、興大事 (751·2)	虛日，不可以 臧蓋。臧蓋， 它人必發之，毋可 有爲也。 用得，必復出。 (940·1)
收可以民馬牛畜 生盡可及人禾稼 可以居處 (21)	收日：可以入人 民、馬牛、禾粟、 人室、娶妻及 它物 (752·2)	吉、實日，皆 利日也，無不 可有爲也。 (935·1)
開日，逃亡不得， 可以言盜，盜 必得 (18)	開日：亡者不得， 請謁得言。盜 得 (753·2)	同上
閉日可以決池入 人奴妾(20)	閉日：可以劈決 池，入臣徒、馬 牛、它牲 (754·2)	閉日：可以蓋 臧及謀，毋可 有爲也 (941·1)

上列三種版本的《日書》建除，內容和排列次序大體一致，這就有了可比性。比較它們之間文字的差異，可以看出：《睡》簡的甲、乙兩種版本在文字繁、簡方面雖有差異，但一些關鍵性的內容和詞語則沒有

區別。例如：《放》簡在 13 和 16 即建日和平日兩次出現“黔首”這個詞：“不可入黔首”，“可以入黔首”。而《睡》簡甲、乙兩種版本中都不見“黔首”字樣，相反，在《放》簡中獨缺《睡》簡甲、乙兩種版本中均有的“臣”這個詞。《睡》簡甲種本有“臣妾亡”（744·2）、“入臣徒”（754·2），乙種本有“臣囚”（436·1）。《放》簡中雖有“人奴妾”等與之相近的詞，唯缺“臣”字，這次不是偶然的。其反映的意義，後面再論，這裏需要指出的就是：《睡》簡《日書》甲、乙本雖有文字上的差異，但是以反映文化特點的關鍵性文字則有更多的相似之處；而《放》簡《日書》與《睡》簡《日書》甲、乙本所表現的差異，則顯示出其不同的文化特點。所以，儘管是幾個字的不同，卻是十分關鍵，這是值得注意的。

“臣”字在《睡》簡和《放》簡中的有無，決不是孤證，與此相近的還有《睡》簡中的“謁”和“冠”字，亦不見於《放》簡。《睡》簡甲種本“建日”有“始冠”（743·2），乙種本“建日”有“利冠”（933·1）。《睡》簡甲種本“開日”有“請謁得言”（753·2），乙種本“徐日”有“可以請謁”。而“謁”和“冠”這兩個字均不見於《放》簡《日書》“建除”篇，更無論“始冠”，“利冠”，“請謁”這些具有更濃厚人文色彩的專有詞了。

“臣”、“始冠”、“利冠”、“請謁”這些詞的有無，實際是反映“禮”制的影響大小不同。例如“臣”最初雖係“囚俘”之謂^②，但到後來，“臣”則已具有禮制的意義：《論語·顏淵》：“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左傳·昭公七年》：“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興，興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僚臣臺。”孔穎達疏：“此云王臣公者，謂上以下為臣。”這裏，“臣”乃是上下、尊卑制度專門詞，而這個詞又泛指配屬關係，《易·蹇》：“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虞翻注：“觀乾為王，坤為臣。”《禮記·樂記》：“宮為君，商為臣”。漢，班固《白虎通·日月》“日為君，月為臣也。”至於“冠”和“謁”的禮制意義就更明顯了。《禮記·曲禮上》“男子廿冠而字。”鄭玄注：“成人矣，敬其名。”《孟子·滕文公下》“丈夫之冠也，父命之。”《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戰國策·秦策一》：“臣請謁其故。”“冠禮”是儒家經

典中重要制度，“請謁”也是嚴格的上下、尊卑關係中一個專門用語。這並非說秦地和秦國直到戰國末年和秦代尚無規定君臣上下尊卑的制度和加“冠”、“請謁”等禮法。而是說作為民間通用的《日書》，儘管社會上層已逐漸接受了關東地區和廣大南方早已深入人心的禮制，而在反映中下層民俗的《日書》建除法中尚沒有多大的影響。

與此相關的還有一個現象值得玩味：《睡》簡《日書》“建除”中有“利早不利暮”(743·2)“興大事”(751·2)這類較為抽象，無具體內容的指示詞句。而《放》簡《日書》中與此對應的就祇是一些具體的事物，如“可以畜六生”(13)“可以起衆”(21)等等。皆指具有物像的事物。對比之下，就顯得“利早不利暮”、“興大事”令人感到神秘莫測。而這正反映了兩種《日書》不同的文化特點。

概言之，《睡》簡《日書》和《放》簡《日書》“建除”一章雖僅有文字上的小異，而這些關鍵性的差異中，卻顯出楚、秦兩種文化特點的不同；《睡》簡有較多的禮制影響和較濃的神秘色彩，反映了楚文化的特點；《放》簡則相反，顯得質樸而具體，因此少有禮制、道德以及鬼神的影響，反映了秦文化“重功利、輕仁義”的特點。

關於秦文化的特點以及秦、楚文化特點的異同，已有許多論著發表。尤其是李學勤先生的一系列著作從考古學及文化史角度都作了透徹精辟剖析。這裏祇從排比《日書》資料中，提供一點佐證而已。不過，在此尚想就秦、楚文化在秦漢時代的融合過程畫一“蛇足”。

秦統一前，關中的秦國與關東六國在文化特點上顯然的不同，尤其表現在文化深層即心理素質和價值觀方面有明顯的反差：秦國“重功利，輕仁義”，貪多務大，不甚重視鬼神。關東各國包括楚國在內，大多“重道德、輕功利”敬事鬼神，信仰天命。這兩種迥然不同的價值觀和天命觀在《日書》中有明顯的反映，已如上述。隨着秦國統一中國的進行，關東和關中兩種文化的融匯勢所必然。但是，這決非意味着統一國家的出現，當秦王朝在公元前 221 年統一天下之後，東、西方文化就會立即匯而為一，從《睡》簡和《放》簡兩種《日書》中所表現出的差異，就可說明這個問題：《睡》簡的年代大約晚至秦始皇三十年（前

217 年)左右^⑨，《放》簡埋入地下時間，大約也在秦始皇三十年^⑩，都在秦統一中國四年之後。當然，從兩種《日書》中可以看到有秦、楚文化匯融的趨勢，如《睡》簡中記有秦、楚記月法關係的 793—796 簡：“正月，楚刑夷(796)“二月，楚夏尿”(793)等等。這一組簡出現一方面說明：在《日書》這種社會流行的數術書上有溝通秦、楚兩種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秦國佔領關東地區(包括南方楚地)之後，在文化方面與當地並非立即就可溝通。事實也應如此：儘管隨着秦國軍隊前進的步伐，關東各國先後均被消滅，至始皇廿六年(前 221 年)“海內爲一統”^⑪。在統一後，秦始皇又推行了統一全國的各種政治、經濟、文化措施、建郡縣、修馳道、墮壁壘、統一車軌、文字、度量衡等等。這些制度在加強統一方面確也起到極大的作用，但文化方面的統一決非秦代十餘年能完成的。這裏說的文化主要指文化的深層——心理素質和價值觀。終秦王朝一代，統一後的十五年間，直到秦亡楚和秦對立的心理並沒有消除，從秦吏卒對楚服役者“遇之多無狀”^⑫，到楚將項羽在公元前的新安坑卒，殺秦卒二十餘萬這一系列事實都可得到證明。楚、秦間的這種對立不僅是政治上的統治與被統治關係的對立。而且有文化心理和價值觀的差異，楚人的價值觀在項羽行動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公元前 206 年秦王子嬰投降劉邦後，擁兵四十萬的項羽，本來可輕而易舉的從僅有十萬之衆的劉邦手中接過秦皇玉璽，繼續統一全中國。然而他面臨着統一王朝的皇位棄之不坐，卻在“屠咸陽”之後“心懷思欲東歸”，一句話道出了他當時嚮往的是什麼：“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⑬。原來他追求的目標是在故鄉光宗耀祖，這就是他的價值觀。在他看來繁華的咸陽，廣袤的國土都不如在父老鄉黨們面前揚名顯貴的重要。這與秦始皇追求的“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要把統治的權力伸到“日月所照，舟輿所載”^⑭的欲望形成多麼明顯的反差！難怪秦地人說“楚人沐猴而冠”，再聯繫項羽在鴻門宴上對劉邦表現的“婦人之仁”種種不務實際的道德觀，和烏江被困臨死前反覆哀嘆“時不利”、“天之亡我”、“奈何”及無顏見江東父老的心情。十分明顯地流露出項羽深受仁義道德、天命的影響，

與秦人追求功利的價值觀是完全不同的。而在項羽身上表現出的，也正是楚文化最深層的特點。由此可見，秦、楚文化之不同，在價值觀方面一直至秦漢之際尚十分明顯。如果說秦統一中國後，秦、楚之間，或秦與關東各地文化方面的統一也在秦代十餘年內完成了。這顯然是不正確的。

秦獨特的文化與東方各地文化最後融合和統一，應完成於漢代武帝以後。關於這個問題已非本文所能包容，當在另外論著中闡述³⁹，放馬灘《日書》的問題就做為引玉之磚，在此拋出，祈海內外專家指正。

注釋

①《秦漢魏晉出土文獻——居延新簡》，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本文所引《居延新簡》釋文及編號均依據此書。

②③④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載《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④《從價值系統看秦文化的特點》，載《歷史研究》1987年3月；《秦人價值觀與秦的統一》，載《人文雜誌》1988年2期；《秦俑效應和秦文化的整合》，載《文博》1989年5期。

⑤⑥見《雲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其中個別釋文參酌臺北《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簡牘篇三》。

⑦饒宗頤先生考證：“兩吉日即盈（滿）日及收日。實日即平日及開日。”見《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⑧ 日即定日，見饒宗頤：《雲夢秦簡日書研究》。

⑨“敷日”即“墊日”“執日”。“敷”亦作“微”，見饒宗頤《雲夢秦簡日書研究》。

⑩“衝”即“衝”，“衝日”即“破日”、“被日”。《淮南子·天文訓》：“申為破、主衝。”然簡作“衝日”，見饒宗頤《雲夢秦簡日書研究》。

⑪“剽日”即“危日”。《淮南子·天文訓》：“酉為危，主杓。”秦簡《日書》則作“剽日”。杓為剽之同音通假。

⑫《禮記·少儀》：“臣則左之”鄭玄注：“臣，謂囚俘。”孔穎達：“臣，謂微伐所獲民虜者也。”

⑬見《雲夢睡虎地秦墓》第三章“墓葬分期，墓主身份及墓葬文化特徵”，文物出版社 1981 年一版。

⑭《史記·秦本紀》

⑮《史記·項羽本紀》

⑯《史記·項羽本紀》

⑰《史記·秦始皇本紀》

⑱這一問題筆者在《劉邦對統一中國的貢獻》一文中詳加闡述。拙文載《劉邦研究》1992 年 2 期。

雲夢龍崗秦代簡牘述略

梁 柱 劉信芳(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9年10—12月,省、地、縣的文物考古工作者為配合當地的工程建設而在湖北省雲夢縣龍崗進行了一次發掘,共掘得秦漢墓九座。其中M6出土了木牘1方、竹簡約150餘枚。經考證,M6的時代約當秦代末年,簡牘係秦統一後頒發的法律文書,其字體屬秦隸,內容有不少與睡虎地M11的秦律(統一前頒發)一脈相承,對研究秦代歷史尤其是秦法律、文字的演變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龍崗M6位於雲夢縣城郊的“楚王城遺址”南垣外,與城址西垣外的睡虎地M11直線距離約3公里,是一座小型的長方形土坑豎穴木槨墓,墓口南北長3.2米,東西寬2.15米,墓坑深2.94米。一槨一棺,被裹置於墓坑內的青膏泥填土層中。棺內以竹席裹屍,尚存人骨架,似係男性,側身葬式,頭北面西,唯不見其腿以下肢骨。隨葬品中的陶器、漆器等置於槨室頭廂,竹簡、木牘等則置於棺內。

竹簡出自棺內足擋處,保存較差,多殘斷散亂。為整理方便,清理者將竹簡編了293個整理號(包括殘片10個號)。根據完整的簡和殘簡端、簡末之數量推算,有150餘枚竹簡,每簡上有上、中、下三道編綸,但繫綸處的簡側無契口。推測這批簡原為一冊,下葬時被捲置於棺內的。完整的簡長28,寬0.5—0.7,厚約0.1厘米。簡文係墨書秦隸,寫於簡的篋黃面上,一簡可達24字(253簡),簡背面沒有字跡。簡正面上半部的字跡一般較清晰,下半部的多漫漶甚或朽穿而難以辨認。書寫風格統一,字距排列有序,疏密有致。字體取長方結體、斜向(自左向右傾斜),筆道勁快,似係一人所書。從字體結構看,既區別

於圓渾、均勻的篆體，又不同於方整趨橫勢的漢隸，應是成熟的秦隸。簡文的格式與睡虎地秦簡相類似，有重文號（寫作兩點）和勾號（寫作✓）；重文號著於相重簡文的右下角，約佔半個字距；勾號著於簡文右邊，係句讀標識，但用例少。如：

而輿輓疾毆入：之其未能桃亟葭□□□毋令獸□□□□（252簡）

城旦舂其追：盜：賞：亡：□出入□□亡者得□□□（261簡）

部主者各二甲✓令丞令史各一甲圖□（188簡）

由於竹簡保存較差，殘斷嚴重，又無自題之律名，綴聯、考釋工作困難較大，簡文不能全篇通讀。爲了敘述方便，考釋者祇作有限的綴聯，根據簡文內容將其分爲五類，並題篇名《禁苑》、《馳道》、《馬牛羊》、《田贏》、《其它》，其中《禁苑》律文係龍崗秦簡的主要內容。據初步統計，150餘枚簡共殘存1770餘字，其中《禁苑》佔60餘枚簡約600餘字。

禁苑係帝王苑囿，秦漢行宮多設於禁苑內。史載秦始皇統一天下後，頻繁出巡，三十七年“行至雲夢”，“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臺”。龍崗簡明確地記載了雲夢、沙丘二禁苑和始皇舍禁苑事：

諸假兩雲夢節以及有到雲夢禁中者得取濯□□□（278簡）

南郡用節不給時令□（148簡）

沙丘苑中風荼者□□（195簡）

從皇帝而行及舍禁苑□□□□發□□□□□（263簡）

雲夢在秦時屬南郡轄境，睡虎地秦簡有南郡守騰頒發的文告（《語書》），今據龍崗簡可知雲夢設有禁苑，由南郡頒發的符節可隨時出入禁苑。那麼，雲夢禁苑故址在哪裏呢？睡虎地和龍崗兩批秦簡均出自雲夢，都提到禁苑，龍崗簡更明確記載“雲夢禁”苑，說明其地望可能就在今雲夢境內。雲夢縣城郊有一座東周秦漢時期的“楚王城遺址”，面積約11平方華里，有一周夯土城垣，城內還有夯土中城垣將其分爲東城和西城。以往在城址內所做的考古發掘工作較少，對於該城的作用也衆說紛紜。龍崗秦簡爲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線索：即該城

址與雲夢禁苑的關係，二者是否可劃等號，值得注意。

有關禁苑的管理，龍崗簡有不少記載，如：

諸禁苑爲與，去苑卅里禁，毋敢取與中獸，取者□罪□盜禁中□
𠄎(274 簡)

禁苑嗇夫、吏數循行，垣有壞及獸道出及獸出在外，亟告縣(253 簡)

諸取禁中豺狼者毋罪(258 簡)

黔首犬入禁苑中而不追獸及捕[獸]者，勿[敢]殺，其追獸及捕獸者，殺之。河禁所殺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殺者]，食其肉而入其皮(238、235②、殘 7②、110、91、164、24 簡)

時來媵，黔首其欲弋射與獸者勿禁(256 簡)

寶出入及毋符傳而闌入門者斬，其男子□□□□𠄎(272 簡)

亡入迹，以弩矢居禁中者棄□𠄎其□𠄎(269 簡)

由上可見，禁苑真是護衛森嚴，有一整套嚴格的管理制度：禁苑有垣牆圍築，設有管理官員——嗇夫和吏，他們需經常巡邏，有情況得報告縣官；出入禁苑憑符節，無節擅入或從牆洞出入者要斬；禁苑垣牆外二十里爲隔離地帶——“與”；對在禁內和“與”裏獵取野獸也有明確的規定。

秦統一天下後，皇帝出巡的專用道路——馳道，史載一般平民、官員甚至太子都不能隨便橫穿的(《漢書·成帝紀》)。睡虎地秦簡並無馳道的記載，龍崗簡的《馳道》律文，乃係迄今所能見到的唯一實物資料：

敢行馳道中者，皆遷(遷)之，其騎及以乘車輶車𠄎(179 簡)

騎作乘輿御騎馬於它馳道，若吏[徒]𠄎(189 簡)

另外，龍崗簡還有“弩道”、“甬道”：

中及弩道絕馳道，馳道與弩道同門、橋及阪𠄎(265 簡)

諸弋射甬道禁苑外□□穀去甬道禁苑𠄎(262 簡)

史載“甬道”是“於馳道外築牆，天子於中行，外人不見”(《史記·秦始皇本紀》正義)，而簡文則稱“弋射甬道”，應與皇帝出巡使用的築

有牆的甬道不同，似與“弩道”有聯繫。

至於《馬牛羊》、《田贏》律文，與睡虎地秦律既有聯繫又有區別，而最爲珍貴的，應數木牘了。

木牘僅 1 方，出自墓主腰部，長方形，完好無損，牘面較平整，尚可見刀削痕，牘長 36.5，寬 3.2，厚 0.5 厘米，其正反兩面墨書秦隸計 38 字（正面二行 35 字、反面一行 3 字），字跡清晰：

鞠之辭，死論不當爲城旦，事論失者已座以論。（正面右行）

九月丙申，沙羨丞甲史丙免辭：死爲庶人。令（正面左行）

自尚也。（反面）

據其內容及行款，應是正面書寫未盡纔移書於反面的。牘文的性質屬冥判辭，表明墓主生前曾犯罪而坐爲刑徒，死後纔判免其罪，定爲庶人（“死爲庶人”）。這是迄今秦律冥判辭的唯一實物。

古時多使用受過刖刑者守苑囿。“刖者使守囿”（《周禮·秋官·掌戮》）。考古發現也屢見這類資料，如陝西出土的西周時期的“刖刑奴隸守門銅鼎”、“刖刑奴隸守門銅方鼎”；山西出土的“刖人守囿六輪銅挽車”等。用受刖者守苑囿，似可起向欲犯禁者現身說法的作用。秦推行嚴刑峻法，對這一套當然會繼續使用。值得注意的是，龍崗 M6 墓主骨架中不見腿以下骨殖，推測墓主生前因犯罪而受過刖刑，並可能被用來守禁苑。又因其收執秦法律文書，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推測墓主犯罪前的身份可能是係士。

歸納起來，龍崗秦簡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

一、有關禁苑管理的律文比睡虎地的《田律》爲詳，有關馬牛羊的管理、田贏賦稅的律文基本上可視爲新出，而《馳道》律文及本牘冥判辭迄今仍係孤本。

二、龍崗簡的時代比睡虎地簡爲晚，如“皇帝”、“黔首”、“馳道”及“罪”字的字形（不寫作“辜”）等皆係秦統一天下之後纔出現的。而這兩批簡有不少內容基本相同，表明二者的傳承關係。有關雲夢、沙丘禁苑的律文，似係爲秦始皇出巡至這兩處禁苑而特別頒發的，說明龍

崗簡的主要法律條文行用於秦始皇二十七年(前 220 年)至秦二世三年(前 207 年)。同時,也為秦時的雲夢、沙丘、沙羨(見牘文)的地望及雲夢禁苑與“楚王城遺址”的關係提供了寶貴的線索。

三、綜合龍崗 M6 墓葬形製、規格、簡牘及其他隨葬品,對考古學和古文字學的研究可起斷代標尺的作用。墓主生前原來可能是士,犯罪後受到刑刑,死後又免罪為庶人而葬於龍崗,這一方面開拓了研究秦律者的視野,另一方面也說明秦時的龍崗可能是庶人墓地,睡虎地則可能係士(或以上)墓地。

馬王堆帛書《周易》

——兼談湖南出土的八卦紋銅鏡

周世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周易》是研究天地人類萬物的宇宙法則，習稱“天人之學”。它是我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也是一切學術思想的根源。

八卦是《周易》最原始的形式，它象徵宇宙萬物。由於萬物複雜多變，八卦難以表達其狀，因而再將八卦重疊，推演成六十四卦。

為此，筆者將馬王堆帛書《周易》和湖南所見八卦紋銅鏡等有關資料，試作簡單介紹。

一、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與八卦

1973年至1974年春，長沙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其內容包括《六十四卦》及其卷後佚書和《繫辭》。其中《六十四卦》釋文已發表在《文物》1984年第3期，此外《六十四卦》卷後佚書和《繫辭》釋文尚未發表，本文結合八卦試作補充說明。

帛書《六十四卦》排列次序和通行本《周易》的排列次序不同，它依次為：

1 鍵(乾)、2 婦(否)、3 掾(遯)、4 禮(履)、5 訟、6 同人、7 無孟(無妄)、8 狗(姤)、9 根(艮)、10 泰蓄(大畜)、11 剝、12 損、13 蒙、14 繫(賁)、15 頤、16 箇(蠱)、17 贛(坎)、18 禱(需)、19 比、20 蹇、21 節、22 既濟、23 屯、24 井、25 辰(震)、26 泰壯(大壯)、27 餘(豫)、28 少過(小過)、29 歸妹、30 解、31 豐、32 恒、33 川(坤)、34 □(泰)、35 賺(謙)、36 林(臨)、37 師、38 明夷、39 復、40 登(升)、41 奪(兌)、42 夬、43 卒(萃)、44 欽(咸)、45 困、46 勒(革)、47 隋(隨)、48 泰過(大過)、49 羅

‘此言爲上而驕下。驕下而不治者未(之)有也。聖人立世也，若遁木，俞高俞畏下。故曰，抗龍有悔。易曰，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孔子曰：‘此言大人之廣德而施(施)教於民也……存者，唯龍乎？德義廣大，□物備具，吉。□□聖人乎？大戰於野者，言大人之廣德，而下綏民也。其血玄黃者，見文也……亦猷龍之文也。可胃(謂)玄黃矣，故曰龍，具龍而稱慕大焉’。”

古佚書中的有些內容見於《繫辭》，其中有一段見於今本《繫辭·上傳》第八章，如：

“夫子曰，德薄(薄)而立(位)莫(尊)……(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又(有)不善，未嘗弗知，知之，未嘗復行之。易曰，不遷復，先羣(祗)誨(悔)，元吉。天地(絪縕)萬物化潤(醇)。男購(構)請(精)，而萬物成(今本作“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反)……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評(語)，定立(交)而後求。君子修於此，三者，存也(今本作“故全也”)，危以動，則人(民)弗與也，無立(交)而求，則人弗予也；莫之予，則傷之者必至矣。”

有些內容是對《周易》卦辭和爻辭的進一步解釋。如：

“此胃(謂)易道。故易文天道焉，而不以日月(星)辰盡稱之，故爲之以陰陽；又地道焉，不可以水處，□上木盡稱之，故律之以柔剛；又人道焉，不可以又(有)子君臣……稱也，故□之以上下；又四時之變焉，不可以萬物盡稱也，故爲之以八卦。故易之爲書也，一類不足以亟之。”又說：“五官六府(腑)不足盡稱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詩書(禮)樂不□百篇(篇)難以至文之，不向於古法，不可順以辭令，不可以求以志……損益之道，□以歡得失矣。”

又：“呂昌問：易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將何胃(謂)也？夫易上聖之治也，古君子處尊思卑，處貴思賤，處富思貧、處樂思勞。君子能思此四者，是……亦君子(之)名與天地俱(存)。……故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此之胃(謂)也。”

又：“李平問於先王曰：‘易歸妹之上六曰，女承匡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將以辭，是何明也。’子曰：‘此言君臣之下□求者也，女者

下也……易曰，□□者，上求於下也。羊者，衆也；皿者，卹也；攸者，所也，夫賢君之爲死執爵立也，與實俱群臣勞其死樂，樂其實。夫人盡忠于上，其於小人也，亦□……。”

二、湖南出土八卦銅鏡的主要特點

湖南出土的八卦紋銅鏡，始見於晚唐五代之際，盛於兩宋，而流傳至明清。除個別八卦的排列次序出現差異外，其餘均爲後天文王八卦。舊說《文王八卦方位圖》係宋代學者根據《周易·說卦》繪製，即所謂“萬物生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見，南方之卦也……乾，西北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文王八卦方位，實際上是將陰陽交感的震、兌、坎、離四卦配置在“四正”方位上，而將陰陽不相交感的乾、坤、艮、巽四卦配置在“四維”（四角）方位上。

湖南出土的八卦銅鏡，除了少數見於唐五代墓外，大量的八卦鏡出自兩宋元明墓、由兩宋元明墓的墓室較淺，時代較近，往往被考古工作者所忽視、因而不少兩宋元明墓遭受破壞，大批青銅鏡也當作採集品收藏，所以，不少八卦鏡祇有收藏號，而無墓葬號。

1. 唐式八卦鏡

唐式八卦鏡數量不多，主要有兩種類型。

A 型 長生八卦鏡 一件爲亞字形鏡，1952 年顏家嶺 964 號墓出土，殘存半鏡。鏡鈕飾八卦和銘文一圈，八卦殘存坎、艮、震、巽四卦；銘文殘存“形神日（照）”和“辟邪衛靈（？）”等字。另一件呈方形，採集品。直徑 14 厘米，鈕部內圈飾文王八卦，外圈有銘文四句：“水銀陰精，辟邪衛靈（？）。形神日照，保（命）長生。”

八卦呈方形排列，作“井”字分隔則狀如“八宮”也類似《洛書》。一說八卦肇始於《洛書》。《洛書》所運用的數爲 1 至 9，以白圓表示奇數，黑圓點表示偶數，數字排列呈方形。洛書以 1、3、5、7、9 五個奇數象徵天道；以 2、4、6、8 四個偶數象徵地道。洛書中 1 居北方訓坎，9 居南方爲離，3 居東方爲震，7 居西方爲兌，5 居中央爲明堂。2 居西南爲坤，4 居東南爲巽，6 居西北爲乾，8 居東北爲艮。此圖象徵一年四

季陰陽消長的規律。坎居北方爲寒；離居南方爲熱。按順時方針從 1 至 9 爲寒消熱長。以 9 至 1 爲熱消寒長。

《洛書》的理論依據，來源於反鄭玄的《乾鑿度》，即所謂“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按照這一理論，《洛書》可簡化爲九宮圖：

巽 4	離 9	坤 2
震 3	中 5	兌 7
艮 8	坎 1	乾 6

在這個“井”字狀的方形數陣中，任何方向（橫排，豎排、斜排）的三個數字之和均爲 15。九宮圖的數陣，又叫“九宮數”。

B 型 十二屬八卦鏡 編號：唐（二）29：30，直徑 14.7 厘米，葵花形外緣，龜形鈕，荷葉形鈕座。主區飾後天文王八卦和浮雕式十二屬圖形：鼠（子）、牛（丑）、虎（寅）、兔（卯）、龍（辰）、蛇（巳）、馬（午）、羊（未）、猴（申）、鷄（酉）、狗（戌）、豬（亥）。

值得注意的是：八卦方位的排列，雖見於《周易·說卦》，而八卦方位圖，許多學者則認爲始見於宋。湖南唐代先天文王八卦鏡的出土，說明文王八卦至少在唐代已很習見。

2. 五代式八卦鏡

五代式八卦鏡，一般歸屬於唐式鏡，由於湖南長沙出土的五代墓達三百餘座，出土銅鏡也具有一定的時代特徵，故單獨介紹。五代式八卦鏡可分爲三種類型：

A 型 四神八卦鏡 可分二式。

1 式 1952 年長沙顏家嶺 949 號墓出土。方形，直徑 14.9 厘米。乳狀小鈕，鈕座處飾離、坎、震、兌四卦，即南北東西，稱爲“四正”；

四角處飾乾、坤、巽、艮四卦，習稱“四維”。這種將八卦分爲“四正”與“四維”的分割式排列，是比較少見的。主區東西南北四方，分別飾浮綢式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圖像。“四神”又稱四方神，《尚書·堯典》孔穎達疏：“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皆西首而東尾。”

Ⅱ式 長沙 147 號五代墓出土。方形，殘存一半。主區浮綢四神和內向型文王八卦，四角處分別飾蜜蜂圖形各一隻。

B 型 十二屬八卦鏡 1954 年長沙楓樹坪 3 號墓出土。方形，直徑 15.1 厘米。乳狀小鈕，鏡內圈飾外向型後天文王八卦，外圈飾浮雕式十二屬圖形，四角處飾雲紋一朵（圖 4）。

C 型 蓮花八卦鏡 器號不明。方形。直徑 11.5 厘米。乳狀鈕。蓮花方形鈕座。主區飾外向型文王八卦。

3. 宋式八卦鏡 可分十種類型。

A 型 四神八卦鏡 可分三式。

Ⅰ式 菱花緣四神八卦鏡 編號：宋（二）20：166。直徑 14.7 厘米。乳狀鈕，蓮花形鈕座。內圈飾浮綢式四神，外圈飾內向型後天文王八卦。

Ⅱ式 菱花緣四神八卦鏡 編號：宋（二）20：54。主區內圈飾浮雕式四神，其中朱雀的圖形很特別，狀如兩個人首共一個鳥身的神物。外圈飾內向式文王八卦。

Ⅲ式 宮扇狀四神八卦鏡 直徑 11 厘米，帶柄，飾內向形文王八卦。

B 型 龍虎八卦鏡，可分二式。

Ⅰ式 菱花緣龍虎八卦鏡 編號：宋（二）20：36，直徑 11.2 厘米，乳狀小鈕，鈕座處飾仿漢式龍虎圖形，並有銘文一圈（已模糊不清）。主區飾內向型文王八卦。

Ⅱ式 宮扇形龍虎八卦鏡 編號：近（三）50：244。圓形，帶柄。無鈕，背面正中飾一“子”字和仿漢式龍虎圖形，外圈飾後天文王八卦。“坎”卦處改用“開甫”二字。

C 型 桃子形雙劍八卦 1953 年長沙棺材塘 3 號墓出土。直徑 17 厘米。桃子形外緣，環形鈕，鏡背正中飾雙劍和水火狀圖形，外圈環列異形八卦。從上方乾開始，按逆時針方向順序，依次為乾、震、坤、離、巽、艮、兌、坎。其中坤與兌相對，震與艮相對。這種排列方位既與先天伏羲八卦不符，也與後天文王八卦不同。如果按照文王八卦的方位排列，則艮為震之誤，兌為艮之誤。（圖 5）

D 型 天文八卦鏡 圓形，直徑 27 厘米，龜鈕。外緣飾如意雲紋，鏡背有圖紋五圈，自內向外，第一圈為四神，第二圈為十二屬，第三圈為後天文王八卦，第四圈為二十八宿，第五圈有詩一首：“長庚之英，白虎之精。陰陽相資，山川效靈。憲天之則，法地之寧。分列八卦，順考五行。百靈無以逃其狀，萬物不能逃其形，得而寶之，福祿未成。”該式鏡或稱宋仿唐式鏡。

E 型 宋元祐紀年八卦鏡 圓形，直徑 7.5 厘米，鼻形小鈕。正中有篆體銘文六行：

宋元祐癸酉孟
秋既望，鮑公潔
依禪□月盡
像以七寶
裝嚴敬造大阿
羅漢一十八身

“宋癸酉”即北宋元祐八年（1093 年）。外圈飾內向型後天文王八卦。

F 型 金木水火八卦鏡 編號：宋（二）20：137。葵花形外緣，直徑 15.2 厘米。鼻形小。鈕，鏡背有圖文三圈。自內向外，內圈飾外向型文王八卦；中圈為方框，方框內飾銘文子丑寅卯十二地支；外圈的南方離卦處飾火焰，象徵“火”；東方震卦處飾樹木，象徵“木”；北方坎卦處飾水池，象徵“水”；西方兌卦處飾香爐，香爐為金屬製品，象徵“金”。十二地支的“子午綫”為南北向。中心處屬“土”，金、木、水、火、土象徵“五行”。（圖 6）

G 型 八卦陽燧 編號：唐(二)24:134。菱花形外緣，直徑 11 厘米。鏡背正中凹面爲陽燧。外圈飾外向型後天文王八卦。

H 型 八卦鏡 編號：宋(二)20:230。蓮花形外緣，乳狀小鈕。外緣飾聯珠紋，鈕座處飾旋子狀變形蓮花。主紋飾反面外向型文王八卦。

I 型 方枚八卦鏡 編號：宋(二)20:53，直徑 16.2 厘米。乳狀小鈕，四周飾方枚各一，其上似有銘文，惜已模糊不清。外圈飾外向型文王八卦。

J 型 人物故事八卦鏡 編號：宋(二)20:57，圓形，直徑 20.2 厘米。背面飾仙人對坐，類似東王公，西王母。中間有四條蟠龍，在水波處飛騰，空中仙鶴高翔，上方飾直立式文王八卦。

4. 元明式八卦鏡

元明式八卦鏡的代表作有三，皆爲圓形。

A 型 十二屬八卦鏡 直徑 21.2 厘米。有圖文三圈：內圈飾外向型文王八卦；中圈飾十二相屬；外圈有詩一首：“百鍊關辟邪(?)鏡，八卦氣像備。衛神以(?)呆(保)命，水銀呈(?)陰精。”該式鏡與 1955 年四川成都白馬寺 6 號墓出土的“唐通背鏡”相似。墓主人死於明正德庚午年(即 1445 年)(見《文物參考資料》1956 處第 10 期)。

B 型 離坎十二屬八卦鏡 直徑 22 厘米。扁圓形平頂鈕，鈕面印“周廣宇造”。鏡背有圖文五圈，自內向外，第一圈爲四神；第二圈飾內向型文王八卦；第三圈飾十二相屬；第四圈爲銘文；第五圈相對地飾☵(坎)，☲(離)二卦。這兩卦的方位，與八卦中的坎，離卦的方向恰恰相反。即南方朱雀與離(☲)卦處飾坎(☵)，而北方玄武與坎(☵)卦處則飾“離”(☲)。

C 型 五子登科太極八卦鏡 編號：宋(二)20:9。直徑 16.3 厘米。小乳鈕，主紋飾相互穿插的玉兔，連錢，“五子登科”銘文和太極八卦圖形。值得注意的是：銅鏡圖形中，這是首次出現“太極圖”，而且八卦的方位，既不是先天伏羲八卦，也不是後天文王八卦。根據該圖外向型八卦的排列，其次序是離與坎相對，自離起，按順時針方向排列

依次爲離、兌、震、巽、坎、艮、乾、坤。其中乾與坤並列，則爲其他八卦所未見。（圖7）

三、有關問題研究

綜上所述，根據馬王堆帛書《周易》和湖南出土的八卦紋銅鏡資料，發現八卦方位的排列，共有五種。今以離卦爲起點，依次按順時針方向排列，其序列分別爲下。

八卦排列一覽表

類型	名稱	八卦順序(按順時針方向)							
A	馬王堆帛書八卦	離	兌	坤	震	坎	艮	乾	巽
B	先天伏羲八卦	離	兌	乾	巽	坎	艮	坤	震
C	後天文王八卦	離	坤	兌	乾	坎	艮	震	巽
D	桃子形鏡八卦	離	坤	震	乾	坎	兌	艮	巽
E	太極鏡八卦	離	兌	震	巽	坎	艮	乾	坤

歷代銅鏡中的八卦，絕大部分是後天文王八卦。未見先天八卦和馬王堆帛書八卦。D型、E型八卦在湖南出土銅鏡中僅一見。

是否A、D、E型八卦爲孤立的卦序排列，而F無所傳呢？至少A型非是。據劉大鈞《周易概論》研究，認爲京氏所作“納甲”之法，其八卦的順序與帛書八卦完全相同。並說，京房八宮卦次，兩千年來一直是個謎。馬王堆帛書的出土，終於將這個謎的秘密揭開了，原來京氏八宮橫向八組卦（由“本宮”八個卦至“歸魂”八個卦），都是由四對互“變”的卦組成，而這些互“變”的卦，在帛書卦序中有着完全相同的差數。這就揭示了京房八宮的特殊卦變方式和卦次排列，乃是在帛書《六十四卦》次排列的基礎上演變而出，從而證明了帛書《六十四卦》在漢初並不是一種上有所承，而下無所傳的孤本。

從上述五種八卦的圖形資料可以想見：春秋戰國以來，可能有多種不同系統的《周易》本在社會上流傳。目前，除了A、B、C型八卦的源流比較清楚外，還有D、E型八卦圖形值得探討，這兩種異形八卦

圖，是由於鑄造者的文化程度不高，而出現了八卦位置的差錯？還是由於這種異形八卦圖另有師傳？則值得進一步研究。

傳統的觀念，認為文王八卦等方位圖為宋代學者道家所作。由於文王八卦方位圖已在唐代出現，說明文王八卦方位圖的年代，至少不會晚於唐代。1991年，筆者在蘭州參加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現甘肅省博物館的陳列室中有一件南北朝時期的石刻，其上刻有“八卦”狀圖形，可惜未能筆錄。如果能證實屬何種八卦，則八卦圖形的上限年代也可提前至南北朝時期，故為之記，以便將來有機會驗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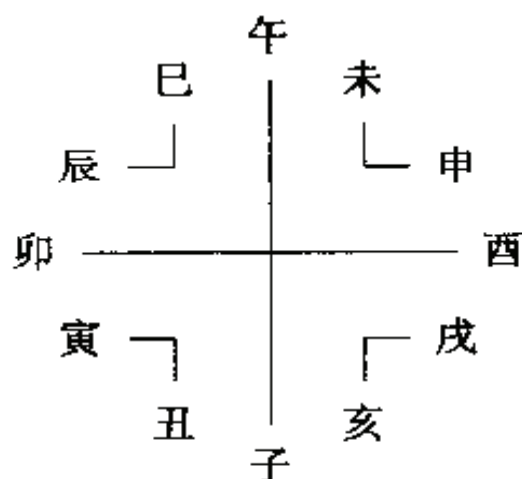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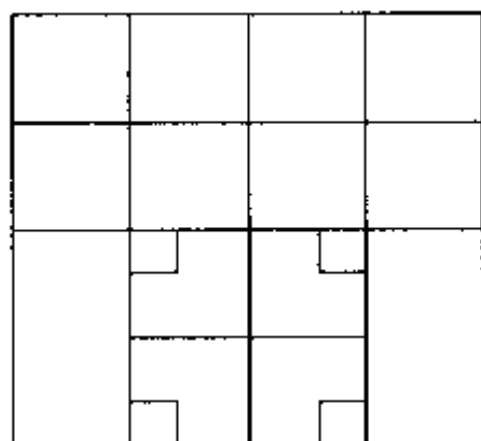
馬王堆《刑德》乙本九宮圖諸神釋 ——兼論出土文獻中的顛頊與攝提——

饒宗頤(香港中文大學)

《馬王堆漢墓文物》最近由湖南出版社印行，最引人入勝的是《刑德》乙本所附的一幅九宮圖。《刑德》屬兵陰陽家。孟子說過“天時不如地利”，趙岐注云：“天時謂時月支干五行王(旺)相孤虛之屬也。”這是對的，孫子兵法亦有類似的說法，銀雀山竹簡孫子《月戰》說：“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殃)。”可見這是兵家的恒言。這本《刑德》是很重要的文獻，出土有甲乙本，祇此乙本先行發表。

九宮圖用五色寫繪，中央似用黃色書寫，文字漫漶難辨，彷彿有“黃帝？”二字，其餘四方依不同顏色題誌。南方火用朱，北方水用黑，東方木用藍，西方則以雙鉤留空代替白色。南北子午綫繪于中央圓圈之外，不相貫通，惟東西則連貫之。可能因卯、酉是二根，《刑德》云：“卯酉，二根也。”又云：“二根司殺”，因為卯酉是對衝的。

四方各圖，格式均作方形加以劃分，如下頁圖：



圖中之卅即表示十二辰的安排

淮南子天文訓：四仲指二繩所指四方之正，即十二辰之子午卯酉。四鉤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

該圖在各個方格之內，填寫干支及神明名字，表之如下：

四仲

北	水						
大(音)	乙[酉]	刑(德)			[壬午]	(豐隆)	(癸未)
雷公	丙戌	冬至	廿昌	夏至	上天	風伯	甲申
	雨師	丁亥		淵王	壬子		
南							
[大音]	[巳酉]	刑(德)			丙午	豐隆	丁未
[雷公]	[庚戌]	冬至	[廿昌]	夏至	大天	風伯	戊申
	[雨師]	[辛亥]			炎帝	丙午	
東							
大音(音)	丁酉	刑德			甲午	豐隆	乙未
雷[公]	戊[戌]	冬至	廿[昌]	夏至	大天	風伯	丙申
雨師	己亥					大星	[乙]卯
西							
大音	癸酉	刑德			庚午	豐隆	辛未
雷公	甲戌	冬至	竹昌	夏至	大天	風伯	壬申
雨師	乙亥				(少)	大星	辛酉

按四仲之神，值壬子 丙午 乙卯 辛酉之正位，其對衡自刑。而刑德并居之位：壬午刑德并居北宮，丙午并居南宮，甲午并居東宮，庚午并居西宮，如上圖所示。《刑德》甲本云：“丙午刑德并居南宮”，正與圖

合。《刑德》乙本云：“德始於甲”，“大陰始生子，刑始生水，水子，故曰刑德始於甲子。”刑生於水，故上圖從北方水之壬子開始。

四隅

所謂“四隅甲子之舍”即甲子丙子庚子壬子，四隅有刑而無“德”。

東南						
大音	丁卯	刑		甲子	豐隆	乙丑
雷公	戊辰		雨師	己巳	風伯	丙寅
			解	丁巳		
西南						
大音	己卯	刑		丙子	[豐隆]	[丁丑]
雷公	庚辰		雨師	辛巳	風伯	[戊寅]
			森氏	丁未		
			司閭	丙子		
東北						
大音(音)	乙卯	刑		壬子	豐隆	癸丑
雷公	丙[辰]?		雨師	[丁巳]	[風伯]	[甲寅]
	矛盾(甲本作“免”。			癸(丑)		
西北						
大音	[癸卯]	(刑)		庚子	[豐隆]	[辛丑]
雷公	[甲辰]		雨師	乙巳	風伯	壬寅
			告?		[癸亥]?	

氣雲

《刑德》乙本云：“刑德之行也，歲徙所不勝，而刑不入宮中，居四隅甲子之舍，始東南□□行廿歲而一周。”又甲本云：“壬子刑居東北宮，德復西宮。”與此圖合。此四隅之舍皆注“刑”字而不及德。

以上各圖，四仲表刑與德並居四方壬午、丙午、庚午、甲午之宮，四隅祇表刑居於壬子、丙子、庚子、甲子之舍

圖中主要六神所屬十干如下：

刑德 豐隆 風伯 大音 雷公 雨師
子午 丑未 寅申 卯酉 辰戌 巳亥

其配合依其序次應如下列：

巳亥	辰戌	卯酉	寅申	丑未	子午
雨師	雷公	大音	風伯	豐隆	刑 刑德

巳癸丁乙
卯卯卯

庚丙甲壬
子子子子

巳癸丁乙
酉酉酉酉

庚丙甲壬
午午午午

甲庚戌丙
辰辰辰辰

辛丁乙癸
丑丑丑丑

甲庚戌丙
戌戌戌戌

辛丁乙癸
未未未未

乙辛己丁
巳巳巳巳

壬戌丙甲
寅寅寅寅

乙辛己丁
亥亥亥亥

壬戌丙甲
申申申申

乙本于支字多殘泐，今依據上表，一一爲之補足，以[]及()號表示之。

六神以刑德爲首，刑德居子午對衝之位，次爲大音，居卯酉相對之位。刑德乙本先言“大陰始生子”，同書下文風占及雷公發氣二段均改稱大音，據此知大音即大陰。說文：“陰，闇也。”大音讀如大闇，亦即泰陰。《史記·天官書》：“涓灘歲：歲陰在申，(歲)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揚雄《甘泉賦》：“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晏曰：“太陰，歲后三辰也。”王先謙引《宋史·天文志》，說“詔招搖與泰陰，猶云詔天矛與天駟”，非是。泰陰或名歲陰，《廣雅·釋天》：“太陰，太歲也。”歲陰左行，歲星右行，太陰即左行之歲陰，本圖亦作大音，大音主卯酉，與刑德之主子午正相對。

其餘之神爲雲雷風雨。《論衡·祀義篇》：“風伯、雨師、雷公，是群神也”，而不及豐隆。《楚辭·遠遊》：“召豐隆使先導兮”，“風伯爲余先驅兮”，“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都提到這諸神，《淮南子》：“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高誘注：“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廣雅·釋天》：“風師謂之飛廉，雨師謂之萍翳，雲師謂之豐隆。”郭璞及李善引舊注稱豐隆爲雷神，雲、雷二神有時牽混爲一。此圖豐隆與雷公則截然爲二。《開元占經》引石氏(申)：“五車東南星名司空，其神名曰雷公；西南星名曰卿，其神名曰豐隆。”分爲二名是也。

在四仲圖中，壬午、丙午、庚午、甲午、刑德之神在夏至爲上(上)

天，亦作大天，冬至爲𠄎昌。汝陰太乙九宮占盤“夏至上天，冬至叶蟄”，夏至之名與此相同而冬至則異。《五經異義》引歐陽說與《爾雅·釋天》則稱冬爲上天，又復不同。至于冬至𠄎昌一名他書未見，太乙占盤與《靈樞經》均作叶蟄（之宮），竊疑𠄎昌或即後來祥氣之“昌光”。昌光名出緯書《河圖》，班固《西都賦》“仰寤束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後漢書》章懷注引《河圖》曰：“昌光出軫，五星聚井”。《尚書帝命驗》“昌光出軫己圖之”。鄭注謂火星當起翼軫之野。（《古微書》本）《廣雅·釋天》：“祥氣第一即昌光”，《符瑞圖》：“昌光者，瑞光也，見於天漢，高受命，昌光出軫。”（御覽 872 休徵部一引）𠄎字讀爲𠄎，𠄎從𠄎得聲，與光同紐字，𠄎昌爲‘光昌’之倒言，帛書《刑德》爲漢初寫本，時稱𠄎昌，不作昌光，拙見可備一說。

四仲之圖，以五行分記於四方，東方木，其神大昊；西方金，其神大旱；西方的‘大’字，必是‘少’之寫誤，即大昊與少昊；南方火，其神炎帝，十分清楚。惟北方水，其神作湍王，以《禮記·月令》及《呂氏春秋·孟冬紀》，“孟冬其帝顓頊”證之，此一與炎帝相對之神，非顓頊莫屬。甲骨文𠄎字作𠄎（甲 11·3），此字當是從水從𠄎，爲顓之異文，𠄎則爲顓的省書，或略稱之曰湍（顓）王。《墨子·非攻下》“高陽乃命（禹）於玄宮”，高陽即顓頊有天下之號。《莊子·大宗師》：“顓頊得之，以處玄宮”。李頤云：“玄宮，北方宮也”。楚及秦皆奉顓頊爲遠祖，《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故秦景公大墓石磬有云：“高陽有靈，三方以鼎。”而顓頊之名，未見於出土文物，是圖作湍王，乃爲首次，故極可貴。

四隅部分諸神明，最值得研究者是西南的攝氏一名究何所指？今按氏與昷古通，《易》坎卦九五爻辭：“祗既平”，《釋文》：京房作昷，《說文》示部昷字引《易》“昷既平”，此昷祗爲異文之證。《公羊傳》僖十六年“是月者何”，《初學記》引別本作“昷月者何也”。《左傳》有昷彌明（宣五年），《釋文》作“祗彌明”，注云“祗本又作昷”。以上刊諸例證之，氏與昷古每借用，則攝氏當即攝昷，絕無疑問。

攝昷星名，本隨斗杓所指，《史記索隱》引緯書《元命苞》云：“攝昷

之爲言提攜也，言能提斗攜角”。《御覽》星下引《天官星占》：“歲星一曰攝提”。石氏有《攝提六星占》。聶氏之爲攝提，既是星名，亦爲神名，《淮南子·地形訓》云：“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爲八風神之一。攝提出現於考古資料，此爲初次，原亦作“聶氏”，以往有人認攝提格爲外來語，此可證其不確。

聶氏下方，有司闕二字、闕字從門𠂔聲，疑讀爲闔，闔即開也。《開元占經·石氏中官占》引《河圖》云：“北斗第一星開樞受，…第六星開陽紀。”《廣雅·釋天》：“北斗七星，一爲樞，…六爲開陽，七爲搖光。”司闔猶言司開，如開樞、開陽之義，因聶氏（攝提）諸星隨斗杓所指，北斗衆星，均受其左右，故曰司開。

東北隅之神，乙本殘缺僅存𠂔形，甲本作矛强，疑即禺强。《莊子·大宗師》：“禺强得之，立乎北極。”禺强的異名甚多，亦作禺彊（《呂氏春秋·求人》）高誘注：“禺 天神名，一名禺京”（《莊子·釋文》引簡文說）又作伯强（《楚辭·天問》）、隅强（《淮南子·地形訓》）。是圖甲本作矛强，古書所未見。

東南隅之神青皐，殘泐不明，青下一字如是從白從𠂔，不是皐便是皐，或者借作青陽，即青陽。《帝王世紀》：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大戴禮》以玄囂爲青陽（參《許廣學林》頁80），字形未明，尚難確定。

此四隅之神，亦有可能是風名，八風之名，見於古籍極爲紛歧。《天問》“伯强何處，惠氣安在”二句，周拱辰說：“伯强、惠氣，風屬。上指日月星，此專言風也”，引《淮南》云：“强隅，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諸稽、攝提，廣漠風、條風之所生也。”其說甚是。此圖最明顯的二神：聶氏、矛强都是風名，聶氏爲攝提，矛强爲伯强，《淮南·地形訓》以攝提屬之東北的條風，是圖則隸於東南；《淮南》以隅强屬之西北的不周風，是圖則隸於東北，微有小異。以八風名配合刑德，於理亦合。蔣驥說“惠氣，瑞氣也”，引《荊州占》卿雲歸邪、昌光爲證，“昌光，亦如龍狀，皆堂中所繪而附於天者，故言天而類及之。”《天問》爲呵壁發問之作，對着壁畫而提出種種問題，代表瑞氣的昌光及隅强、攝提諸風神可能亦在其中。是圖於四隅神名諸題榜出自長沙楚墓，以證《天問》，

其相涉之處，足以補充前人所未及，故附帶加以討論。

《刑德》乙本文云：

凡風占軍吏：子午刑德，將軍；丑未豐隆，司空；寅申風伯：侯；卯酉大音：尉；辰戌雷公：司馬；巳亥雨師：冢子，各當其日。

自刑德以下，軍吏編配，各當其日辰，如圖所記，一一符合，而日之曰風占，從知四隅諸神與風角有密切關係，亦吾說之佐證也。

1992年十月上旬於香港

帛書《刑德》略說

陳松長(湖南省博物館)

馬王堆帛書《刑德》^①是現存秦漢時期兵陰陽的最早著作之一，共有甲、乙、丙三篇，其中乙篇相對較為完整，整篇帛長 84 厘米，寬 44 厘米，圖形及色彩均比較清晰，文字首尾完整，祇是中間略有殘缺。甲篇則絲帛的經緯綫有些變形，但圖文還較為清晰，驗其內容，與乙篇基本相同，祇是書體差異較大而已，故完全可以與乙篇校對互補。丙篇則殘破太甚，已很難拼合，無法句讀，現存原物共裝裱為 18 張殘片。該篇全部用朱文書寫，間附有粗重的墨綫邊框，從殘存的片斷文字看，其內容與甲、乙兩篇亦大致相同，祇是該篇均用朱紅書寫，是否別有含義，尚待研究。本文僅以乙篇為主，輔之以甲篇，就帛書《刑德》的有關內容做些簡略的介紹和分析。

一、《刑德》內容略說

帛書《刑德》乙篇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位於帛書右上部的“刑德九宮圖”；第二部分是與“九宮圖”並列，位於其左的刑德運行干支表；第三部分則是兩篇關於刑德運行規律和兵陰陽家的文獻，這三部分又互相聯繫，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刑德九宮圖”(圖一)用紅、黃、黑等顏色繪成，正中是一黃色圓環，環中用墨色繪有一個兩分的小圓，小圓與大環之間用射綫切分為等分的十格，每一格中分別注有文字，參照甲本，其文字大致應是：“德，戊午；刑，戊子。辛卯，太音。壬辰，雷公。癸巳，雨師。巳未，豐隆。庚申，風伯。壬戌，雷公。辛酉，太音。癸亥，雨師。庚寅，風伯。己丑，豐隆。”其中的“德”和“刑”，乃是太陰運行的專稱。《淮南子·天

文訓》：“太陰所居，日德，辰爲刑。”清代訓詁大師王念孫在《讀書雜誌》卷十二中論及此句曰：“‘日’下脫‘爲’字，‘日爲德，辰爲刑’，相對爲文也”。這就是說，早在《淮南子·天文訓》中就已明確指出：所謂“德”、“刑”，其實乃是太陰在運行過程中兩個具有特定意義的名稱。“大音”則是歲陰的別名。《史記·天官書》：“涓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口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其它諸如豐隆、風伯、雷公、雨師等，則是人們所熟悉，在先秦文獻，特別是《楚辭》中習見的司掌雲、風、雷、雨的尊神，在這裏，和刑德一起統爲兵陰陽家占測軍戰吉凶的天神，在帛書《刑德》乙篇中，有一段文字可以作它的絕好注腳：

“凡以風占軍吏之事，子午，刑德，將軍。丑未，豐隆，司空。寅申，風伯，侯。卯酉，大音，尉。辰戌，雷公，司馬。巳亥，雨師，冢子。各當其日。”

除上述文字外，帛書甲本中還在圓環中標有“土”字，由是可知這在五行中屬土，位處中央，而其顏色取黃色，正與土相配。是爲“刑德九宮”的中宮。

“刑德九宮圖”的方位和同墓出土的馬王堆帛書地圖、駐軍圖的方位相同，亦是上南下北，左東右西，這既有五行方位的明確標示，又有綫條粗細和不同顏色的明顯區別。其中木所居的東宮和其側宮東南宮的綫條又粗又重，黑裏透藍，有一種潤澤感，似乎意味着草木的蓬勃生機。火所居的南宮和其側宮西南宮則用朱色繪成，以示南方主火的五行觀念。金所居的西宮和其側宮西北宮則用雙鉤綫描出，呈其白色，以顯示五行中以金爲白特點。水所居的北宮和側宮東西宮則用較細的墨綫繪成，也許這種細瘦的綫條正象徵着北方的清冷和肅殺。上述八宮在圖形上明顯地分成正宮和側宮兩大類，其正宮均作正方形，每個正宮切分作十一個大小不等的欄格，其中十個欄格中分別注明干支和刑德諸神之名，另一個大格內則都繪一個按十二度的空間結構運行的式圖，這種式圖不僅在緊鄰的刑德運行干支表中呈有規則的整齊排列，而且在馬王堆帛書《禹藏圖》^②和《陰陽五行》隸書本^③

中反復出現。據《淮南子·天文訓》所知，此圖中的十字形乃是表示“四仲”，即二繩所指的四方之正，也就是十二辰中的子、午、卯、酉；而L形則是表示“四鉤”。也就是居於“四仲”左右，夾持“四維”的四對辰位，即十二辰中的丑寅、辰巳、未申、戌亥。而刑德的運行就是按照這種圖式歲主一辰地運轉的。以東宮爲例，在第一排正中兩格分別注明：“甲午，刑德”。這就是說，此宮中刑德居於甲午。再按干支運轉的秩序，從右至左的五格內分別填注：“乙未，豐隆；丙申，風伯；丁酉，大音；戊戌，雷公；己亥，雨師。”這六個干支所記的諸神，乃是刑德日徙的司掌之神。這在《刑德》乙篇的那兩篇文章中有清楚的注解：“凡以風占軍吏之事，子午，刑德，將軍；丑未，豐隆，司空；寅申，風伯，侯；卯酉，大音，尉；辰戌，雷公，司馬；巳亥，雨師，冢子。各當其口”。

“其初發也，刑起甲子，德起甲午，皆徙庚午，居庚午各六日；刑徙丙子，德徙丙午，居各六日；皆徙壬午，各六日；刑德不入，徑徙甲午，各十二日；刑徙庚子，德徙庚午，各六日；皆徙丙午，各六日；刑徙壬子，德徙壬午，各六日；德徙戊午，刑不入中宮，徑徙甲子；德居中六日，徙甲午。”

這是關於刑德日徙規律的一段詳細說明，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刑德所居之宮，多以六日爲期，而每一宮中的六日又分別由刑德、豐隆、風伯、大音、雷公、雨師六神司掌着，這也就直接說明了九宮中何以多注六日干支和這些“各當其日”的神名的原因。

除上述六格外，在第二排正中兩格內分別標有“大天，夏至。北昌，冬至。”“大天”或是“昊天”的別稱。《爾雅·釋天》：“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郝懿行疏注曰：“正義引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由是可知昊、大義正相通，故昊大連言之。《說文解字》中昊的字形作‘𠂔’，並解釋曰：‘春爲昊天，元氣昊昊也。’到底是春爲昊天還是夏爲昊天，歷代學者曾難以定說，今以帛書所記的“大天，夏至”來品衡，似乎應以《爾雅》所釋爲更可信。“北昌”一名他書未見，饒宗頤先生曾以爲“𠂔昌或即後來祥氣之‘昌光’”，他認爲“𠂔字讀爲𠂔，𠂔從𠂔得聲，

與光同紐字，𠂔昌爲光昌之倒言”。^④這雖不失爲一種大膽的推論，但考其字形，該字實作“𠂔”形，甲篇作“𠂔”乃是“北”字的通常寫法，在《刑德》乙篇的兩篇文章中，“北”字乃數見，或作“𠂔”，如“虛，齊北地”，或作“𠂔”，如“□以北移”。據此，九宮圖中應釋爲“北昌”，而不是“𠂔昌”。“北昌”其名雖未見經傳，但從“大天，夏至”的意義去推斷，“北昌”當是古代關於冬至，乃至冬季的一個特殊的專稱。至於“夏至”、“冬至”何以要特別注明，並在每宮中居正中之位置，是因爲日至之日乃是刑德運行的重要基點。《刑德》乙篇中就明確解釋說：

“刑德之歲徙也，必以日至之後七日之子午卯酉。”

可見，刑德歲徙，就是以日至爲基準去計算其運行規律的。

此宮中還有一格內注有：“乙卯，大臯”。這裏“乙卯”這個干支和上述六神各司其日的干支不相聯屬，它是《刑德》中所講的“四根”之一。帛書《刑德》乙篇中說：

“德在木，乙卯爲根；在金，辛卯（當爲“酉”字之誤）爲根；在火，丙午爲根；在水，壬子爲根；在土，戊戌爲根。”

“凡均始司成，四極司生，二根司殺。乙卯、丁未、辛酉、癸丑，四極也，卯、酉，二根也。雨之則吉，風寒有氣，凶。”

由是可知，這個干支“乙卯”乃是“司殺”的二根之一。“大臯”即“太皞”，爲古帝名。《禮記·月令》：“孟春云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按照古代兵陰陽家的認識，“太皞”是陰陽五行學說中司掌東方之帝。

“刑德九宮圖”中的南宮、西宮、北宮與上述東宮的形式排列和干支、神名等都大致相同，祇是“四根”的干支和帝名各有不同：南宮是：“丙午，炎帝”，西宮是“辛酉，大臯”，（參稽《刑德》甲篇，“大臯”乃應是“小臯”，即五帝中之“少皞”。）北宮是：“壬子，淵王”“淵王”即司掌北方之帝“顓頊”。對此，饒宗頤先生曾率先做過一段很精彩的考證：

“以《禮記·月令》及《呂氏春秋·孟冬紀》：‘孟冬其帝顓頊’證之，此一與炎帝相對之神，非顓頊莫屬。甲骨文尙字作𠂔（甲 11.3），此字當是從水從𠂔，爲顓之異文，王則爲頊之省書，或略稱之曰𠂔（顓）王。《墨子·非攻》下：‘高陽乃命[禹]於玄宮’，高陽即顓頊有天

下之號。《莊子·大宗師》：‘顓頊得之，以處玄宮。’李頤云：‘玄宮，北方宮也。’楚及秦皆奉顓頊爲遠祖，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故秦景公大墓石磬有云：‘高陽有靈，一方以鼎’。而顓頊之名，未見於出土文物，是圖作‘湍王’，乃爲首次，故極可貴。”^⑤

正宮之外，四個側宮均作丁字形，每宮均切劃成十個方格，分別填注有刑德、豐隆、雷公、雨師等神名和干支。和正宮相比，沒有“夏至”、“冬至”這兩個時標，沒有大皞、炎帝等帝稱，沒有十二度的刑德運行式圖，故每一個宮內都有空格，其中東南、東北兩宮各空三格，西南、西北兩宮則各空兩格。特別耐人尋味的是，這四個側宮中都分別標有一些頗難索解的名稱，下面僅就手頭資料所及，做一些簡略的考索。

西南宮中注有“丁未，聶氏。丙丁（當是“子”字之誤）司鬪。”“丁未”在《刑德》中是四極之名（見前所引述）。聶氏，饒宗頤先生指出：“聶氏當即攝提，絕無疑問。”^⑥他從古音學和文獻中的棊文，通假例證中證明：“氏”與“是”古通，“祇”或作“提”，“是”或作“提”，“提”或作“祇”，是知“氏”與“提”古每借用。聶之所以是“攝”的借字，大概是太簡單之故，饒先生沒有去作考證，事實上，占文獻中聶、攝通假者，確是處可見。如《禮記·內則》：“聶而切之”，《經典釋文》：“本文作攝。”《山海經·海外北經》：“聶耳之國，爲人兩手聶其耳。”郭注：“言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也。”由是可知，饒先生斷言“聶氏”即“攝提”，確是堅實之論，無需有半點疑惑。“攝提”多用爲星名，在本圖中顯然是用爲神名。饒先生據《淮南子·地形訓》的“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指出，攝提乃是八風神之一，此不失爲一家之說。

“丙丁，司鬪”，鬪字或疑讀爲鬪，進而認爲鬪即開字，“司鬪”即司開，猶如《開元占經》中所引《河圖》所云的開樞，開陽之類^⑦。筆者以爲：似乎不必從通假中求解，鬪，《類篇·卷三》云：“交爭也”。與“戰”、“鬥”的意思相近，故鬪、鬥多相通用。帛書《刑德》中有一段文字，可爲“司鬪”作一注腳：“占軍戰，講也。以丙子爲六分，以爲六旬，攻城圍邑，疾西風而城拔，東風不拔”。此處所言占測軍戰之道，必以“丙子”

爲六分，可見“丙子”與“軍戰”之間，在兵陰陽家看來，有着某種必然的，或者說是約定俗成的聯繫，因此，“司鬪”或許就是司戰的神名。

東北宮中有“癸□，矛□”。據甲篇所示，知是“癸[丑]，矛强”。《史記·天官書》：“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集解》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招搖爲天矛”。帛書《刑德》乙篇中有言：“德在木，名曰招搖，以此舉事，衆也大勞。”不知典籍上所言的“天矛”是否是“矛强”的株稱，如果是的話，那就應是“德在木”時的一種專稱。饒宗頤先生曾疑“矛强”或即“禺强”，又作“伯强”，是八風名之一，這亦是一種推論，正確與否，尚待更多的出土文獻來證明。

西北宮有“癸亥，青淖”，東南宮有“丁巳青皐”。甲篇的東南宮則作“丁巳，青潒”。其中一字不識，但從其三個字的形體看，雖然各自的形符不同，但相同的是，其主要構件均是從日從羊，故其音很可能是從羊得聲，故饒宗頤先生疑其爲青陽之陽的借字，這不無道理，但青陽是少昊帝之字號，爲何東南宮和西北宮中都用青陽之名，它與另兩宮的“聶氏”，“矛强”是什麼關係，尚待進一步研究。

此外，西北宮中還有：“氣雲”一欄，甲篇中亦有此二字，祇是沒寫在欄格內，而是書於西北宮的外側，值得注意的是，九宮圖中的所有欄格內，均有相應的十支和日至，唯獨這裏沒有，而且在甲篇中還置於欄格之外，這也許說明“氣雲”乃是刑德運行的一種輔助的觀測依據。馬王堆帛書中有一卷“天文雲氣雜占圖”，可能正是這《刑德》九宮中所記“氣雲”的詳細圖釋，也許，兩者之間還有一種尚待解釋的特殊關係呢。

帛書《刑德》的第二部分是刑德運行干支表（圖二），該表分爲六列，每列由十個朱色式盤組成，每個式盤的右下方整齊地墨書了從甲子至癸亥六十干支，每一個干支所居的式盤辰位標志綫上，按左旋的方向，從子午綫的子這個辰位開始，分別用墨點標明了刑德運行中“歲居一辰”的規律。甲篇在刑德運行干支表左側有這樣一行文字：“[今皇]帝十一年，大陰在巳，左行，歲居一辰。大陰在所，戰，弗敢攻。”我們查對甲篇干支表，在“乙巳”這個干支的式圖內，正標有“今

皇帝十一”的字樣，而這一式圖的左上方，即位於四鈎的“巳”這個辰位上，正有一個標志刑德運行位置的墨點。因此，我們亦進一步知道，這個刑德運行干支表乃是大陰歲行的實際記錄。

這個刑德運行干支表並沒有詳細記載每個干支所代表的年號，但其中記錄的幾個重要年號，則為我們準確判斷帛書的抄寫年代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甲篇中有兩個年號，一是“壬辰”為“張楚”的年號，一是“乙巳”為“今皇帝十一”的年號。查歷史紀年干支表可知，“乙巳”正是漢高祖十一年的年號，表中稱“今皇帝”，說明甲篇是在漢高祖在位期間抄成的，同時亦說明甲篇抄寫的準確年代應是公元前 205 年以後。乙篇中共有三個年號，一是“壬辰”為“張楚”的年號，這與甲篇相同。二是“丁未”為“孝惠元”，三是“乙卯”為“秦皇帝元”。這三個年號的干支，與歷史紀年的干支完全相同，其中特有意義的是，乙篇中沒有“今皇帝十一”的紀年，而有“孝惠元”的紀年，這就意味着乙篇抄寫的準確年代是在孝惠帝元年，即公元前 194 年以後，同時，也就間接地說明，甲篇的抄寫年代應是漢高祖 11 年，（公元前 205 年）至漢孝惠帝元年（公元前 194 年）之間。我們知道，馬王堆帛書的字體主要分古隸和今隸兩種，《刑德》甲篇是用古隸抄成，乙篇則用今隸寫成，而這兩篇所抄寫成的時間又僅隔十餘年。這至少可以說明兩個問題。第一，它說明馬王堆帛書中與甲篇字體相同的其他古文獻抄本，大致均是漢高祖十一年至孝惠元年之間抄成的，而與乙篇字體相同的另一些古文獻抄本，則都應是漢惠帝元年至漢文帝 12 年之間抄成的。第二，它說明漢字隸變的過程其實並不像人們所常說的那樣，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直到東漢時期隸書纔漸趨成熟，而是在秦漢交替之際，漢字的隸變已日漸完成，至漢文帝初年，規範的漢隸已基本形成，至於東漢以後的標準隸書，祇不過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完善和美化而已。

帛書《刑德》的第三部分是兩篇首尾完整的文章。第一篇共 61 行，每行 25 字左右，共 1500 餘字，其主要內容是關於刑德運行規律的解說和對刑德九宮圖的詮釋。例如文章開篇就指出：

“德始生甲，大陰始生子，刑始生水，水，子。故曰：刑德始於甲子。”

然後，詳細地敘述了刑德歲徙的規律：

“刑德之歲徙也，必以日至之後七日之子午卯酉。德之徙也，子若午；刑之徙也，卯若酉。刑德之行也，歲徙所不勝而刑不入宮中，居四隅。甲子之舍始東南□□行廿歲而壹周，壹周而行德四通，六十歲而周，周於癸亥，而復從甲子始。刑德初行六歲而並於木，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並木，大陰十六歲而與德並於木。”

這段文字中，首先說明刑德歲徙，必以日至為基準，這無疑直接地說明了刑德九宮圖中為什麼四個正宮內都注明“冬至”、“夏至”的原因。其次，所謂“子、午、卯、酉”，乃是《淮南子·天文訓》中所講的“四仲”，即四方之正。第三，“歲徙所不勝”，則明確揭示了刑德是按照五行相生相剋的規律運行的。刑德九宮圖中，東南西北中各宮分別標有木、火、金、水、土的五行屬性，根據五行相生相剋的理論可知，木不勝金，金不勝火，火不勝水，水不勝土。而刑德運行是“歲徙所不勝”，那麼其運行的軌迹就是，從屬木的東宮開始，第二年就徙居屬金的西宮，第三年則徙居屬火的南宮，第四年就徙居屬水的北宮，第五年則徙居屬土的中宮，這樣周而復始，“行廿歲而壹周”，而壹周正是刑德在五宮中走了“四通”。第四，“刑不入宮中，居四隅”者，則說明刑德在歲徙過程中，德多居正宮而刑多居於四隅的側宮。這一點，在甲篇的刑德九宮圖中填注得更明確。該圖的正宮中，乾脆就祇有一個“德”字，而不像乙篇一樣，將刑德合寫在一起。至於“六十歲而周，周於癸亥，而復從甲子始”則應是對刑德歲徙干支表的一種概括，與“廿歲而壹周”所述的刑德在九宮中的歲徙規律應有區別。

在詳細敘述刑德歲徙的規律後，文中接着又詳盡地敘說了刑德日徙的規律：

“其初發也，刑起甲子，德起甲午，皆徙庚午。居庚午各六日。刑徙丙子，德徙丙午，居各六日，皆徙壬午，各六日。刑德不入，徑徙甲午，各十二日。刑徙庚子，德徙庚午，各六日；皆徙丙午，各六日。刑徙

壬子，德徙壬午，各六日。德徙戊午，刑不入中宮，徑徙甲子；德居中六日，徙甲午。”

我們將這段文字與刑德九宮圖相對勘，可以說，其日徙規律是相當清楚的。它亦是按照“歲徙所不勝”的五行相生相剋的理論運行的，而刑、德在每一宮中所停留的時間均是六日或十二日，其“初發”又是“甲子”、“甲午”，這不僅可以和九宮圖中每一宮內各有六個干支欄格相印證，而且亦是對“必以日至之後七日之子午卯酉”這句話的具體詮解。

刑德的歲徙、日徙都是有其固定程序的，同樣，型德在其運行的週期中，還有一些特定的專門術語和一些參稽刑德運行的情況占測戰爭勝負吉凶的專門規定。例如：

“德在木，乙卯爲根；在金，辛卯（卯字當是酉字之誤）爲根；在火，丙午爲根；在水，壬子爲根；在上，戊戌爲根。”

“凡均始司成，四極司生，二根司殺。乙卯、丁未、辛酉、癸丑，四極也。卯、酉，二根也。雨之則吉，風寒有氣，凶。”

讀着這些近似於訓詁一樣的專門術語的解釋，我們回過頭來理解“刑德九宮圖”中的某些干支和神名，就知道：原來東宮中的大[太]一，西宮中的[少]皐，南宮中的炎帝，北宮中的湍（顓）王（項）乃是四根之神；而西南宮中的聶（攝）氏（提），東北宮中的矛盾則是四極之神，它司掌着天地生靈，具有極大的權威性。

又如：“倍（背）刑德，單（戰），勝，撥國。倍（背）德右刑，單（戰），勝，取池。左德右刑，單（戰），勝，取地。左德倍（背）刑，單（戰），勝，取地。倍（背）德左刑，單（戰），勝，不取地。倍（背）刑右德，單（戰），勝，不取地。右德左刑，單（戰）敗，不失大吏。右刑德，單（戰），勝，三歲將死。左刑德，單（戰），半敗。”

這是一段以刑德的左右前背測定戰爭勝敗的規定。《史記·天官書》：太白“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又《淮南子·天文訓》：“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清代王念孫就此考證曰：“此當爲右背刑，左前德，寫者顛倒耳。《五行

大義》論配支干篇曰：‘從甲至癸爲陽，從寅至丑爲陰，陽則爲前爲左爲德，陰則爲後爲右爲刑，右背刑，左前德者，所以順陰陽也’。^⑧我們從《史記》和王念孫的考證知道，所謂刑德的前背左右、實乃兵陰陽家的一種理性規定，因爲陽爲前、爲左、爲德、陰爲後、爲右、爲刑，所以凡順陰陽者則吉，凡逆陰陽者則凶、依此去梳理帛書《刑德》中的文意，也就豁然明朗了。

帛書《刑德》的第二篇文章主要是關於以雲氣、風、雨、雷占測戰爭勝負吉凶的規定。全文分十一節，每節講一種占法。如第一節主要講月暈雲氣占：

“月半白半赤，城半降半施；層赤盡施，盡白盡降。月小中赤，餘盡白，城中將死，其人降。月大光赤，主人出，單（戰），不勝，城拔。月大据有光，主人出，單（戰）。月七日不孫（弦），主人將死。月北填陰，國得地；月据受衡，其國安；月大受繩，其國亡地。月八日南陞陰，國亡地；月不盡八日北陞陽，國亡地。月軍（暈）壹重，三復之，主人出，單（戰），勝。月軍（暈）二重，倍滴在外，和成外；倍滴在中，和成中，月比其國，憂。有軍於外，軍傷。月薄，其主病，中赤日，並鼎尺，打月，其主死，有軍，軍罷。”

從第二節至第十節，每一節都是一種占法，祇是各節所占測的依據各有不同而已，唯有最後一節，即第十一節乃是關於 28 宿與地望的說明頗值得注意。因爲它與歷史文獻中的記載多有不同，例如它的星宿分野既按列國劃分，但又不僅如此，而是星宿分“左服”，“右服”等，列國又分方位區域。如：

“房左驕，汝上也；其左服，鄭地也。房右服，梁地也。右驕，衛也。婺女，齊南地也。虛，齊北地也。”

此外，該篇在說明星宿與地望的關係時，僅僅標記了房、婺女、虛、營室、東壁、參、畢、觜、東井、輿鬼、柳、七星、張等星宿和相關的地望。這似乎說明這篇帛書中所講的星宿分野並不是《史記·天官書》那樣是單純的地望分野，而應是專門配合刑德運行以供使用者占測戰爭勝敗吉凶用的星宿分野，這種分野的特定範圍，亦爲人們推尋

帛書作者的國別提供了可信的線索。

二、《刑德》的研究價值簡說

第一，帛書《刑德》爲我們提供了兩幅秦漢時期所繪製的完整的刑德九宮圖，該圖不僅繪製精細，五行方位清楚準確，而且刑德在九宮中的運行規律清晰可尋，這無疑給我國傳統的術數學研究提供了嶄新的材料。

衆所周知，術數作爲一個學科的類目，最早見於《漢書·藝文志》：“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至於人們現在所能看到記有術數活動的最早材料，乃是殷墟甲骨中所記錄的商王從事各項活動的占卜結果。春秋戰國時期，儘管術數的種類包括了卜筮、星占、陰陽、五行、占夢、占祲兆等多種內容，但迄今爲止，像帛書《刑德》這樣彩繪明晰的刑德九宮圖尚屬首次發現，它完全可以和已出土的西漢初期的六壬式盤和太乙九宮盤對比進行研究，從而更全面地揭示西漢初期所流行的術數學的內涵和本質。

第二，帛書《刑德》第一次向人們展示了兩幅由六十個式盤組成的干支表。這種干支表不像殷墟甲骨上所刻契的干支表那樣，純爲記載和檢索紀年用，而是按十二度的式圖結構，根據刑德歲徙的規律，在干支表中詳細而準確地標明了太陰運行的方位、軌跡和一些有特殊意義的紀年。這種非常專門化的干支圖表，乃是出土文獻中所罕見的，因此，尤其顯得珍貴，尤其具有研究的價值。

第三，帛書《刑德》第一次給人們提供了兩篇西漢初期的兵陰陽家所使用的術數類文本。如前所述，術數早在西漢時期已見諸典籍，不僅《漢書·藝文志》上有專門記載，而且在《史記·天官書》、《淮南子·天文訓》等著作中亦多有叙說，但無論是傳世的歷史文獻中還是出土文獻中，還沒有發現有時代比帛書更早的詳釋刑德運行規律和占測戰爭勝負吉凶的長篇文獻。因此，帛書《刑德》的面世，無疑是傳統術數學研究獲得嶄新進展的重要因素，勢必在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

注釋

①帛書《刑德》乙篇見《馬王堆漢墓文物》，湖南出版社，1992年5月版。

②見《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③尚未發表。

④⑤⑥⑦見本輯所收饒宗頤“馬王堆《刑德》乙本九宮圖諸神釋——兼論出土文獻中的顛項與攝提”。

⑧見《讀書雜誌》卷十二。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畫 “城邑圖”及其有關問題

徐蘋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卻穀食氣》篇和《導引圖》同卷的，還有一幅被命名為“城邑圖”的帛畫，可以說是中國現存時代最早的城市圖，約繪於公元前 168 年（漢文帝十二年），即三號墓下葬之年以前。

據親自參加整修帛書的韓仲民同志云：此圖“與《卻穀食氣》和《導引圖》等繪在一幅長帛上，不是折疊存放而是捲在一塊長木片上，出土時破損十分嚴重。這一部份圖幅長寬各約 48 厘米，上部繪有閉合曲綫加給繪席紋斜綫的圖形，與‘地形圖’山脈的畫法類似，中間有一‘甲’字形空白。下部畫有墨綫勾畫的兩層城垣和建築。”（《關於馬王堆帛書古地圖的整理與研究》，《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頁 12—17，文物出版社，1990 年 7 月）又云：“圖的下半部繪有城邑。城垣用較細的墨綫勾畫，縱 20 厘米，橫 18.8 厘米。正門為廡殿頂重樓式建築，邊門則為單層建築。外垣之內有內垣。內垣有門三座，有的是單層建築，左側門由於畫面殘破，有無建築已難確定。城內布局，上半部分割為幾個大小不等的方形或長方形，有建築物六座，式樣與內垣門相同。下半部分左右兩個部分：左側是主要建築，繪有長方形框，縱 3.5 厘米，橫 4.7 厘米；右側繪有兩個長方形框，各縱 4.7 厘米，橫 3.8 厘米。另有一方框，縱 2.8 厘米，橫 2.8 厘米。均塗以紅色。”（“城邑圖”圖版說明，見《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圖版說明頁 2）此圖原無名，是整理時擬加的。

原圖是許多碎片拼綴的，帛已作深褐色，所繪線條很不清楚，幸有摹繪本可窺其原貌（見《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第28、29圖）。

馬王堆三號墓“城邑圖”以後的城市圖，是內蒙古和林格爾漢代壁畫墓中的城市圖。此墓的時代約當東漢末年（公元二世紀中葉以後）。壁畫中共描繪了五幅城市圖，它們是寧城圖、繁陽縣城圖、土軍城府舍圖、離石城府舍圖和武成城圖（見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和林格爾漢墓壁畫》，文物出版社，1978年6月）。

寧城圖畫出了東門、西門，未見有北門。南門是城市的主門，門內向北正對護烏桓校尉幕府的南門，四周繞以廊垣。幕府南垣東西接有護烏桓校尉營舍南垣牆，東側有營門，營舍內東側有營曹、司馬舍，東北與北側為倉庫。西南角為庖舍是馬廄。東門內為“寧中市”，市周圍亦用廊垣封閉。東門內稍北為“寧城縣寺門”，寧城縣衙所佔面積較小。寧城的主要部份為護烏桓校尉幕府，其次為寧城縣與寧中市。寧城屬上谷郡，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置護烏桓校尉於寧城（見王先謙《後漢書集解·郡國志》）。其地當在今張家口南、洋河的北岸（黃盛璋《和林格爾漢壁畫卷與歷史地理問題》，《文物》1974年1期，頁38）。

繁陽屬魏郡，故城在今河南內黃縣東北。壁畫上的繁陽縣城圖平面作長方形，繁陽見官寺在城之一隅，隔成子城，約佔全城之二分之一；另有三個院落，未標明為何建置。全城共闢五門，有兩門亦為子城城門，子城還有兩門開在城內。繁陽置縣始於西漢，戰國時屬魏，可能已有城池。

土軍城平面近方形，闢一門。都尉治所在城內中央，面積佔全城二分之一強，有廊垣、府門。城內除都尉府外，無其它建築。上郡屬國都尉西漢武帝時置，都尉治所在龜茲縣（今榆林縣西北），西漢末廢，東漢永元二年復置。永和五年秋，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

方治五原(《後漢書·南匈奴傳》)。上郡屬國都尉何時內徙,史籍不載,估計亦應在永和五年南匈奴入侵時徙治上軍城,即今山西石樓。

離石屬西河郡。西河郡原治平定,在榆林縣北。永和五年南匈奴內侵時,西河郡治自平定遷離石,即今山西離石縣。壁畫離石城平面方形,闕二門,中央有小子城。

武成縣屬定襄郡,在今內蒙古清水河東南,距墓地所在之和林格爾甚近。武成城平面方形,繪有南門,南門內稍東為“武成寺門”和“武成長舍”,在武成縣衙內有一院落,繪生活圖像。發掘報告的執筆者認為,武成城是和林格爾壁畫墓墓主人最後生活的地方。

在和林格爾漢墓壁畫城市圖以後,最重要的城市圖便是朝鮮平安南道順川郡龍鳳里遼東城塚壁畫墓中所繪的遼東城圖。此墓為公元五世紀初高句麗時期的壁畫墓,相當於南北朝初期。遼東城平面作扁方形。如按上北下南、左西右東之例,城西南隅為子城,內有樓閣等建築,應是官署之所在。在城之東西兩垣上各開一門,兩門間之大路橫穿遼東城中部和子城北部。城內右上部墨書“遼東城”榜題三字(參見俞偉超《跋朝鮮平安南道順川郡龍鳳里遼東城塚調查報告》,《考古》1960年1期,頁59)。

自西漢初年至南北朝初期,即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五世紀初,考古發現的古代城市圖共有七幅,已如上述。這七幅城市圖是中國最古老的城市圖,而且都是地方城市圖,從城市發展史和城市地圖繪製史的角度來看,這七幅地方城市圖是極其珍貴的科學資料。

中國古代城市之起源和早期城市之發展,亦即先秦時代城市的研究,近年來有了極大的進展。秦漢的城市形制與早期城市有所不同,除都城之外,地方城市的興起是一個本質上的新變化,郡縣制確立以後,地方政治體制與地方城市密切結合,由於政治統治的需要,要建各級地方官吏守土治民的府舍,以這些官吏府舍為中心修建的地方城市,在城市形制上必然是以官府為中心的布局。這一點在上述七幅地方城市圖中表現的極為明顯。

漢代地方城市有兩類:一類是如上述七幅圖中所畫的地方官府

所在的城市，亦即地方行政城市。另一類邊塞城障，屬於軍事性質的城堡。在這篇短文中主要討論地方行政城市的問題。

漢代地方行政城市的布局，以馬王堆三號漢墓帛畫“城邑圖”為例，全城分為東、西兩部分，主要建置是右部三間大建築，大建築下方的三塊紅色地段，意義不清，但肯定是很重要的所在。這個城市圖所表現的是城市內有明確的區域劃分，最主要的部分是在城邑圖的右下角。韓仲民同志認為也有可能是“園寢圖”。但從圖中所繪的格局看，我認為尚缺乏園寢的證據。

漢代地方城市中的官吏府舍為城市的最重要部分，外圍多用垣牆包繞，形成了城內的另一個小城，即所謂“子城”。馬王堆三號漢墓帛畫“城邑圖”的右下角區域，應是“子城”之所在。和林格爾壁畫墓所繪各城市圖和朝鮮“遼東城”塚之“遼東城”，都有子城。考古發掘的北京寶店漢城的西北隅亦有子城，雖然現存子城可能晚至北魏（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拒馬河考古隊《北京市寶店古城調查與試掘報告》，《考古》1992年8期，頁705—719），但並不排除此子城是在早期子城城垣上重建的可能性。子城是中國古代城市的一個很顯著的特點，這與中國城市的政治特性有直接關係。宋代以後地方城市的子城被衙署所代替，但它在城市規劃中的特殊地位並未改變。

從城市規劃上來看，和林格爾壁畫墓中的寧城圖有着極其重要的價值。寧城是以護烏桓校尉幕府為中心的城市，護烏桓都尉府的營城在全城北部，占據了寧城的絕大部分。幕府在全城中央，幕府南門對寧城南門；幕府南門前有東西橫街，通寧城東、西兩城門，形成了寧城的主幹街道是“丁”字形的布局。這種“丁”字形的街道布局的地方城市，一直延續到元明時代。

寧城圖中有“寧中市”。“寧中市”繪作四周皆有牆廊圍繞的封閉式的市場。封閉式的市場是宋代以前城市市場的通制。四川新繁東漢墓出土的“市井圖”畫象磚的市場，也是四周用圍牆封閉，市內有十字街，街中心建市樓（參見《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第34、35圖），正可補“寧中市”的市場內部之情景。

一個城市的規劃是通過幹主街道的分佈來區劃不同區域，街道在城市規劃中猶如人體之骨骼。這七幅城市圖中，有明顯街道規劃的，除寧城的“丁”字街之外，還有遼東城的橫貫全城的東西大街，這是兩種不同的規劃。

和林格爾壁畫墓中的諸城圖和遼東城圖中除繪出城門外，還繪出了角樓和女牆。和林格爾壁畫墓中的女牆較簡單，遼東城圖中的女牆有兩種，一為凸字形，上部中央有射孔，另一種呈三角形。

在城市圖的繪製方面，最突出的是以不同形式的建築圖像表示不同的建置，如在城垣闕口上繪兩層樓閣式城門，在城角上繪單層角樓，繪單層房屋表示建築，繪帶有兩挾的殿堂表示主要建築，繪兩層或三層樓閣式建築表示更高級的殿堂樓閣。這種用建築物表示不同建置的繪圖方法，一直沿續到唐宋以後的地方志城市圖中，甚至在清乾隆京城全圖上，也還是用這種繪圖的方法來表示城市圖中的建置。這是中國城市圖中的傳統繪製方法，從馬王堆三號漢墓帛書“城邑圖”中可以知道，這種傳統繪製方法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了。

這七幅中國古代地方城市圖之所以科學價值高，是因為目前中國考古學家尚未對漢代地方城市作大面積的和詳密的調查發掘，在考古實例很少的情況下，想要論述漢代地方城市形態，這七種城市圖便是唯一可依據的資料。

談銀雀山簡《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

饒宗頤(香港中文大學)

銀雀山簡爲漢武以前遺物，其中一種屬於陰陽術數的律書列於簡號 0860 的，題曰“天地八風五行客主五音之居”，此十二字標題，寫在該簡的正面。文物出版社印行的《銀雀山漢墓竹簡》壹，未及收入此冊占書，祇在卷前論竹簡情況時略作介紹。吳九龍的《銀雀山漢簡釋文》書中列此於陰陽時令類之第十一，故吳書凡在內未註明“陰”11者即指此篇，全文無法復原，茲掇錄其文而條理之如下：

- 宮○ 宮風：庚子、辛丑、庚午、辛未、戊申、乙酉… (1198)
- 商○ 商風：庚辰、辛巳、庚…… (984)
- 角○ 角風：戊戌、乙亥、戊亥[辰]、己巳、庚[寅] (931)
- 角風當生長三日宿戒，五日兵…… (1647)
- 徵○ 徵風：丙寅、丁卯、甲戌、乙亥、丙申 (1475)
- 禹(羽)○ 禹(羽)風：壬辰、庚巳、壬戌、癸亥…… (960)
- 三月 風：周風…… (873)
- ……風凶…… (932)
- 利客○ 大剛風、哲風、剛風，可以爲客，不可以爲[主] (0795)
- 十一月，凡哲、周、剛、大剛、凶風，皆利爲客 生涿弱風 (904)
- ……盛氣也，以戰客敗不可攻。回，可(爲)百丈千丈冠帶劍…… (927)
- 利主人○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日…… (941)
- 利客○壬子、癸丑。主人卅二不當客…… (958)

……不盡三日奏黃鍾，天立方，雜鳴畢。 (773)

可禱祠。入之日，奏應鍾。 (305)

……祠入，之三日，奏蕤賓，天不陰雨，不吉利，有人邊麥秋苗生 (218)

……禱祠入，六畜入之，三日奏林鍾，天必…… (306)

以上斷殘碎璧，無由窺其全體，然必爲風占之書則無疑義。有數事可得而言者：

①配五音之風，所值日辰，如宮風之庚子、辛丑、庚午、辛未、戊申、乙酉，並非雜亂不加倫次，實爲依據五行區別陽律、陰呂（如子爲黃鍾、丑則爲大呂）再以隔八相生爲壬申、癸酉，由下復隔八相生而爲庚辰、辛巳、以終於亥，自一陽之甲子，遍歷五行，而六十甲子與十二律配搭成一體系，此即所謂“納音”。余曾指出雲夢秦簡中之《禹須臾》，所列之甲子表即納音之結果，《古字文研究》14輯），劉樂賢君謂爲一大發現，復舉出銀雀山以數簡五音所屬五風作爲佐證，其說甚是，今不復贅。

②銀雀山簡所記八風之名，殘簡僅見大剛風、剛風、哲風、周風、凶風、大弱風、淶弱風諸名號。今以素問王冰註、隋爾雅五行大義引《太公兵書》，及唐李淳風《乙巳占》推證之，可得其概：

甲、《素問·八正神明論》：“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王冰註：“八風者：東方嬰兒風；南方大弱風；西方剛風；北方大剛風；東北方凶風；南方弱風；西南方謀風；西北方折風。”

乙、《五行大義》引《太公兵書》：“坎名大剛風；乾名折風，兌名小剛風；艮名凶風，坤名謀風，巽名小弱風，震名嬰兒風，離名大弱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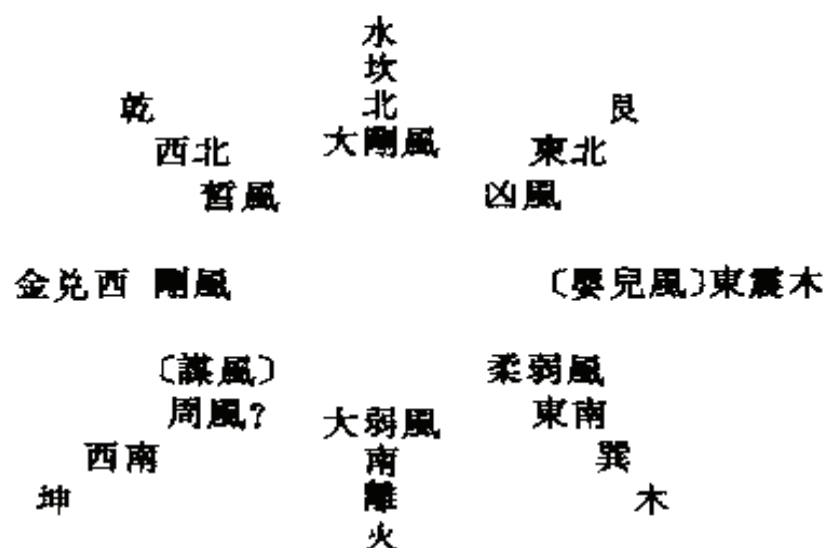
丙、李淳風云：乾高折風（原注一名衝），坎爲大剛風，艮爲凶風，震爲嬰兒風，巽爲大弱（原注一云小弱），離爲大弱風，坤爲謀風（原注一名陰謀風），兌爲小弱。

三家所記，風名微有出入，風所起之處，以配八卦，或始於坎，或

起於乾，《素問》則舉八正以統四方、四隅，今持數家之文，以校銀雀山簡，其差異有如下表：

銀雀簡	其他
西風	無
暫風	折風 高折風
大剛風	大罡風
柔弱風	小弱風
凶風	凶風

八風全名，今爲復原如下圖：



銀雀簡別有“周風”一名，未能與各書對應，暫厝於謀風，以待續考。

③八風命名之義，茲再引《五行大義》以釋之：

淮南子曰：東北方曰蒼門。生條風。東方曰開明門。生明庶風。東南方曰陽門。生清明風。南方曰暑門。生景風。西南方曰白門。生涼風。西方曰闔闔門。生闔闔風。西北方曰幽都門。生不周風。北方曰寒門。生廣莫風。蒼門者、東北木將用事。春之始。故曰蒼門。開明門者、明、陽也。日之所出。故曰開明門。陽門者、月建在巳純陽用事。故曰陽門。暑門者、盛衰之時。故曰暑門。白門者、月建在申。金氣之始。故曰白門。闔闔門者、八月建在西萬物將收闔、大、闔、閉。收閉之時，故曰闔闔門。幽都門者、幽暗也，玄冥將始用事。陰聚故幽也。故曰幽都門。寒門者、積寒所在故曰寒門。此八極之方，是八風

之所起也。呂氏春秋云：東方滔風。東南動風。南方巨風。西南淒風。西方飄風。西北厲風。北方寒風。東北炎風。此意亦同於前。太公兵書云：坎名大剛風。乾名折風。兌名小剛風。艮名凶風。坤名謀風。巽名小弱風。震名嬰兒風。離名大弱風。大剛風者、大陰之氣。好殺故剛。折風者、金強。能摧折物也。小剛風者、亦金殺故也。凶風者、艮在鬼門。凶害之所也。謀風者、坤爲地。大陰之本。多陰謀也。小弱風者、巽爲長女。故稱弱也。嬰兒風者、震爲長男。愛之。故曰兒。大弱風者、離爲中女。又弱於長女也。大剛、小剛、客勝。大弱、小弱、主人勝凶、有凶害之事謀、有謀逆之人。折爲將死。嬰兒風、主人強。此並兵家觀客主盛衰。候風所從來也。楊泉云：春氣濡。其風溫以和。喜風也。夏氣盛，其風陽以貞樂風也。秋氣勁，其風燥以清。怒風也，冬氣冷。其風凝以厲。哀風也。又。四維之風。隨生成之氣。方土異宜。各隨所感而風者，天之號令，治政之象。若君有德令。則風不搖條。清和調暢。若政令失，則氣怒凶暴，飛沙折木。此天地報應之理也。此皆五行之氣。故並釋焉。

《太公兵書》論兵家觀客主盛衰，即以候風爲斷，大抵大剛、小剛，客勝、大弱、小弱、主人勝，嬰兒風則主人強，與是簡“可以爲客，不可以爲主”之說正可互證。

又靈樞經記太一行九宮兩朝八風，而占吉凶，其解釋此八風之名所由取義，則從病理學之虛實相反觀念出發，更具新義，錄其說如下：

立秋二玄委西南方 秋分七倉果西方 立冬六新洛西北方

夏至九上天南方 招搖中央 冬至一葉蟄北方

立夏四陰洛東南方 春分三倉門東方 立春八天留東北方

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葉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葉蟄之宮。曰冬至矣。太一游。以冬至之日。居葉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

則多雨。後之則多汗。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病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貴賤。因視風所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是故太一徙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其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肺。外在於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小腸，外在於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爲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大腸。外在於兩脅腋骨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肝。外在於筋紐，其氣主爲身溼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在於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

太一出遊，其“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故太一徙位，八風有生、殺之變，風從其所居方向而來者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對衝後來者爲虛風，則爲傷人者，主害，故候虛風而避之。此八風命名，皆從消極立義，故《靈樞》謂此八風皆從虛之鄉來，乃能病人。持此以證“漢魏鮮某臘明正月旦以決八風”之事，天官書云：

“風從南方來大旱”

西南，小旱；

西方，有兵

西北 戎菽，爲小雨，趣兵；

北方 爲中歲

東北 爲上歲

東方 大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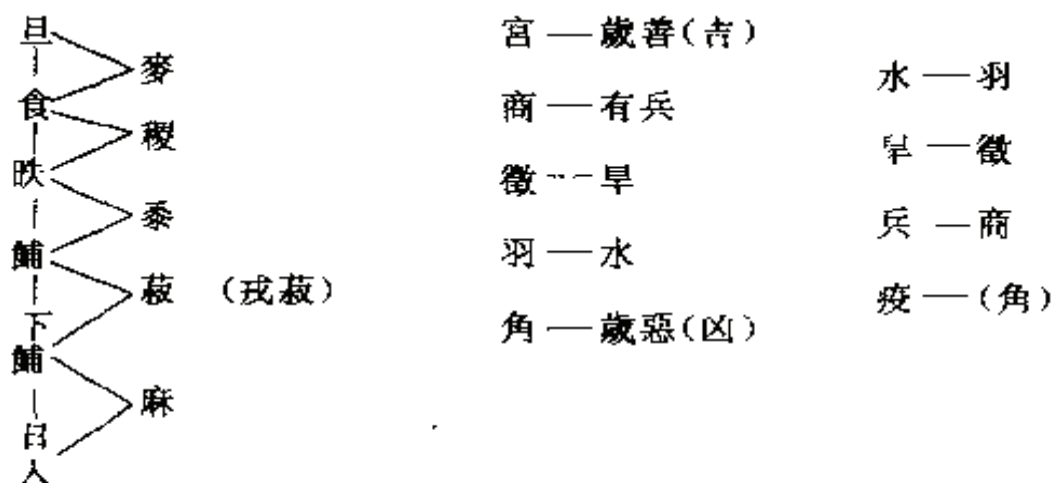
東南 民有疾疫，歲惡。

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參開元占經引《正月朔旦八風占》）

所謂八風各與其衝對，即咸爲從虛之方向而來者，故多主不吉，戎菽二字，以《天官書》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昃爲稷，昃至餽爲黍，餽至下餽爲菽，下餽至日入爲麻”數句證之，麥、稷、黍、菽、麻爲區食、日仄至日入之時間代號。“戎菽”當指餽至下餽一段，下文以“爲上歲”“爲中歲”例之，宜讀“爲小雨”句。“小雨”一名，卜辭屢見，言此時刻有小雨，宜促用兵。《論衡·變動篇》云：

天官之書，以正月朔，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

四方之風，以占水、旱、兵、疫四者，皆從風之對衝立說，於此可悟卜辭之四方風名，必與候風之事有關，而候風之事，又繫於農事，以占歲之熾惡，故歲有中歲、上歲之分。殷代占四風，自不若魏鮮之配五音、五穀等之詳備，但風占之意義出於候歲，其理則一。卜辭之“東方曰析風日昃”昃指昃田受年，與周語記籍田之“前五日，警告有協風至”，若命符節，甲骨學者論之已詳。銀雀山簡西北乾位之咎風，亦作折風，其名當出殷之東方析，但方位分配不同。魏鮮以一日之時刻配合五穀，以五音定歲事美惡，如下圖所示：



凡此種種，於卜辭多無可徵考，惟“北方之風曰毳”，在銀雀山簡正北爲大剛風，亦作大毳風，可能“毳”即爲疫；北方積陰，故季冬之月，大儺毳疫。（周禮占夢鄭注）一般讀毳爲役，引《說文》“戍邊”爲說，謂取義於邊區寒地，則頗費解。《天官書》以風從東方來者爲疫，殷人則以屬之北方，此其異耳。

①正南之風曰大弱風。左襄十八年傳，“楚師多凍，徒役歲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杜注：“歌者吹律以咏八風，南方音微。”周禮保軼：“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命乖別之妖祥”，鄭玄注云：“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不（否），其道亡矣。”引左襄此傳爲說。按南音所以音微而不競者，以南方之風爲大弱風之故，得此簡可明其理。銀雀簡屢言奏黃鍾、奏應鍾、奏蕤賓、奏林鍾，殆禱祠之際以十二律所應之月而奏之，惜辭簡意晦，難究其旨。鄭玄謂十二辰皆有風，其道久亡，仍有待於探索。

是篇但揭橥大略，未能深入，“風占”之稱王充《變動篇》云：“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開元占經》風占亦分言祥風及凶災之風，謂“當詳五音定八方，觀其起止占之”。是簡雖殘，而漢初風占之術，前乎魏鮮翼奉者，其說粗存端倪，可視術數之一端。“風角”之稱見《郎顗傳》，李賢注謂“風角，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隋書經籍志五行類，此類共二十二部附亡書十二部，皆託名於京房、翼奉。如（京都大學《天地瑞祥志》引翼奉《風角要決》）唐太史令李淳風云：“自翼奉已後、風角之書近將百卷，或詳或略，真偽參差。”此殘簡年代較早，價值殊昂。李氏《乙巳占》論八方暴風占一節另附有圖，以十二支、十干、四維相配，與宋人所謂後天八卦圖相同，其中西方兌風名作“衝風”，東方震稱“亢風”（即嬰兒風）名復不同，可以參考。勿遽著文，訛謬自多，仍冀方聞，有以正之。

1992年11月12日於香港

本篇原爲關西大學漢簡會議論文。

再論“檢”

大庭 脩(日本關西大學)著 徐世虹(中國政法大學)譯

一、研究回顧

簡牘中有“檢”，其字義據《說文解字》云：“檢，書署也。”書署即書寫官府名，它指收受文書的官府，因此“檢”被解作收件一方的官府。又據《釋名》解：“檢曰署，署豫也，題所豫者官號也。”這一解釋和《說文》相同。此外又提出了另外的解釋：“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即封閉物品，使之不散開暴露。

王國維是首先對檢進行詳細研究的第一人。他的《簡牘檢署考》一書，有一半以上的篇幅為檢的研究。《簡牘檢署考》有二個版本，一是載於1912年《藝文》3卷4、5號上的由鈴木虎雄氏翻譯的日文本，一是刊於1914年的《雲窗叢刻》所收的中文本。比較二個版本可見，中文本有較大幅度的修改，因此從整體上說中文本要優於日文本。王國維的論述大綱如下所述。

如《古今注下》所云，“凡傳皆以木為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書函也用板封閉，這個板就是檢。《說文》的“檢，書署也”，是指檢字的本義，書署之物也是檢。徐譜《說文繫傳》云：“檢，書函之蓋三刻其上，以繩封之，填以金泥，捺題書之印。大唐開元封禪禮，以石函納玉牒，作石檢。”從漢至宋的情況來看，其封禪禮的方法乃是書函之檢的類推，即於函上用檢，再縛繩，填泥，押印，最後書寫所授之人。許慎的解釋祇是取其最後一個步驟。《釋名》以檢署為二個概念，故釋檢為禁，釋署為予。

王國維還考證，斯坦因在於闐得到的書牘有二種：一種上端呈尖

狀，大小和檢、牘相同，與唐的玉牒檢相仿；另一種呈長方形，比檢和牘短，和唐的玉匱之玉檢相同，像是嵌入牘中之物。二種書牘的共同點是，都可以在刻齒中勒繩，封泥加印。王國維在這裏指的是斯坦因於尼雅發掘獲得的佉盧文本簡（參見大庭脩著《漢簡研究》（上冊，朋舍，1992年）P211圖30，以下所引的圖均省略，祇稱編號。）。

其後有原田淑人的研究，他撰寫了《關於支那古代簡札編綴法》^①一文，敘述了對檢的見解。其認識基本與王國維相同，所參考的對象也是斯坦因於尼雅獲得的佉盧文本簡。不過原田氏第一次指出，在出土的漢文本簡中也有王國維所說的斗封檢這種實物。

參照敦煌漢簡、居延漢簡、樓蘭晉簡考證檢的，有勞榦氏所著的《居延漢簡考證甲·簡牘之制》中的封檢形式、檢署、露布諸項^②。勞氏認為檢有二種，一種形製同普通簡，一種比普通簡寬，但長度短。前者是封函的檢署，後者是書囊的檢署。對此侯燦氏就勞氏提出的五十二簡進行了再論證，根據書寫格式將其分為七類。

第一類，在簡的上部中央以大字書寫收件者之名，底下佔一行、二行或三行不等，書寫發信人的姓名、印文、到達日期、傳送者姓名。第二類，於簡的上部中央大字書寫收件者之名，發信人的姓名、印章、到達日期、傳送者姓名則書於簡的兩側。第三類，祇在簡的上部中央書寫收件者之名。第四類，在簡的上部中央寫收件者之名，接着寫明“隧次行”、“亭行”、“郵行”、“吏馬馳行”等傳遞方式。第五類，簡的上端書有收件者之名，下有璽室（容納、保護封泥的孔），再下為發信人的署名或說明文字。第六類，不寫收件者之名，祇在兩行簡上書寫發信一方負責人的姓名和印文，以及到達日期和傳送者姓名。第七類，在簡的上部書寫收件者之名，下部記有“廩名籍”、“穀簿”、“歲留□”等帳簿名。侯氏在此分類的基礎上指出，一——五類為封函的檢署，六、七類是書囊的檢署。

永田英正氏在介紹了王國維的《簡牘檢署考》後認為，單獨的簡牘和策書，“除分別加檢於其上以作為封外，具有文獻性質的文書還要被裝入類似今天信封一樣的袋（即囊）中”^③。書囊為方底、四角底，

天子詔書入青色或綠色絲囊，臣下密奏入黑色絲囊，邊境異變之訊入紅色或白色之囊。他還就漢代的斗封檢介紹了王國維的觀點，認為署就是在簡的中央書寫收件者之名，並就書有傳達方式的檢（侯燦氏所分的封四類）和附在運送賦錢、弓弩青繩口袋上的檢作了考證，利用居延出土簡補充了王國維的考證。

1973、74年出土“居延新簡”的釋文作者之一李均明氏，也發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封簡題署考》^⑥。李氏的參照對象祇有“舊簡”，他首先把封檢題署分成文書封檢題署和實物封檢題署兩大類，前者舉出十個種類，後者舉出十五個種類。然後認為封檢題署的內容主要有以下五點：（1）標明收件人。它要求書寫收件人的機關名和收件人的官職及姓名；發件人在封泥上蓋押自己的印章，不用文字書寫。但私人信件有時在封檢上書寫發信人姓名。（2）標明傳達方式。其書寫內容因傳達的緩急而異，有時也不指定傳遞方式。（3）發件人對到達時間和傳遞者的記錄。嚴格地說，當封檢文書到達收件人之處後，收件人爲作收文記錄而書寫了上述文字，這時封檢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4）標明被封緘文書的種類。（5）標明被封緘物品（李氏措辭爲實物）的類別、數量、所有者等。物品有衣糧、器具、錢、書寫材料等；錢有賦錢封檢和現錢封檢之別，後者主要書寫支出記錄。

以上檢均帶有封泥孔（也稱作印齒、璽室，李氏稱爲封泥槽），但也有內容和封檢相同然而無封泥孔的木板。李氏在舉出三例後表明了以下幾點看法：

1. 未涉及印章及傳達者、到達時間的，可能是內容不太重要的文書。

2. 無封泥的原因，可能是在檢到達後被削平或截斷所致。封泥孔留有被砍削的痕跡，即爲明證。之所以要砍削封泥孔，在於封泥孔的突出部分不利於保存。

3. 函封和封檢是兩體。

4. 封檢除上述所見的用途外，還可用於各種器物和動物，驢頸附封檢就是其中一例（後文將述）。

在王國維著述問世後的八十年間，有關檢的研究歷程大致如上所述。因此以下準備在客觀地介紹迄今為止的諸家之說的基礎上，闡述我的看法。

王國維的《簡牘檢署考》匯集了以往有關檢署的文獻資料，給人以極大的方便；從文獻中探尋封禪禮的用檢，讀來也趣味盎然。他所利用的出土資料，是斯坦因於尼雅發掘所得的佉盧文本簡，其照片分別載於斯坦因的《赴中國土耳其斯坦從事考古和地形考察的初步報告》^④和《古代和闐》^⑤，因此其得以目睹。他所賴以為據的二種書牘，特別是長方形的書牘，從側面看，中央突出，有封泥孔，並有三道繫繩用刻齒，形狀呈圓錐火山型。王國維認為這就見於文獻的斗檢封。但今天我們已然可知，封泥孔另外還有靠近檢一側邊緣的形狀，我考慮這種檢更與斗相稱，它纔應該是斗檢封。因此可以說，頂端呈尖狀的佉盧文本簡也接近這種形式。原田淑人同樣以佉盧文本簡為例說明檢。他以圓錐火山型的漢文簡為依據，第一次指出同樣檢的存在。然而該檢在孔拉第的書中^⑥被示為斯文，赫定在樓蘭發掘所得的晉簡，原田氏的說明由此陷入混亂^⑦。

勞幹的研究比較粗略，侯燦氏就見於“檢署與露布”的示例進行了再整理。他認為勞幹的封函檢署和書囊檢署的二分類法有所不足，因此將勞幹使用的五十二簡細分為七個小類，五小類歸封函檢署，二小類歸書囊檢署，再加上勞幹列為封檢形式的內容，勞、侯兩氏對檢署就有三種分類。這意味着被勞氏列入“封檢形式”的檢是物品檢，和李均明氏的文書封檢、物品封檢的二大分類明類不同。這就是說，李氏之說的特點在於，突破了包括永田氏在內的將檢的範圍限定在文書的思路，而將其擴大到物品檢。取而代之的是，在李氏之說中書囊檢不復存在。因此永田氏有關書囊形式的詳述又為其特點所在。此外，李氏的無封泥檢乃是原有封泥孔被砍削所致的見解，也是前所未有的^⑧。

以上闡述了我對以往研究的個人評價，下面再結合實例略作探討。

二、物品檢

李均明之說以其分出實物封檢題署即物品檢為特色而引人注目，因此這裏首先論述物品檢。

在索馬斯特勒姆整理的“居延舊簡”考古研究報告中，載有根據發掘者貝格曼的草圖繪成的檢圖，由於通過它可以很方便地了解檢的形狀，故先將其揭載如下^④。圖中的 11 檢即前文提及的圓錐火山型，因歷來無照片而示於十六圖，所以在此一併圖示。檢上無文字，也許是在運往瑞典時，中國方面的照片被遺漏了。此類檢在晉簡中祇有二枚，故在年代上可以上溯至漢代。該檢出土於甲渠候官遺址(A8)，尺寸為 12.1×3.9×1.8 厘米。編號為 286 的敦煌漢簡“顯明隧藥函”不是書信檢，形狀亦同此(參見圖 31、32)。

圖 31 所示的十三種檢，形狀較接近的有 1、4、7、9 號檢，其中的 1 號檢是文書檢，這將在後文敘述。與 4 號檢相似的有著名的滎陽秋賦錢檢，即附在運自河南滎陽縣五千秋賦錢錢囊上的檢。

	東利里父老夏聖等教數	
1	滎陽	西鄉守有秩志臣佐順臨
		45 · 1A
		□□□□
	出少見錢少	45 · 1B

該檢長 17.6，寬 3.8 厘米，距上端 2.1 厘米處，有長 2.8 厘米的封泥孔(□印)。背面為平面，正面自封泥孔以下呈斜坡狀，最上端厚 3.7 厘米，下端厚 0.4 厘米。從頂部俯視，在距前端 1.2 厘米的中央部位，有一直徑為 0.9 厘米的孔，孔的下端可見正面照片中封泥孔的中央部位。正面文字的左側四字，是後來書寫上去的，意義不明；側面的“出少見錢少”也是後寫的。中央孔的用法不明。(圖 33)

睢陽戍卒西尉里王柱

□里囊一領

- 梁 旱布復袍一領
- 2 ●□ 旱布禪衣一領
- 國 旱布復袴一兩
- 梟非一兩

常韋二兩

179.2

該檢上寬 6 厘米，下寬 7.5 厘米，長 15 厘米，是出身梁國睢陽西尉里的戍卒王柱所持的衣糧囊之檢。檢上無長孔，但如照片所示，封泥孔的兩側有細密的刻痕，這是為把檢牢固地紮在囊上而刻出的繩槽，可見繩子也很細（圖 34）。上述的 1—2 例檢是偶然被附在錢囊和衣囊上的，但其他的 4 型檢則非錢囊檢即衣囊檢。

如衣囊檢：

- 3 □ 東郡戍卒東阿靈
- 里袁魯衣囊 13.8×4.6 100·1

如錢囊檢：

- 4 鄧□餘錢萬七十 16.9×3.5 214·2
- 5 □七月秋賦錢五千 17.8×2.5 49·2

（右半缺）

- 6 □ 潁陽邑元康元年九月
- 調三千 17.9×3.5 183·18A
- 上吏□（簡的右側） 183·18B

- 7 卷□ 士吏武臨
- 萬九千二百 19.9×6.2 208·5
- 記吏已來六百萬八千六百

- 8 □ 卒□數具嗇夫同臨 13.2×6.7 262·1
- 卒柏□數具

上述記載的尺寸為長×寬，單位厘米，以最長、最寬部分計算。例如檢 8 最窄的幅寬祇有 3.5 厘米，是最寬部分的一半。檢 3 也像檢 1 一樣，有長孔，但這部分殘缺。

7 型檢也是用於錢囊：

□□里父老□□

9 邙秋賦錢五千 正安釋□□

□鄉 裔夫京佐吉□ 23.3×7.0 526 · 1

10 廣秋五千 王德少三 19.7×6.2 21 · 1

□賦 □四
鄉

十一月己卯掾彊所收五年餘菱錢二千五十五
元年菱錢萬四千五百廿八●凡萬六千五百八十
三

出錢五千七百廿五□收掾車給官費

11 亭□□□ 出錢三千八百六十六□居延責錢

□ □ 出錢千縣所□□ 19.2×7.4 209 · 2

凡出萬五百九十一

今餘錢五千九百九十二

出錢四百五十一十一月壬辰付令史根□□□

出錢三百十一月壬辰付士吏□□□□□

檢 9、10 繫在運送秋賦錢的囊上，其發送地和檢 1 以下的錢囊相同，作用和日本木簡中贅的付札相似。檢 11 十分特殊，可能是某年十一月居延縣某亭的錢財出納簿。其附於裝現錢的囊上，於出納之際記錄。出納結束後，由承辦的掾和裔夫分別押蓋封泥。因此檢 11 有可能是從別處移送來的。










12 型檢的使用方法同 4、7 型，也是囊囊檢。但沒有照片，出土於 P8 這一不明地點，頭部似有孔。4、7 型的封泥孔雖有一個和二個的不同，但在封泥孔無側壁這點上，1—8 型共通；狀如 12 型側壁的則有 9—11 型。由於它必須刻出封泥孔及繩溝，因此製作起來很費工時。

9 型的例子有很多，現將其集中示之如下：

12 累虜候長

弓箭四發

9.2×2.9 83 · 3

- 13 第十六隧驚 
弩青繩卅二完 (圖 35) 11.2×3.8 166·1
- 14 卅井降虜隧 
出火推鑽 11.2×4.6 305·2
- 15 ● 第卅五隧 
蘭一完 12.9×3.9 393·5
- 16 卻胡亭木
料二完 10.7×3.5 438·1
- 17 驢喜隧車父棠
卒許勃所假
●  具弩一有帽 9.7×3.8 83·5
榦羌爲聞
- 18 ●  士吏常褒 11.5×3.6 30·11
- 19 卅井累虜隧 
布緯糲三斗 9.0×2.5 181·8
- 20 第八隧橐矢箭  14.4×4.4 玉門花海 21
- 21 貝丘第四車 
第五  12.1×3.5 428·2

以上各檢中,18 檢的封泥孔雖與其它相同,但自封泥孔的下壁至檢下端,文字面呈斜狀,不同於其它封泥孔呈突出狀的檢。19、21 的封泥孔呈無兩壁之形,但均長 9—12 厘米,寬 2.5——4.6 厘米,以封泥孔所具有的形態衡量,兩者幾乎一致。從記載的文字看,除 18 和 21 不詳外,其餘分別書有弩、箭、蘭、料、弓繩、糲、鑽^③等物品,並標明了這些物品的所屬,禁止他人使用。這就是所說的封印的作用。檢 17 意爲:隸屬驢喜隧的車卒許勃有一帶帽的具弩(部件齊全,且能放入布袋的弩),榦羌爲許勃保管。檢 18 可能也是附於士吏常褒所持的物品之上。據此可知,9 型檢是不移動的。其書寫的文字是物品的說明,而不是去向。這就是李均明氏所說的實物封檢題署——物品檢的一大特色,它具有封印的意味。檢 2、3 衣囊也具有封印的意味,即集中

運輸戍卒的衣囊。“居延新簡”出一簡，就是對運輸或保管戍卒用物的統計：

22 回右南陽私衣物囊百一十一 EPT52·84

22 簡的存在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例如，檢 2 是附在梁國睢陽戍卒王柱衣囊上的檢，而 22 簡表明，像這樣的衣囊自梁國集中運來了數十、上百個。檢 2 出土於甲渠，而帶有檢的衣囊自梁國運往居延。由此可見，該檢在事實上是自梁國向居延移動。然而檢 2 並沒有寫運往居延之類的文字，從而表明該檢專用於王柱的衣物，除王柱外別人“禁止”開啓。標明物品的到達地居延的，則另有它檢。或者是附有該檢的衣囊和其它衣囊被集中裝車，該車來到居延，於是檢 2 也來到了居延。

檢 1 的滎陽賦錢也同樣如此。它表明囊中之物為滎陽賦錢，而不表示運往居延。從檢的移動來看，該檢上的文字並非為署明移動目的地而寫。這一認識是過去所沒有的。

作用在於封印的檢，其它還有一些。貝格曼的草圖中無這些檢，但索馬斯特勒姆的報告裏有其照片^③。（圖 36）從照片上看，這些檢無文字，但實際 1—6 有兩枚有字檢：

23 第
卅四回 4.4×2.3 67·26
隧

24 魏郡回納 6.4×1.2 112·17
（缺左半）

以下二檢也許是 7 型下部的切斷部分：

25 金
緱氏回奉 8.9×4.5 127·1
卿

26 貴里 阜布襦
淳于休回 臬肥 5.7×3.2 34·15
衣囊 常章

犬祿二

此外圖 7 的 4 檢可能就是 199.20。像這種形狀的檢，在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竹筍上發現有三十七個。《馬王堆一號漢墓》將其定名為封泥匣，但封泥上的印文有“軟侯家丞”二十七處，“右尉”兩處，“□買之”一處，尺寸也是長 4.2—7，寬 2.6—2.8 厘米^⑧。

把這樣的木製品稱作“檢”，還是稱作說明狀況的“封泥匣”，恐怕是關鍵所在。我認為這是檢的一種，即所謂封檢，它具有《釋名》所說的“禁”的含義。（圖 37）

上述考察的都是封泥孔較小的物品檢，但反之也有較長大的檢：

27 ●□厭胡隧橐矢銅鐃百 33.5×2.6 敦煌 283+284

該封檢附於厭胡隧所有的百枚帶有銅鐃的矢束之上，較長大。與此類似的還有下列檢：

28 禽寇隧札二百兩□行五十繩十丈□六月爲七月 28.2×2.1 10·9

29 □安漢隧札二百兩行五十繩十丈五月輸□ 26.7×1.9
138.7+183·2

30 安漢□（中缺） 10.7 繩十丈札二百兩行五十□ 10·8

以上三簡意為，將二百枚用作書寫材料的札、五十枚幅寬可書寫兩行的兩行簡、十丈用以繫連冊書的繩子分配給禽寇隧和安漢隧，三簡為附在這些書寫物品上的長檢。29 中的“五月輸”，是指該簡為送物品至安漢隧的檢，還是保管收取物的檢，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尚難以斷定。同樣的問題又見以下二檢：

31 ●肩水候官地節□四年計餘兵穀□財物簿毋餘船毋餘芟 23.5×1.4 14·1

32 建昭二年□吏奉賦名籍 14.5×2.0 236·1

31 的最後五字也許是後加的，不過 31、32 同是附於簿籍的檢。其文字不可視為送達地，而是簿籍內容的表示。換言之，其目的和附在簿籍上以表示其種類的楊（寫有物品名稱的簡）一樣。但由於它帶有封泥孔，具有不使他人目睹的“禁”的意義，所以可以視為檢，其所

示之物的性質和 28—30 檢的物品相同。李均明氏把檢 31、32 歸入文書封檢題署，我不贊成。我認為這應是附於簿籍這類物品上的檢。文書具有“往來於發件人和收件人之間”的性質，因此簿籍不是文書，而是記錄。

三、文書檢

其一 有封泥孔的文書檢

文書檢歷來被理解為檢的使用目的，因此本節擬就常識性的問題作簡單闡述。在前節所示的圖 36 中，我認為 1 型即為文書檢。

張掖甲渠塞尉

33 甲渠官 回(圖 38) 16.0×3.5 133·1

九月癸亥卒同以來

王彭印

34 甲渠官 回 15.0×3.0 133·4

四月乙丑卒同以來

35 甲渠官 孫□印 15.5×4.5 175·11
□寅卒同以來

上述三檢均在中央大字書寫收件人甲渠候官，右側寫按於封泥的印文，左側記錄到達日期和傳達者姓名，下端有封泥孔而無側壁。檢 33 的下端臺室壁高 1.8 厘米，寬 1 厘米，封泥孔上下距離為 4.4 厘米。檢 34 下端的封泥孔壁高 2 厘米，底厚 0.4 厘米。又：

楊音印

36 甲渠官 15.0×2.7 4·29

正月丙寅卒便以來

□□□□

37 卅井候官 13.7×3.2 428·4

十一月丙戌□□卒□□以來

38 肩 水府左掾門下 14.4×2.8 288·16

39 劉 宣書奏

武 大伯 (圖 39) 14.2×2.5 284·25

以上四檢，李均明氏指出其封泥孔的上下壁已被削去，對照照片亦能辨認得出。檢 39 我認為是私人信件。圖 36 之 8 型檢如：

40 ●回甲渠發候尉前（圖 40） 14.5×2.9 55·1

該簡上下有封泥孔，是在“甲渠候、尉前開啓”的重要文書。上端的封泥孔底中央，有一寬 0.5 厘米的凸出部分，前文所述的 199·20 也有，其作用在於防止封泥脫落。3 型檢見：

任次君示睨

41 回居延左 15.4×5.4 214·1B

42 卒皇定所□

甲渠候官故行（圖 41） 214·1A

該檢的封泥孔有凸出部分，筆迹正反兩面相同，因此書於反面的居延左（尉？）也許是發信人。“故行”很罕見，不知歷來是否有所注意，未聞有何見解。不過“新簡”中略有其例：

43 甲渠候官故行 EPT20·1

44 甲渠候官故行 EPT51·618A

45 甲渠塞候故行 EPT53·80

46 （上缺）^{延都尉章}
渠鄣候故行 EPT59·450

故有“特別、特意”之意。《經傳釋詞》云：“固，尤必也。或作故。”據此故可通固，意為務必無差錯送達。今天的掛號郵件有特別傳送之意。可比照理解。

47 莫府吏馬馳行以急為故 回 259·5

以此例見之，故行又有急行之解。其準確的解釋尚有待於將來。

其二 私印封泥的含義

目前我們能夠見到的數量較多的檢，一般是在無封泥孔的普通板上大字書寫甲渠候官、肩水候官的署名，或以小字書寫封泥印文、到達日期、傳遞人等記錄署名。其印文有官印和私印的區別。如果是官印，可以知曉發信人是誰。那麼如果是私印，發信人又是誰呢？對此目前還未見有所論及。

檢署的體例通常如下例所示：

印曰陳德昌印

48 甲渠候官

38·7

八月乙巳第八卒夏賀以來

即檢的右側小字記錄封泥印文，左側小字記錄該郵書的傳達者，中央的檢署則以不同筆迹書寫。祇是無此記載的檢署也有許多。

在印文記錄中，如封泥有所破損則書“印破”；如是高級官吏的官印，則書“居延塞尉”(259·4)、“印曰張掖肩水司馬印”(14·3)、“章曰張掖都尉章”(54·25、74·4)、“居延令印”(EPT51·37、51·144)、“居延左尉印”(EPT51·128)、“居延倉長”(EPT51·140)、“張掖塞尉”(EPT51·143)等。

但是如前文所述的 38·7 號檢所示，在怎樣的情況下書寫人名印文呢？與此相同的資料為數較多，因此以下擬在綜合的基礎上加以揭示。

(1)王充

王充印

49 甲渠候官

30·17

閏月甲寅第七卒會以來

50 候長王充粟三石三斗三升少十月庚申卒護取 馬食秣稬五石八斗 十月庚申卒護取 158·2

據該簡可知，王充是候長，但具體情況不詳。

(2)東門輔

東門輔

51 甲渠官 閏月乙亥第七卒以來 EPT51·129

誠北部迹簿

東門輔

52 甲渠官 EPT50·146

五月甲辰第七卒□以來

東門輔

53 甲渠官行者走 EPT52 • 154

十月辛□卒□以來

□輔印

54 甲渠官 178 • 29

□□□□第□卒同以來

55 徙王禁責誠北候長東門輔錢不服

移自證爰書會月十日

●一事一封 四月癸亥尉

史同奏封 259 • 1

上述五檢中，前三檢有東門輔之印。54 檢是否東門氏，不詳。但據 55 檢可知，其為誠北候長，51 檢的誠北部迹簿的注文亦可旁證。

(3)楊褒

楊褒印

56 甲渠官 267 • 1

六月甲戌卅卒同以來

楊褒私印

57 甲渠官 EPT51 • 333

三月乙酉卒建以來

58 第十候長楊褒 馬一匹駟牡齒五歲(下缺) 18 • 13

據 58 簡可知，楊褒為第十候長。又據 EPT59. 548 簡文書記載，楊褒於元壽二年十二月，因私使用戌卒而受到某種懲罰。

(4)李充

李充印

59 甲渠候官行者走 42 • 10

60 城北候長李充(下缺) 61 • 15

59 檢的李充可能就是 60 簡中的城北候長。

(5)李奉

李奉

61 甲渠官 EPT51 • 139

四月戊午卒年以來

62 (上缺)士吏李奉 令明(下缺) 84・14

兩個李奉有可能是同一人物，身份爲士吏。

(6)孫猛

孫猛

63 甲渠官 EPT51・168

九月戊午卒□以來

64 甲渠士吏孫猛□□□□(下缺) EPT52・17

65 甲渠士吏孫猛(下缺) EPT52・236

66 (上缺)月自言責士吏孫猛脂錢百廿●謹驗問士吏孫猛辭服
負已收得猛錢百廿

EPT52・21

出百償肉錢

67 士吏猛四月奉千二百 出十五猛取 EPT52・353

出十四騰計

68 甲渠言士吏孫猛病有瘳視事言府●一事集封(下缺)

185.22

孫猛的資料最爲豐富。在 64、65 簡中，可見甲渠士吏孫猛；66、67、68 簡則記載了孫猛返還所借脂錢，領取奉錢，支付肉錢，患病等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如下簡所載：

69 ●俱起隧長程偃等能不宜其官換如牒●一事二封 八月丁
告尉謂誠北候長輔

亥士吏猛奏封 EPT52・18

孫猛作爲甲渠士吏，將縣的人事變動通知傳達給誠北候長。接收通知的誠北候長輔，即(2)之東門輔。其次又見：

70 候宏移甲渠候官令史遣士吏猛等

□等出穀食凡卅石石二斗各如牒前移 RPT52・416A

這是有關孫猛因公出差的文書，其公務活動由此可窺一斑。

71 平元年九月甲辰不侵守候長士吏猛敢言之 EPT52・
42A(觚)

42B

這是說孫猛在擔任士吏本官的同時，又兼任不侵候長。再見下簡：

72 河平元年九月戊戌朔丙辰不侵守候長士吏猛敢言之將軍行塞舉

駟望隧長杜未央所帶劍刃圭狗少一未央貧急輟弱毋以塞舉請

斥免謁言官敢言之 EPT59 • 3

73 河平元年九月戊戌朔丙辰不侵守候長士吏猛敢言之謹驗問不侵候史嚴辭曰士伍居延鳴沙里年卅歲姓衣氏故

民今年八月癸酉除爲不侵候史以日迹爲職嚴新除未有追逐器物自言尉駿所曰毋追逐物駿遣嚴往來毋過 EPT59 • 1

74 日且入時嚴歸以戊申到郭東田舍嚴病傷汗即日移病書使弟赦付覆胡亭卒不審名字己酉有

追逐器物盡壬子積六日即日嚴持絳單衣甲帶旁囊刺馬刀凡四物其昏時到部嚴期一日還 EPT59 • 2

以上兩件文書，前者是孫猛彈劾駟望隧長杜未央，後者爲孫猛彈劾不侵候史衣嚴勤務上的失職。無結尾的 59 • 1—2 文書，其結論恐怕也是要求實行免職處分。這又表現了孫猛公務活動的一個方面。同時頗具意義的是，根據文書的內容還可以瞭解漢代官吏的勤務，祇是本文不擬對此深入探討。我想首先確認的是，這兩份文書的日期，即河平元年（前 28）九月丙辰（19 日）很令人注目，據此可知 EPT52 • 42 號簡的日期也是河平元年，九月甲辰即九月七日。這表明孫猛的活動期是在公元前 28 年前後。

一旦確定了年代，下述簡中的問題也就可以解決了。如：

75 五鳳元年五月戊午朔甲子甲渠候長猛敢言之謹

寫重敢言之

EPT56 • 257

這裏的甲渠候長猛，活動於五鳳元年即前 57 年，較河平元年早二十九年，因此恐怕不是孫猛。又：

- 76 第四候史孫猛 104 • 38
77 候史孫猛 十月奉錢六百 EPT52 • 255

第十士吏孫猛十二

- 78 故甲渠第九隧長吳建
奉百廿 EPT52 • 130

上述三簡，前二簡與擔任士吏以前的孫猛有關，但 78 簡中的第十士吏孫猛是否和前一孫猛有關，尚不能做出判斷。

以上通過六例，探討了候長王充、誠北候長東門輔、第十候長楊褒、城北候長李充、士吏李奉、不侵守候長、士吏孫猛等人的印封。作為包含這些人在內的行書記錄，又見下簡：

- 79 二封王憲印 二封呂憲印
一封孫猛印 一封王彊印
書五封檄三 一封成宣印 ●二月癸亥令史唐奏發
一封王充印 (圖 42) 214 • 24

這其中的王憲，即下簡中的候長王憲：

- 80 □□居延甲渠候官塞有秩候長公乘王憲中勞十月一日(下缺) 185. 10

呂憲見 185 • 25 號簡：

- 81 臨木候長呂憲…

王彊見：

- 82 餅亭候長王彊 三月奉錢千二百… 279 • 26

- 83 ●候長王彊王霸坐毋辨護不勝任免移名府●一事集封 八月丙申掾彊封 317 • 21

從以上二簡看，王彊有可能是候長，因此成宣也肯定是候長、士吏、隧長等下級官吏。

根據上述考證，包含在檢署中以小字書寫的私印記錄，表明該公文書乃是由無官印的候長、士吏、候史、隧長等簽發，且簽發者多為候長和士吏。在此基礎上令人注意的是，其簽署大多數寫“甲渠官”，而不是正式地簽署“甲渠候官”，這或許意味着候長、士吏等簽發的是候

官內部的文書，以示與候官外部文書的不同。

其三 其他問題

排列有序的封泥印記錄，又見傳達者的記錄。底下來考察一下它是否由一定的亭隧之卒傳達的。

首先是發往甲渠候官的檢署，整理結果如下：

第三卒 EPT51 · 130

第七卒 30 · 17、185 · 17、EPT50 · 16、EPT50 · 146、EPT50 · 159、EPT50 · 178、EPT50 · 207、EPT51 · 140、EPT51 · 143、EPT51 · 176、EPT51 · 625、EPT52 · 381

第八卒 38 · 7、178 · 1、214 · 107、EPT50 · 24、EPT51 · 135、EPT51 · 334、EPT52 · 389、EPT52 · 625

第十卒 214 · 3、259 · 4、262 · 30、279 · 10

門卒 55 · 19、EPT14 · 1、EPT40 · 1

臨桐卒 EPT51 · 127、EPT51 · 161、EPT51 · 169、EPT51 · 190

郭卒 184 · 9

第十隧長 262 · 30

止北隧長 73 · 7

候史

候長 262 · 27

三墩隧長 EPT51 · 145

第廿九隧長 EPT51 · 164

隧長 EPT43 · 118

肩水候官因“居延新簡”尚未發表，例子甚少，祇有“卒”、“金關卒”、“隧長”等。

由於烽隧的位置不能確定，因此甲渠候官和第七隧的關係不詳，但在文書傳遞的路綫上應有密切關聯。可以想象，第七隧的大量文書也是由其他隧傳達，由隧長、候史、候長送達的。這也許是由文書的性質所決定的，祇是對此尚不得而知。肩水候官的例子很少，最應引起

注意的是下列：

張掖都尉章

84 肩水候以郵行 (圖 43) 74 • 4

九月庚午府卒孫意以來

這裏的發信者是張掖都尉，傳達者是府卒孫意，因此孫意無疑是都尉府卒。所謂以郵行，是指通過郵至郵傳送郵件。但以此例來看，是否表明府卒孫意從郵至郵傳遞文書，還較難判斷。

除“以郵行”外，還有多種指定的傳遞方法，如見於檢 47 的“吏馬馳行”、檢 42—46 的“故行”、“行者走”、“以亭行”、“隧次行”、“隧次走行”、“亭次走行”等；EPT53 • 71 還出現了“居延縣以郵亭行”的新內容。這個問題現在考證起來還有困難，準備留待將來解決。

其次是在收件人下記入一定的內容。

印破

85 甲渠官十一月乙卯卒同以來 220 • 7

●二事

86 甲渠郵候以郵行 16 • 5A

●一事

87 甲渠候官 26 • 22

病書

東門輔

51 甲渠官閏月乙亥第七卒以來 EPT51 • 129

誠北部迹簿

88 甲渠候官行者走 EPT51 • 141

有府會

周并私印

89 甲渠官亭次行 EPT26 • 7

九月癸丑卒以來●一事

張掖居城司馬

90 甲渠郵候以郵行 EPT43 • 29

九月戊戌隧卒同以來●二事

91 甲渠鄯候以亭行 EPT51 · 156

…□□卒宏以來四事

牟政印

92 甲渠官 三月辛卯第七卒延以來 EPT51 · 176

●二事

93 甲渠候官 EPT51 · 625

正月庚辰第七卒開以來●二事

居延□□□

94 甲渠鄯候以亭行 EPT52 · 380

八月丁巳隧長□□以來

●一事

95 肩水候官 名捕酒泉大 280 · 7

守男敦煌太守

稟名籍

96 肩水候官 穀簿 (圖 44) 51 · 6

歲留□

97 候官 第六
迹候簿 36 · 16

檢 87 的病書、51 的誠北部迹簿、88 的有府會、95 的名捕酒泉太守男敦煌太守、96 的稟名籍、穀簿、歲留(簿)、97 的第六迹候簿等，均附檢表明郵書的內容。85、86、89、90、91、92、93、94 的一事、二事、四事，和 259.1、EPT52.18 簡於發件記錄上記載的一事一封、一事二封相同，下簡也同此：

98 (上缺)候長候史十二月日迹簿戌卒東郭利等行道貰賣衣物郡中移都尉府 二事二封 正月丙子令史齋封 45.24

即在檢的表面寫明封中的文書是一件，還是二件、四件。因此檢面如是一事，該檢就相當於一封，一事一封是其具體表現；書寫簿籍名，用以表現其中為簿籍，所以檢封的應是文書和簿籍。如果檢封的是文書和簿籍，則正如永田氏所指出的那樣，其極有可能被裝入袋中。由此

可以認為，這些檢是被附在書囊之上的。這一結論亦可支持侯燦氏將書囊檢署分為第七類的見解。那麼這些檢是否原來有封泥孔，後來又被削去了呢？從檢的長度看，這一看法未必妥當。那麼封印又如何呢？我認為例 23—26 檢不同於為封印封泥孔而使用的檢，即它把收件人書寫在和普通簡一樣的板上，用祇有封泥的印齒檢封印。這一考慮是否更妥當呢？這樣推論的結果，就是要求承認單純板檢署的存在。當然這個想法也有缺陷，那就是較之無封泥孔的出土檢，印齒檢的數量明顯要少。

再次是露布文書，它們是包括很多檄在內的長簡。

- | | | |
|-----|-----------------|-----------|
| 99 | 廣田以次傳行至望遠止 | 273 • 29A |
| 100 | 莫府吏馬馳行以急為故 | 259 • 5A |
| 101 | 乘候官士吏詡隧長戎以亭行 | 427 • 1A |
| 102 | 平望候長刑珍附馬行 | 敦 633 |
| 103 | 獲虜寫傳至斥地 | 敦 2 |
| 104 | 萬歲東西部吞胡東部候長隧次走行 | 806 |
| 105 | 候史德在所以亭次行 | 5 • 4A |

上述均為於封泥孔處折斷的長簡的頭部，可以想像出其原型的有下簡：

- ①十二月辛未甲渠候長艾候史個人敢言之蚤食時臨木隧卒路人望見河西有虜騎廿亭北地豁中即舉蓬燔一積薪虜即西北去毋所死亡敢言之/十二月辛未將兵護民田官居延都尉圍城倉長禹兼行□(下缺)
- ②寫移疑虜有大眾不去欲竝人為寇檄到循行部界中嚴教吏卒驚燕火明天田謹迹候一望禁止往來行者定燕火輩送便兵戰鬪具毋為虜萃槩已先聞知死亡重事毋忽如律令/十二月壬申殄北守
- ③候長綏未央候史包隧長畸等疑虜有大眾欲竝人為寇檄到綏等各循行部界中嚴教吏卒定燕火輩

送便兵戰鬪具毋爲虜所萃乘已先聞知失亡重事
毋忽如律令

278・7^⑬

106 廣田以
次傳行
至望遠止


此份露布的大意是，由於匈奴有攻擊的預兆，居延都尉府下令戒嚴，並令殄北守候長將此令自廣田隧傳達到望遠隧各隧。因此該露布沒有附檢的必要，但有封泥。其印的作用在於以印爲信，證實命令的真實性，所以幾乎等同於印信。

再舉一個以印爲信的絕好例子。敦煌漢簡 370，上部有繩痕。其文曰：

107 降歸義烏孫女子
復帑獻驢一匹驛牡
兩祛齒二歲封頸以
敦煌王都尉章

(圖 45)


該簡尺寸 10.6×3.9 厘米，莫如說是符的變形。在烏孫女子所獻的驢馬頸上封以敦煌玉門都尉章，可見此印既是封印，也是信印。

108 牛肉 
十斤

EPT56・174

此簡中的牛肉也和驢的情況相似，該檢亦可視同檢 12—21 的物品檢。

以上提出的檢，收件人或是甲渠候官，或是肩水候官。不過個人收件也有一些：

109 劉 宣書奏 
武 大伯
284・25

110 李 鳳書再拜奏
甲 渠蘇掾門下
61・16

111 掾永叩頭白記

- 甲渠候解君門下 EPT50・139
- 112 高仁叩頭白記 𠄎
甲渠候曹君門下 EPT40・7
- 113 吳陽書再拜奏 𠄎
甲渠候曹君門下 EPT40・8
- 114 候義書叩頭奏
甲渠候曹君門下 EPT40・208

在這些檢中,109 的發信人和收信人都無名銜,而其它檢的收件人則有。不過我懷疑給甲渠候解君和曹君的不是公文,而是私信,祇是無法確認。109 和 110 的第一字與第二字之間的空格,為繫繩所用;下部的封泥孔也用繩縛,即一檢縛以二繩。

284・25 長 14.3 厘米,寬 2.8 厘米,幾近完整。因此該檢所能覆蓋的簡也極為有限。如是通常的一尺簡,會因過長而無法覆蓋。典型的私信之一是 10・16 簡。該簡為 22.3 厘米的兩行簡,正面書寫三行,反面也書寫三行。兩面書寫,不僅檢不能覆蓋,其長度也顯不足。如果真是一檢覆蓋一簡,那麼是否有像佉盧文簡那樣以檢覆蓋簡文的例子呢?

115 傳 (圖 46)

這是覆蓋在過所,即旅行者身份證明上的檢。181・2A 為身份證明之一例,雖因下部殘缺而不知其準確長度,但基本上和 115 檢同等長,所以似可以覆蓋。不過如圖 47 所示,29・1、29・2 的隧長及其家屬符,還有 29・3A 的簿楊(附札),長度均為六寸;肩水金關的出人符也與此同長。因此有封泥孔的檢另當別論,符、檢、楊則均使用六寸板,以適應某種需要。

以上對檢的探討,還遺留有很多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尚有很大的難度。不過正因為問題涉及到了諸多方面,所以纔對僅利用佉盧文木簡的王國維的《簡牘檢署考》及原田淑人的論述有不滿足之感。本文在考察歷來有關檢研究的基礎上,受其啓發而就一些疑問點闡述了一己之見。

本文的觀點如下：檢分為物品檢和書信檢二種。物品檢表明內裝之物，具有禁止窺探內裏的含義。書信檢寫明收信人，具有書署的意味。兩種檢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即如《釋名》六釋書契第十九所云：“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書文書檢曰署，署豫也，題所豫者官號也”。此外封印亦如《釋名》所云：“印信也，所以封物為信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可以說，有封泥孔的檢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受印的性質。

注釋

①原田淑人《關於支那古代簡札的編綴法》，載《東方學報》東京六（1936年），後為《東亞古文化研究》（1940年）採錄。

②勞幹《居延漢簡考證》，《居延漢簡·考釋之部》（1986年）所收。其最初的研究見《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1944年）。

③侯燦《勞幹〈居延漢簡考釋·簡牘之制〉平議》，《秦漢簡牘論文集》所收，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編，1989年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

④永田英正《書契》，收入《漢代的文物》（1987年）。

⑤李均明《封檢題署考略》，《文物》1990年10期。

⑥Aurel Stein: Preliminary report on a journey of archaeological and topographical exploration in Chinese Turkestan. Publish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H. M. 's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in Council. London: Printed by Eyre and Sportis woode, 1901

⑦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 M. Indian Government, 2 vols, 1907.

⑧August Conrady: Die Chinesischen Handschriften und Kleinfunde Sven Hedins in Lou-lan. Stockholm, 1 vol, 1920.

⑨原田氏的《東亞古文化研究》之圖版67，揭示了該樓蘭晉檢的照片，但說明卻言“漢代的木牘”。

⑩或許脫離了本文的論題，但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為何佐盧文本簡被發掘出土時，其封泥呈未開啓狀態呢？中文木簡中完全沒有此例。

⑪Bo Sommerström: Archaeological Resarches in the Edsen-Gol Region,

Inner Mongolia, 2 vols, Stockholm, 1956~58 之中, part 1, Fig. 17. Wooden seal-tablets from Mu-durbeljin and A10.

⑫檢 12 的“箭四發”的“發”，爲十二矢之義。檢 13 的“驚弩”之“驚”，通繁，弓的矯正器。檢 14 的“出火推鑽”爲發火器。檢 15 的蘭指箭筒。檢 16 的“料”指長柄槌杓。檢 19 的糲指乾糧，布緯或指布製軍糧袋。

⑬見注⑪ Part 1, P1, 14.

⑭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1973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上集 112 頁。

⑮1992 年 3 月在歷史語言研究所確認原物之際，由門田明釋出該觚簡文，本文據此。

（原載書學書道史學會：《書學書道史研究》第 1 號（創刊號），1991 年。後又收入大庭脩著《漢簡研究》，同朋舍出版，1992 年 12 月 10 日。）

新舊居延漢簡冊書復原舉隅(續)

謝桂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關於新、舊居延漢簡的冊書復原,我曾在拙作“新、舊居延漢簡冊書復原舉隅”^①和“元康四年賜給民爵名籍殘冊再釋”^②中,舉出過兩個實例,這裏再補充兩個實例。

(一)新莽制詔殘冊復原

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從破城子舊出的居延簡中,曾發現過如下兩枚王莽的制詔簡:

簡(一) 辨衣裳審棺槨之厚營丘龍之小大高卑薄厚度貴賤之等級。
始建國二年十一月丙子下

二一〇・三五,圖二九九^③

簡(二) 制詔納言其宜官伐材木取竹箭 始建國天鳳三年十一月戊寅下

九五・五 圖二八〇

這次,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從破城子探方五十九新出的居延漢簡中,又發現了下述內容和文例相類的簡文:

簡(三) 制詔納言其令百遼屬省所典修厥職務順時氣 • 始建國天鳳三年十一月戊寅下

EPT59・61

簡(四) 制詔納言農事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之者取之不誅 •
始建國天鳳三年十一月戊寅下

EPT59・62、63

(簡五) 始建國天鳳三年十一月戊寅下

簡(六) 𠄎𠄎掌酒者秣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餽必絜(潔)水
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六物大酋

EPT59 • 343

簡(七) 監之勅於酒𠄎𠄎

EPT59 • 492

簡(八) 𠄎三年十一月戊寅下

EPT59 • 493

因據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④一文介紹，簡(三)至簡(八)均是從漢代甲渠候官遺址塢東灰堆的北灰區中出土的，所以，簡(一)和簡(二)，亦可能同出土於北灰區。且該文又云“此區北、東、南部出土的簡主要是昭、宣帝時期的；西北部以元、成帝時期的較多；西部則以王莽時期為主，且多在上層”，而從探方五十九共出土了 63 枚有明確紀年的簡號，其中屬於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漢孺子嬰和東漢光武帝紀年的簡號 27 枚，屬於王莽紀年的簡號 36 枚；另外雖無王莽紀年，但根據王莽時期的制度改革和名稱變更，諸如甲渠改名甲溝；居延改名居成；酒泉郡改名輔平；臨木改名推木；長安改名常安；間田；王田；大司農改名羲和；郡太守改名卒正、連率、大尹；除匈奴之號；赦除翟義、劉宇、劉璜及家屬當坐者外謀反罪名；庶士；秩上大夫；小泉；大黃布；四寫作三；七寫作泰；廿寫作二十；卅寫作三十；奉錢、賦錢等之錢寫作泉；薪俸之奉寫作祿等等，可以推斷屬於王莽時期的簡號 177 枚。即從探方五十九中至少出土了二百餘枚屬於王莽時期的簡，這在塢東灰堆北灰區八個探方中無疑是數量最多的。因此，更確切地說，簡(一)至簡(八)均應是從北灰區西部出土的。

這八枚簡文不僅出土地點相同，內容和文例相類，而且簡的木質、形製和簡文字體、筆迹也都完全相同，應屬於同一冊書。首先，從簡文記錄的制詔下達日期來看，簡(一)為“始建國二年十一月丙子下”，誠如陳夢家考證所云：“始建國二年(公元 10 年)汪表閏丑正十

月癸亥朔，張、陳表閏寅正九月癸亥朔，劉表閏丑正十一月壬辰朔。”漢簡有“始建國二年十一月丙子下，則十一月癸亥朔不是閏月，應如劉表閏丑正十一月壬辰朔。”⁵⁵故十一月爲癸亥朔，則丙子爲十四日。簡(三)、簡(四)、簡(五)均爲“始建國天鳳三年(公元16年)十一月戊寅下”，簡(六)雖無下達時間，但在內容上和簡(七)緊相連接，而從照片上看，簡(七)和簡(八)又似可綴合，故簡(六)、簡(七)、簡(八)亦可視爲“始建國天鳳三年十一月戊寅下”，因十一月爲戊午朔，則戊寅爲二十一日。唯有簡(二)因原簡的紀年斷裂後綴合，月份筆迹漫漶不清，很難確認，以往各家的釋文，如勞幹的三個版本⁵⁶和《居延漢簡甲編》均爲“始建國天鳳二年十一月戊寅下”，而《居延漢簡甲乙編》(以下略稱《甲乙編》)⁵⁷則改作“始建國天鳳二年二月戊寅下”，《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以下略稱《合校》)⁵⁸改作始建國天鳳□年二月戊寅下，日本學者森鹿三認爲是“始建國天鳳元年十二月戊寅”⁵⁹，陳直則主張爲“始建國天鳳二年十一月戊寅”⁶⁰，總之，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經過仔細辨認，“十一月戊寅”當屬不錯，誠如森鹿三所指出的，天鳳二年十一月甲午朔，無戊寅日。另外，經過查對天鳳年間，在十一月份有戊寅的年份爲天鳳三年、四年、六年，但因新出的簡(三)至簡(八)均爲天鳳三年十一月戊寅，所以暫且將簡(二)亦視爲“始建國天鳳三年十一月戊寅下”。因此，推測整個冊書，應當包括王莽所建立的新朝歷年所頒布的制詔，今後如能繼續發現，將會是非常珍貴的。其次，從簡文記錄的制詔內容來看，簡(一)勞幹據丁梧梓考證爲《月令》之文，甚是。《禮記·月令》：“孟冬之月，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營丘壘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這段文字又見於《呂氏春秋·孟冬紀》：“孟冬之月，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壘之小大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簡(二)、簡(四)、簡(五)、簡(六)、簡(七)，亦均爲《月令》之文。《禮記·月令》：“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秣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又曰：“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又曰：“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亦見

於《呂氏春秋·仲冬紀》：“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餱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又曰：“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又曰：“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將簡文與《禮記》和《呂氏春秋》的記載進行比較，可以看出：第一，簡文與《禮記》和《呂氏春秋》均略有不同，其原因誠如陳直所指出的，“或詔書原文之改易，或承書傳鈔之脫落，不能據以訂經文之誤。”^⑩我推測兩者兼而有之。前者如簡（二），《禮記》作“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呂氏春秋》作“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簡文則改作“其宜官伐材木取竹箭”^⑪，簡（四）將《禮記》和《呂氏春秋》中的“取之不詰”，改作“取之不誅”，簡（六）將“乃命大酋”改作“掌酒者”，簡（七）在“監之”後略去“毋有差貸（忒）”，改作“勅於酒□”，特別是像簡（三）中“其令百遼屢省所典修厥職務順時氣”，無論在《禮記》或者在《呂氏春秋》中，都找不到與它基本相同的文句。後者如簡（一）中“審棺槨之厚”後疑承書傳鈔脫落“薄”字，簡（四）中“牛馬畜獸有”後疑脫落“放佚”兩字，簡（六）中“水泉”與“香”之間疑脫落“必”字。第二，簡文或同於《禮記·月令》，或同於《呂氏春秋》。如簡（一）中“槨”同於《禮記》，但“營”、“小大”、“薄厚”等卻又同於《呂氏春秋》，簡（六）中“湛餱”同於《呂氏春秋》，“必潔”卻又同於《禮記》，誠如日本學者森鹿三已指出的，“簡文毋寧說接近於《呂氏春秋》”^⑫。據此推測王莽起草制詔時所根據的是《呂氏春秋》。第三，王莽使用殷正，以十二月為歲首，而把相當於夏正十月的孟冬和十一月仲冬的政令，均於十一月合併頒佈。根據文獻記載，僅知王莽頒佈政令，均是仿照周官和左傳，採用古文說，但根據這個制詔殘冊則仿照月令，可見亦兼用今文經^⑬。總之，利用儒家經典施政是王莽時期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徵，旨在說明他建立新朝以取代漢朝，既與天和神意相符，又合乎古義。

（二）甲渠鄯候誼不留難

變事爰書殘冊復原

在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新出的居延漢簡中，從破城子第

五十一探方發現了如下這枚簡文：

簡(1) □□□□□復使根彊來曰欲言變事候故＝
使我來召奈何不往敝復曰病未欲言根彊＝
去

EPT51·2

此簡完整無缺，簡文用恭謹的隸體書寫。簡端有五或六個字，因筆迹嚴重脫落而無法辨認，從殘留的筆迹來看，其中第一個字似可補釋作“敝”。“敝”、“根”、“彊”，均係人名，據下引簡(3)可知，“根”，疑即指令史根，“彊”，疑即指尉史彊，均為甲渠候官的屬吏。“候”，官職名，即指甲渠候官的長官。於是，先從第五十一探方中尋找和它相類的簡文，結果又發現了以下兩枚簡文：

簡(2) 聽受若又頃根彊還言敝言脅患不耐言變＝
事

EPT51·7

此簡亦完整無缺，不僅簡文內容相類，而且簡的木質、形製均與簡(1)相同。簡文共十八字，其中從“聽受”到“敝言”等十一字，亦用恭謹的隸體書寫，筆迹亦與簡(1)相同；唯“脅患不耐言變事”等七字，則用隸體草書，但仍可認定與簡(1)是同屬於一個人書寫的。“若”，代詞，意即“汝”或“你”。《史記》卷七《項羽本紀》：‘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並殺樅公。’又曰：‘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杓羹。”’其“若”字均作如是解。“患”，即“痛”字，舊出居延簡四·四A：‘第廿四隧卒高自當以四月七日病頭患，四節不舉’，其“痛”字亦如此寫。“耐”字，與“能”字通。《禮記·禮運》：“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又《禮記·樂記》：“故人不耐無樂。”鄭玄注：‘耐，古書“能”字也。’新出居延簡 EPF22·80、81：‘建武三年

三月丁亥朔己丑，城北隧長黨敢言之：“迺二月壬午病，加兩脾雍種，旬脅丈滿，不耐食飲，未能視事敢言之。”其“耐”字亦做“能”字解。

簡(3) 誼不留難敞變事滿半日時令史根尉史彊＝

守塞尉萬候長呂憲王充徐弘候史成遂

EPT51·17

此簡亦完整無缺，雖然簡文內容與上述兩簡相類，且簡的木質、形製亦相同，但簡文卻是用草體書寫的。“變事”兩字，《居延新簡》^⑨釋作“既入南”三字，不僅釋文有誤，且文句不通，非是，舊出居延簡四六·二六：“匚敞後不欲言變事，爰書：誼數召根，不肯見誼，根且匚”，其中的“變事”兩字，亦作如是寫，今據照片訂正。“誼”，人名，疑即指上引簡(1)中甲渠候官之長的“候”，新出居延簡 EPT59·14：“甲渠郭候誼叩頭死罪死罪，誼職事數毋狀，罪當死，叩頭死罪死罪”，可以印證。“令史根”，疑即指簡(1)中之“根”，“尉史彊”，疑即指簡(1)中之“彊”。

此外，還有 EPT51·16：“魏郡鄴平祿里，爵大夫，年卅七，今年中戍詣居延，與匚”，EPT51·270：“匚匚詔書律變告，迺訊問，辭”，EPT51·272：“●右爰書”，不僅與上述三簡的木質、形製相同，且簡文內容亦可能有關，但筆迹卻不相同，是否屬於同一冊書，尚無法確定。

接着又翻閱了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從破城子新出全部居延簡，又在第五十二探方中發現了如下兩枚簡文：

簡(4) 根前所白候爰書言敞後不欲言今迺言候＝

擊敞數十下脅愚匚

EPT52·178

此簡下端斷缺，且有被火燒灼痕迹，簡的木質、形製和簡文筆迹，均與上引簡(3)相同，內容亦相類。“脅愚”，因筆迹漫漶不清，很難辨認，《居延新簡》釋作“多所”，疑非是，今根據筆迹，並參照上引簡(2)的文例，改釋作“脅愚”。

簡(5) 萬謂敞候故使萬留受匚

此簡僅剩上端，大部份已斷缺，且有被火燒灼的痕迹，簡的木質、形製和簡文筆迹，亦均與上引簡(3)相同，內容亦相類。簡文中兩見之“萬”，疑即指上引簡(3)中之“守塞尉萬”。“候”，疑即指甲渠郃候“誼”。

一九八九年三月至六月，我赴日進行學術交流訪問，住在關西大學期間，曾經翻閱過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舊出的全部居延簡，亦從破城子出土的上方編號分別為二七、四六、一二三的簡中，發現了如下與上引諸簡相類的簡文：

簡(6) 𠄎敞欲言變事後不欲言變事時彭(?)人(?)𠄎

𠄎不欲言變事皆證它如爰書敢言之𠄎

二七·二一 A、B 圖五(一)七、五(一)八

此簡為三面觚，上端和下端均已斷缺，且有被火燒灼的痕迹，僅有 A 面和 B 面寫字，A 面的“敞欲”兩字，《合校》未釋，今據圖版的殘留筆迹補釋。“時”，勞幹《居延漢簡·考釋之部》¹⁶（以下略稱《考釋》）亦如是釋，《居延漢簡甲乙編》¹⁷（以下略稱《甲乙編》）和《合校》均改作“昧”，應以《考釋》為是。“彭人”，《考釋》作“彭入”，均可能有誤。B 面的“不”字，《合校》亦未釋，今據殘留筆迹補釋。

簡(7) 𠄎敞後不欲言變事爰書誼數召根不肯見＝

誼，根且𠄎

四六·二二 圖二四六

此簡上端和下端均斷缺，且有被火燒灼的痕迹。

簡(8) 𠄎□□□□𠄎敞後不欲言變事爰書□白＝

誼所令□□□□𠄎

四六·二六 圖四五二

此簡上端和下端均已斷缺，且有被火燒灼的痕迹。大多數簡文字迹漫漶不清，“□白誼所令”，《合校》釋作“自證□今”，今據圖版改釋。

簡(9) 𠄎□□□數反欲言即來言不欲言𠄎

四六·二八 圖四五二

此簡上端和下端均已斷缺，且有被火燒灼的痕迹。“數”，《合校》未釋作“□”，“不欲言”，作“不□”，今據圖版補釋。“反”和“返”通，意即返回，歸還。《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何以報不穀？’”又《國策·衛策》：“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舊出居延簡三四六·二四：“□□百八十三束，再反，□□百八十五束，再反。”其“反”字均作如是解。

簡(10) □□送府君尉當聽受敝欲言□

一二三·八 圖一五三

此簡上端和下端均已斷缺，且有被火燒灼的痕迹。“當”，《合校》釋作“留”，“欲言”，釋作“□□”，今據圖版改釋和補釋。

簡(11) □□□也君即以根不信前居延還根等□

一三三·二六 圖一五四

此簡上端和下端均已斷缺，且有被火燒灼的痕迹。

簡(12) □敝欲言變事□

一二三·四七 圖一五五

此簡上端和下端大部都已斷缺，僅留下以上五個字，簡文用草體書寫。

簡(13) □敝辭曰初欲言候擊敝數十下脅患不耐＝
言□

一二三·五八 圖一五五

此簡上端和下端均已斷缺，且有被火燒灼的痕迹。“欲”，《考釋》、《甲編》、《甲乙編》均誤釋作“敢”，《合校》改作“□”，今據圖版補釋。

簡(14) □坐之根意恐□謂充白根今王敝□

一二三·六一、無號 圖一五四、一五五

此簡由一二三·六一和無號簡綴合而成，上端和下端均已斷缺，且有被火燒灼的痕迹。“謂”，《合校》釋作“昌”，“今”，未釋作“□”，今據圖版改釋和補釋。

另外，在上方編號為一二三的出土簡中，還有下列諸簡，雖然形製和筆迹與上引簡文不同，但內容卻可能有某種關係。如：

𠂔敞置辭言不欲言變𠂔

一二三·一六 圖一五三

牢中不驗證令史𠂔

一二三·四 圖一五三

𠂔言行塞及𠂔𠂔

一二三·一八 圖一五三

以上三簡的木質、形製和簡文字體、筆迹均相同，簡一二三·一六中的“敞”字和“變”字，《合校》均漏釋，一二三·一八中的“𠂔𠂔”，釋作“義從”，今據圖版補釋和改釋。又如：

從迹入塞及出塞爲踵迹窮追以檄𠂔

一二三·六〇 甲六九四

𠂔十一日不詣乃移病書誼使令史根等
官

一二三·五三 圖一五五

𠂔父死爲解＝何具對

一二三·五七 圖一五五

以上三簡的木質、形製和簡文字體、筆迹亦均相同，簡一二三·六〇中的“從”，《合校》未釋作“𠂔”，“從”和“蹤”通，《史記·刺客列傳》：“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其“從”字亦作如是解。簡一二三·五三中之“不詣官”三個小字，《合校》誤作“子候官”，“誼”字未釋出作“𠂔”，簡一二三·七中的“父”誤作“及”，今均據圖版訂正和補釋。再如：

𠂔郵書失期前檄召候長敞詣官對狀𠂔

一二三·五五 圖一五五

還有在上方編號爲一三六和二〇六的出土簡中，各發現一枚簡文，其內容亦可能與前面所引十四枚簡文有關：

𠂔再還 詣隧以歸𠂔 𠂔𠂔敞何故不言官＝
解何具對

一三六·四二 圖四四一

萬年部卒傳送詣官務以畢爲故言不畢遺敝一

詣官如律令會月十五日

二〇六·二九 圖二二四

簡一三六·四二中的“再”字，《合校》釋作“百”，“詣隧以歸□□□”，釋作“詣驛以騎十 爲□”，今據圖版改釋。簡二〇六·二九中的“故”字，《合校》釋作“欲”，疑非是，今據圖版改釋。“故”意即故事、成例，《商君書·更法》：“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又成語云：“蹈常襲故”，舊出居延簡二五九·五A：“莫府吏馬馳行以急爲故回”，其“故”字均作如是解。

上面我盡可能地從破城子出土的新、舊居延簡中，將與前面所引十四枚簡有關的簡文，都一一列舉出來。因據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一文介紹，簡(1)至簡(3)均是從甲渠候官遺址塢東灰堆的南灰區北部出土的，相當於1930年—1931年貝格曼在破城子(A8)發掘的第Ⅰ地點；而簡(4)和簡(5)則是從塢東灰堆的北灰區中出土的，相當於第Ⅱ地點。所以，簡(6)至簡(14)即上方編號爲二七、四六、一二三的舊出居延簡，均可能是從破城子(A8)第Ⅰ或第Ⅱ地點出土的。如前所述，簡(1)至簡(14)，不僅出土地點相同，簡文內容亦相類，且除簡(6)屬於三面觚外，其餘十三枚簡的木質和形製又相同，可是，簡文的字體和筆迹的情況卻顯得比較複雜，有的簡文用恭謹的隸體書寫，有的則用隸體草書或草體書寫，字形有大有小，並不整齊劃一。其原因可能有二：第一種可能，這些簡文雖均屬同一冊書，但或因出自不同的書寫人員之手，或因書寫的時間有先有後，或者屬於起草的草稿和正式文本的區別。第二種可能，它們不屬於同一冊書，而是分屬於內容有關連的不同冊書，究竟屬於哪種可能，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目前尚無法準確判斷。且因出土的簡文，大多數屬於斷簡殘篇，前後又不連貫，所以，亦無法恢復整個冊書的原來面目。下面僅據殘冊所留下的簡文，分別就冊書的內容以及相關問題，做些初步的蠡測。

首先，什麼叫做“上言變事書”？有同志在徵引前面所列舉的舊出

居延簡四六·二三：“因敝後不欲言變事。爰書：誼數召根，不肯見誼，根且因”和簡三八七·一二、五六二·一七：“肩水候官令史、鱒得敬老里、公乘、糞土臣烹，昧死再拜上言變事書”之後解釋說：“變事書，如譯為現代漢語，就是變革的建議或改革意見書”¹⁸。非是。在此之前和以後，國內外的學者均不贊成這種解釋，筆者亦有同感。“上言變事”，漢代廩律律文，程樹德《九朝律考》卷三《漢律考》引《周禮·夏官·太僕》注：“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又若今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漢書》卷六十七《梅福傳》：“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輅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師古注曰：“附縣道之使而封奏也。變謂非常之事。”漢代朝廷明令各級地方官吏向上言變事者提供各種方便。所謂“上言變事”，或稱“上變事”、“上變”、“變告”、“急變”、“飛變”等，即臣民向皇帝揭發檢舉和報告謀反、叛亂等非常事件，史籍中屢見不鮮。如《漢書》卷三十四《黥布傳》：“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同卷《韓信傳》：“有變告信欲反，書聞，上患之。”師古注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同傳又云：“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均是其證。

日本學者大庭楯教授曾經在英國學者魯惟一博士研究的基礎上，從地灣(A33)即肩水候官所在地舊出的居延簡中，復原出如下一部“上言變事書”的殘冊¹⁹：

(a) 肩水候官令史鱒得敬老里公乘糞土臣烹昧—
死再拜上言變事書

三八七·一二、五六二·一七 圖四二

此簡屬於“上言變事書”冊書的首題簡，依次記載了上書人的署所、職務、原貫（包括縣和里）、爵稱、名字和所上文書的名稱，這是肩水候官令史烹向皇帝上言變事的文書。兩漢時期，凡是吏民向皇帝上書，自稱“糞土臣”和“昧死再拜”，乃是出於尊敬皇帝而對自己的卑

稱。新出居延簡 EPT52·46A：“糞土臣德昧死再拜上言變事書印曰臣德其丁且合蒲藍□□”和馬圈灣新出的敦煌簡 117、118、146 等三枚簡文均載云：“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糞土臣△稽首再拜上書”亦如此稱，誠如已故陳直先生所指出的：“類如晁錯傳之自稱草茅臣，許冲上說文表之自稱草莽臣。東方朔傳諫起上林苑疏云：‘糞土愚臣，忘生觸死。’蔡邕被收時上書自陳，首稱‘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見全後漢文卷七十二。）皆與本簡符合。”²⁹又《漢書》卷六十五《東方朔傳》記載他向武帝上書中亦自稱“臣朔昧死再拜以聞”，同書卷七十二《貢禹傳》記載他向元帝的上奏中亦自稱“茅愚臣”，均可印證。

(b) □ 十二月乙酉廣地候

四〇七·二、五六二·九 圖四一

廣地，候官名，亦屬肩水都尉府管轄，廣地候即廣地候官之長。

(c) □ 驚檄曰甲申候卒望見塞外東北

四〇七·三、五六四·一—三 圖四一

“驚”，以往諸家釋文均未釋出作“□”，《合校》據圖版補釋作“驚”，甚是。“驚檄”，疑可能即指“驚事告急”的軍事文書，類如羽書、羽檄、奔命書、驛馬軍書。《史記》卷九十三《韓信盧綰列傳附陳豨傳》：“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集解》：推其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文選》晉左太冲（思）《詠史》之一：“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後漢書》卷八十七《西羌傳》論：“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繫，羽書日聞。”注：“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邊有警急，即插羽以示急’也。”《文選》梁虞子陽（義）《詠霍將軍北伐》詩：“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周禮·夏官·太僕》鄭司農注：“又若今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漢書》卷七十四《丙吉傳》：“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人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師古注曰：“奔，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此簡中的“甲申”和簡(b)中的“乙酉”，均為干支紀日，“甲

申”爲“乙酉”的前一日。“候卒”意即負責候望的戍卒，《國語·晉》八：“候遮捍衛不行。”注：“候望。”《後漢書》卷四十一《鍾離意傳》：“闕候風雲。”

(d) 囗火四所大如積薪去塞百餘里臣熹愚囗

四〇三·一九、四三三·四〇、五六四·二八 圖四一

此簡由四〇三·一九、四三三·四〇和五六四·二八等三枚斷簡綴合而成，大庭脩僅作“四〇三·一九”，可能是排印時脫漏。魯惟一在《漢代行政記錄》第二卷中，將簡(a)至簡(d)復原成冊書，分類爲UD6⁶⁰。

(e) 皇帝陛下車騎將軍下詔書曰烏孫小昆彌烏

三八七·一九、五六二·二七 圖四二

關於此簡，大庭脩曾經指出如下三點：第一，他注意到此簡中“皇帝陛下”的“皇”字，是抬頭頂格書寫的，而其他的簡，或者從簡端起留有一個字的空格，或者從簡的下段開始書寫，我想這可能還是表示上書人對皇帝陛下的尊敬。第二，他認爲魯惟一所排列的簡(a)、簡(b)、簡(c)、簡(d)的順序是正確的，簡(d)“臣熹愚”後面尚有與“謂”相類似的字，應與簡(e)的擡頭相銜接，甚是。第三，他認爲簡(e)“皇帝陛下”後面大概漏寫一個重文號“=”，應是“皇帝陛下下車騎將軍，下詔書曰”，疑非是。我認爲此簡中的“皇帝陛下”，應該連接前面的簡(d)，讀作“臣熹愚囗皇帝陛下。”前引蔡邕被收捕時上書自陳稱“議郎冀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與此文例相類。

(f) 就屠與匈奴呼韓單于謀

五六二·四 圖八八

此簡中的“呼韓單于”，大庭脩衍釋作“呼韓邪單于”，但原簡寫作“呼韓單于”。“謀”，魯惟一和《合校》均釋作“謀”，大庭脩改釋作“謀”，甚是。

(g) 夷狄貪而不仁懷挾二心請僞

三八七·七、五六四·一五 圖四二

“懷挾”之“懷”，魯惟一釋作“懷”，非是，大庭脩改作“懷挾”，意

是。“挾”，《說文·手部》：“挾，俾持也。”段注：“俾持，謂俾夾而持之也。亦部夾下曰：盜竊裏物也。俗謂蔽人俾夾，然則俾持正謂藏匿之持，如今人言懷挾也。”“懷挾”，意即包藏，《漢書》卷九十七下《孝成許皇后傳》成帝報后書：“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虜，又況其無乎？”但原簡寫作“懷俠”，誠如陳直先生所指出的，“懷俠爲懷挾之假借字，漢書禮樂志，郊祀歌練時日云：“俠嘉夜，蘭茁芳。”顏師古注，“俠與挾同””⁴²。“僞”，魯惟一本作如是釋，大庭脩改作“爲”，則非是。

(h) 邳支爲名未知其變

三八七·二四、二八七·二五 圖四二

(i) 塞外諸節穀呼韓單于

三八七·一七、四〇七·一四 圖四二

此簡在魯惟一的《漢代行政記錄》一書中本是兩枚斷簡，大庭脩將它們綴合成一簡，甚是。原簡亦在“呼韓”之後脫寫一個“邪”字。

(j) 以往來牧表是樂

三八七·一 圖四二

“牧”，魯惟一釋作“技”，大庭脩改作“技”，均非是。陳直先生曾指出：“表是樂下當爲涇字，漢書地理志，表是樂涇兩縣，俱屬酒泉郡。”甚是。

(k) 小月氏柳羌人

三八七·一 圖四二

“柳羌人”，魯惟一釋作“仰羌人”，大庭脩改作“仰美人”，均非是。

(l) 愚戇觸諱忘言頓首

三八七·二二、四〇七·四 圖四二

魯惟一曾在其所著的《漢代行政記錄》第二卷中，將上引簡(e)至簡(l)等八枚簡文(因魯惟一在書中，簡(i)分爲簡三八七·一七：“塞外諸節穀呼……”和簡四〇七·一四：“……韓單于”，所以，該書共九枚簡文)與簡三三二·二六：“制曰可”復原成一個詔書冊，分類爲UD9。而大庭脩認爲簡三三二·二六：“制曰可”，因爲筆迹不同，當屬於“元康五年詔書冊”中的一簡，應該除外；又因簡三八七·一七和

簡四〇七・一四可以綴合成一簡，其餘八簡即簡(e)至簡(l)和前引四簡即簡(a)至簡(d)，不僅均同出土於地灣，而且簡的木質、形製和簡文字體、筆迹亦均相同，內容又有聯繫，當屬於同一冊書，即肩水候官令史慈的“上言變事書”。其是。關於各簡的排列順序，正如大庭脩所說，因均係斷簡，且又屬殘冊，所以不得不仍遵照魯惟一所排列的順序。這裏我想補充的是，簡(e)至簡(l)的排列順序，如前所述，簡(e)應該緊接排在簡(d)之次；因簡(e)最後之“烏”和簡(f)開頭之“就屠”相銜接，故簡(f)亦應緊接排在簡(e)之次；又從簡文上下文意來看，簡(h)似應緊接排在簡(f)之次，疑可讀作“烏孫小昆彌烏就屠與匈奴呼韓(邪)單于謀(誅)郅支爲名，未知其變”；而簡(g)似應排在簡(h)以後；再從明書文例來看，簡(l)排在最後亦甚合理。儘管這一冊書尚屬殘冊，但它卻是迄今爲止所能見到的第一份較爲完整的冊書，對於具體認識漢代的上言變事書及其相關制度，是彌足珍貴的。

此外，在新舊居延簡中，還有下列簡文顯然亦是與上言變事有關的：

- 𠄎
毋上書言變事者
甲渠言部吏毋上
書言變事者

三三一・一四 簡 七七

EPF22・695
- 贊上臣德昧死再拜上言變事書印曰臣德其一
丁丑合蒲葢庠𠄎

EPT52・46A
- 五百卅

EPT52・46B
- 𠄎𠄎𠄎言變事自書所言一卷已覆而休言未一
滿半日

EPT52・47
- ・令相長丞尉聽受言變事者毋𠄎

EPT52・48

舊出居延簡二三一·一一〇和新出居延簡 EPF22·695,雖然形製不一,但均從破城子出土,且文例相類,性質和用途亦同。簡二三一·一一〇縱裂,右半缺佚,據簡 EPF22·695 文例,右半缺佚文字疑當補作“甲渠言部吏”。簡匣 EPT52·46A 中的“廔”,《居延新簡》未釋作“□”,今據照片補釋,“廔”與“廔”通,EPT52·46B 中的“五百卅”,疑爲文書編號。根據上述斷簡推測,漢代不僅命令各級地方官吏及時聽受上言變事,並向朝廷直至皇帝火速報告,不得停留和阻難,即使所屬部吏平時沒有人上言變事,亦當定期向上級官府匯報。

其次,關於冊書的主要內容和名稱。如前所述,簡(1)至簡(14)亦屬於殘冊,且或因被火燒灼,或因筆迹嚴重脫落,無法探究冊書的準確內容,但從殘留的簡文來看,個人認爲簡(3):“誼不留難敵變事滿半日,時令史根、尉史彊、守塞尉萬、候長呂憲、王充、徐弘、候史成遂”,是瞭解整個冊書內容的關鍵。第一,貫穿整個冊書的中心內容和最終目的在於說明“誼不留難敵變事滿半日”;第二,與此事件有關的人,除了“誼”和“敵”兩人外,還有“令史根、尉史彊、守塞尉萬、候長呂憲、王充、徐弘、候史成遂”,一共九人,整個囊括無餘。“留難”,意即停留阻難,《易林·觀之震》:“盤紆九回,行道留難。”亦謂於事故意作梗,無理阻撓。《鹽鐵論·本議》:“問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爲市。”《唐律疏議》卷八《衛禁》:“諸關、津度人,無故留難者,一日主司笞四十,一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疏》議曰:“關,謂判過所之處。津,直度人,不判過所者。依令:‘各依先後而度。’無故留難不度者,一日主司笞四十。”“主司”,謂關、津之司。一日加一等,七日罪止一百。此謂非公使之人。若軍務急速而留難不度,臻稽廢者,自從所稽廢重論。’特別有趣的是,大庭脩從敦煌凌胡隧遺址中,也復原出下列這份有關“留變事事件”的詔書冊^④:

(上缺)□隧長當時坐男郵海以公事怨望=
欲害

129

(上缺)當時賊燔補隧城賊滿二百廿以不=
知何人發覺種八十(下缺)

138

輒以聞治所謂留難變事當以留奉□□□□=

□律令吏用□疑或不以聞爲留變事滿半月

162

弃市樂見決事興霸德安漢不所坐不同即上—

書對具(下缺)

213

.....

制 曰可

54

(年 月 日御史大夫霸下丞相承書從事下當=

用者如詔書)

失

四月庚子丞(相)吉下中二=千=石=郡=

太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

57

(如詔書 少史某令史某、某)

失

(某月干支 敦)煌太守常樂丞賢下部縣=

官承書從事下當用者

190 • 205

(如詔書 /屬某府佐某)

失

(玉門都尉的執行命令)

失

□月丙寅大煎都守候□□□□□□下士吏=

異承書從事

下當用者如詔書 /令史尊

247 • 223

其中簡 162 中亦載有“留難變事”。“留變事滿半月”，可以和此冊書簡(3)中的“誼不留難敞變事滿半日”互爲印證。且因簡(3)釋文能清晰確認，疑簡 162 中所載的“留變事滿半月”，應改作“留(難)變事滿半日”，前引新出居延簡 EPT52 • 47：“□昌言變事自書所言一卷已覆而休言未滿半日”，亦可資佐證。

整個冊書的內容梗概大體是這樣的：候長王敞初本欲向甲渠鄣候誼上言變事(簡(6)、簡(12)、簡(13))，但當誼先是使甲渠守塞尉“萬留受”(簡(5))，後又復使甲渠屬吏令史根、尉史彊去召喚(簡(1))和“聽受”(簡(2))，往返多次(簡(7)、簡(9))，敞仍不欲言變事(簡(1)、簡(2)、簡(4)、簡(6)、簡(7)、簡(8))，其原因，簡(13)載云：“□敞

辭曰：初欲言，候擊敞數十下，脅患不耐言因”，“脅”，腋下肋骨所在的部份，《史記·范雎蔡澤列傳》：“魏齊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擢齒。”根據王敞的說法，他當初本欲上言變事，但因遭到甲渠鄣候誼的笞擊，兩脅疼痛不能再言變事，但是根據簡(4)記載：“根前所白候爰書言，敞後不欲言，今乃言，候擊敞數十下，脅患因”，誼之所以“擊敞數十下”，是由於敞初欲上言變事，後又不欲言變事，現在又欲言變事，前後出爾反爾導致的，未知孰是？再從冊書的文例來看，當屬於爰書，所以暫且將它定名為“甲渠鄣候誼不留難變事爰書殘冊”。

再次，關於冊書製作的大致年代和目的。因為簡(1)至簡(14)均無紀年，所以無法直接判明冊書是何時製作的？下面想就簡文中涉及到有關人名來間接推測冊書製作的年代。如前所述，殘冊中出現的人名計有：(1)甲渠鄣候誼；(2)守塞尉萬；(3)令史根；(4)尉史彊；(5)候長王敞；(6)候長呂憲；(7)候長王充；(8)候長徐弘；(9)候史成遂。在舊出和新出居延簡中，明確記載甲渠鄣候誼任職年代的僅有如下兩簡：

河平五年正月己酉朔丙寅 甲渠鄣 候誼＝
敢言之府移舉書曰第 十三隧長解宮病背＝
一傷右脰
□□爰書言已乘□亭解何今移舉各 如牒＝
書到牒別言●謹案第 十三隧長解宮病背＝
□□□傷右脰作治

三五·二二A 圖五一〇

令史博尉史昌 V 嚴

三五·二二B 圖五一一

建始元年九月辛酉朔乙丑張掖大守良長史＝
威承宏敢告居延都尉卒人言殄北守候塞尉＝
護甲渠
候誼典吏社受致廩飯黍肉護直百卅六直百＝
卅二五月五日誼以錢千五百償所斂吏社錢＝

有

書護受社廬不謹誼所以錢千五百償吏者審一

未發覺誼以私錢償□罪名書到如

EPT52・99

又據簡 EPT59・415:“永光五年正月甲渠鄣候喜□”和簡三五・八 A:“陽朔三年九月癸亥朔壬午,甲渠鄣守候塞尉順敢言之。府書:移賦錢出入簿與計偕,謹移應書一編敢言之。”推測誼任甲渠鄣候最早應在元帝永光五年(前 39)正月以後,最晚至成帝陽朔三年(前 22)九月以前。守塞尉萬僅此一見。明確記載令史根任職年代的僅有簡 EPT52・265:“建始元年(前 32)六月癸巳朔乙卯,令史根□□□□□□□□□□□□,毋盜賊發者敢言之。”明確記載尉史彊任職年代的亦僅有如下的奉錢出納簿:

出臨木部吏九月奉錢六千

候長呂憲奉錢千二百

臨木隧長徐忠奉錢六百

窮虜隧長張武奉錢六百

木中隧長徐忠奉錢六百

(以上爲第一欄)

終古隧長東郭昌奉錢六百

望虜隧長晏望奉錢六百

□□隧長元禹奉錢六百

●凡吏九人錢六千

候史徐輔奉錢六百

武賢隧長陳通奉錢六百

(以上爲第二欄)

建昭五年(前 34)十月丙寅甲渠尉史彊付=

終古隧長昌守閭卒建知付狀

(以上爲第三欄,此簡上端右側有刻齒)

不過，據簡三三・一，一〇三・二：“出錢二千四百；其千二百，第六隧長徐遷十月、十一月奉；千二百，第十八隧長鄭彊十月、十一月奉。十二月令史弘取，付尉史彊。”此簡亦屬於甲渠候官的奉錢出納簿，其中特別注明由令史弘領取後交給尉史彊，再由尉史彊付給徐遷、鄭彊等隧長的。又據簡一四五・二六、一七八・二五B、三二六・二等均載有由令史弘和尉史彊共同署名，可見他倆曾同時在甲渠候官任職。關於令史弘這個人，日本已故學者森鹿三曾經撰寫過一篇“關於令史弘的文書”，他根據簡二六七・二〇：“甘露四年（前50）七月甲子（十九日），甲渠候長充以私印行候事敢言之。府移左農右”，這是甲渠候官第四候長王充代理候，即代理甲渠候官之長事務，呈報給居延都尉府的文書斷簡，結果不僅直接判明了候長王充的任職年代，而且間接推測出令史弘、尉史彊、尉史蒲、尉史熹、令史唐、呂憲、王憲、王忠國、李勝、王霸、孫猛、咸宣、徐輔、徐遷、鄭彊、虞護等人的任職年代，均為宣帝甘露年間（前53—前50）及其前後⁹⁰。此次新出居延簡中，不僅發現了直接明確記載令史弘任職年代的簡EPT52・100：“建始二年（前31）十月乙卯朔丙子（二十二日），令史弘敢言之。迺乙亥（二十一日）直符倉庫，戶封皆完，毋盜賊發者敢言之。”而且，也發現了明確記載臨木候長呂憲任職年代的簡文，除前引簡EPT51・409外，還有如下三簡：

●建昭四年（前35）十月甲渠候長呂憲

EPS4T2・3

建始元年（前32）四月甲午朔乙未（二日）＝
 臨木候長憲敢言之爰書雜與候史輔驗問隧＝
 長忠等七人先以從所主及它部官卒買
 三日而不更言請書律辨告乃驗問隧長忠卒賞＝
 等辭皆曰名郡縣爵里年姓官除各如牒忠等＝
 毋從所主卒及它

EPT51・228

建始二年(前 31)十二月甲寅朔甲寅(初=
)臨木候長憲敢言之謹移郵書課一編敢=
言之

EPT51 • 264

這樣一來，尉史彊和令史弘、臨木候長呂憲等人任職年代的下限，均應由宣帝甘露年間(前 53—前 50)及其前後分別延長到元帝建昭五年(前 34)和成帝建始二年(前 31)以後。另外，冊書中的候長王充，雖知其為第四候長；候長徐弘為城北候長，舊出簡四六·二二：“城北候長徐弘”和簡一三五·一：“𠄎𠄎𠄎二年閏月癸卯，誠北候長弘𠄎”均可印證；但均無其任職年代的直接明確記載。候史成遂，除冊書外，尚在如下新出簡中一見：

第三隊卒幹威 絮巾一直廿
不五十
(以上為第一欄)

謹驗問威辭迺二年十月中所屬候史成遂徙=
補居延第三塢長威以𠄎
至今年三月中廿三日遂復以錢廿予威曰以=
償威所送遂絮錢𠄎

(以上為第二欄)

EPT51 • 301

疑為萬歲部候史^⑧，亦無任職年代的明確記載。因此，我推測冊書製作的大體年代，上限不會早於元帝永光五年(前 39)正月以前，下限不會晚到成帝陽朔三年(前 22)九月癸亥朔壬午(二十日)以後。關於這一點，和冊書出土的破城子第五十一、五十二探方中的有明確紀年的簡，正好也是元帝和成帝時期的佔絕大多數完全吻合^⑨。如前所述，簡(3)載云：“誼不留難敞變事滿半日”，又簡(10)載云：“𠄎𠄎送府君，尉當聽受敞欲言𠄎”，甲渠候官製作這份冊書，是為了向上級機關居延都尉府匯報沒有留難部吏上言變事的詳情，或者是為了請示將部吏送往居延都尉府聽受其上言變事，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注釋

① 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編：《秦漢史論叢》第1輯，法律出版社，1997年12月。

② 本文又是應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大庭脩教授的邀請，為出席1992年12月在大阪舉行的《漢簡研究國際シンポジウム'92》而撰写的。

③ “二九一・五”是指1930—1931年舊出居延漢簡的原簡編號，“四二九六”是指勞幹著《居延漢簡・圖版之部》（臺北，1967年）的頁數，下同。

④ 原載《文物》1978年第1期，後又收入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

⑤ 參看陳夢家著《漢簡綴述・漢簡年曆表叙》，中華書局，1980年12月。

⑥ 是指勞幹著《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1943年四川南溪石印本、1949年商務印書館鉛印本）和《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臺北，1960年。

⑦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居延漢簡甲編》，考古學專刊乙種第八號，科學出版社，1959年。

⑧ 謝桂華、李均明、宋國焯編《居延漢簡釋文分校》上、下冊，文物出版社，1987年1月。

⑨ 參見森鹿三：《居延出土的王莽簡》，原載森鹿三著《東洋學研究——居延漢簡篇》，同朋舍，1975年，中譯本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1月。

⑩ 參見陳直著《居延漢簡研究・居延漢簡綜論・王莽四詔書》，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

⑪ “其宜官伐材木取竹箭”，“宜”，森鹿三未釋，作“□”，陳直作“葬”；“材”，森鹿三、陳直均作“林”，今據圖版補釋和改釋，參見注⑨、⑩。

⑫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7月。

⑬ 參見注⑥。

⑭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考古學專刊乙種第十六號，中華書局，1980年12月。

⑮ 參見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省博物館編《漢簡研究文集》第286頁。

⑯ 參見大庭脩著《秦漢法制史の研究》，創文社，1982年2月，中譯本見林劍

1. 李均明：《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

24. 參見陳直著《居延漢簡研究·居延漢簡解要》第192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

25. 參見魯惟一著《漢代行政記錄》，兩卷，劍橋大學出版社，1967年。

26. 參見大庭脩著《漢簡研究》第二章第一節，同朋舍，1992年12月。

27. 參見森鹿三：《關於令史弘的文書》，原載森鹿三著《東洋學研究——居延漢簡篇》，同朋舍，1975年，中譯本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編《簡牘研究譯叢》第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1月。

28. 參見李均明：《居延新簡概述》，載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24，1991年3月。

29. 參見永田英正：《新居延漢簡の概観》，載《東方學》第83輯，1993年1月。

漢簡遣書考述

李均明(中國文物研究所)

漢簡所見,公務人員受遣,均持書面憑證,或以符、傳、或以遣書。以符遣,如《居延新簡》(以下簡稱《新簡》)EPT26·6:“●甲渠八月廿六日庚午,遣隧長幹況、徒……覆衆迹虜到故候官,知虜所出符,符左留官。”^①以傳遣,如《新簡》EPT59·398:“臨封傳,即日遣詣府,敢言之。”傳本文,如《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以下簡稱《合校》)170·3A:“元延二年七月乙酉,居延令尚、丞忠移過所縣道河津關;遣亭長王豐以詔書買騎馬酒泉、敦煌、張掖郡中,當舍傳舍,從者如律令。 /守令史詡、佐褒。七月丁亥出”。《新簡》EPT50·171:“元始元年九月丙辰朔乙丑,甲渠守候政移過所;遣萬歲隊長王遷爲隊載璽,門亭塢辟市里毋苛留止,如律令。 /掾匱。”

遣,派遣。遣書即因派遣需要而形成的文書。從廣泛意義上講,上文所引二傳也是遣書的一種,它們具有二重性。單純的遣書如下所見:

(一)甲渠鄣候 匱 (即日壬申舖後遣) 五月壬寅,府告甲渠鄣候:遣乘隧騎士王晏、王陽、王敞、趙康、王望 《新簡》EPT22·473A

等五人借人乘,隧長徐業等自乘隧,日時在檢中,到課言。
《新簡》EPF22·473B

(二)四月壬戌,府告甲渠鄣候:遣乘隧第五隧騎士郭陽、第十八隧騎士夏侯倉 《新簡》EPF22·474A

甲渠鄣候 匱 [即日癸酉舖時遣] 之官,日時在檢中,到課

言。 《新簡》EPF22·474B

(三)十一月己未，府告甲渠鄣候：遣新除第四隧長刑鳳之官，符到，令鳳乘第三。遣 《新簡》EPF22·475A

甲渠鄣候 □ [己未下舖遣] 騎士召戎詣珍北乘鳳隧。遣鳳日時在檢中，到課言。 《新簡》EPF22·475B

上引三例爲任職派遣書，其名目見《合校》67·11：“右除遣視事書”，《合校》84·20A、B：“建始二年正月以來盡十二月吏除及遣。”《合校》262·4A、B：“永始二年除及遣書”《新簡》EPT50·180A：“建始五年正月盡十二月吏除遣及”B：“十二月吏除遣及調書□□”。除，任命。視事，到位工作。

派遣是實現官吏任命的重要環節，《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置吏律》：“除吏、尉，已除之，乃令視事及遣之；所不當除而敢先見事，及相聽以遣之，以律論之。”^③即已任命，當及時派遣赴任，漢簡所見亦如此，如《合校》142·34：“候史徐輔遷補城倉令史，即日遣之官，移城倉。●一事一封，十二月庚子令史弘封。”《合校》40·21：“移居延；第五隧長輔遷補居延令史，即日遣之官。●一事一封，十月癸未，令史敞封人。”《新簡》EPF22·355：“掾譚言：新除第二十九隧長鄭慶月五日壬子昏時受遣，癸丑當到。”派遣大多在任命之日或近期進行，對到達新崗位的日期有嚴格的規定（詳下文）。

遣書不僅僅適用於任命官吏，其它有時間限制的公務活動也常常使用它，例如：

(四)詣作所，如章程，日時在檢中，到□ 《合校》甲附 33

(五)□午廩事已，詣部，日時在檢中，到言□

□丁亥昏遣□ 《新簡》EPT40·188

(六)□□獄對，事已，遣之官，日時在檢 《新簡》EPF22·582

(七)九月庚子，府告甲渠鄣候：尉史忠平甬府，事已，遣之官，日時在檢中，到課言。 《新簡》EPF22·290

上述四例表明，赴勞作地點，領取糧食，核對計量器具，處理司法事務均使用遣書，可見遣書的使用範圍相當廣泛。

漢簡所見遣書多有“日時在檢中”句，它與官吏派遣密切相關。檢，封檢，《釋名·釋書契》：“檢，禁也，禁閉諸物使不得開露也。”封檢之制，通常是在長方形木板上挖一凹槽，以便於在槽中施封泥，並在封泥上打印章。所謂“日時在檢中”，就是在施封泥前先在凹槽底部寫上發遣日期、時刻，然後纏繩，施封泥，字迹被掩蓋，他人無法窺見，必然也無法修改，起到保密作用，例（一）至（三）所見“即日壬申 後遣”、“即日癸酉舖時遣”、“己未下舖遣”，皆書於封檢凹槽底部，即是。遣書送達收件人手中，經拆封，封檢底部所書文字方能暴露，收件人才知曉來人被派遣日期，並籍此以考核來人是否按期到達。

遣書中通常都有“到課言”句，意即被遣人到達後，接收單位必須考核其到達時間，並將結果回報給發遣單位，此類考核回報文如：

（八）史馮白：吞遠候長檄言：遣卒范詡、丁放、張況詣官，今皆到。

●奏發書檄，皆見。 《新簡》EPT59·36

（九）……時在檢中，到課言。 ●謹案：匡乙卯受…… 《新簡》EPT65·102

（一〇）中，到課言。謹案：良等丙申日中受遣，即日到官，敢言之。

《新簡》EPF22·369

（一一）……□後受遣，甲戌到官，敢言之。 《新簡》EPF22·

552

（一二）□卒 昏時到官。謹案：良帶□□，敢言之。

《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704^①

例（八）至（一一）所見，回報文之上半段大多抄錄遣書原文，下半段才是回報文本，並多以“謹案”二字起頭，有的還標以大圓點，文末以“敢言之”結尾。據此，《新簡》EPF22·389：“王良詣府，事已，遣之官，到課言。●□□”亦為遣書之回報文。

任職派遣多以任職任命書的形式進行，這種任命書也具有遣書的作用，但不採取“日時在檢中”的做法，如：

（一三）甘露□□□月丁亥朔□寅，將屯居延都尉德謂甲渠塞候：都尉……以功次遷為甲渠候長，今遣壽之官。 《合校》40·2A

掾仁、卒史賞、書佐安世 《合校》40・2B

(一四)九月乙亥，鯁得令延年、丞賢敢言之：肩水都尉府移肩水候官告尉謂東西南北部

義等補肩水尉史、隧長、亭長 關佐各如牒，遣自致。

趙侯、王步光、成敢、石胥成皆

書牒署從事，如律令，敢言之。 《合校》97・10, 213・1

例(一三)所見，署明派遣日期“今遣”，例(一四)雖未署明，因文書本身已有日期，其派遣與到任期限或按慣例實行。

又，基層的派遣工作常常是按上級的旨意進行，如：

(一五)甲渠候長願以令取寧，即日遣。書到，日盡遣，如律令。

《合校》160・16

(一六)記到，遣昌詣官。 《合校》210・32

(一七)……遣，言留狀，毋出二月五日

(一八)時遣，云廩吏卒校未已，解何？書到，趣遣，具言狀，會月十日

(一九)遣之官，書到，如律令。 《新簡》EPT52・90

(二〇)四年十月乙卯到，政未到。書到，可亟遣，報，如律令。

《新簡》EPT53・23

上引五例中，大多對派遣日期都已經提出要求。如例(一五)之“日盡遣”、例(一六)之“記到，遣昌詣官”為當日派遣。例(一七)之“毋出二月五日”、例(一八)之“會月十日”，提出了具體日期。例(二〇)之“亟遣”則指立即派遣。

當時有關派遣時限的要求曾得以嚴格實行，超限者均記錄在案，以待處理，如：

(二一)……召私留，不以時詣官，毋狀

(二二)受遣，十月癸酉到官，令史憲出入五十餘日不到，毋狀。憲已受遣。 《新簡》EPT51・248

(二三)以月十七日辛丑，遣奉領隧，奉誠私留衆駿田舍解緩衣積七日，奉 《新簡》EPT51・254

(二四)甲渠言隧長趙永代騎士王敞

乘隧，穀少，永留十三日，乙巳到官 《新簡》EPF22·586

(二五)爲吏四歲六月二十八日。五月戊午受遣，六月壬午積二十三日到府，故官 《新簡》EPT48·4

受遣而不按時到達，爲“毋狀”，根據情節輕重予處分。漢簡所見，不僅當事人須負責，主管官員往往也受罰，如《合校》61·3,194·12：“萬歲候長田宗，坐發省治大司農茭卒不以時遣吏將詣官，失期，適爲驛馬載三墩茭五石致止害。”又《新簡》EPT59·59：“第十候長傅育，坐發省卒部五人，會月十三，失期，毋狀。今適載三泉茭二十石致城北隧給驛馬，會月二十五日畢。”

綜言之，遣書是人員派遣過程中產生的文書形式。“日時在檢中”乃指遣書的派遣日期、時刻寫在封檢的凹槽底部，它是檢驗派遣情況的重要依據。

注釋

①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②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烱：《居延漢簡釋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1月版。

③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11月版。

④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文物出版社，1984年3月版。

漢簡所見邊郡軍事與民政系統的職權關係

徐樂堯(甘肅省博物館)

關於漢代邊郡地區太守以下治兵與治民兩大系統的職權關係，據《漢舊儀》：“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說明西漢邊郡的部都尉不理民事。又據《後漢書·百官志》：“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並職太守，無都試之役。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此說明東漢光武帝劉秀所罷之都尉僅限於內郡，邊郡都尉不但未罷除，而且自建武六年以後都尉也分縣治民。因此，過去史學界不少人認為自西漢至東漢建武六年以前，邊郡太守治下的都尉與縣兩個系統，都尉不理民事，縣不管軍事。這種主張廣為流傳，曾為許多著述所沿用。現在，我們根據居延、敦煌新發現的漢簡資料，覺得《漢舊儀》、《後漢書·百官志》的記載及史學界過去所襲用的觀點，應該予以補正。下面試從三個方面加以說明，有不妥處，請同志們指正。

一、從邊塞的司法制度看

以大家熟悉的居延新簡“寇恩冊”為例，^①建武三年，居延縣受理甲渠候粟君與客民寇恩之間的財物訴訟案後，經過反覆查證裁審，最後報府批覆，纔了結此案。從案件處理過程中幾個文書的傳遞時間來看，作者同意初師賓、蕭亢達同志的考訂，此冊中的“府”，應是居延都尉府，而非張掖太守府。^②由此說明，建武三年居延都尉領居延縣，並管理民政司法事宜。我們再從敦煌馬圈灣新簡所提供的資料來看，邊郡軍事防禦系統的亡卒、罪囚，均送至防地所在縣以律治罪。例如：

1. “□千秋隧長安，謹劾移亡卒得，寫移龍勒獄，以律從事，敢言

之。”

T12:38¹

2. “塞曹言，守候長趙嘉，劾亡卒楊豐，闕越塞，移龍勒□□□”

T6:38

3. “富昌隊長宋恭，送囚龍勒。”

T5:227

4. “□□長翟奉微，還龍勒，二月乙卯出東門。”

T9:22

上引數簡中的“龍勒”，係漢代敦煌郡的一個縣名。從簡文可見，境內軍事防禦系統的亡卒、罪囚，均送至該縣治罪。這些馬圈灣新簡雖無具體紀年，但參照同出的馬圈灣紀年簡來看，這些簡也係宣帝至王莽時物，由此可見，早在宣帝至王莽時，邊塞的縣已兼理軍隊的司法事宜。

二、從邊塞的奉廩制度看

這方面我們先來看一下居延新出的《居延都尉吏奉例》冊，¹該冊是居延都尉轉發的建武三年河西賓融政權頒發的一份關於居延官吏奉祿標準的律令文書。冊中規定，“居延令奉穀月卅石，居延丞奉穀月十五石，居延左、右尉奉穀月十五石。”從冊書可見，居延縣令、丞、尉的奉祿標準均由五郡大將軍幕府規定。由此說明，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即脫離張掖太守而直轄於河西大將軍府，下領居延縣並治理民政。我們再從敦煌馬圈灣等地所出土的新簡所提供的資料來看，發現邊塞的郡縣也管理當地駐軍的倉廩事宜。例如：

5. “入稬麥五斛 守丞匡，受門下縣吏。”

T6:67

6. “始建國三年三月乙酉朔戊申，上吏崇，敢言之。謹移所雜受門下縣吏、玉門造，橫麥出廩，各如”

T5:152

上引簡說明，王莽時期邊塞候望系統的吏卒及其家屬的口糧，可直接從所在縣廩受，說明邊塞的縣也管軍隊事宜。再如：

7. “入郡倉元年六月轉二兩麥小石七十五石居攝元年八月己未步昌候長黨隧長尚受就人龍勒萬年里□”

D·H·C:17

8. “入 郡倉居攝三年正月癸卯轉一兩 居攝三年三月戊辰人煎都
麥小石卅七石五斗

士吏牛黨候史尹欽受就人效穀益壽里鄧尊” T5:245

9. “人郡倉居攝三年正月癸卯轉兩
粟小石卅一石六斗六升大 居攝三年四月壬辰大煎都步

昌候史尹欽隧長張博受就人敦煌高昌里滑護字君房” T5:243

10. “人郡倉居攝三年正月癸卯轉一兩半兩
麥小石五十六石二斗五升 居攝三年四月壬辰大

煎都步昌候史尹欽隧長張博受就人敦煌利成里張賀字少平” T5:244

上引簡文中所提到的敦煌玉門都尉大煎都候官，該候官轄區地勢平坦，水源充足，宜於種植，是漢代敦煌邊塞的一個重要軍屯區。⁵從上引簡文可知，大煎都軍屯區所收穫的糧食，在居攝元年、三年，曾派士吏、候史、隧長等邊吏僱人驅車送入郡倉收藏。由此說明，地方郡倉也管理軍屯的糧食，這從一個側面反映敦煌邊塞地方政權管理軍隊事宜的歷史事實。

三、從邊吏任免制度看

這方面居延新出的一冊完整的人事任免通知書最能說明問題。該冊書名為《居延令移甲渠吏遷補牒》⁶，其發文時間是建武五年八月。文書是以居延令和承審的名義分別通知尉和鄉以及甲渠候官等，命令他們按照通知的內容執行官吏任免。此處的居延令即居延縣令，承即居延縣承，尉即居延縣尉。故此文書是居延縣令和縣承，發給縣尉、鄉和甲渠候官的通知。該冊書共有五枚簡組成（E. P. F22:56-60），除簡（F22:56）為冊書首簡外，其餘四簡（F22:57—60）係逐個記載任免內容。例如：

11. “甲渠候官尉史鄭駿 遷缺” F22:57

12. “故吏陽里上造梁普年五十 今除補甲渠候官尉史代鄭駿” F22:58

13. “甲渠候官斗食令史孫良 遷缺” F22:59

14. “宜谷亭長孤山里大夫孫況年五十七無事 今除補甲渠候官斗令史 代孫良” F22:60

從上引簡文可見，被任免者鄭駿、梁普、孫良、孫況均係甲渠候官的屬吏——尉史與令史。故此冊書說明建武五年甲渠候官屬吏的任免權屬於居延縣，從而清楚地說明居延縣管理邊塞的軍隊事宜。

綜上所述可見，漢代河西邊郡，在建武六年以前，早至居攝元年、三年、王莽始建國四年，甚至更早至宣帝時期，治兵與治民兩大系統的職權關係，已不同於西漢舊制而有較大的調整。這些漢簡新資料的整理，或對漢代邊疆政治、軍事史的研究有所補益。

注釋

①，“寇恩冊”簡文見《居延新簡》釋文第 475·478 頁，E. P. F22:1 -36。

②參閱《居延新簡“責寇恩事”的幾個問題》，《考古與文物》1981 年第 3 期。

③釋文見吳初曠等校釋《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本文下引敦煌馬圈灣等地新簡同此。

④該冊簡文見《居延新簡》釋文第 482 頁，E. P. F22:70—79。

⑤參閱拙作《西漢敦煌軍屯的幾個問題》，文載《西北師院學報》1985 年第 4 期。

⑥該冊簡文見《居延新簡》釋文第 480·481 頁，E. P. F22:56 -60。

“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考

永田英正(日本京都大學)

一

在 1973、1974 年，發現的新居延漢簡中有一支是特異形狀的簡牘(E. P. T57·108)，通稱為“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這支簡由切削樹枝做成，長 82cm，直徑粗頭 3.1cm，細頭 1.5cm。其特異處是僅在上端書寫文字部分的正反兩面削平，其餘部分均保留原樹枝狀態，另外下端刻劃有凹槽三道。

發現地點位於破城子即甲渠候官遺址塢東的廢棄坑之最下層，由共存紀年簡可知其簡牘的年代屬宣帝元康三年(63B. C)以前的東西。關於此簡牘的認識及介紹和研究有以下幾篇論文。

1. 甘肅居延漢簡整理小組：‘居延漢簡“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文物”1979—1

2. 徐元邦、曹延尊：‘居延出土的“候史廣德坐不循行部”檄’，“考古”1979—2

3. 初師賓‘漢邊塞守御器備考略’“漢簡研究文集”(1984)所收。

諸文對此簡牘雖有種種考察，但遺憾的是幾乎都未觸及該簡牘的中心人物——有候史職務的廣德。本文旨在於認識該簡牘的性質並考及候史的職掌問題。

二

簡牘文字書寫於正反兩面，其釋文如下：

簡 1. 候史廣德坐不循行部，塋亭，趣具諸當所具者，各如府都吏舉。部 不畢，又省官檄書不會=日，督五十。(E. P. T57:108, 背面省略)

文頭有‘候史廣德’，由同時出上簡，可知張廣德，任甲渠候官所屬的北部候史。關於府都吏，文獻 1 引“漢書·文帝紀”元年三月條‘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及注‘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也’，釋府指太守府，都吏即督郵。其實舊居延漢簡中也有記載。

簡 2. 毋得貰賣衣財物，太守不遣都吏循行[](213, 15)

也許有可能把該簡牘中的府都吏看作是太守府的都吏，具體來說就是張掖太守府的督郵。但依我之見不應當是太守府而應屬都尉府之吏。其理由在於該簡牘是由候史廣德的上司甲渠候官下發的，一般候官作成的文書稱府的話，應當是指都尉府。該簡牘由候官下發這一事實，行文‘又省官檄書，不會=日’表現得很清楚。另外，候官作成的文書若稱府當指都尉府這一點，舊居延漢簡中亦有如下二例。

簡 3. []月候長史口迹簿，言府 ●一事集封，十月癸巳令史弘封(136·39)

簡 4. 甲渠言，士吏孫猛病有廖視事、言府 ●一事集封 [](185·22)

二者均屬甲渠候官的發文記錄一類的文書，兩簡記有‘言府’之府指都尉府。該簡牘如是候官作成的文書無誤，所謂府當為都尉府。如果是太守府的話，理應明記太守府的。另外，都吏的都是同都亭或都鄉的一樣具有大的意義，都吏就是大吏，即普通名詞主要的吏。引如淳的律說‘都吏即督郵’，就是說，郡吏之中督郵是主要的吏。以此對照都尉的屬吏，可以認為主簿等等相當於都吏。從而簡 1 正面的文意就是候史廣德受到都尉府大吏的彈劾，原因是他完全怠惰於部所管內的巡察，裝修亭壁，充實部署必需品等職責，以及乾糧不足，命令期限內未去候官處等等罪名，罰杖打五十下。其背面內容列舉候史廣德任監督職責的第十三燧～第十八燧的六個燧長名和各燧設施和備品的欠缺，是正面所記都尉府的大吏彈劾之具體內容。

以上就是所謂“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簡牘文的概略，由此文分析，可知候史廣德因失其職，遭受逐一問罪並受到杖五十下的處罰。廣德被甲渠候官喚問，也許就是用此簡牘為杖行罰的。從該簡牘的長度和粗細及全體形狀來看，可以令人想像這樣的情景。

關於此簡牘引起筆者注意的是候史為什麼受到這樣的處罰。我對簡牘研究的關心還在於簡牘文是誰寫的？而其簡牘又是怎樣做處理的？為此對候史之職特別引起我的重視。按目前簡牘研究的理解，候史是部所屬的小書記官，其上設有候長對部負全權責任。儘管如此，由於讀解該簡牘文可知，負責任者是候史而不是候長。這是邊境軍事組織裏關於吏的職掌及職務分擔的問題，有解明的必要。候史的職掌究竟是什麼？以下以舊居延漢簡為資料試做一分析。

三

漢代邊郡的防衛組織由一系列嚴密的軍事組織構成，都尉府作為軍事基地，下配備數個候官，候官之下設部、燧。候史就是部吏^①。其任務首先是書記。

簡 5. 元康元年十二月辛丑朔壬寅，東部候長=生，敢言之候官。官移太守府所移河南都尉書曰（正面，以下略）。 候史齊，遂昌（背面，20·12）

簡 6. 五鳳五年二月丁酉朔乙丑，甲渠候長福敢言之。謹移日迹簿一編，敢言之。（正面） / 候史定 （背面，267·15）

以上二簡均為候長的上申文書，簡 5 是東部候長給肩水候官，簡 6 是甲渠候長給甲渠候官提出的文書。這二支簡的背面可看到書記的署名，簡 5 是候史齊和遂昌的連名，簡 6 是候史定的署名，由此表明候史即是書記。

候史的任務就是日迹，即巡察所管轄燧之天田。

簡 7. 候長武光，候史拓 七月壬子盡庚辰積廿九日=迹，從第卅燧北，盡鉗庭燧北界，毋蘭越塞天田出人迹 （24·15）

這是候史拓同候長一起記錄下的關於某年七月一個月間從事日

迹的實績。由此可知巡察所管各燧的天田也是候史的重要任務。

簡 8. 五月癸巳，甲渠鄯候喜告尉，謂第七部士吏候長等，官移檄到，士吏候長候史循行（159・17=283・46）

這是甲渠鄯候即候官長的下送文書，可知因鄯候的命令，候史同士吏及候長們一起做巡察。祇是該簡牘中有‘官移檄到’這樣的文句，可考慮屬臨時巡察。即使是臨時巡察，候史與候長同時出行巡察本身也應值得注意。

另外，候史要去候官領取部吏的俸錢。

簡 9. 第廿三候史良，詣官受部吏奉 三月乙酉平旦入（168・5=224・13）

該簡牘屬於記錄簿，記述了去候官處之際的要事及到達時日。從簡 9 可瞭解到第廿三候的候史良外出領取俸錢時，除候長和候史自身的之外，所管轄燧長的俸錢也一起領取。

以上是關於舊居延漢簡中可判明候史任務的事例。歸納起來有四個方面：(1)書記，(2)日迹，(3)巡察，(4)前往候官處領取俸錢。當然作為候史還會有其它任務，這四點並不代表候史職掌全部。但是，候史中表現其職名的史（即書記）字的出現可判斷其本職到頭還應當是書記，毫無疑問，其任務是以書寫文書做記錄為主。以下關於候史就是書記這一點再稍做進一步考察。

四

眾所周知，燧是邊境軍事機構的最末端組織。以燧為單位作簿籍，例如燧的戍卒每天所從事的日迹及其它雜役等等留下的工作記錄。還有冠以燧名的守御器簿等等。那麼，如此這般的燧之記錄究竟是誰寫的？而燧的簿籍又是誰作成的？對此問題還不十分明確。以往的研究認為燧長就是名符其實的職任^②。如果在燧獨自做記錄，作簿籍的話，那麼充其任者別無他人，祇有燧長。但是照此推斷是有問題的，其最大理由在於燧長能否書寫文字。本來燧長祇是邊境所在燧任監視哨的小頭目，其任務是率三、五名戍卒日夜候望以防備敵人

襲擊，而且他們幾乎都是當地邊郡出身者^③。如此這樣的燧長中不會沒有能讀書寫字的人^④，可是設於邊境的幾十，幾百個燧的燧長全員都能讀會寫是很難成立的。其次，記錄文書依做記錄對象不同各有一定樣式^⑤，如此能按規定格式做記錄者，祇是專職書記。即使燧長能寫文字也不能做這樣的記錄。

如上所述，燧長若不做燧的記錄，其做記錄者必定是燧的上級機關部的專門書記——擔任候史者。但是！如此推斷仍有問題，候史是如何每日做燧的記錄的？每天由燧向部打報告這一解釋也是可行的。其理由在於，燧是獨處最前綫者，不斷與部取得聯絡是必要的。若說無異常便不聯絡是不行的。正因為孤處前綫，就是沒有異常也應當每日做報告。例如，日迹有無異常等我認為有每天打報告的義務。如此這般，由燧上報的每日記錄及燧的其它報告合起來做記錄，其擔當者是候史。特別是像簡 7 記載的那樣，候史自身亦從事日迹，在所管之燧內巡察，此時候史自身在現場做記錄是充分可能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部設置有複數的候史，簡 5 的背面有此記載。所謂部的機構內，除責任者候長和書記候史以外還有戍卒 10 餘人，如此說來燧屬較大的機關。在部配置複數的書記本身就可以說候史不僅是部而且還兼任燧的書記。在此將前面引用過的簡 6 為例。

如前所述這是甲渠候長向上級的甲渠候官提出的上報文書，內容是關於送上日迹簿一編。由部向候官送日迹簿來看，這份日迹簿應屬某所管燧的日迹的記錄。其上記有發信日是五鳳五年二月丁酉日。因為朔日則為乙丑之日，即二月二十九日。據陳垣“二十史朔閏表”，五鳳五年二月是小月，如此二十九日當為該月最後一日。甲渠候長福發送的日迹簿因僅有一份日迹簿是否為當月不清楚，但把它看作是一個月前正月的日迹簿又過於遲，再者作為二月發送，即推遲一個月的月末發送也是不可理解的。因此，這份日迹簿應該屬二月份的。如此這般，部收某所管燧的日迹記錄是在當月最終日並送給上級的候官。在部可以迅速處理，也應解釋為部的書記候史常做燧的記錄，依此判斷可以初步得到理解。

五

以上關於候史的任務做了一番考察，候史在部裏是僅次於候長的吏。候史的本職說到頭是書記，與部的責任者候長同行巡察或日迹，也可認為是做為候長的輔佐役而盡義務。而且不單單是部的書記，同時也擔負包括部所管燧在內的全體部的書記這一重要的任務。

基於以上認識再來看候史廣德的簡牘，其中被列舉的罪名很明顯是超出了候史職掌的範圍。其內容屬統轄燧的候長的責任，很難理解其為候史廣德的責任範圍，然而事實是廣德與候長受到同等的問罪和處罰。照其結果，一定有什麼事情為背景，比如祇能考慮為候長不在這樣的情況。

從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候史廣德之所以被問罪和受處罰，是北部候長不在或空缺由他代任候長，否則就是與候長一起受連坐。如果屬後者，則還應有一支與候史廣德同樣的處罰候長的簡牘存在。

注釋

①反映候史為部所屬也配屬燧的簡文如下：

A. 執胡燧長吳宗乘三石三斗二升少世取 P 卒柳世三石二斗二升少
自取 P (下略)

候史胡延壽乘三石三斗三升少自取 P 卒楊湯三石二斗二升少
世取 P
卒李何傷三石二斗二升
少世取 P(157·2)

B. 廣昌候史，敦煌富貴里，孫男憂，未得二月盡五月積四月奉錢二千四百
(敦 62)

②參照藤枝晃“長城的防衛”(“自然和文化”別編 2, 所收)1955 年。

③參照注②論文。

④表明燧長曾書文的簡例如下：

A. 居延轍胡燧長，龍山里公乘樂熹年卅，徙補甲渠候史，代張赦(3·19)

B. 肩水候官執胡燧長，公大夫，累路人，中勞三歲一月，能書會計，治官

民，頗知律令，文，年四十七歲，長七尺五寸，氏池宜藥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

(179・4)

⑤參見拙著“居延漢簡的研究”(同朋舍,1989年),第一章,第二章“居延漢簡的集成”。

(原載唐代史研究會報告第Ⅵ集《東アジア古文書の史的研究》,1990年。)

甲渠塞臨木部候長考

——兼論候長的職責

劉 軍(中國文物研究所)

甲渠塞由南北向並列的甲渠河北塞與甲渠河南塞組成，^①凡十部，其中河北塞六部、河南塞四部，臨木部即河南塞中最南的一部，據《新簡》EPT52·52：“二月辛丑夜半時誡北卒胸受吞遠卒壽，鷄前鳴七分付臨木卒常”^②又《新簡》EPT51·357：“正月戊申食時當曲卒王受收降卒敞，日入臨木卒僕付卅井卒得，界中八十里，定行五時，不及行三時”。臨北部北接甲渠誡北部，南臨卅井塞，是居延郵路中的重要驛站。候長是諸部的主管官員，本文試將歷任臨木候長考述於下：

候長寬

(一)候長寬、候史安世 四[] 《新簡》EPT57·36

按：據《新簡》EPT57·4：“臨木候史安世等，尉史充國爲[]”，寬與候史安世共事，故其爲臨木候長的可能性最大。另《新簡》EPT58·35：“候史安世 七月甲戌迹盡壬寅積廿九日無越塞渡天田出入迹。”此探方所見多爲漢宣帝時物，查《二十史朔閏表》，西漢昭帝以後到新莽執政前七月朔爲甲戌者僅漢宣帝元康元年一例，可知此簡所述爲元康元年七月事，推知候長寬執政當在此前後，據下例其下限不晚於甘露三年。

候長福

(二)甘露三年十一月辛巳朔己酉，臨木候長福敢言之。謹移戍卒呂異衆等行道貰賣衣財物直錢如牒。唯官移書，令饒得灤涇

收責，敢言之。 《新簡》EPT53・186

按：此爲臨木候長福上行候官之催收債文書。據上例，其任職上限不早於元康元年（公元前 65 年），據下例，其任職下限不早於建昭四年（公元前 35 年）。

候長呂憲

（三）建昭四年十月，甲渠候長呂憲□ 《新簡》EPS4T2・3

按：建昭，漢元帝年號。建昭四年，公元前 35 年。

（四）出臨木部吏九月奉錢六千。

候長呂憲奉錢千二百、臨木隧長徐忠奉錢六百、窮虜隧長張武奉錢六百、木中隧長徐忠奉錢六百、終古隧長東郭昌奉錢六百、□□隧長元禹奉錢六百、候史徐輔奉錢六百、武賢隧長陳通奉錢六百、望虜隧長晏望奉錢六百。 ●凡吏九人錢六千

建昭五年十月丙寅，甲渠尉史彊付終古隧長昌，守閤卒建知付狀。 《新簡》EPT51・409

按：此例爲俸祿出入簿。建昭五年，公元前 34 年。

（五）建始元年四月甲午朔乙未，臨木候長憲敢言之。爰書：雜與候史輔驗問隧長忠等七人，先以“從所主及它部官卒買□，三日而不更言請書”律辨告。乃驗問隧長忠、卒賞等辭皆曰名郡縣爵里年姓官除名如牒，忠等毋從所主卒及它□ 《新簡》EPT51・228

按：此例爲驗問爰書。建始，漢成帝年號。建始元年，公元前 32 年。

（六）建始二年十二月甲寅朔甲寅，臨木候長憲敢言之。謹移郵書課一編，敢言之。 《新簡》EPT51・264

按：建始二年，公元前 31 年。

與甲渠臨木候長呂憲有關的簡文又有以下數簡：

（七）殄北候令史登不服負臨木候長憲錢，謂臨木候長憲。 ●一事集封，四月己卯尉史彊奏封。 《新簡》EPT51・25

（八）書三封 其一封呂憲印、一封王建國、一封李勝。 十月

癸巳令史弘發。 《合校》180・39,190・33^⑧

(九)臨木候長呂憲 《合校》185・25

(一〇)書五封、檄三。二封王憲印、一封孫猛印、一封成宣印、一封王充印、二封呂憲印、一封王彊印。二月癸亥,令史唐奏發。

《合校》214・24

(一一)臨木候長憲以亭行。 《新簡》EPT51・734

(一二)誼不留難,敵既入南滿半日,時令史根、尉史彊,守塞尉萬,候長呂憲、王充、徐弘,候史成遂 《新簡》EPT51・18

據例(三)至(六)所見年號簡,候長呂憲任期在漢元帝建昭至漢成帝建始年間左右。據例(二)簡甘露三年見“臨木候長福”。據例(一三)簡河平二年見“臨木候長政”,所以候長呂憲的任期上限不早於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下限不晚於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據例(四)、(五)簡所見,供職於呂憲手下的有候史徐輔,隧長徐忠、張武、東郭昌、元禹、陳通、晏望等。

候長政

(一三)河平二年九月己未,令史博受臨木候長政 《合校》137

・4

(一四)匚服謂臨木候長政。 ●一事集封 八月癸匚匚 《新簡》EPT51・261

按:河平,漢成帝年號。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其任期的上下限尚難確定。

候長武

(一五)木中隧長王當 十月祿大黃布十三枚 三年正月己丑候長武取 卩 《新簡》EPT59・204

按:據例(四)所見,木中隧屬臨木部管轄,可知此例所見候長武無疑為推木候長(“推木”為新莽時期“臨木”的稱謂)。下例地皇三年已見推木候長王宏,所以此例所見“三年”祇能是始建國四年或者是天鳳四年。經查《二十史朔閏表》,始建國四年正月為乙卯朔,當年正月不可能有“己丑”日,故此例所見必為天鳳四年事。再則,此例所見

爲《新簡》EPT59・191—228 冊書中的一枚，其中 192 號簡見“推木候史馮長 十月祿大黃布十三枚 三年正月己丑候長□□取。

卩”可知候史馮長供職於候長武門下。據例(一三)，候長武任職上限不早於河平二年(公元前 27 年)，據下例綜析其任職下限不晚於地皇四年(公元 23 年)。

候長王宏

(一六)推木候長王宏 十一月一斛五斗 同 十月丙寅掾譚取。 卩 《新簡》EPT65・10

(一七)□木候長王宏詣官受□ 《合校》231・5

按：例(一六)所見爲《新簡》EPT65・8—17 冊書中的一枚。其中《新簡》EPT65・15 之“士吏馮匡”始見於天鳳六年(見《新簡》EPT68・4、11)，此例所見之掾譚則始見於地皇元年(見《新簡》EPF22・413)；再有 EPT65・11 之“第十秊候長趙彭”始見於地皇四年(見《新簡》EPT65・11)，在此之前天鳳二年第十秊候長爲“良”(見《新簡》EPT48・136)可知趙彭在位不會早於天鳳二年，則上引《新簡》EPT65・8—17 冊書的年代不會早於天鳳二年，推木候長王宏任職的上限也不會早於此。

候長上官武

(一八)建武四年十一月戊寅朔乙巳，甲渠鄯守候博叩頭死罪
《新簡》EPF22・126A

掾□□ 《新簡》EPF22・126B

敢言之。府記曰：卅井關守丞匡檄言，居延都田嗇夫丁 《新簡》EPF22・127

宮，祿福男子王歆、郭良等人關檄留遲，後宮等到。 《新簡》EPF22・128

記到，各推辟界中，定吏主當坐者名，會月晦●謹推辟
《新簡》EPF22・129

界中，驗問候長上官武，隊長董習等辭相付受□ 《新簡》EPF22・130

及不過界中，如牒。謹已劾，△領職教勅吏毋狀，叩頭死罪

《新簡》EPF22・131

死罪敢言之。 《新簡》EPF22・132

卅井關守丞匡檄一封，詣府，十一月壬辰言居延都田嗇大丁宮，
祿福男子 《新簡》EPF22・133

王歆等入關檄甲午日入到府，留遲。 《新簡》
EPF22・134

●謹推辟驗問臨木候長上官武隧長 《新簡》
EPF22・135

陳陽等辭不受卅井關守丞匡言宮 《新簡》EPF22
・136

男子王歆等入關檄不過界中。 《新簡》EPF22・
137

卅井關守丞匡檄一封，詣府。十一月乙未言男子郭長入關檄丁酉
食 《新簡》EPF22・138

時到府，留遲。 《新簡》EPF22・139

●謹推辟驗問臨木候長上官武、隧長張勳 《新
簡》EPF22・140

等辭：今月十八日乙未食坐五分，木中 《新簡》
EPF22・141

隧長張勳受卅井誠勞北隧長房岑；舖時勳 《新
簡》EPF22・142

付城北助隊長王明；下舖八分明，付吞遠助 《新
簡》EPF22・143

隧長董習。習留不以時行，其昏時習以 《新簡》
EPF22・144

檄寄長，長持檄道宿，不以時行 《新簡》EPF22・
145

檄，月廿日食時到府， 《新簡》EPF22・146

吞遠隧去居延百卅里，檄當行十三時， 《新簡》
EPF22・147

定行廿九時二分，除界中十三時𠂔 《新簡》
EPF22・148

案：習典主行檄書不𠂔 《新簡》EPF22・149

時二分，不中程，謹已劾 《新簡》EPF22・150

(一九)、臨木候長上官武 十二月臘肉直石二斗 十二月己未
女取。 《新簡》EPF22・204

按：上引例(一八)爲推辟驗問書，即關於入關檄書留遲的調查報告。從中可知候長上官武是在建武初年任職的，上限尚難確立；據下例，其下限不早於建武八年(公元32年)。候長上官武與上文所見天鳳年間任職的候長武年代相距十餘年，中間還隔着候長王宏，其爲同一人的可能性很小。

綜上，簡文已出現的甲渠塞歷任臨木部候長如下(以——表示年代延伸)：

候長寬 ——元康元年——甘露三年

候長福 元康元年——建昭四年

候長呂憲 甘露三年——建昭——河平二年

候長政 ——河平二年——

候長武 河平二年——地皇四年

候長王宏 ——天鳳三年——

候長上官武 建武初年——建武八年

以上所列僅爲某一候長任職時間的大概範圍，不是絕對的年代，其間或還有簡文未出現的候長存在，這有待於新資料的出土。

關於候長的職責

候長，是候官下屬諸部負責人，秩有秩，俸錢每月一千二百或一千八百^④，其職能主要是指揮邊塞諸隧進行巡邏和候望，防禦敵方的侵擾。《新簡》EPT68・68—70簡云：“公乘居延中宿里，年五十一歲，姓陳氏，今年正月中府補業守候長，署不侵部，主領吏迹候備寇虜盜

賊爲職。”其中“主領吏迹候備寇虜盜賊爲職”即爲總概括。

諸部每部管轄七、八座烽隧，候長要對這些烽隧的工作負責，需經常循行檢查，如《新簡》EPT5·59：“候長等各循行部，嚴告吏卒明畫天田，謹迹候，常……”。還要完成上級交給的其它任務，如派遣士卒爲上級服務等，《新簡》EPT59·59：“第十候長傅育 坐發省卒部五人，會月十三，失期，毋狀。今適載三泉茭二十石致城北隧給驛馬，會月二十五日畢。”不完成任務即受罰。

候長每月都必須上報該部日迹候望的情況，如《新簡》EPT57·87A：“元康元年五月乙□朔丁丑，候長安世敢言之。謹移四月日迹簿一編，敢[言之。]。”日迹簿本文如《新簡》EPT58·17：“收降候長賞、候史充國：四月乙巳日迹積一日，毋越塞蘭渡天田出入迹。乃丙午日出一千時，虜可廿餘騎萃出塊沙中，略得迹卒趙蓋衆。丁未日迹盡甲戌積廿八日，毋越塞蘭渡天田出入迹。”對於日迹，候長不僅祇是檢查，自己也有日迹的義務，漢簡常見候長、候史日迹簿，如：

(二〇)候長武光、候史拓 閏月辛亥盡己卯積廿九日日迹從第卅隧北盡鉗庭隧北界，毋蘭越塞天田出入迹。 《新簡》EPT52·82

(二一)候長尊、候史長秋 丁未詣官不迹 閏月己卯從當曲隧北界迹南盡不侵隧南界盡丁未積廿九日，毋越塞出入迹。 《新簡》EPT56·28

候長、候史日迹與戍卒日迹不同，戍卒祇是在所在烽隧周圍日迹，路程很近；而候長、候史是在部的範圍日迹，跨七、八烽隧，路程在二十漢里左右，工作比較艱苦，當時朝廷對候長、候史日迹制定了優惠法令，漢簡所見如《合校》一〇·二八：“北邊絮令第四：候長、候史日迹及將軍吏勞二日皆當三日。”此令當時曾得以認真執行，如《合校》一五九·一四，“五鳳三年十月甲辰朔甲辰，居延都尉德、丞延壽敢言之。甲渠候漢彊書言候長賢日迹積三百廿一日，以令賜賢勞百六十日半日，謹移賜勞名籍一編，敢言之。”

候長身爲前沿指揮官，不僅指揮作戰，也要求自身有較高武藝，

所以法令規定對候長定期進行考核，如：

(二二)功令第卅五：候長、士吏皆試射，射去厚帶、弩力如發弩，發十二矢，中帶矢六爲程，過六，矢賜勞十五日。 《合校》45·23

候長考核記錄，如《新簡》EPT50·18：“張掖居延甲渠塞有秩候長公乘樊立 鴻嘉三年以令秋試，發矢十二，中帶矢十二。

處於郵驛路綫的諸部候長，除上述職責外，還要對郵書的傳遞負責。見前例(一八)，另《合校》123·55：“郵書失期。前檄召候長敞詣官對狀。”《新簡》EPT52·83：“建昭四年四月辛巳朔庚戌，不侵候長齊敢言之。官移府所移郵書課舉曰：各推辟部中，牒別言，會月廿七日。謹推辟案：過書刺正月乙亥人定七分，不侵卒武受萬年卒蓋；夜大半三分，付當曲卒山；鷄鳴五分付居延收降亭卒世。”

注釋

①李均明：《漢代甲渠候官規模考》，《文史》第34、35輯。

②《新簡》，即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7月版。

③《合校》，即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下，文物出版社，1987年1月版。

④參見陳夢家：《漢簡綴述》135-147頁《漢簡所見奉例》。

漢代邊塞軍隊的給假、休沐與功勞制

——讀《居延新簡》札記之二——

邢義田(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一、取寧、予寧與功勞

漢代官吏因親人死亡，請喪假，謂之“取寧”，上級長官准予喪假，謂之“予寧”。《漢書·哀帝紀》綏和二年詔：“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顏師古注：“寧謂處家持喪服”。取寧、予寧的例子在漢簡中都可以見到。取寧之例如：

1. 第卅八隧長蒲母死詣官寧三月[] (59. 39, 勞圖版 329)
2. 元年七月己丑父死取寧[] (100. 10, 勞圖版 40)
3. []甲渠候長頓以令取寧即日遣書到日盡遣如律令 (160. 16, 勞圖版 512)
4. 重追木中隊長徐忠同產姊不幸死寧日盡移居延一事一封正月丙戌尉史忠封 (EPT50:9)
5. []延都[]德謂甲渠塞候移牒得令建書曰延壽
同里楊合眾病死猛為居延甲渠候長願以令取寧
(EPT59:53,54)
6. []前取寧曰[]詣官[]庚午下舖入 (3. 22+3. 23, 勞圖版 526;《合校》作“寧”，《甲乙編》作“宣”，《勞》作“寡”，按圖版，《合校》是)
7. 為妻嬰取寧盡[] (121. 19, 史語所藏未發表居延簡)

從 1, 2, 4, 7 例及以下第 8 例可知，為父母喪，為同產姐妹喪，為妻喪可以取寧告假，第 5 例可惜簡殘，兩段殘文之間的關連不能十分確定，需要稍作疏解。從其他的簡(40. 2A, 85. 8, 139. 13, 159. 14,

267. 5A, 478. 16, EPT51:125, EPT51:190A, EPT51:556A, EPT56:33, EPT56:199)可知,第5例的“延都□德”即“居延都尉德”。都尉德有一繫年簡在五鳳三年十月(159. 14)。甲渠塞候移檄得縣令文書曰延壽同里云云,這裏的延壽,不是指人名,而是檄得縣的延壽里。檄得縣令的文書是說,其縣延壽里的楊合衆病死,和他同里的甲渠候長猛願取寧。而這位甲渠候長猛曾出現在另一繫年簡上(EPT56:257),時間是五鳳元年五月,他可能也就是同一坑位出土 EPT56:96 簡中的楊猛,該簡謂:“肩水都尉斗食屬檄得延壽里公乘楊猛□□”。雖然兩位名猛的人,一是甲渠候長,一是肩水都尉斗食屬,不過如果我們考慮猛有可能曾經調遷職務,則不能排除這兩位猛是同一個人。根據漢代同族居於一里的習慣,楊猛和楊合衆或許是居於同一延壽里的親人。祇有這樣,才好解釋為何楊猛有資格為楊合衆請喪假。即使如此。這仍是十分特殊的現象。漢代取寧是以那些親屬為範圍,很值得繼續注意,(此外必須說明的是,簡 EPT48:17 載:“甲渠候長檄得延壽里趙猛”。也就是說前簡中的甲渠候長猛似乎有可能是這位趙猛。而不是楊猛。如此甲渠候長猛為楊合衆取寧,就不是因為親族關係,而僅僅是同里之人罷了。但是據簡 EPT48:58A,知候長趙猛和士吏馮匡同時,而馮匡是王莽至光武初的人,參拙稿《從居延簡看漢代軍隊的若干人事制度》《新史學》三卷一期,1992,頁 101;因此宣帝五鳳時期的甲渠候長猛,不可能是這位趙猛。)

予寧的例子如:

8. 永光二年三月壬戌朔己卯甲渠士吏彊以私印

行候事敢言之候長鄭赦父望之不幸死癸巳

予赦寧敢言之 (57. 1A, 甲 2553A)

9. □甲渠候官予寧敢言之□ (EPT51:563)

10. □□願以令取寧唯府告甲渠候官予寧敢言之
(EPT53:71A)

從上例看,有權決定給予候長或隧長喪假的是候官一級的單位。這一點永田英正已經指出(《居延漢簡の研究》,481 頁)。不過,他需要向

更高的都尉府報備。第8例中的士吏代行候事，於永光二年三月十八日（己卯）報告了候長鄭赦的父親不幸死亡，並已於二月一日（癸巳）給予鄭赦喪假之事。每個月單位中取寧的情況都要匯集造冊，稱之為某月“吏寧書”（176·48A，勞圖版250）。從上例中“以令取寧”的措詞可知，要求給假所根據的應是“寧令”或“假寧令”。《太平御覽》卷六三四〈范寧啓國子生假故事〉曾引晉之“假寧令”（見張鵬一編《晉令輯存》，頁312—313）。晉令名稱當是淵源於漢，但漢簡中也有“以律取寧”一例（EPS4T2:144A）。《後漢書·陳寵傳》附子陳忠傳，忠上疏謂：“……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李賢注引《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據此，則漢初有關吉凶假的規定似列入“科”，而非“令”或“律”。

喪假可以請多久呢？從上引第一例來看，母死，取寧似乎是三個月。但此簡下半殘文不明，我們不能十分肯定簡文最末的“寧三月”就是喪假期限。較明確的例子見於敦煌簡：

11. 玉門千秋隧長敦煌武安里公乘呂安漢年卅七歲長七尺六寸
神爵四年六月辛酉除功一勞三歲九月二日其卅日父不幸死
寧定功一勞三歲八月二日訖九月晦庚戌故不史今史

（《敦煌漢簡》，中華書局，1186AB，圖版139）

《敦煌漢簡》釋文“寧”字作“憲”，疑誤。據圖版，字形類“憲”，實為寧字。從文例上看，上引第4、8簡，尤其是第4簡“不幸死”之後，亦接一寧字。這是一枚記呂安漢功勞的簡。他原積功一，勞三歲九月二日，但其中三十日因父死告假，請假日數需自積勞中扣除，功勞從而定為功一，勞三歲八月二日，呂安漢因父喪取寧三十日，十分明確。取寧的日數，或有上限，文帝定約禮之制，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漢書·文帝紀》顏注引應劭曰）《後漢書·陳寵傳》附陳忠傳李賢注謂此三十六日“後以為故事”。也就是說，文帝以後官吏服喪似以三十六日為極限。但因取寧日數需自積勞中扣除，很可能在上限之內當事人也有自行斟酌將假請滿，或少請一些的餘地。呂安漢為父喪取寧三十日是一個實例。這是一枚宣帝時期的簡，從奔喪需扣除積勞可以知道，

最少在宣帝以前，並不鼓勵長期服喪。前引陳忠上言還提到：“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宣帝此令僅及祖父母，未言父母，又喪未滿三月勿徭；換言之，滿三個月，就得應徵服徭役。陳忠在安帝元初三年重提宣帝舊令，是因為光武絕告寧之典，當時已不行此令，請鄧太后重‘依此制’。儘管如此，這樣的喪假規定離主張三年之喪的儒生理想還差得太遠，在邊塞的簡牘文書中，一無三年取寧或予寧的踪影。

關於取寧，于豪亮先生在〈居延漢簡校釋〉“取急”條（《于豪亮學術文存》，頁208）曾略略提到，可參，趁便一提，第11例中“故不史今史”一語的意思，應該是呂安漢原不知書寫當時公文用的書體——史書，亦即隸書，但記錄功勞時，他已經學會了。“史”、“不史”詞義，可參于豪亮上引書，頁202，又可參簡EPT51:4, EPT51:11, 129. 22 + 190. 33。

81. 5. 1

二、休沐

72—74年出土居延簡中有一條關於休沐制的寶貴資料，從這一條可以知道漢代有工作十天，休息一天的休假制，和文獻中“五日一休沐”的情況不同：

1. ●告尊省卒作十日輒休一日于獨不休尊何解□□
(EPT59:357)

這是有關漢邊吏卒休假規定極重要和極明確的一條資料。省卒每工作十天應有一天休假，此簡文意尚有難解之處，因無圖版可以覆按，姑置不論。大致是省卒未能依規定得到休假，引起上級質問，並要求解釋。可見該給的假不得任意刻扣，這雖然是關於省卒的休假規定，不過很可能其他類的‘卒’，甚至‘吏’都是如此，以隧卒日常的工作日迹來說，在以月為單位登記某隧的日迹簿裏，所記錄的日迹通常都是十天輪一班，不知是否即和十日一休有關：

2. 卒□□四月丙辰迹盡乙丑積十日

卒□□四月丙寅迹盡乙亥積十日 ㊦

卒張福四月丙子迹盡甲申積九日 (EPT52:9)

簡甲第一卒行日迹從丙辰到乙丑爲十天，第二卒接着從丙寅到乙亥，也是十天，第三卒張福又接着迹最後的九天，從丙子到甲申，由一卒單獨行日迹，一人連續輪值十天，以這樣方式輪值日迹的例子又見下列簡：

3. 卒郭鈴乙酉迹盡甲午積十日 凡迹廿九日毋人馬蘭越塞天田
出入迹

卒董聖乙未迹盡甲辰積十日

卒郭賜乙巳迹盡癸未積九日 (18.8, 勞圖版 530)

4. 卒□□甲辰迹盡癸巳積十日 卒韓憲金甲辰迹盡壬子積
九日

第二隧

卒張棠甲午迹盡癸卯積十日 凡迹廿九日毋人馬蘭越塞
天田出入迹

(257.3, 勞圖版 247)

5. 𠄎盡壬辰積十日

𠄎盡壬寅積十日

𠄎盡壬子積十日

𠄎越塞天田出人迹(EPT2:22)

6. 四月乙卯卒王宮迹盡甲子積十日 四月乙亥卒許柱迹盡
甲申積十日

𠄎●

四月乙丑卒鄧祿迹盡甲戌積十日 凡迹積卅日毋人馬蘭
越塞天田出入迹

(EPT4:83)

7. 𠄎盡甲子積十日

𠄎十日𠄎 (EPT5:185)

8. 臨木隧卒三人(以上爲第一欄)

卒陳廬癸未日盡壬辰積十日毋人馬蘭越塞天田出人迹

卒汜□癸巳日迹盡千寅積十日毋人馬蘭越塞天田出入迹
卒□漢癸卯日迹盡壬子積十日毋人馬蘭越塞天田出入迹
凡積卅日 (以上爲第二欄) (EPT43:32)

9. □迹積十日
凡積十日 (EPT48:112)

10. □卒未央迹盡乙卯積十日 凡迹□□
□卒侯游迹盡乙丑積十日 出入□
□卒許敢迹盡甲戌積九日 (EPT51:286)

11. □月丙寅卒莊禹迹盡乙亥積十日
□盡乙酉積十日 (以上爲第一欄)
十一月丙戌卒藉良迹盡乙未積十日
凡迹卅日毋人馬出入塞天田迹 (以上爲第二欄)
(EPT51:522)

12. □迹盡甲申積十日□ (EPTS4, T1:22)

隧卒除日迹，還有勤務稱爲“日作”，日作似也以十日爲一單位，工作九日，第十日休息。以下各簡是隧卒九天工作的記錄：

13. 第五隧卒高登 治壑□□ 治壑八十 治壑八十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27. 12, 勞圖
版 503)

14. 第廿四隧卒孫長 治壑八十 治壑八十 治壑八十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61. 7 +
286. 29, 勞圖版 158)

15. 第卅四隧卒富承 治壑八十 治壑八十 治壑八十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89. 22, 勞
圖版 234)

16. □□隧卒□當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除土 (254. 22, 勞圖版 230)

以上 13—16 簡都完整，形式一致，記錄隧卒每日治壑或除土的

情況。從以上看來，所謂十日一休沐，似乎是指工作九日，休息一日，因此祇記錄九天的工作內容。以下幾枚敦煌日作簡也反映工作十天，有一天休假的情形：

17. 募當卒張逢時 病 病 病 葦 葦 葦 格 葦 休
葦 葦 葦 阝

(《敦煌漢簡》1027, 圖版 139)

18. 煎都鄆卒郭縱 病 ✓ 葦 葦 葦 葦 葦 葦 格 休
葦 葦 葦 葦 葦 葦 葦 葦 病 葦 J 休 詣昌安

(《敦煌漢簡》1028, 圖版 140)

19. 葦 葦 葦 休 葦 葦 格 取葦 (《敦煌漢簡》
1031, 圖版 95)

20. 阝初格——葦 休 葦 葦 葦 阝 (《敦煌漢簡》
1032, 圖版 95)

以上 17- 20 簡性質相同，其中第 18 簡完整，從第 18 簡可見鄆卒郭縱二十天中每天工作(採葦)或生病或‘格’(意義不明)，或‘休’的情形，二十日中曾休沐兩次。可見所謂十日一休的一種情況是工作九天，休息一天，而從第 17、18 例看，生病似乎並不影響休假的權益。工作九天，休一天合為十日的計算法，從以下這一條可以看得更清楚：

21. 一日休 四日格

格 十日

五日葦 (《敦煌漢簡》1029, 圖版 94)

和這一條書寫格式相同的另兩條上，則有每十五日，工作十四日，休一日的情形：

22. 阝格 假 十五日 其一日休 一日葦 一日格
十一日葦 一日[]葦

(《敦煌漢簡》869, 圖版 83)

23. 阝格 十五日 一日休 一日葦 一日格 阝
九日葦 三日運葦

(《敦煌漢簡》1030, 圖版 95)

不論那種情況，十日一休沐並不是一成不變，也不是工作九或十

四天，就一定有一天休息。日迹或日作的時期長度都並不完全固定。有人日迹三天一輪，也有人連續迹十五日纔換班的。三天的例子如下：

24. 不侵隧卒更日迹名(以上爲第一欄)

郭免乙亥戊寅辛巳甲申丁亥庚寅癸巳丙申己亥辛丑癸卯

李常有丙子己卯壬午乙酉戊子辛卯甲午丁酉庚子壬寅

李相夫丁丑庚辰癸未丙戌己丑壬辰乙未戊戌省不迹(以上爲第二欄)

(EPT56:31)

25. 第十六隧長王□□	乙巳王敞迹／	壬子王延迹)
戊卒王延	丙午王延迹)	癸丑王敞迹／
戊卒王敞	丁未陳樂成迹	甲寅陳樂成迹
戊卒陳樂□	戊申王敞迹／	乙卯王延迹
卒王延省	己酉王延迹)	

(EPT56:290)

	戊午陳□□迹	
	己未王延迹)	
26. [□□	庚申王敞迹／	
	辛酉陳樂成迹	(EPT56:307)

27. [□□	丙寅王敞迹／	壬申王敞迹
	丁卯陳樂成迹	癸酉陳樂成迹

●凡積卅日

(EPT56:289)

以上 25、26、27 簡原是第十六隧戊卒同一份日迹記錄的殘存部份。我曾試以日期及人名排列順序，復原全份記錄；第 26、27 簡部份可以十分吻合地照順序復原如下：

戊午陳樂成迹	[壬戌王延迹)	[戊辰王延迹)
己未王延迹)	癸亥王敞迹／	己巳王敞迹／
庚申王敞迹／	甲子陳樂成迹	庚午陳樂成迹

辛酉陳樂成迹 乙丑王延迹 〕 辛未王延迹 〕

丙寅王敞迹 〵 壬申王敞迹 〵

丁卯陳樂成迹 癸酉陳樂成迹

●凡積卅日

依照 25 簡及以上的復原，可知三名戍卒每人輪一日，隔兩天輪到一次。一個月每人仍是日迹十天，但輪法不同。其他也有十五日一輪的：

28. 讎光九月癸未盡丁酉積十五日迹 凡積卅日 □□

李安九月戊戌盡壬子積十五日迹

趙賜九月旦省詣茭 (132. 29, 勞圖版 149)

29. 卒呂弘二月壬午迹盡丙申積十五日

第三隧卒郅安世二月丁酉迹盡庚戌積十四日

卒橋建省治萬歲塢

凡迹積廿九日毋人馬越塞天田出入迹

(214. 118, 勞圖版 448)

30. 〔卒左朔十月己巳迹盡癸未積十五日 凡 〕
卒張定十月甲申迹盡戊戌積十五日

(EPT51:393)

第 30 例簡殘，第 28、29 例的兩卒各迹十四、五日，是因隧中另一卒另有照料馬料或修治塢堡的特別工作，否則一般似乎是由三卒分擔每月的日迹工作，每九或十日一輪。

每工作九日、十日或十餘日纔有休沐一次的機會，這樣的休沐比漢代京官通常享有的‘五日一休沐’（《漢書·萬石君石奮傳》）要差得多。漢居延或敦煌簡中還找不到五日一休的例子，不過許多情形是將應享的休沐日數集成若干天的假期一次休。簡中有一次休二、三十日的：

31. 第二十一隧卒杜詡 休二十日 (EPT65:51)

32. 第二十八隧長張駿 休二十日 (EPT65:136)

33. 第二十五隊卒鮑永 己 休三十日 (EPT65:323)

為何有休二十日、三十日的情形呢？下文還可以見到有休十天或十五

天的例子。我的猜測是吏卒雖十日一休，但事實上他們並不一定九或十大就休息一天。居延簡中有例子提到，有人“七月一日居署盡晦積卅日”(EPT40:160)云云。這是說某人在自己的“單位”當職(居署)從七月一日至最後，連續工作了卅天，照規矩計算，他就積了三天休假。如果累積更多，一次即可休二十日甚或三十日。各人似可隨需要自便。又按漢邊計功勞的辦法，在某些情況下，有二日當三日的(居延簡 10·28, 562·19, 敦煌簡 1854)。這樣的一個好處就是休假較正常為多：積勞二十日等於三十日；本來可以休假二日，如此就可以休假三日。其餘漢簡中常見的增勞或奪勞，都會影響到休假的增多或減少。過去學者多認為功勞是和昇遷有關，我相信也和休假有關。

討論到吏卒的休假，從這裏使我聯想到為何簡牘中有那麼多某人家居“去官”若干里的記載，這也可能和休假有關。先來看看相關的記載：

34. 肩水候官並山隧長公乘司馬成中勞二歲八月十四日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武年卅二歲長七尺五寸躰得成漢里家去官六百里 (13. 7, 勞圖版 39)

35. 肩水候官始安隧長許宗^{功一勞一}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中除十五日}令文年卅六長七尺二寸躰得千秋里家去官六百里 (37. 57, 勞圖版 137)

36. 匚平日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年五十一歲長七尺五寸□□□里家去官千六十三里□□□□和百□匚 (49. 9, 勞圖版 583)

37. 匚候官窮虜隧長簪褭單立中功五勞三月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年卅歲長七尺五寸應令居延中宿里家去官七十五里屬居延部 (89. 24, 勞圖版 505)

38. 匚七尺三寸居延全稽里家去官十里匚 (136. 2, 勞圖版 434)

39. 肩水候官執胡隧長公大夫奚路人中勞三歲一月能書會計治

官民頗知律令文年卅七歲長七尺五寸氏池宜藥里家去官六百五十里
(179.4, 勞圖版 83)

40. 饒得□胡里寶田去官六百里和□□ (387.8, 勞圖版 7)

41. 𠄎……頗知律令文年卅八歲長七尺五寸居延肩水里家去官八十里……

(EPT3:3)

42. 𠄎歲長七尺五寸居延昌里家去官八十里 (EPT52:137) (竹簡)

43. 𠄎居延□里家去官七十里 (EPT56:424)

44. 延城甲溝候官第三十隊長上造范尊中勞十月十秊日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年三十二歲長秊尺五寸應令居延陽里家去官八十里屬延城部

(EPT59:104)

45. 居延甲渠候官第十隧長公乘徐譚功將
中功一勞二歲

其六月十五日河平二年三年四年秋試射以令賜勞 □令 (以上爲第一欄)

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 (以上爲第二欄)

居延鳴沙里家去大守府千六十三里產居延縣

爲吏五歲三月十五日

其十五日河平元年陽朔元年病不爲勞 居延縣人 (以上爲第三欄)

(EPT50:10)

以上十五簡的共同點很明顯，即它們都是功勞簡。爲什麼在記載功勞的簡冊上要注明他們家去官里數呢？原因是這些隧長或候長平日工作，未居於自己的家中，祇有休假時，纔能回家省親。他們的休假日數和機會，除了固定的十日或五日一休，更與累積的功、勞多少有關。記載家去官距離，是因爲漢代顯然和後世例如晉代一樣，給假也依遠近給“程”（如前引《晉令輯存》，頁 312—313）。記載去官距離的一個作

用應是作為給程的依據。所謂“去官”的“官”，應是指他們服務的候官。雖然我們沒有漢代給程的直接證據，不過從上例 34、35、39，家去官達六百里或六百餘里，如給假不另計路程時間，假期就要消耗在路上，十分不合理。簡中祇有一些不很明確，或為“程”的記載：

46. 鄣卒蘇寄 九月三日封符休居家十日往來二日會月十五日 (EPT17:6)

47. 𠙴十一日封符直休居家廿日往共𠙴 (EPC:61)

第 46 例，鄣卒蘇寄從九月四日起休假歸家十日，所謂“往來二日”應是來回在路上所耗的“程”；第 47 例，休假廿日，“往共𠙴”疑應作“往來𠙴”，所記也應是來回所耗的“程”。

休假者在休假期間需有人代理工作：

48. 隧長常業代休隧長薛隆適丁卯舖時到官不持府符●謹驗問隆 (EPF22:170)

49. 俱南隧長左隆，借寶永自代 休 (EPF22:268)

50. 課言●謹案湯自言病令子男珍北休隧長詡自代乘隧湯蓋癸酉 (EPF22:340)

休假者在返家來回的路上需要“過所”為通行證：

51. 過所 𠙴建武八年十月庚子甲渠守候良遣臨木候長刑博 (EPF22:698A)

過所 𠙴便休十五日門亭毋河留如律令 (EPF22:698B)

此簡中的“河”字應原是“苛”字，這一過所兩面連讀，臨木候長刑博，“便休十五日”的“便”字不知何解。甲渠守候給了他十五天休假。憑此過所，他在來回路上，門亭關津都應依律令放行。

除了“便休”，居延簡中還有所謂的“後休”，其制尚不明，姑錄備考：

52. 名而猥言調給解何記到更具言隧長後休在隧長當廩者𠙴 (EPF22:382)

53. 𠙴長董放 月十九日後休 (EPT26:4)

54. 𠙴月十九日後休 (EPT27:68)

不知是不是因為不得為嫂死取寧？另有一例，私去署是“之它亭聚會奉誦飲匱”(403.10,勞圖版 52),意義不明。私歸或私去署都要受到調查：

62. 詰況私去署以何日還到隧具對 (EPF22:383)

63. 詣官往來積私去署八日除往來日積私留舍六日辭具 (EPF22:387)

第 63 例謂“私去署八日，除往來日，積私留舍六日”，在路上往來兩天加以扣除，這正是前面所說的“程”，都是不列入計算的，這也證明給程制度的存在，至於私去署會受到什麼懲罰，無可考。

81. 5. 24

82. 4. 28 改訂

後記：拙稿改訂期間，承裘錫圭先生、蕭璠兄指教，謹此誌謝。

《居延新簡》商榷

馬先醒(臺北中興大學)

(上)書名商榷

(一)居延與簡牘

就地理言，居延遠不及敦煌著名；就中西交通言，居延更不似敦煌般重要；但就考古言，居延漢簡足與敦煌漢簡分庭抗禮，並駕爭先。

近世簡牘之出土，既以敦煌漢簡為嚆矢，且經當時東、西漢學名家王國維，沙畹迅即分別考釋刊佈，附驥敦煌顯學而名播瀛寰。

居延漢簡則適得其反，出土於中國南北決戰之秋，^①復錮蔽於外寇日亟、內部擾攘局中。老實說：居延漢簡原物至今猶大部幸存於天壤間，賴人力，尤靠運氣。多少文物毀滅；多少學者犧牲！‘北京人’何在？王國維何在？陳夢家又何在？

天縱睿才王國維是簡牘學的奠基者，後來者迄今尚無人居上。其名著《簡牘檢畧考》易得沙畹《敦煌漢簡》手校本，鍵戶數月成其與沙著齊名之《流沙墜簡》。更鼓勵張鳳毅然刊佈《漢晉西陲木簡彙編》。但他非命於戰伐，無緣親見目睹數以萬計的居延漢簡，這批一手文獻就皮存在他曾執教過的清華園及他沉歿的昆明湖附近。不過，話說回來，即使王國維未自沉，他果能得見參考居延漢簡？由後來種種事實顯示：實在未必！清華國學院的另一導師梁啟超雖活着，卻不敢續教於清華園，甚至不敢留在北京！黨同伐異，烈於古昔一朝天子一朝臣。

居延漢簡、王國維緣慳一面，固是居延漢簡的不幸，更是簡牘學及整個簡牘學界的不幸。

（二）《居延漢簡》與《居延新簡》

居延漢簡為“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所發現，更確切點講，是該團團員瑞典人貝格曼所發現。

名為“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西北科學考查團”，實際是以外國人士為主體。發起人及籌劃者斯文·海定(Sven Hedin)固是瑞典人，團員數十位亦多屬歐西人士；中國團員僅五位——徐炳昶、黃文弼、袁復禮、丁道衡及詹蕃勳。斯文·海定、徐炳昶分任團長，黃文弼、貝格曼為其考古團員。

黃文弼曾於額濟納河舊廟發現古紙甚多、於天倉北古堡採獲漢簡數枚，^②但與今所謂《居延漢簡》，則殊少關涉。

貝格曼(Falke Bergman)，瑞典考古學家，自一九二七年參與西北科學考查團，歷時達八年之久。

西北科學考查團在中國的活動，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二七年五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駝隊旅行回疆，踏查沿途地理、氣象。

第二階段：一九二八年夏至一九三三年秋，純粹科學探研工作，團員中專家們各率其助手，分散數省，各得其所，各務其業。

第三階段：一九三三年秋至一九三五年春，是一意外的延續，西北科學考查團接受中國政府委託，勘察西北公路線。

貝格曼全程參加了三個階段，居延漢簡是他在第二階段考古工作的主要收穫。

數以萬計的居延漢簡運抵北京後，即人少數人掌握，後稍稍開放，由賀昌群、勞幹、余遜、向達等合力考釋，事未竟而東寇作，原簡離京而滬、港、美、臺。在港時曾予拍照，勞幹先生即據其反體照片奮力著成《居延漢簡考釋》，時正值艱極寇深、戰火焦眉之一九四三年，故僅石印三百部。六年後，商務印書館方有鉛印本行世，繼之更有史語所專刊本《居延漢簡·圖版之部》（一九五七）及《考釋之部》（一九六

○),計共著錄簡牘一〇一五六號。

《居延新簡》共著錄簡牘八一五三號。其發現亦經三個階段,即一九七二年秋季的踏察:南起金塔雙城子,沿額濟納河,北至居延海。一九七三、七四夏、秋季的發掘,及一九七六年夏、秋季對布肯托尼以北地區的調查。

《居延新簡》所著錄的八一五三簡中,除十四枚採集於一九七二年踏察時,其他盡皆掘獲於一九七三年,除踏察時採集的十四枚簡牘地點不明外,其餘盡皆出土於甲渠塞。

漢代甲渠,新莽更名甲溝。《居延新簡》主要出土地甲渠候官,今俗名破城子,貝格曼曾予發掘,獲簡數千枚,《居延漢簡》中編號A8者即是。二者關係密切如此,所以自一九七八年一月號《文物》刊佈發掘報告及部份新獲簡牘內容起,筆者等多以《新居延漢簡》目之。今之釋文顏曰《居延新簡》,委實有些出人意表!

《居延漢簡》與《居延新簡》雖僅一字之差,卻毫釐千里,直有改朝換代之虞,可謂茲事體大。不詳其更名過程究如何。

一九七八年一月刊佈的發掘報告及研究論文中,多名《居延漢簡》為“首批漢簡”^③或“舊居延漢簡”^④,而名《居延新簡》為“漢簡”^⑤或“新居延漢簡”,^⑥固宜,蓋《居延漢簡》有聲於世,習用既久,約定俗成,稱用方便。僅四個字,前二字“居延”表空間,中一字“漢”表時間,末一字“簡”表文物性質。時、空背景抑文物性質,貝格曼發現者與居延考古隊發現者,雷同一致。固然《居延漢簡》中頗有“新簡”,但《居延新簡》中更多“漢簡”,循多數代稱例,《居延漢簡》愈於《居延新簡》。

若謂“新”非對“漢”而言,乃對“舊”而言,果如此,則宜恢復至一九七八年該批簡牘初宣佈時的稱謂——“新居延漢簡”,雖不甚佳,但絕對不誤,若用《居延新簡》,由於《居延漢簡》的歷史久,散布廣,“漢”、“新”對應結果,非經解釋,必致誤會——誤會《居延新簡》為《居延新莽簡》,繼之進一步波及“主題”、“副題”矛盾問題。

《居延新簡》是“主題”,《甲渠候官與第四隧》是“副題”。然新莽既更“甲渠”為“甲溝”,則《居延新簡》的副題祇能作《甲渠候官與第四

隊》，不如此即主、副題矛盾。欲脫此困，必加解釋：“新簡”之意，不同於“漢簡”，而等同於“新的漢簡”。既如此，豈不回歸到“新居延漢簡”！

總之，既用《居延漢簡》以名貝格曼所獲之簡牘，即不當更用《居延新簡》以名居延考古隊所獲之簡牘。若覺舊名《居延漢簡》並不合宜，而欲求新求變，則當從更遠更大處着眼。

（三）《張掖簡牘》或《張掖漢新簡牘》

《居延漢簡》的出土地，計北自宗間阿瑪（A1），南至北大河（A42），縱貫數千里，其間，由北而南，察汗松治（A2），破城子（A8，甲渠候官）、瓦因托尼（A10）、博羅松治（P9）、A21、布肯托尼（A22）、查科爾帖（A27）、金關（A32）、地灣（A33）、大灣（A35）等係出土簡牘較多地區，計共萬餘，除北大河（A42）出土的四簡外，餘均屬漢張掖郡地境。又南、北分屬二都尉，自小方城（A24）以南為肩水都尉部，自布肯托尼（A22）以北為居延都尉部。分而計之，二部出土簡數約略相當，是宜分別名為《肩水漢簡》及《居延漢簡》，或統一名為《張掖漢簡》。

北大河既處漢酒泉郡，是所出四簡當名《酒泉漢簡》。^⑦

雖名為‘漢’、‘簡’，實則不少屬新莽時期，更幾乎全部屬木質之牘，竹質之簡絕無僅有。

由前述事實，可見《居延漢簡》四字，其實一無是處。故陳夢家嘗言：‘稱它們為“張掖漢簡”，更合宜些’。^⑧惜僅訂正了‘空間’問題，於‘時間’、‘文物性質’二方面，未曾顧到，是其失着。

《居延新簡》的出土地——甲渠候官與第四隧，均處居延地境，空間上毫無問題，但‘簡’字問題如故，‘新’字問題尤大。

再者，據發掘報告，《居延新簡》出土地不止《甲渠候官與第四隧》，另外尚有肩水金關。待肩水金關簡刊行時，依《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隧》成例，勢將顏曰《居延新簡——肩水金關》。不幸而果真如此，則形成一更大問題，蓋肩水金關屬肩水都尉，與居延完全無涉。因此，筆者大膽假設，肩水金關出土之九千餘簡，刊佈之時，其書名絕非《居延新簡——肩水金關》，或簡捷名為《肩水金關簡》，倒較

簡明合宜。同理,《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隧》宜更名為《甲渠塞簡》。

上列名稱,固較精確,但失之瑣碎,欲為“居延考古隊”所發現的二萬簡牘擇一足以統合全部之嘉名,非不可能。

但任何事物,名稱乃一符號,貴在簡明、實用。

《居延漢簡》雖一無是處,但沿用一甲子,約定俗成,學者稱便。《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隧》雖甫刊佈,但既經面世,朝令夕改,總非善舉。真有更名必要,當熟計其利弊,宜符合下列數原則:

第一,急切需要:《居延新簡》問題既生,肩水金關簡問題將接踵而至。究名若何?學界關注,似頗有其急切需要。

第二,利多於弊:世間事固難十全十美,輒利、弊兼生,欲有所舉措,必利多於弊時,方值實行。

第三,統籌兼顧:陳夢家雖見《居延漢簡》名稱之不當,但並未遽然將之更換,今《居延新簡》名稱既顯現更大問題,可見已到山窮水盡、不得不更張之境,宜趁此時將二者一併處理。

第四,一勞永逸:甲渠一塞出簡萬數,肩水一關出簡近萬,遂即出現命名問題。除非從此‘封籬’、‘封疆’,不再考古,祇要繼續考古於額濟納河域,隨時會有第三批、第四批簡牘出土。若今不肯未雨綢繆,屆時必為其命名問題煩心傷神。前為解決既存問題,後為一勞永逸之計,新制名稱必着眼高邁,行之久遠。

基於《居延漢簡》、《居延新簡》之雙雙不合宜性,更基於待刊《肩水金關簡》之急迫性,鍼前失,開未來,宜趁此時一舉將新、舊問題同時解決。

陳夢家《張掖漢簡》之名固勝於《居延漢簡》,但也僅限於“空間”方面,至於“時間”方面、“文物性質”方面的問題,依然存在。為統籌兼顧,宜徹底更為《張掖簡牘》或《張掖漢新簡牘》。“簡牘”係出土文物的性質,“張掖”係其出土地,“漢新”係其所屬時代。

為一勞永逸計,宜更名《居延漢簡》為《張掖漢新簡牘》^①,更名《居延新簡》為《張掖漢新簡牘》^②,今後若續有所獲,依次名為《張掖

漢新簡牘》^③、^④，乃至無窮。

(四)結語

任何學問，遂其發展，名、實、方法，需隨時調整。當發展至某一階段，且需有較大幅度或較根本的調適整合，方有更上層樓之可能。簡牘學自不例外。

《居延新簡》頗顯現額濟納河流域出土簡牘命名上的窘況，但也適足促啓“柳暗花明”之新境。以《張掖漢新簡牘》^①、^②取代既往之《居延漢簡》及《居延新簡》，以《張掖漢新簡牘》^③期待下一批簡牘之出土。

待既約定俗成之後，便可進而以《張^①》名《居延漢簡》，《張^②》名《居延新簡》。那時，即屆調整完成期，同時亦即其豐收季。

注釋

①：西北科學考查團由北京出發時，廣州軍政府的黨軍已北進至江城，當貝格曼埋首於發掘居延漢簡時，正是中國及回疆政情最詭譎險惡時期。

②黃文弼：〈略述內蒙古、新疆第一次考古之經過及發現〉，《黃文弼歷史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北京，頁四。

③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頁一〇。

④徐蘋方〈居延考古發掘的新收穫〉，《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一期，頁二七。

⑤同前揭書、文，頁二六、二七。

⑥初師賓〈居延烽火考述〉——〈兼論古代烽號的演變〉，《漢簡研究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九月，蘭州，頁三五五。

⑦陳夢家〈漢簡考述·叙言〉，《漢簡綴述》，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北京，頁一。

⑧同前注。

居延“愚吏”簡校箋

魏啟鵬(四川大學)

本文所稱“愚吏”簡，見《居延漢簡甲乙編》五〇六·七。試標點鈔錄於下，酌加校箋。

□所得用事者，上所言皆曰可，上所爲皆曰善，□□□代爲，故陰上之所好而進之，苟容而□。所得備員史者，方□員□，□□私家，不□公事，意

□桂耶，懷作咸猶容，猶容與世沈浮一。所得愚吏者，知淺而羞學問，位卑而好自用，諫之不駭，告之不知，示之不見，教之不爲，且積不可痛，罪大不可解。

• 所得用事者

案：用事謂當權。《戰國策·秦策三》：“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擅權用事。”本文所云用事者，指擁有權勢之大臣，曲意權倖之輩。

• 上所言皆曰可 上所爲皆曰善

案：參見《春秋繁露·五行相勝》云“司營爲神，主所爲皆曰可，主所言皆曰善，調順主指，聽從爲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說苑·臣術》：“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

• □□□代爲

案：《玉篇》：“代，行也。”

• 故陰上之所好而進之

案：參見《說苑·臣術》：“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之耳目。”隱通陰，《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隱天動地。”《漢書·司馬相如

傳》、《文選·上林賦》隱作陰。

·苟容而□

案：《荀子·臣道》：“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國賊也。”《說苑·臣術》云：“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疑此句可補缺字爲“苟容而樂”。

·所得備員史者

案：備本爲謙詞，謂充數而佔有其位。《左傳·哀公十五年》：“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注》：“備，猶副也。”《史記·平原君列傳》：“毛遂曰：願君即以遂備員行矣。”《漢書·申屠嘉傳》：“爲丞相備員而已。”此簡之“備員史”，當指權臣下屬的左後隨員和文書，或相當於雲夢秦簡所稱：“官府佐、史”。

·方□員□

案：參看雲夢秦簡《爲吏之道》：“反赦其身，止欲去顛。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說苑·談叢》，“中不方，名不章；外不圓，禍之門。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往；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新序·節士》：“晉文公曰：吾聞之也，‘直而不能枉，無與遂往；方而不能圓，不可與長存。’”可證爲先秦流傳之熟語。疑闕文可補爲“方中圓外”。

·□□私家不□公事

案：據《說苑·臣術》所論“六邪”之一“安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云云，闕文可以照此補出。

·意□桂耶

案：桂讀爲眚。見《淮南子·原道》“今人之所以眚然能視”注。《集韻·齊韻》：“眚，目惡視。”耶通作邪。眚邪，有邪惡不正之義。闕文疑爲“近”或“甚”。

·懷作咸猶容

案：現存歷代字書未見“猶”字，考從侖得聲之字，多爲來母，亦有讀爲見母者，如淪、輪、綸又音皆讀見母，疑苟、猶因聲同而假借，猶容即苟容。本句意爲，其人襟懷與行爲都是偷合苟容。一說，疑猶爲狁字之訛，《搜真玉鏡》：“狁，音中”，狁借爲容，狁容即容容。又，疑下

容乃衍文。

• 獮容與世沈浮一

案：參看《說苑·臣術》：“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容容，隨衆上下也。見《漢書·翟方進傳》“何持容容之計”注。

• 位卑而好自用

案：參看《仲虺之誥》：“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禮記·中庸》：“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

• 且積不可痛

案：痛讀爲鋪。《方言》卷十二：“鋪，止也。”《廣雅·釋詁三》：“鋪，止也。”此句說愚吏積習難改，不可止也。下句則言其罪過不能寬恕。

總上，居延“愚吏”簡雖然是漢人抄錄，其內容與《荀子》、秦簡《爲吏之道》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從所劃分的三個官僚層面來看，其成書年代可能早於《說苑》、《新序》，直到《潛夫論》中猶可窺見其影響。此簡爲研究中國古代職官制度和政治思想史，提供了有價值的材料。

敦煌馬圈灣漢簡中的一組律令冊

吳祁驤(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敦煌馬圈灣漢簡中,有五枚簡從其形製、木質、書體、墨色來看,屬於同一簡冊。根據同出紀年簡,時代當屬王莽時期。現將這一簡冊的序次試作如下排列,并略作考釋,以就教識者。

1. • 諸惡子受符,即欲夜出,皆詣近所抑官亭吏,言欲夜出,報乃得夜出。

《敦煌漢簡》386(下同)

2. 無部署,須具伍任乃予符。盜符者,數請其罪,任者皆爲不從作。其無任者,勿予符。惡子爲不從作。 214

3. • 貧民羸謹,爲作庸不能常讎者。 215

4. • 此三牒。無作業,其任把關傳。言若它作事,各以便宜作事之,皆如附託詔書。爲官當取庸驗治。及它作,皆須所受隨。羸民不迫,乃取它庸。其 213

5. 不可作事者,冗食於倉。 216

“惡子”,不務正業者。《漢書·尹賞傳》:“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注:“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漢書·昭帝紀》:“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師古注:“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漢書·李廣利傳》:“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師古注:“惡少年謂無行義者。”

“官亭吏”,縣尉所屬之城、鄉亭吏。《續漢志·百官志》:“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本注曰: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注引《漢官儀》:“亭長課徼巡。……設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

半，司奸盜。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

“伍任”，五家擔保。《漢書·尹賞傳》師古注：“五家爲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續漢志·百官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本注曰：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事惡事，以告監官。”“任”，擔保。《周禮·秋官·大司寇》：“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漢書·哀帝紀》：“綏和二年，除《任子令》。”師古注：“任，保也。”

“符”，符券。《說文》：“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由於符券“分而相合”，易於驗核取信，故先秦以來，廣泛用於關門、行旅。漢承秦制，常於宮門、城門、里門、坊門和特定管轄區，以符券爲憑證，制約出入行止。符券的文書內容，可參考張掖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的實物：

始元七年閏月甲辰，居延與金關，爲出人六寸符券，齒百，從第一至千，左居官，右移金關，符合以從事。

• 第八

《居延漢簡甲乙編》65.7

上引符券文書中的紀年、月、日，爲居延都尉頒發日期。“從第一至千”，爲本次頒發符券的總數。“• 第八”，爲該符券的序號。受符人須持從發符機關領取的左券，與原存金關的同一序號之右券相合，方能出入關門。此種符券的形製，多爲木質，長14.4厘米（約合漢尺6.3寸），寬2.1厘米，上端一側刻齒，齒內墨書“百”字，然後自“百”字正中縱剖爲左、右二券，兩券外側墨書文書內容，文字相同（故左、右券合符時，不僅序號必須相同，而且刻齒和齒內的“百”字筆劃也必須相合）；下端有穿，原繫繩可懸於腰間，或掛於壁上。

“關傳”，出人關身份證明。《漢書·文帝紀》：“（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張晏注：“傳，信也，若今過所也。”《漢書·景帝紀》：“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關傳的文書內容，可參考張掖肩水金關遺址出土的實物：

永始五年閏月己巳朔，丙子，北鄉嗇夫忠，敢言之。義成里崔自當，自言爲家私市居延。謹案：自當毋官獄徵事，當得取傳，謁移肩水

金關、居延縣索關，敢言之。

閏月丙子，麟得丞彭，移肩水金關、居延縣索關，書到，如律令。掾晏、令史建。

《居延漢簡甲乙編 15.19

關傳的形製，據崔豹《古今注》：“凡傳皆以木爲之，長尺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版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過所也。”但據居延、敦煌出土之關傳實物，其長度均爲 23 厘米左右，即漢尺一尺。寬度不限，正面多行墨書文書內容。但目前尚不清楚何種檢署木牘爲關傳之封版，封版置於關傳之正面抑或後背，或僅以封泥木柙置於關傳之後背，內封以縣丞印章。

“不從作”，不可放縱其行爲。從，“縱”字的通假。《漢書·谷永傳》：“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漢書·杜欽傳》：“置萬姓之力以從耳目。”師古注：“從讀曰縱。”

“無作業”，沒有職業。《史記·高祖本紀》：“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廡民”，懶惰的貧民。《商君書·墾令》：“愛子惰民不廡，則故田不荒。”

“冗食”，不勞作而食。《後漢書·劉瑜傳》：“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資治通鑑》胡三省注：“無事而食，謂之冗食。”

根據上述簡冊的內容，似爲漢代管理無業者的科條摘錄，屬漢代行政法規中關於基層政權——里的民政管理規範，或即漢律中已佚之“里、督亭律”的部分內容^①。律令將無業者分爲兩類。一類爲不務正業者；一類爲病弱或勞動能力低下、不能經常找到僱主的貧民。對這兩類人規定了不同的行政管理辦法。對於不務正業者，律令規定實行行政強制，列爲不可放縱其行爲者，亦即必須受官府管制者，其出入行止須向里正領取符券。不務正業者的行動，如果沒有官府的安排，必須具有其所在的“伍”的擔保，纔能授予符券。竊取符券者，按其所犯的各項罪行，一併懲治。擔保人也要予以行政處罰——列入受官府管制者。無擔保人，不得授予符券。凡不務正業者，受符後如欲夜

問外出，必須向附近負責社會治安的亭吏提出申請，經批准後方能外出。對於病弱或勞動能力低下、不能經常找到僱主的貧民，在待僱期間，由其擔保人代為保管出入關身份證明。一旦受僱，則按有關的詔書規定辦理。官府應對作庸者進行審查驗問。作庸者如另外找到份主，必須隨身攜帶身份證明。據居延漢簡：

庸任作者，移名任作。不欲爲庸
一編，敢言之。

《居延漢簡甲乙編》224. 19)

官府對願意庸作並有擔保人者，皆編制有“任作名籍”，便於隨時驗核。因病弱、懶惰、動作遲緩，不能勝任勞作者，僱主纔能另僱他人。不欲爲庸者，亦另有名籍備查。對於喪失勞動能力的貧民，由置於城、鄉的倉廩供養。

從以上介紹的關於漢代民政管理法規的部份內容，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什伍連坐”原則。它是歷代統治階級通過鄉、亭、里等基層行政組織，對廣大勞動人民進行嚴密控制的重要法律手段。什伍之制，淵源甚早。《周禮·地官·司徒》：“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戰國時，秦獻公十年（前 375 年），“爲戶籍相伍”（《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孝公三年（前 359 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居三年……乃拜鞅爲左庶長”（《史記·秦本紀》），“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史記·商君列傳》）“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史記·高祖本紀》（集解）張晏注）“秦之法，任人及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記·范雎列傳》）在雲夢睡虎地秦簡《法律答問》中，涉及“什伍連坐”的內容極多，如“律曰‘與盜同法’，有（又）曰‘與同罪’，此二物其同居、典、伍當坐之。云‘與同罪’，云‘反其罪’者，弗當坐”；“盜及諸它罪，同居所當坐”；“‘伍人相告，且以辟罪，不審，以所辟罪罪之。’有（又）曰：‘不能定罪人，而告它人，爲告不審。’今甲曰

伍人乙賊殺人，即執乙，問不殺人，甲言不審，當以告不審論，且以所辟？以所辟論當毆（也）。”漢承秦制，亦實行“什伍相保，任者同罪”原則。“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爲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鹽鐵論·周秦篇》）敦煌馬圈灣漢簡中的律令冊，即爲“什伍連坐”原則在無業者管理上的運用。“惡子爲不從作”、“盜符者，……任者皆爲不從作”的規定，正是“什伍相保、任者同罪”原則的具體體現。

文獻記載，漢初曾廢除“連坐”法律。《漢書·文帝紀》：“（元年十二月），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漢書·刑法志》：“（孝文二年），盡除收律、相坐法。”但是，“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連坐”法律又行恢復。《漢書·元帝紀》：“（初元五年），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應劭注：“舊時相保，一人有過，皆當坐之。”師古注：“特爲郎中以上除此令者，所以優之也。”《漢書·刑法志》：“及至孝武即位，……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師古注：“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並連坐也。”是“什伍連坐”原則又擴及至同級、同事或上下級之間。對於宋、元法制具有重大影響的《唐律疏議》，其中即有許多關於“伍保連坐”的規定。如《鬪訟律》規定，“即同伍保內，在家有犯，知而不糾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疏〉：議曰，‘即同伍保內’，謂依令‘伍家相保’之內，在家有犯，知死罪不糾，得徒一年；知流罪不糾，杖一百；知徒罪不糾，杖七十；犯百杖以下，保人不糾，無罪。”事實上，“什伍連坐”原則在我國封建法制史上，直至明、清仍然沿用。

積穀置倉，賑災濟貧，是我國遠古氏族社會的固有傳統，爲各代統治者所繼承，是穩定社會秩序、維持被統治者再生產的補充。《尚書·周書·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周禮·地官·司徒》：“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

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漢書·成帝紀》：“（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文穎注：“冗散也。散廩食使生活，不占著戶給役使之。”雲夢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倉律》，規定有置於城、鄉之禾倉。“入禾倉，萬石一積而比黎之爲戶。縣嗇夫若丞及倉、鄉相雜以印之，而遺倉嗇夫及離邑倉佐主稟者各一戶以氣（餼），自封印，皆輒出，餘之索而更爲發戶。”漢亦於城、鄉置倉廩，以濟貧弱鰥寡、備荒年。敦煌馬圈灣漢簡律令冊關於羸弱失業貧民，由倉廩賑濟供食的規定，即爲明證。而在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的律令中，規定賑災濟貧的內容，則顯示出封建法律欺騙性的一面。

注釋：

《里·督亭律》爲居延漢簡中的一枚殘簡，見《居延漢簡甲乙編》149.16（甲887），其上、下端和左側均已殘斷，是否爲律名，難以斷定。

敦煌新出簡牘輯錄

何雙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敦煌漢簡，前有斯坦因、夏鼐所獲，後有馬圈灣、酥油土所掘，此乃敦煌漢簡之大宗，並有著錄出版。本文所輯者，是 1979 年至 1989 年十年間，敦煌境內諸遺址調查採集所得，計 147 枚，出自 12 個不同的地點。這些簡牘大多數是敦煌市博物館榮恩奇、韓耀成等先生文物調查時採歸者，其中也有我採拾者，現存敦煌市博物館。1989 年七、八月間，我出差於敦煌，榮、韓二氏欣然邀我將這些簡予以整理，我即埋頭於該館地下室，對所出簡牘，加以編號、清理、記錄，做了統一釋文。後來，甘肅文物考古研究所編纂《敦煌漢簡》一書^①，收錄上述簡牘，接着《文物》1991 年 8 期上刊出了釋文^②，又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敦煌漢簡釋文》本^③。三者均收入了這批簡。讀後甚興，但可惜的是仍存在三個至為重要的問題：一是收錄不全，有遺漏，二是有些簡出土地點和時間錯亂，三是釋文欠妥。為此有必要弄清，故我以 1989 年底稿為基礎，重新修訂於此，以供學者參考。有關簡的照片，有些簡《敦煌漢簡》一書中有圖版，本文在每條後注出編號，便於查看，有些簡該書中無圖版，本文祇好僅存其釋文。現按出土時間和地點分述於下：

1. 鹽池灣烽燧遺址

共 8 枚，1979 年出土，皆殘斷，無一完整者，最長者 18.5 厘米，寬 1.2 厘米。紀年簡 1 枚。（每簡後編號，前為敦煌市博物館館藏號，後為《敦煌漢簡》一書編號，以下同此）釋文：

(1) 𠄎敦煌周𠄎𠄎 14--82、(1265)

(2)□五月乙 六月戊 七月庚 八月 14-83、(1264)

(3)□妻大女憲 14-86、(1263)

(4) 隧長記良當轉詣 14-87

(5) 粟輸謂倉以就品賦無欲爲者 14-88、(1262)

□丙丁丙

(6) 午子巳辰巳 14-90、(1267)

(7) 敦煌長史守福使屬尉錢 萬可 14-91A

(瓶)

隧長王良可 建始二年二月 14-91B

(8) 廣漢隧候史效穀得玉里衛利 14-130、(1261)

2. 後坑烽隧遺址

共 14 枚，1979 年出土，完整者 4 枚，簡長 23 厘米，寬 1 厘米，多草書、內容雜。釋文：

(1) 入粟小石二百五十石爲券八十三枚奇一石 十二月庚戌受敦煌倉長都車六輛 79DHC:84、(1227)

(2) 驚備檄已移今宜禾都尉復檄言虜守酒泉破胡隧檄到各驚備循行明教告吏卒謹迹望驚識 79DHC:92、(1248)

(3) 田廣十五長十久二 79DHC:93、(1250)

(4) 凡入外塞吏子大男十一人積五百六十二日 79DHC:94、(1249)

(5) 都尉 謂 79DHC:95A

令史 79DHC:95B

(6) 史解年故爲玉門護虜候 79DHC:97、(1228)

(7) 中乘塞燹隧史卒諷誦燹火品約具燹燹不知 79DHC:96、(1226)

(8) 拜 建爲定以十月五日到亭南部 79DHC:98、(1231)

(9) …… 79DHC:105、(1233)

(10) 大司
[] [] 79DHC:106, (1224)

(11) [] [] 以解後到府 [] [] [] [] 79DHC:107A, (1229A)

[] 郭掾 79DHC:107B, (1229B)

(12) [] 候史 [] 79DHC:108, (1221)

(13) [] [] 朔占白部復終一兩復 [] [] [] [] 復 [] [] [] ……
79DHC:109, (1232)

(14) [] [] 報司馬定 [] [] 79DHC:110, (1230)

按：第1簡中段文字“爲券八十三枚”一句，與正文字體相異，爲第二次書寫，可能是運輸糧食時出入庫的憑證編號。第2、3、4簡《敦煌漢簡》等皆列入小方盤南第一、二燧出土，有誤，該簡採自後坑遺址。當訂正。

3. 馬圈灣烽燧遺址

共3枚，1979年出土。皆爲牘，完整者1枚，長23厘米，寬1.9厘米。紀年簡1枚。採自該烽燧未發掘之前。釋文：

(1) 五鳳四年二月壬寅朔戊申萬年隧長 [] 敢…… []

二百五十步敢言之 79D14-77, (1238)

(2) 告士吏帶裝詣官會丁卯旦迎轉毋以它爲解 []

79D14-78, (1237)

(3) 十二月甲辰官告千秋隧長記到轉車過車

令載十束葦爲刺有教

79D14-79A, (1236A)

千秋隧長故行 79D14-79B (1236B)

4. 小方盤城南第一烽燧

共5枚，1987年出土，皆殘斷，多草書，很可能是新莽時期的簡。釋文：

(1) 吏逆尉如 [] 對逢戊子 [] [] 87D 小方盤南燧:1, (1246)

(2) [] [] 求恐叩頭 [] 87D 小方盤南燧:2, (1245)

(3) 調柁用因奉 [] 87D 小方盤南燧:3, (1243)

(4) 𠂔付吏卒□𠂔 87D 小方盤南燧:4,(1247)

(5) 𠂔五月三日盡𠂔 87D 小方盤南燧:5A,(1244A)

時君到龍勒□𠂔 87D 小方盤南燧:5B,(1244B)

5. 小方盤城(玉門關)外

共 2 枚,1987 年出土,皆殘斷,採自城外南牆灰區。

(1) 𠂔八月戊申入關 87D 小方盤:1(1240)

(2) 主簿審白發箭 87D 小方盤:2(1239)

6. 臭墩子烽燧遺址

共 2 枚,皆完整,1987 年出土。簡長 23.2 厘米,寬 1.2 厘米,爲文書,一爲郵書,釋文:

(1) 本始元年六月辛卯朔戊辰當武長山敢言 87D 臭墩子:1(1241)

(2) 東書一封墩德……詣府九月戊子日中時當遮卒過受臨御卒願之 87D 臭墩子:2(1242)

7. 蘆草井烽燧遺址

共 8 枚,1987 年出土。有簡、觚、簃。觚尚完整,長 24 厘米,寬 1.6 厘米。這些簡,《敦煌漢簡》列入小方盤城南第二烽燧,但實出自蘆草井。釋文:

八月乙巳敦煌玉門都尉宮謂玉門候官寫移書到如太守府

(1) 書律令 / 掾恩屬漢昌 87D 蘆草井:1(1254)

(2) 右吏一人 十一月丁卯不食 87D 蘆草井:2(1252)

(3) 右亭兵 87D 蘆草井:3(1253)

(4) 𠂔□□里孟成□□壁□塞所□□□𠂔 87D 蘆草井:4(1259)

(5) 步偷隧六石具弩一完 87D 蘆草井:5(1256)

(6) 惡其發□□ 87D 蘆草井:6(1255)

(7) 卒四人隧宜矢𠂔 87D 蘆草井:7A(1257A)

□□隧長蘇千~□□留□□ 87D 蘆草井:7B(1257B)

(8) 𠂔二年七月癸亥𠂔 87D 蘆草井:8(1258)

8. 小月牙湖東墩烽燧

共 19 枚，1987 年出土。有簡、牘、觚、簽。完整者 7 枚，紀年簡 2 枚。完整簡長 23 厘米，寬 1 厘米。完整簽長 9.8 厘米。寬 2.1 厘米。釋文：

- 步廣候官破虜隧戍卒宋外
(1) ● 承弦二(簽) 87D 小月牙:1(1272)
(2) 𠄎積薪火不西通謁 87D 小月牙:2(1276)
(3) 永平六年 步廣候 𠄎 87D 小月牙:3A(1281A)
吏 田胡許 87D 小月牙:3B(1281B)
(4) 益光里王過 付亭長 87D 小月牙:4(1273)
(5) 破虜隧賈接效穀西鄉高議里賈接主 87D 小月牙:5A
(1271A)
效穀西鄉高議里賈破虜隧長接 87D 小月牙:5B
(1271B)
(6) 𠄎 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 87D 小月牙:6(1277)
(7) 𠄎 廣袤一尺厚一寸以墨 𠄎 其四故名小日中 𠄎 大書以
爲五 87D 小月牙:7(1285)
(8) 𠄎 壽貴里吾可·西鄉句里桓安國 87D 小月牙:8(1283)
(9) 府移檄告胡領主循行見騎教告士馬毋得擅出 87D 小月
牙:9(1275)
(10) 𠄎 東西盡界毋弩人馬越塞天田出入者
87D 小月牙:10(1279)
(11) 𠄎 表通 爲 表通 87D 小月牙:11(1282)
(12) 人上沓弩 𠄎 人輶教單于及解 𠄎 上 𠄎 87D 小月
牙:12(1289)
(13) 臣甚幸十煎樂謁事 87D 小月牙:13(1274)
(14) 元始四年十月乙卯朔壬戌
牒書從事致官亟遣之官謂 𠄎 87D 小月牙:14(1284)
(15) 𠄎 品三車札三 𠄎 兩五十耶 𠄎 賦卷 𠄎 𠄎 𠄎 87D 小月

牙:15A(1278A)(觚)

𠄎忽如律令 87D 小月牙:15B(1278B)(觚)

𠄎□□□受召董事毋忽如律𠄎 87D 小月牙:15C
(1278)(觚)

𠄎檄書□𠄎 87D 小月牙:15D(1278) (觚)

(16)𠄎不□□何必破 87D 小月牙:16

平□□□□□守御器簿

(17)●□ 87D 小月牙:17(1286)

(18)𠄎候簿 87D 小月牙:18(1288)

(19)𠄎□所受粟以二月□侯卒多 87D 小月牙:19A

𠄎□辰表一通□□ 87D 小月牙:19B

9. 後坑墩烽燧遺址

共 3 枚,1988 年出土,皆殘斷。有簡、觚、牘。釋文:

郡倉元年六月轉二兩
(1)人 麥小石七十五石 居攝元年八月己未步昌侯長黨隧長
尚受就人龍勒萬年里𠄎 88D 後坑:1(1234)

(2)𠄎□□取火將出入其官移致裝十二月移墩𠄎(觚)88 後坑:

2A

𠄎□□□□□移檄□□□□□……𠄎(觚)B

𠄎□□使隧報□□□將□□□循行……𠄎(觚)C

其一護羌……

(3)出西合檄四一廣倉田謂…… 𠄎

一金城守丞印…… 88D 後坑:3

按:第 3 簡,《敦煌漢簡》列入懸泉出土,有誤,當採自後坑墩烽燧。

10. 人頭疙瘩遺址

共 10 枚,1988 年出土,其中 4 枚是一冊完整的書信,皆草書,簡長 23 厘米,寬 1 厘米。同出王莽紀年簡 1 枚,故這批簡是王莽時期的遺文。釋文:

(1)隧長淵泉宜年里五士孔詡年二十三 田卒利寥亭部安君豆

始建國天鳳上戊三年八月庚戌除 88DYTGC:1

(2)安樂侯長諸鳳 具鞶馬詣府 88DYTGC:2

(3)弟子王習詣霍師門下叩＝頭＝敢多問光日相見甚厚起毋恙
煩勞毋也叩＝頭＝88DYTGC:3A

且清郭隊長爲禮數什所幸勿恙哀小姓之不足存也 88DYTGC:
3B

(4)弟子王習詣刑師門下叩＝頭＝秉問弟子何已守職習不上名
何用封今迫事急 88DYTGC:4A

且怒力憂當見將軍可不思念也且勿忽來往如此矣
88DYTGC:4B

(5)弟子王習詣吳師門下叩＝頭＝煩勞遠苦問之甚厚意大佳元
小疾未平復叩＝頭＝出謁 88DYTGC:5A

告弟子皆如前甚毋失期有者坐之交故兩師循行互處之
88DYTGC:5B

(6)匚習叩頭言孝孫前欲言門下詣掾所言重恐不宜耳叩＝頭＝
白出 88DYTGC:6A

匚宏叩頭多請巨先起居得毋有叩頭迫不白相見 88DYTGC:6B

(7)匚錢八百破胡令史趙子惠所數責不可得 88DYTGC:7

(8)匚□□鄒卒肥充四月食匚 88DYTGC:8

(9)匚……塞具匚 88DYTGC:9A

匚……□今□匚 88DYTGC:9B

(10)匚書一封 回 88DYTGC:10
各致書叩頭

11. 條湖坡烽燧遺址

共4枚,1988年出土。皆殘斷,釋文:

(1)匚利漢隧長某候卒匚 88D 條湖坡:1

……尉……

(2)匚□□□曹卿來平望□使循 88D 條湖坡:2

(3)匚□道里簿 88D 條湖坡:3

(4)匚□壽 88D 條湖坡:4

12. 懸泉置遺址

共 69 枚。該遺址 1987 年首次發現，1990 年始正式發掘。未發掘前的一年中，我們每次到敦煌必去懸泉，因而陸續採拾 69 簡。這些簡大多數採集於置外西邊灰區，位當 1990 年第一次發掘區內西側。種類有簡、牘、觚、封檢、籤。完整者 11 枚，紀年簡 11 枚，均為西漢簡，年號有宣帝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和元帝初元、成帝河平、永始。內容有抄錄的詔書、官文書、爰書及各種簿籍等，字體草隸相間。保存較好。釋文：

效穀懸泉置嗇夫光以亭行[] 87DXC:1(1290)

出西書三封置記二 二封詣府 一封冥安長印 十二月
一封酒泉太守章 一封毋印章詣敦煌

癸酉大農付樂至卒印[] 87DXC:2(1291)

元康三年正月己丑朔庚戌效穀承 敢言之謹移

糴糴簿 一編敢言之 87DXC:3A(1292A)

/嗇夫賀 87DXC:3B(1292B)

君候喪當東方警……[] 87DXC:4A(1293A)

白將宜和辟……[] 87DXC:4B(1293B)

永始四年五月癸卯朔癸丑

佐昌謹與御王忠禱診[] (觚) 87DXC:5(1294)

元康三年九月辛卯朔癸巳懸泉置嗇夫弘敢言之謹

移鐵器簿 一編敢言之 87DXC:6A(1295A)

佐禹·長富 87DXC:6B(1295B)

河東郡新成當利里乾克 字子游 神爵五年正月壬戌過東[]
87DXC:7A(1296A)

章曰新成之印 87DXC:7B(1296B)

●懸泉……87DXC:8(1297)

馬以節若使用傳信及將兵吏畔言[] [] 以驚聞獻[] 寫駕者四將以
美以除候其以教令及……[]

孝武皇帝元鼎六年九月辛巳下凡六百一十一字

庇令 87DXC:9(1298)

轉卒東郡武陰東里宮賦 甘露二年七月己卯病死 87DXC:10
(1299)

尚書臣昧死以聞

制 曰可賜校尉錢人五萬校尉丞司馬千人候人三萬校尉史司馬
候丞人二萬古佐令史人萬 87DXC:11(1300)

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乙丑懸泉廐佐廣德敢言之爰書廐御千乘
里畸利謹告曰所使食傳馬一匹驢牡左剽入坐肥齒二歲高三尺一寸□
頭□柱送日逐王乘至冥安病死即與

御張乃始✓冷定祿診馬死身完毋兵刃木索迹病死審證之它如爰
書敢言之 (觚)87DXC:12(1301)

□□懸泉甘井里 87DXC:13(1302)

□二匹皆驂 87DXC:14(1303)

□尉候千人令史王時 五鳳二年九月庚辰朔壬辰敦

□誠 煌太守常樂丞賢謂敦煌□□

爲駕丞書從事如律令 87DXC:15A(1304)

□/□□宮 87DXC:15B

極知天寒刺史且來不敢解須臾久居石上舉露水處非所樂誠
87DXC:16(1305)

戊卒穎川鄆萬年里記固 87DXC:17(1306)

□丈人□ 87DXC:18(1307)

白梁稷米六斗□ 87DXC:19(1308)

漆式三木式二見 鐵式見二 87DXC:20(1309)
其一馬興失亡

錐一□ 87DXC:21(1310)

●右七百里定十八□詣.....□ 87DXC:22(1311)

●懸泉置五鳳三年九月穀出入簿 87DXC:23(1312)

..... □□□□□□□行承事謂縣令曰

.....不傳□□□□□ 案計一匹爲載就縣官畜產案計以來

87DXC;24(1313)

河平四年二月甲
爲郡徙卒敦煌

☐

87DXC;25(1314)

☐……右大將夫人使者竈五用帛☐ 87DXC;26(1315)

☐治而絕經自城北何道未

☐

☐☐☐☐☐府☐☐邊塞☐ 87DXC;27(1316)

持至遮=要=主趣具徒淳于☐☐ 87DXC;28(1317)

來欲案報書之☐ 87DXC;29A(1318A)

屬☐☐…… 87DXC;29B(1318B)

十月己巳朔☐☐少府丞[]☐爲懸泉置☐……言☐☐

☐☐……

☐書…… 如律令/令史更生

87DXC;30A(1319A)

/令史 87DXC;30B(1319B)

☐石九斗☐ 88DXC;31(1320)

☐十石樂寅昌☐ 88DXC;32(1321)

☐……杵~~~~~八月己丑日蚤食時樣相郵人青辟付赤上人語

88DXC;33A(1322)

☐……十月丙子 88DXC;33B(1322B)

十月餘銑一畝 88DXC;34(1323)

●☐甲乙 卯寅 ☐[]☐星 88DXC;35A(1349A)

☐ 共 共 共 ☐ 88DXC;35B(1349B)

●元年毋☐襦☐已糲☐ 88DXC;36

箭 88DXC;37(1326)

☐……長金城…… 88DXC;38A

☐廿 88DXC;38B

大月=屬禹丁良西送大月氏副使者 88DXC;39(1328)

尊市・幸爲尊叩頭頃鄧長史諸置人夫子

王尊記詣董子文所
記上徙=郡……
子=文=子當居平望驛子文使爲御遂遣其
子使□□……

88DXC:40A(1329A)

事等也獨爲此可不記到遂遣來已言謹言不來狀軍書重事□……
使再拜奉董卿 88DXC:40B(1329B)

八月……廿五人
四人病
九人□□人…… 88DXC:41(1330)

酒泉太守章□ 88DXC:42A(1331A)
遣施刑士廿人敦煌庫□□ 88DXC:42B(1331B)

□□歲尉范□單衣□□□□ 88DXC:43A(1332A)

□□□□□□□
□置□□□者□ 88DXC:43B(1332B)

□□鳳□成光行□ 88DXC:44(1333)

□蒼 蒼蒼蒼蒼 伏伏伏地 言君足

頃成也母文 88DXC:45A

(1334A)

□蒼父人 父 88DXC:45B(1334B)

□齒齒數(以下爲圖畫) 88DXC:46(1335)

□二石七斗朝食 出糜二石□ 88DXC:47(1336)

□……禹收責□ 88DXC:48(1337)

□……王瓊□ 88DXC:49(1338)

□□隧衆蚩矢百 88DXC:50(1339)

土吏出計 九萬□□……89DXC:51(1340)

……計字意

遣烏孫曰至使者奉始元……

行在所以令爲…… 89DXC:52A(1341A)

□□如律令轡子 89DXC:52B(1341B)

十月輸□□ □□…… 89DXC:53(1342)

匣合檄一太守章詣冥安十二月戊子日下舖受…… 89DXC:
54(1343)

匣野塗除□塗□□除□匣 89DXC:55(1344)

匣伏地再拜請尹門承足下匣 89DXC:56(1345)

匣乾青…… 89DXC:57(1346)

生……已記到 89DXC:58(1347)

匣……敦煌錢 神爵二年五月庚申司空□千人畸受庫佐充
89DXC:59(1348)

二月餘官靳干^{其十完}……匣 89DXC:60(1350)
三□□

匣□五月八百八十七石五斗匣 89DXC:61A(1324A)

匣□八千位當入檄小石七千廿石匣 89DXC:61B(1324B)

……以以以 (習字) 89DXC:62(1351)

十月餘□□千二□匣 89DXC:63(1352)

匣□謂□匣 89DXC:64

匣兩 匣 89DXC:65

受四月餘扁十四^{其九幣} 89DXC:66
五完

匣者如律令 89DXC:67

□孫忠詣常門下

□□□請□長孫□子寅 □ 89DXC:68

初元二年三月辛巳懸泉置丞敢言之辛卯 89DXC:69

以上 12 個地點所獲百餘枚簡牘，雖然數量少，地點分散，殘斷者多，但是其中不乏新資料，對我們研究和認識過去一些疑難問題和提出新的問題有重要意義。

一、關於諸地點的性質問題

斷定簡牘文書出土的性質、身份，至關重要，也是簡牘研究的課題之一。過去我們在認定遺址名稱和性質時，往往偏重於以簡文中普遍出現的某一名稱來確定，現在看來此一做法多有偏見，甚至不

準，而應是考察簡文的性質、級別、滯留原因，從中找出簡文與出土地的關係，在此基礎上再定其性質、名稱，這樣更可靠些。現就上述部份地點淺論如下。

鹽池灣遺址，所出 8 枚簡中，名籍類 4 枚，曆書 2 枚，令品 1 枚，隧文書 1 枚。名籍是隧的基層檔案，所以有可靠性，故該遺址應是廣漢隧。

馬圈灣遺址，出簡數量較多，其中除詔書、律令外，官文書是比較重者，考其性質、有都尉府、候官下發文書，也有較多的諸隧上報文書，上下二級文書具存，由此看來，該遺址非候官、也非烽燧，推測當是候官下屬部候的駐所。（此題今後還有專論）

後坑遺址，出土 13 枚簡中，除官文書較多外，烽火、爰書也佔一定比例。考察其性質，級別不同於一般烽燧，故當是候官級的所在地。

小方盤城，是學術界長期研究至今未下定論的課題，或曰是玉門關，或曰是玉門候官。但考察其以往簡文，其文書級別是較高的。另 87 年所採 2 枚簡，對認定其遺址很有幫助，即“主簿審白發箒”、“八月戊申入關”。從這 2 條簡文看，該遺址既非玉門關，也非玉門候官，當應是玉門都尉府的所在地。（此題有專論）

蘆草井遺址。出簡 8 枚。有兵簿、食簿、兵器箒及都尉府下發的文書。如“玉門都尉宮謂玉門候官寫移書到如太守府書律令”，背面簽名“掾恩、屬漢昌”。這是一份由玉門都尉轉發太守府文書與玉門候官的官文書，簽發人是都尉府的掾、屬。接收單位是玉門候官。出土於蘆草井，可證該遺址應是官文書到達地——玉門候官的駐所。

小月牙湖東墩遺址。出簡 19 枚，有詔書、名籍、官文書、日迹簿、兵和守衙器簿、候簿等，這些文書級別均較高，如第 9、10、14、17、18 等簡，非烽燧存檔文書，故以簡文所見名稱，當是步廣候官駐所。

人頭疙瘩遺址，出簡 10 枚，除 2 枚候長詣府、鄣卒食簿外，有 4 枚三份書信，且為重要，寫信者自稱弟子王習，收信者為三位有地位之人。收信者閱後及留存。以此看來，該遺址應是候官駐地。

二、新史料箋證

這些零散的簡牘之內容，大部份是過去敦煌、居延簡中常見者，目睹相熟。其中有一些新的史料，可引以為重，為今後研究提供線索。大略有以下諸事：

1. 懸泉置 87DXC:9(1298)簡抄錄武帝元鼎六年所下關於驛置的詔令。這是所有邊塞出土詔書中有明確紀年、時代最早的詔書，也是以前曾未見到者。可謂至新。

2. 鹽池灣(1262)14—88簡，關於運輸“就品”一詞。過去常見有關運輸顧就的實錄。但未曾見過也不知有何規定，從該簡可知，有“就品”存在。這是今後研究簡牘時應注意的問題。

3. 後坑 79DHC:94(1249)及馬圈灣簡中，有關“外塞吏子”“外塞吏子葆”的資料，甚新鮮。外塞吏是何等人？子、葆又是何性質？這都是需深入研究的課題。

4. 人頭疙瘩第5簡書信中提到“故兩師”的問題，是否為李廣利之貳師，李廣利伐大宛屯駐玉門關，其後兩師是否常駐敦煌？與後來駐軍有何關係？

5. 條湖坡第3簡“道里簿”，是一個新名詞，居延、懸泉簡中有所謂的“里程簡”，觀此簡，其正名應為“道里簿”。

6. 懸泉 87DXC:12(1301)簡。“爰書”，是邊塞同類簡中所見最完整者，對編綴居延、敦煌簡中相類者有重要意義。此類文書，雲夢秦律·封診式中有例文，該簡所書格式與封診式甚吻合，可見其繼承關係。

7. 懸泉 88DXC:39(1328)和 89DXC:52(1341)2簡關於大月氏副使和烏孫使者的文字，是研究當時漢與烏孫、大月氏關係的新資料。

8. 懸泉簡中記載該置的官吏有置嗇夫、置丞、置長、廄嗇夫、廚嗇夫等，對研究置的行政建制和級別至為重要。

9. 懸泉 87DXC:13(1302)簡是一份名籍殘冊，文曰“懸泉甘井里”。很重要，按這種文書的慣例，完整行文是郡、縣、鄉、里。如若注册者屬本郡人，即省去郡名，是本縣者，省去縣名。但鄉、里二級始終

保留。懸泉屬敦煌郡效穀縣，故該簡省去縣名，留其鄉里名。那麼僅此一簡，說明懸泉該地，不僅是驛置名，而且也是鄉名，效穀縣下曾設有懸泉鄉，懸泉置設立於懸泉鄉的屬地。關於懸泉鄉，漢代的建置歷史是不清楚的，敦煌唐代文書中有大量唐代該鄉的史料。孰不知懸泉鄉在西漢早已有其建制。如若沒有該簡的出土，其鄉將永遠是被遺忘的角落。

10. 上述百餘簡中每每有關於郡、縣、鄉、里的各種名籍和文書。其中許多是新的地名，為編纂鄉里志增添了不少新材料。

零簡斷牘，釋者有所悟，醜陋於此，同行者正筆。

注釋

①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 中華書局 1991 年

②敦煌市博物館《敦煌漢代烽燧遺址調查所獲簡牘釋文》《文物》1991 年 8 期 36 頁至 40 頁

③吳初驥 李永良 馬建華《敦煌漢簡釋文》126—140 頁 甘肅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西北新近發現的漢代行政文書

魯惟一(英國劍橋大學)著

孫 曉 卜憲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

1960 年以前,漢代的木簡和竹簡文書主要限於 1900 和 1915 年斯坦因和 1930 至 1931 年中國和瑞典聯合探險隊的發現。在敦煌附近累計發現約 1000 餘枚,在沿居延邊防綫各遺址中發現約 10000 枚左右。這些發現引起了中國、日本和西方學者的極大興趣。他們的工作結果使得圖版和釋文得以刊佈,並且對簡文中所描述的一些民事和軍事的特定內容進行了研究。黃文弼在羅布淖爾的發現對這些材料作了少量的補充,他對此也進行了研究。引人注目的大量補充是 1959 年在甘肅省武威縣磨嘴子墓中發現的 500 枚簡。這是第一次發現如此完整的文字材料(包括《儀禮》和日忌、雜占斷簡;公元前 31 年一道關於對年長者予以優待的詔書和一個辱老判決例)。文書被及時出版(《武威漢簡》,甘肅省博物館和中國科學院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 年)。

近年來的新發現使情況有了顯著的變化,許多新發現是在漢帝國的內郡。這些新發現包括文學、歷史、法律和科技方面。根據初步的報告,已寫出一些專著和論文。但所期望的釋文和圖版全集在近年還不可能出版。新近發現的文書目錄已刊登在《通報》TP63:2-3 (1977),99-136 和《文物》1978 年第 1 期第 1-44 頁上。

此外,自 1972 年以來,在西北的一些地區還有較多的重要發現。這些文書既牽涉到漢帝國的一般行政,也牽涉到防禦綫上駐軍哨所的情況和問題。這些遺址的一部份與以前的調查相一致或相似。這

些新發現也大大提高了先前所發現的文書的價值(下面提到的舊材料)。下面這篇文章試圖對西北所發現的材料作一概述,以及中國學者在這些問題上的研究成果(截止 1984 年底)。這篇綜述材料選自於一些期刊;如《文物》和《考古》,也包括甘肅文物工作隊和一些學者近來出版的論文集,如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和甘肅省博物館編的《漢簡研究文集》(以下簡稱《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 年;英文版預計在 1986 年 3 月出版。

這些發現源於居延(1972 年,1973—74 年和 1976 年)和敦煌(1979 年)遺址的一系列發掘。更進一步的發現是在磨嘴子(1981 年)和在青海省的一個墓中(1973 年)獲得的。對居延遺址作了一次全面的調查,並進行了局部的、有選擇性的發掘,以便確定居延都尉所轄軍隊的部署及範圍。在貝格曼 1930 年所劃定遺址的基礎上,調查隊又作了進一步的擴展,並用分佈圖和圖片成功地對防綫作了更清楚和詳細的描述(《文集》62 頁,分佈圖在 63 頁,圖版在卷首)。

敦煌附近的發掘集中在 71 座烽隧遺址上,包括對馬圈灣的嚴格科學發掘。迄今為止發掘還限於初步的報告。現在定為 D21 的遺址斯坦因未曾調查過(《文物》1981 年第 10 期,1—7 頁;《文集》499 頁未附插圖)。報告描繪了駐地建築遺址和一次大火遺留的活動痕迹。馬圈灣接近斯坦因調查的 T12a 和 T11 號遺址,現在這兩處遺址被重新標為 D22 和 D20。很明顯這個遺址的活動高潮是在宣帝時(前 74—前 49 年),王莽時期衰落。公元 20 至 22 年被廢棄。這一遺址中發現的 1217 枚簡大部份為木簡,也有一些竹簡。所提及的紀年從漢宣帝時期到公元 21 年。其中一半以上是平帝時代的(前 1—公元 6 年)。一些簡可以被復原成同一冊書。

從青海大通上孫家寨 175 座漢墓中發現了 400 枚簡(《文物》1981 年第 2 期,16 頁);主要在 115 號墓中發現。簡位於兩具男女棺木之間。隨葬品包括一枚刻有“馬良私印”的青銅印章和武帝到宣帝時期的貨幣,沒有王莽時期的貨幣發現,墓葬被認為屬於西漢晚期。

1976 年對居延邊塞的三個月調查,確定了 82 座城障烽隧遺址,

可分甲渠、卅井、北部地區、黑城及以北四處(《文集》64—84頁)。因此對居延都尉管轄範圍的情況比以前瞭解更多。許多遺址被認為可能是軍事首腦機關。我們現在可得到更多的關於城障烽隊佈局、建築規模和結構的情況。目前注意力專門集中在破城子(EP),甲渠塞第四隊(EPS4)和肩水金關(EJ)三個遺址上。

EP 遺址已被確定為破城子,即甲渠候官的治所(平面圖見《文物》1978年第1期,14頁圖1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407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這一要塞可區別出不少於37個房間或隔離間,出土文物881件,包括武器、輓轡、貨幣和農具,以及一些裝備,這些裝備名詞可在《漢書》或別的地方看到,但還不能被全部理解。這個遺址的發掘報告最早刊登在《文物》1978年第1期第1頁上(包括EPS4和EJ),《文集》(476頁)重新刊登時作了個別修改,但沒用圖片;分佈圖和遺址圖原版比再版更清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展》中公佈了這一要塞的復原圖,它於1979年3月20日至5月13日在東京展出。

根據在不同遺址發現的文書上所記載的紀年,使在編年史的基礎上區分遺址的不同年代成為可能。這些簡已有6865枚被編號,尚未編號的近千枚。約40冊完整或基本完整的文書,年代從公元14年到25年。從所獲證據可以推論這些候官的設置不會晚於武帝晚年,活動最頻繁的是昭、宣時期;公元32年以後的活動極少記載。據記載有一次勞力使用總計達44000人次,這可能是勞動日的累積數。

以前被定為P1,現被定為EPS4的遺址已被證實為甲渠第四隊烽臺。這兒發現的195枚簡中包括許多重要文書,時間從公元前84年到公元25年(平面圖見《文物》1978年第1期第4頁,圖5;《文集》482頁圖12)。

第三個遺址(EJ)被確定為金關烽隊。它是北面居延都尉的咽喉門戶,拱衛着南面不遠的肩水都尉府和肩水候官,並且也是渠屯、肩水金關二塞的分界綫。此遺址以前被定為A32,1930—31年的探險隊曾發掘過,並出土850枚簡。新近開探方37個,獲簡11577餘枚,

尚有 1426 枚未編號。遺址還出土 1311 件實物，如貨幣、積薪、農具、陶器、木器或漆器、網狀絲織物和食物，金關的活動從武帝中期開始，王莽末年出現重大衰落。

馬圈灣發現的部份簡關係到玉門關的出入，這些簡說明這一重要邊關不在以前所認為的地點（《文物》1981 年第 10 期，圖版Ⅰ，1、2、9，圖版Ⅲ，1、2）。它位於主要交通道路上，稍離防綫，接近於馬圈灣（見《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平面圖（CXI11））。另一些簡說明馬圈灣是玉門關候的治所（《文物》1981 年第 10 期，圖版Ⅰ，6、7，圖版Ⅲ，3、8、9）。關於玉門關與玉門關候在《文物》1981 年第 10 期上有詳細討論（9—13 頁）。根據一些簡也能獲得各種邊塞的地點及部署和他們所轄範圍的情況（《文物》1981 年第 10 期，圖版Ⅲ，7）。

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帝國內郡的亭，較少涉及邊亭。徐樂堯的文章（《文集》298—334 頁）借助 251 枚簡以及一些新簡材料，區別出邊塞不同種類和性質的亭。大量材料反映了亭由北向南沿居延邊塞建立。有時可以根據他們的單個名稱或一系列名稱而確定分類。一些泛指的亭，如“郵亭”、“隊亭”、“市亭”等，反映他們與烽火、郵驛、市場有關。“隊亭”是居延邊塞候望系統的亭。“郵亭”是居延邊塞郵驛系統的亭，主要滿足互不相連的一些軍事單位的通訊需要。“農亭”是居延邊塞屯田系統的亭，包括“農卒”和他們家屬的住所。從“農都尉”以下一些官職可以追溯駐軍屯田的複雜系統。另一些亭牽涉到民事而非軍事方面的行政管理，如官員巡視的膳宿供應、市場管理、城門守護等。“隊亭”兼有治安之職，包括對逃犯的追捕。居延發現的材料證實了關於亭是與地方日常行政管理的鄉、里有區分的另一系統的看法。

遺址中發現的實物部份可用來辨識他們所發現的地點，部份可與新簡材料相印證。因而簡上有許多參考材料，特別是關於“轉射”和他們的功能（《文集》190 頁）。現在可以確認“轉射”是一木製框架，經測量長寬為 40×40 公分，中心豎裝一有軸圓柱狀木，可轉動角度 110°；柱中豎鑿一斜下式長方孔，孔下安一小木棍，可使中軸左右轉

動，覆蓋面很寬。這個裝置可用來調節弓矢，使他們最大限度的發揮效力。同時這個裝置也可用作觀察，祇須轉動中柱，打開斜下的射孔。“轉射”很顯然被固定在牆上，每隔 5 米一個。在一個可容一個隊或候官的塙壁內，每面牆上裝有 5 個或更多的“轉射”，《絲綢之路》67 號有彩圖解釋（《文物》1978 年第 1 期，3 頁，圖 4）。甲渠候官的復原圖說明了這一裝置如何被安裝在牆上（《絲綢之路》135 頁）。遺址平面圖用在要塞外發現的實物展示了他們被安裝的地點（《文物》1978 年第 1 期，14 頁，平面圖 14；《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407 頁）。

從同一平面圖可看到被做成尖木樁的“虎落”被一排排地掩藏在要塞周圍，作為障礙物（《文物》1978 年第 1 期，26 頁）。“深目”的確切功能可能是視孔，在一些文書中常提到。一些遺址中還發現了用作信號的苜（EPS4:047,48；《文物》1978 年第 1 期，17 頁，圖 27；《絲綢之路》68 號）。

金關遺址發現了兩片麻紙樣品（《文物》1978 年第 1 期，6 頁；《文集》488 頁）。其中一件長寬 21×19 公分（EJT1:011），同一出處簡的最晚紀年是公元前 52 年。另一件長寬 11.5×9 公分（EJT30:03），發現於平帝時代的地層中。另一些麻紙發現於馬圈灣遺址中（T12:047, T10:06, T9:026, T9:025, T12:018），同出的紀年簡在公元前 65 至公元前 50 年之間。馬圈灣出土實物 337 件（《文物》1981 年第 10 期，3 頁；《文集》505 頁）。同一遺址還出土苜 7 件，筆 1 支，石硯 1 件，絲織殘片 123 件，毛織殘片 12 件。

遺址中所發現的實物大都是日常生活用品，為低級士吏使用破損後拋棄。所發現的兩塊木板畫顯然不是日常用品（《文物》1978 年第 1 期，6 頁；《文集》488 頁）。其中之一長寬 25×20 公分（EJT28:01；《文物》1978 年第 1 期，圖版Ⅲ，1），上繪有一匹拴着的馬和一個人，時間約屬於昭宣時期；另一塊長寬 9×6.6 公分（EPT51:06）；《文物》1978 年第 1 期，圖版Ⅲ，2），上用墨綫勾出一隻帶翼的虎，約繪於王莽時代或稍後。金關遺址的一枚簡記載了一幅畫的內容（EJ:601），與第一塊板畫相吻合。

從金關遺址發現了一件特別引人注意的實物，同類實物尚未在別處發現，這是一件長方形的紅色織物，長寬 21×16 公分，上寫有“張掖都尉榮信”(EJT21:01;《文物》1978 年第 1 期, 6 頁, 圖版 1;《文集》487 頁;《絲綢之路》64)。它被認為是進行官方事務所需要的證書和通行關禁所需要的證件。李學勤認為,“榮”的詞意含混主要是因為唐宋以後的學者沒見到過實物。我們必須把榮信和刻木而成的榮區分開來。榮的特點是作為一面幡,其上的字是官方權力的標識,用以表明可以通行關禁。李學勤還引用了漢代和其後榮用於這一目的的實例(《文物》1978 年第 1 期, 42—43 頁)。

除了對新材料的研究外,下面還可看到對於舊材料也做了相當多的工作。單卷本的《居延漢簡甲編》1959 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包括了在居延不同遺址中發現的 2555+41 枚簡的圖版和釋文。1980 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居延漢簡甲乙編》上、下冊,這部書採用了《甲編》不太清楚的 189 幅圖版,又從勞幹的集子裏採用了 293 版。在《甲乙編》裏,簡及斷簡的秩序是依照原發現地區的編號。這些編號根據某一時期劃分為兩部分。指定簡組編號的第一步是依照他們的發現地區,共 586 組;第二步是給每組簡中的每支簡編號。1930—31 年居延探險隊所獲簡的釋文現已首次按順序編定刊佈。因此現在纔有可能通盤考慮在同一地點、同一情況下所發掘的簡和斷簡的釋文。《甲乙編》附錄提供了識別每組編號和其所發掘的遺址之間的關係;更進一步的編目是用圖版照片顯示原簡及斷簡的編號。

另外中國有計劃將日文和西語學者對舊簡的研究論文譯成中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已選編了森鹿三、永田英正、藤枝晃、大庭脩、尾形勇的文章,這部書被命名為《簡牘研究譯叢》第一輯。書中最有價值之一的是大庭脩的《中國出土簡牘研究文獻目錄》,牽涉到戰國以前的所有出土簡牘文獻(這篇文章首先刊在 1979 年 3 月的《關西大學文學論集》28:4)。這篇文章還被摘錄重印在:(a)森鹿三的《東洋學研究·居延漢簡篇》(《東洋史研究叢刊》之二十三之二,同朋舍,1975 年);和(b)大庭脩的《秦漢法制史研究》東

京創文社，1982 年）。

斯坦因發現後由沙畹和王國維分別出版（1913 年和 1914—16 年）的第一組 700 枚簡引起中外學者的極大關注，推進了對敦煌舊文書的研究，賀昌群、伏見冲敬、勞榦等人都作了嘗試。新近的發現使補正舊釋文成為可能，何雙全在《文集》的一篇短文中（464—475 頁），依照勞榦和沙畹所編文書為底本，以王國維的本子為參考，對 50 枚簡作了更進一步的更正和評論；但斯坦因第三次敦煌探險所獲的 116 枚簡（後由馬伯樂在斯坦因死後出版），何雙全沒有參考。

新近發現的文書目錄概述如下：

簡及斷簡數目

1) 居延

EP(甲渠候官)	編號 6865 枚	包括 F22 的 40 冊
	未編號 1000 枚	
EPS4(甲渠第 4 隧)	195 枚	
EJ(金關)	11577 枚	含未編號的 1426 枚
總數	19637 枚	編號 17211 枚, 70 冊近於完整

2) 敦煌

D21 馬圈灣(玉門) 1217 枚

3) 青海上孫家寨 115 號墓 400 枚

4) 少量發現如下：

酥油土	70 枚
花海	100 枚左右
磨嘴子	27 枚
甘谷	23 枚

居延遺址 19637 枚簡大部份是木簡，也有一些竹簡。如在早期看到的一樣，木頭被削成各種形狀和大小用於不同目的。《文物》1978 年第 1 期圖版 IV 用他們的專門名詞陳列了這些簡的大部份類型。《絲

綢之路》63 還出示了一類被專門用作“檄”的簡。70 冊幾乎完整的簡照原樣用細繩綁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細繩被染成紅色，當屬王莽時代（《文物》1978 年第 1 期，27 頁）。黎泉主要在舊材料的基礎上，探討了書體的發展歷程（《文集》399—417 頁）

很明顯，對新材料的大量整理和編號工作已完成，但僅有少部份照片和釋文出版。下列短文將首先考慮發現在居延、馬圈灣和上孫家寨的簡的詳情，對西北所發現的漢代以後的材料也作一簡短說明。文章特別注意已出版的對一些重要問題的研究。帝國行政管理運用的問題將先於西北地方防務的行政管理運用的問題。目錄如下：

- 1) 居延文書
- 2) 馬圈灣遺址
- 3) 上孫家寨的發現
- 4) 漢代以後的材料
- 5) 紀年和干支
- 6) 官方文書種類
- 7) 武帝的一道遺詔？（花海發現）
- 8) 公元前 32—前 10 年對長者特權的授予（磨嘴子）
- 9) 公元 159 年對帝室宗族的優待（甘谷）
- 10) 守御器備
- 11) 蓬火品約
- 12) 立功的賞賜（酥油土）
- 13) 公元前 62 年張廣德失職案
- 14) 債務指控：公元 28 年寇恩案例

1) 居延文書

下列文書在《文物》1978 年第 1 期，7 頁和《文集》489 頁上有介紹。

二枚簡記有公元前 52 年的一條律令（EJT:1—3），律令關係到兩年前劉胥發動的一次叛逆陰謀，是為通緝逆黨逃犯而發佈的。律令

還命令地方當局嚴密監視並逮捕與此次陰謀或公元前 80 年一場叛亂有牽連的兩名女奴。這些逃犯的特徵都被詳細描述(《文物》1978 年第 1 期,圖版 V 6—8)。另一項司法和法律上的事件記在昭、宣時的簡上(EPT52:15),當屬“鹽鐵令品”的條文之一。公元前 105 年後的 6 枚簡(EPT56),是關係到一道贖罪的法令。建武時期(約公元 25—30 年)的 20 枚簡(EPT22),可能是公元前 123 年置武功獎賞條例中的一部份。EJT22、37 包括文帝、武帝和元帝時一些詔書的簡要內容。另 16 支簡(EJF16)是公元前 14 年的一道詔書,也有公元 9 至 19 年王莽時期部份詔書的殘冊(EPT59)。同時還有關於更改官制、改長安名稱和為穩定經濟所採取的措施等律令和詔書(EPT6、59)。公元 22 年的 18 枚簡(EPT22),反映了王莽時期對邊境的管理事務。建武時期的文書有關於居延都尉吏奉谷秩別命令(EPT22:70—79,圖版 VI 1—10)。另 5 組文書中(EPT22),有一些詔書和禁令,如光武帝禁止嫁娶過制,屠殺馬牛,砍伐樹木和公元 29 年的大赦等詔書。一枚“軍情”簡(EPT22:325,圖版 VII:1),反映光武帝準備採取一個計劃,與竇融聯合發動一場對隗囂的進攻。

關於居延屯戍活動的文書最多、最完整。如建武初年的 17 枚簡為“塞上烽火品約”(EPT16:1—17;見下(11))。另 5 枚公元 29 年的簡是關於官吏的遷補和提昇(EPT22;《文物》1978 年第 1 期,圖版 V 1—5)。約公元前 62 年的一枚檄,是對一名未能很好執行任務而玩忽職守的官吏的懲罰(EPT57:108,《文物》1978 年第 1 期,圖版 VI 7—8,見下(13))。許多文書是關於公元前 26 年至公元 31 年的司法活動案例(EPT59,EPT6 和 EPT20,68)。另一些簡包括例行的公文、公事方面內容,如經上級批准同意的病假條(EPT22:80—82,《文物》1978 年第 1 期,19 頁,圖 36)。公元 10 年 48 種防守器械的名稱和數字(EJT37:1537—1558,《文物》1978 年第 1 期 24—25 頁,圖 41,42;見下(10))。有記載騎士名籍的 62 枚簡(EJF3)。有 9 枚簡記載王莽的使者在視察金關食用米肉的開支(EJT21:2—10,《文物》1978 年第 1 期,圖版 VIII 2 和 19 頁圖 35)。所獲最完整的 36 枚簡,共為一冊,是一

件關於債務的控告，特別引人注意（見下（14））。

大量的殘冊散簡內容十分廣泛，反映了當時的行政管理、經濟狀況、軍事組織、屯田水利和交通。這些信息可從文書所載的各種吏卒家屬、百姓、奴婢、刑徒的名冊中獲得。還有武器裝備、戍務勞作、買賣、糧食和其他物資的簿冊。也有徵稅、借貸活動的記錄。一部份簡反映了在宣帝時從梁國來的 1095 人到達張掖戍邊（EJT25:86），從趙國戍肩水的 564 人（EJT28:63）。

還有漢代部份書簡資料。如王莽時代或建武早期的 6 枚簡（EJT40:202—207），載有一篇鑒別刀劍優劣的專著，它可能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載佚書《相寶劍刀》的部份抄本。還有部份數學、醫學、天文方面的內容，如《九九術》及醫藥方，曆法干支、日蝕天象等，也有《蒼頡篇》、《急就篇》之類的識字課本（EPT48:144；《文物》1978 年第 1 期，圖版 VI 6）。

紀年簡共有 1222 枚。元朔元年的一枚簡（72EJ:77），疑是學字書，並不表明那時已佔據這一地區。公元前 119 年以前的一枚簡是一份官吏任命書（EJT10:311），表明那時居延都尉已建立。這比以前公認的最早記載提前了 20 年。值得注意的是，部份紀年簡提到“復漢元年”（公元 23 年）（《文物》1978 年第 1 期，圖版 VI，1—5），這是隗囂採用的紀年，《後漢書》載為“漢復”。也提到建世二年，即公元 26 年，是赤眉軍採用的年號。一枚簡提到“漢元始廿六年”這一特殊年號，相當於建世、建武二年。曆法和干支的使用看下（5）

2) 馬圈灣遺址（《文物》1981 年第 10 期，1—7 頁；《文集》499—512 頁）

這一遺址所發現的 1217 枚簡，所提到的時間從公元前 71 年至公元 21 年，大多數簡是平帝和王莽時期的，還有關於出入玉門關的記載（79D. M. T9:28, 27 和 79D. M. T6:55；《文物》1981 年第 10 期，圖版 III，2, 1；圖版 I，9）。簡文提到烽火及屯戍的活動，如名籍、兵器、奉廩、錢糧、勞務、軍紀、巡徼、糧食運轉、郵驛、訴訟、賦稅、買賣、借貸等。也有部份律令（79D. M. T12:26），是對擅離職守，失職或投降的

懲罰規定。如其它同類遺址一樣(如居延,《文集》83 頁),一些簡說到公元 6 年劉崇發動的陰謀叛亂(79D. M. T6:17)。還有部份書簡資料,如《蒼頡篇》、《急就篇》和《易》等著述殘簡,以及曆書、干支表、天象、占卜、九九算術書等殘簡。特別引人注意的是王莽與西域各國關係的 100 餘枚簡,提到了車師、焉耆、烏孫、尉犁、鄯善、卑陸和鬱立師等。這些文書證實了《漢書》中王莽對這些地區統治者變更稱號的記載。文書也證實了那時這些地區騷亂頻仍。文書還談到公元 16 年王莽發動的一次流產遠征。

3) 上孫家寨的發現

這個遺址 115 號墓的發掘報告發表在《文物》1981 年第 2 期 16 頁上,圖版 I 和圖版 II 刊登了部份簡的照片,釋文發表於同一期(22-26 頁)。朱國炤進行了初步歸類(27-34 頁)。還有一篇短文是關於如何將變形木簡恢復為正常形狀的(35-36 頁)。

釋文分 4 部份,絕大部份是關於軍事組織和紀律。第 1 部份中有些簡有數字,根據這些數字可復原兩卷文書的目錄,第 1 卷為 1-16 章,第 2 卷為 17-42 章(可能是 45 章)。根據內容可以分:(i)軍事律令文書;(ii)和(iii)為軍隊的編制、陣法和標幟;(iv)是與《孫子》有關的兵書;還有暫時無法歸類的第 5 部份。這些文書提供了漢代論功拜爵制度的證據。第 2 部份提供了軍事編制、陣法情況。第 3 部份是關於部隊的標幟,據此可識別出許多有關部隊編制單位的名稱及其指揮官,這一制度與《尉繚子》所載大體相近似。各種顏色旗幟的使用,反映了“五星術”的影響(251、020、030、029、031、108 號等說明“左部司馬旗胡青,前部司馬旗胡赤,中部司馬旗胡黃,右部司馬旗胡白,後部司馬旗胡黑”)。第 41 章包括一些遺失的兵法。

李零曾對文書的這種分類提出過質疑,他認為這是源於一組單獨的文書(《考古》1983 年第 6 期,549 頁)。

115 號墓位於漢代金城轄區臨羌縣內,有人認為墓主是馬良。他曾是兩次擊羌戰役中一次的指揮官之一。第一次戰役是公元前 61 年趙充國率領從帝國各地抽來的大批軍隊發動的,歷史上湮沒無聞的

馬良曾參加這次戰役；另一次是公元前 42 年羌族叛亂後發動的。

4) 漢代以後的材料

除從木簡所獲漢代軍事和行政活動的材料外，在西北的青海省還有另一些發現，時間上從漢至唐。吐魯番文書在《文物》1978 年第 6 期，3—7 頁和 10—12 頁（圖 4—15）有圖示。專門研究的文章有：《文物》1978 年第 6 期，15—21 頁（郡縣的行政制度）；《文物》1978 年第 6 期，22—25 頁（租佃契約關係）；《文物》1983 年第 1 期，19—25 頁（吐魯番阿斯塔那 382 號墓中的文書）；《文物》1983 年第 1 期，35—38 頁（“按貨配生馬”制度）；《文物》1983 年第 1 期，39—41 和 42—44 頁（吐火羅文 A（焉耆語）本《彌勒會見記劇本》殘卷。）；《考古》1974 年第 3 期，200—204 頁和 205—207 頁上的文章是關於甘肅武威發現的西夏手稿的研究。武威旱灘坡還出土了關於漢代醫方的研究材料（《通報》：LX II 2—3，130—31）。文物出版社 1975 年出版的《武威漢代醫簡》一書包括圖版、簡的臨摹和釋文，大大補充了對漢代醫學的研究。

5) 紀年和干支

在居延兩次主要發掘（1930—31 年，1972—76 年）所獲 12000 枚簡中，有近 1000 枚為紀年簡。任步雲在《文集》（418—463 頁）中以表的形式闡述了紀年程序。表 1 以簡文年號朔日干支為主，兼收僅具年月而不具干支者，儘量達到月份銜接；表 2 是按簡曆新舊年號並見；表 3 收輯了一部份年號不明而具朔日干支的簡，對與陳垣《二十史朔閏表》不合者略加考定。這些紀年簡的時代從公元前 85 年到公元 32 年，有 5 支簡的紀年是從公元 86 年到 111 年。除王莽時（公元 9—23 年）以 12 月為歲首外，其餘均以公元前 104 年的“太初曆”來記歲首。總體上看與《陳表》相合。該文沒有詳述新的紀年材料，以及在什麼方面對陳垣的觀點有所更正（RHA 卷 I，347—366 頁）。

6) 官方文書種類

薛英群根據舊出居延簡和敦煌簡對所發現的官方文書進行分類（《文集》258—297 頁）。總體上可分中央和地方兩大類。雖然“制”、

“詔”、“敕”等詞的形式史籍中間有記述，但其區別絕不是很清楚的。缺乏完整的記載，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困難所在。文章引述了王國維的觀點。大庭脩對這方面的研究也是引人注意的。文章試圖根據簡文主題，區分了源於當地的 14 類不同的文書，如檄書、爰書、病書等。

7) 武帝的一道遺詔？

花海（接近現在玉門）發現的約 100 支簡被認為是練字習作。其中包括一枚多面稜形的簡，被認為是“檄”（77. J. H. S:1），上有一道詔書（《文集》15—33 頁；釋文在 28 頁，照片在卷首）。這是一位病中皇帝的遺詔，告誡後嗣要遵循某些統治原則。現被認為是武帝給劉弗陵的遺詔。他在武帝死前一點被冊立為太子，即著名的昭帝。遺址中的另一些簡表明對酒泉的防務始於武帝統治時期。練字習作包括《蒼頡篇》中的片段。

8) 對長者特權的授予

1959 年在磨嘴子發現了 10 枚載有一道詔書的簡，很快公佈。這組簡的內容是關於給上了年紀的人一些特權。同樣內容的簡在它處也有發現，從而為釋讀早期的簡提供了便利（《武威漢簡》，140 頁，《皇家亞洲社會期刊》1965, 4, 17—26 頁；大庭脩：《秦漢法制史研究》332—354 頁）。武威新出土的文書由 27 枚組成，現存 26 枚。在簡背後有系列編號，可正確排列順序，不像先前 10 簡無法編排。這些簡也及時加注出版（《文集》34—61 頁，照片在卷首）。新簡準確表達了早期簡的內容，並更加充分。它包括官方文書等。編號 42 和 43 的詔令年代是從公元前 32 年至前 10 年。這些詔令重申給予達到年齡的長者特權待遇。他們被象徵性地容許帶有一種特殊的權杖，他們擁有從官方的壓迫下獲得自由的允諾。文書包括對違反這些規定的行為進行懲罰的描述，以至達到當眾處死。簡文中一部份是一個名叫“咸”的尚書令於公元前 31 年的一份上書。可確定他就是從公元前 16 年管理少府的官員陳咸（《漢書補注》19B, 45a）。這些簡使我們可能追溯從公元前 72 年早期以後各種保護老年人措施的連續性。

9) 帝室宗族的優待 公元 159 年（甘谷）

這項重要發現是在甘肅省的東南部，距居延約 800 公里的地方（《文集》85—141 頁，張學正的文章，釋文在 87—94 頁，照片在卷首）。1971 年在甘谷，屬於漢代天水轄區的一部份發掘出 23 支寫有兩行字的簡。簡後的系列編號使正確排列簡序和復原殘片成為可能。應有 1300 字的完整文書，祇有 1000 字保留下來。簡文是公元 159 年以一道詔書形式頒佈的官方文書。很顯然，在 2 世紀對被忽視的特權的要求決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文書還包括劉矩的一份上書，他從公元 158 年為宗正，後為太常，公元 161 年代黃瓊為太尉。這份上書報告了從蜀地統治者所獲得的信息，並牽涉到公元 141 年的一道詔令。這份上書反映了官方文書的程式，闡述了給予皇室宗族優待的要求。它為 2 世紀普遍的社會動蕩提供了新證據，這是在正史中所不能得到的。

10) 守御器備

守御器備應當和兵器區分開。兵器多因人而設，發給吏卒個人使用，可以轉移和流動；守御器為戰鬪單位公用的固定設備，不得轉移。初師賓根據 5 種簡牘文書分析了居延的守御器備（《文集》，142—222 頁）：守御器備檔案文簿、戍務裝備司法文簿，吏卒功過勞績的考課文簿、財物出入統計文簿，其他文簿。這些守御器備可按功用分為 12 類，107 種，如警備食用類，取火發火器物類，烽火信號用具類，司時號令用具類，防攻鬪具器物類，備用兵器附件類，塢堠射擊觀察裝置類、偵迹設施類，守護安全設施類，戍務與維修工具類，雜用類及其它。

對守御的進一步研究是關於張廣德被懲罰的記錄（《考古》1979 年第 2 期，174 頁，EPT57:108，下(13)），這是因為他不能有效地監督和管理他的下屬。這枚檄文的詳細內容可與其他各種文書相比較：(a) 公元 10 年的橐佗隧的守御器簿（EJT37:1537—58；釋文見《考古》1979 年第 2 期，175 頁和《文集》144 頁）；(b) 從居延早期材料中發現一個相似的文簿，這是於大灣發現的一塊寬 506.1 公分的板（A35），釋文和譯文見 RHA 卷 1, 87; 89 頁；(c) 在居延和敦煌發現的

個別簡。文章還討論了守御器備種類和烽隧機構等問題。

11) 烽火品約

通過新舊簡的比較，促進了對邊塞烽火制度的研究（吳初驤，《文集》223--257 頁）。很明顯，烽火制度由中央、郡、都尉三級頒發。各類都尉頒佈適宜於地方情況的實施細則。烽火制度設計出各種不同的烽火信號表示敵情大小和入侵程度。各種不同的烽火日夜都可使用。據估計，24 小時內一條消息可傳送 579 公里。對烽火所使用的種類及變化有許多觀點，無論是對信號標誌，煙，苣，積薪。雖然尚未發現其它材料，但關於升起烽火的設備和方法仍存有懷疑。

初師賓根據新材料將有關烽火文書分爲 4 類：(a) 督行烽火的詔檄類；(b) 烽火戍務記錄簿類；(c) 烽火司法文書類；(d) 烽火律令章程類（《文集》355—398，及 EPF16.1—17（烽火品約）見下）。對各種不同烽火的研究和調查過去一直求助於文字材料，並以此來求證他們的歷史和一些名詞的含義。“烽”也常被譯爲“標”，是一種形狀似筐，蓋有一塊有色彩的布之類的東西，並不是可燃的信號。甚至認爲鼓也被用作輔助工具。這是由漢代烽火制度的特徵和它的操作形式而得出的。

在居延 F16 發現的 17 支簡名爲“塞上烽火品約”（EPF16:1—17）。除兩枚簡的下部被火損壞外，文書情況良好。它寫在長 38.5 公分的簡上（漢 1.65 尺），《考古》1979 年第 4 期，圖版 8—9, 10—11 爲放大圖版，釋文在同期 360 頁（1979 年第 5 期，445 頁重印）。《文集》224—226 頁不準確。烽火品約上的紀年從建武早期或從王莽時期到後漢早期（《考古》1979 年第 4、5 期）。薛英群和徐蘋芳對這一問題作了專門研究（《考古》1979 年第 4、5 期）。徐蘋芳在分析了新材料之後，又將其與其它遺址所發現的內容作了比較。徐文討論了後漢早年從居延都尉頒發的 17 枚簡，認爲它與從不同時期其它都尉，諸如昭宣時的肩水都尉，公元 1 世紀敦煌郡的中部都尉所頒發的品約很相似。分析了這些不同品約後，徐蘋芳指出品約規定了如何用不同的烽火種類來表示不同的情況，以及如何用烽火來表示不同的地理位置。

新材料還包括一個有趣的品約(F16:10),如果發錯了信號就要立即降烽滅火,並立即報告都尉府。如果天氣惡劣,不能施放烽火,也要派人急告都尉府。從居延、敦煌早期來看,敵情觀測和記錄文簿的呈送有着嚴格的規定,如要求對烽火制度、急遞、記錄文簿的保存、烽火設施檢查都要熟悉。徐文最後還注意了一些未解決的問題,如烽火設施的操作等。

12)對功勞的獎賞

1981年在敦煌西北接近酥油土的遺址中發現70多枚簡,紀年簡僅一枚,為公元前80年。這些簡記載了候望隧次,賬簿,守御裝備文簿等問題(《文集》1—14頁,釋文在9—14頁,照片在卷首)。其中4枚簡載有“擊匈奴降者賞令”(D38:3, D38:4, D38:7A, D38:7B),獎賞是封爵和賜黃金,比在別處看到的獎賞規模要大。

13)公元前62年張廣德失職案

在甲渠候官遺址發現的簡中(EPT57),至少有一個“檄”的樣式,具有代表性。它從一個長方形的木牒上被辨認出來,這種形狀是爲了便於傳送和容納更多的文字(EPT57:108;《文物》1979年第1期,70—71頁,照片在《絲綢之路》63)。檄文描述了一個名爲“廣德”的人的案件,他可能就是張廣德。公元前62年他被任命爲候史(候或隧的高級文職人員),屬於甲渠候官下的某隧。他被指控未能有效地管理他所轄地區,導致嚴重的防務和裝備設施的錯誤以及供應的不足而被審訊。他也未能完成定期向上匯報的任務。檄文最後毫不掩飾地說他被判抽打50次。檄的另一面載有張廣德轄下機構的效率情況(釋文在《文物》1979年第1期,70—71頁和《考古》1979年第2期,174—175頁;見上(10))。此類文書在早期的發現中也有,部份與此相似。

14)一件債務指控:公元28年的寇恩案

迄今最完整的一冊文書,共36枚簡,發現於甲渠候官治所遺址,吸引了許多學者的注意(EPT22:1—36)。這是一件司法案件的檔案,根據原卷所標命名冊書爲:“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責寇恩事”,債

務案是建武 3 年 12 月甲渠候粟君指控寇恩的。案件復原如下：

在 12 月 27 日或元月 28 日，66 歲的鄉民寇恩去鱣得賣 5000 條魚。鱣得是張掖都尉的治所，位於甲渠候官南約 300 公里（約東經 100°21' 北緯 39°00'）。根據附近發現的漁網碎片，魚可能是在居延的湖或水中捕的（《絲綢之路》69）。由於在深冬趕路，魚可能不會變壞。屬甲渠候官的兩名官吏因故不能去鱣得賣魚。寇恩同意代表粟君去賣，粟君期望魚可賣到 40 萬錢。然而寇恩發現估價高了，他沒能賣掉全部魚。結果他比原先商定付給粟君的錢少了 8 萬。他並不害怕，他賣掉了粟君原先支付給他工資一部份的一條黑牛，這條牛是從官府的畜羣中牽來的。他還用粟君僱他兒子捕魚的工錢（20 石穀）相抵。結果他多付粟君 24600 錢，粟君非但不還給他這筆餘款，反而指控寇恩賣了借給他的牛不賠償。

檔案記載了這件案子如何被處理的完整過程。在乙卯這一天（12 月初三），都鄉嗇夫傳喚寇恩驗治，寇恩的供辭被錄成爰書，這是檔案的一部份，以一行文字寫在窄簡上（簡 1—20）。

當案件審理時，粟君的指控未被接受。粟君認為寇恩的供辭與事實不符，他向上級告劾，要求再次審理，很快被辦理。寇恩 13 天後被劾問時堅持原辭（12 月十六），並再次被錄成爰書。這次文書更寬些，每簡寫了兩行（簡 21—28），這些簡與其它簡有細微的差別。三天後（12 月十九）都鄉再次把堅持原辭的驗問結果報送居延縣，認為寇恩不欠粟君的債（簡 29—32）。己卯（12 月二十七），居延縣把整個案卷移送甲渠候官（簡 34—35）。毫無疑問甲渠候官將這些案卷存檔，並附其標記（簡 36），直到最近被發現。

這些簡的圖片刊登在《文物》1978 年第 1 期，圖 37—40，釋文在 30—31 頁。在 28—29, 32—34 頁上探討了有關此簡的各種問題（最後一篇是蕭亢達的文章）。俞偉超在一篇文章中研究了獄辭文例（《文物》1978 年第 1 期 35—41, 95 頁），他認為在居延和別的地方也有相似的文書，初師賓和蕭亢達對法律程序和《囚律》等問題作了深入研究（《考古與文物》1981 年第 3 期，108—118 頁和 1984 年第 2 期，96

100 頁)。何四維教授的譯注爲“公元 28 年的一件訴訟案”。(注)

《文集》的出版對我們了解新近發現的文書有很大貢獻，但也有不足，如插圖太少，所繪簡圖並不總是注明比例和大小說明；這一缺陷在文章中有時得到更正。中國現代出版物的格式要求釋文被印在同一水平綫上。對研究這些文書的特殊要求者來說，保持簡文原貌可能更有益。可能導致混亂和不準確的縮略語在釋文中的使用，也令人惋惜。在很多例中，簡或斷簡的原文祇有與其它簡相聯繫方可理解。日本和歐洲學者寫了許多文章來探討如何復原簡和簡冊。由於沒有注意這些關係，具有重要意義的單簡常可能被遺失(261 頁 332.9 號簡就應與一些未被引用的簡片上下文來考慮)。《文集》所討論的許多問題，歐洲學者也進行了研究，但他們的成果被忽略了(對馬伯樂的參考也很少)。可以說所採用的材料絕不都是正確的，如 261 頁，332.9 號簡的“三年十月”應該是“二年七月”。“烽火品約”的釋文也比別的地方缺乏準確。在進行單項研究(如用作烽火的積薪)時祇用某些直接有關的長簡的部分內容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沒有充分的參考材料的情況下，究竟缺少多少應予引證的材料也令人懷疑。因而無論如何僅依釋文本本身來翻譯或斷定新材料的價值是不可能的。文書原件的圖片和比例大小對於專業研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就新近的發現而言，《文集》是最有價值的。這些發現的範圍也是令人震驚的。在所期望的與原比例一致的圖版和釋文出版之前，已做了很大努力，很多基本工作已完成。我們已獲得很多漢帝國西北地區的清清楚楚知識，誠然也有許多問題有待解決。目前所得出的結論不過是片斷的。根據已報道的 70 冊完整文書的發現，對現有的研究成果將不可避免的有所修改和擴大。這些新文書可望提供更多的基本材料，如烽隧系統、軍事機構、和通訊等。很顯然對這 70 冊複雜文書的專業整理需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文集》僅有 8 頁，488—496 頁)，但這些文書的部份目錄、部份內容，比例和提到的紀年是可能盡早出版。對西北木簡的研究長時間地困於資料的不完整，應努力盡早出版更完整的資料。

注：原載《通報》LXXII, 1986。

絲綢之路與漢塞烽燧

岳邦湖(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在中國歷史上的漢唐之際，從首都長安出發向西經過甘肅、新疆通向西域中亞、南亞和歐洲各地有一條通道，它在中國對外友好往來史上，曾發揮過巨大作用，在歷史長河中有着極其光輝的一頁。當時經由這條路綫輸出的物品中，數量最多、最受歡迎的是絲綢，後來德國著名地理學家希霍芬首先提出，從公元前一世紀中國通向印度之間絲綢貿易為媒介的西域交通綫為‘絲綢之路’。

這些精美的絲綢雖然早在秦漢時期以前已傳往西方，但大量的輸出，卻是在漢王朝派遣使者張騫出使西域之後，漢朝先後在河西設置酒泉、武威、敦煌、張掖四郡，稱河西四郡，河西走廊交通逐漸恢復形成的。為了保護‘絲綢之路’的暢通，漢王朝在河西地區建立了統一的防禦體系，軍事上修築長城，漢時稱塞牆，置兩關（陽關、玉門關），長城東起令居（蘭州西），西至敦煌西部馬迷兔，北連居延，綿延數千里，其規模之宏大，氣勢之磅礴，建築之奇特，堪稱建築史上一大奇迹。《史記·大宛傳》：漢伐大宛之後，“敦煌……西至鹽水，往往有亭。”《漢書·西域傳》：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敦煌西至鹽澤往往有亭。”敦煌以西的邊塞應築於李廣利伐大宛之後。李廣利伐大宛在太初元年至四年，所以敦煌西部建塞應在天漢年間。

保存在敦煌西部的漢塞烽燧，雖然經歷兩千餘年滄桑變遷和自然風化侵襲，但仍然不失其當年雄姿風彩。在今天出現的旅游熱潮中，敦煌西部長城烽燧又大放異彩。三米多高望不到盡頭的塞牆，九米高的烽燧林立，報警系統使用的‘積薪’蘆葦草堆，排列整齊的存放在那裏，使旅游者嘆為觀止，他們以驚訝心情詢問兩千多年的遺物，

爲什麼還能夠保存到今天，不可思議。

公元前一世紀，西漢王朝爲防止北方匈奴民族向南侵犯，抗擊匈奴族的侵擾，保證‘絲綢之路’交通暢通無阻，西連烏孫、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國關係，聯絡西域各國友好往來，所採取的積極政策。

《漢書·匈奴傳》：“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偶落，溪谷水門，稍之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

敦煌西部漢塞構築方法，所採用的材料都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敦煌西部沼澤地帶盛產蘆葦，修築塞牆則以蘆葦爲原料，將蘆葦細扎成把，編織成方形框架，中間填充沙礫，層層迭砌而成，當地地下水多含鹽碱，水與沙礫凝結後十分堅硬。有些地段則用紅柳、胡楊爲原料，有的牆基則用羅布麻以固沙石。

障城以夯土板築爲主，也有用擊壘砌，居延‘甲渠候官’障就是以土壘夾蘆葦壘砌的，敦煌西部‘玉門都尉’治所（俗稱玉門關），則是夯土板築。

玉門關，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關隘，通向西域的門戶，障城爲方形，面積六三三平方米，牆高九·七米，寬四米，門向北開，西門爲後期所建，北門外五米處由東向西大中道路應當是‘絲綢之路’故道無疑。障外有規模較大的塢牆環繞四周。

沿着大車道向東十一公里處又一古城建築，夯土板築，是漢、魏晉以來長城綫上存放糧餉，河倉城遺址。一九四四年西北考察團在遺址北部發掘出土西晉泰始二年石碣一塊，證明倉城在西晉時期仍在使用的。倉爲長方形，東西一三二米，南北寬十七米，牆高六·七米，中間隔成三大房間，門向南開，南北牆上下均開三角形通風孔，倉外有塢壁連接，四周築瞭望臺，塞牆由東向西經倉城北側通過，周圍烽燧林立，防守嚴密，固若金湯。

烽燧，在軍事上屬於攻守兼備，傳送信號多種用途建築，多建築在塞牆內側，但也有建在遠離塞牆綫上高山之巔或孤立於戈壁荒漠之中。建築方法用料與塞牆建築相一致，夯築，土壘夾蘆葦、紅柳土塊壘砌。漢代烽燧多爲方形，底部八×八米，頂部建女牆，高約一米，多

爲土壘砌成。攀登烽燧方法各有不同，有臺級踏步，有垂繩索，牆壁作腳窩。烽燧往往與塙牆連接爲一體，塙內建房屋二至三間不等，供燧長，戍卒宿用。塙牆建築比較堅固，牆頂有女牆，女牆嵌Ⅱ形木制工具，Ⅱ形框內安裝可以旋轉木軸，軸上刻長方形斜孔，從孔內可向外觀察瞭望，亦可進行射擊，簡文稱‘轉射’。

積薪，屬於傳送信號使用的工具，在邊防守禦系統中必不可少的傳遞信號裝備，出土‘烽火品約’簡牘中有詳盡的規定制度。

‘匈奴人晝入甲渠河南道上塞，舉二燾，塙上大表一，燔一積薪。夜入，燔一積薪，舉塙上二苕火，毋絕至明。殄北，三十井塞上和如品。’(E·P·F16.3)

敦煌西部長城烽燧除保存眾多的完整建築羣體之外，在相當數量遺址中蘊藏着大量的、內容豐富的漢代簡牘文書檔案和珍貴的實物資料，這些珍貴史料，對研究漢代政治、經濟、軍事、交通以及西域往來關係史有極高的價值。

木簡多以松木爲原料，但在敦煌西部又多用胡楊、紅柳爲主。簡的長度爲漢制一尺，約合二十三公分左右，以麻繩編綴成冊，所以稱‘簡冊’。一九三零年在居延查科爾帖烽燧出土的‘永元器物簿’七十五枚，一九七四年居延破城子出土的‘寇恩冊’三十二枚簡，都是最爲完整的檔案文書。

出土實物中有生產工具、兵器、絲綢、漆器、木器、紙、毛筆、硯和各種生活用具，都是當時戍邊戰士使用過的工具。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除保存數萬件木簡的雄厚漢代檔案資料外，還收藏數以萬計各類實物。我們希望更多的專家學者對它進行深入研究。

(原載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編《東西學術研究所紀要》第二十五輯，一九九二年三月。)

定縣八角廊漢簡儒書小議

李學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二十年前,即 1973 年,在河北定縣八角廊 40 號漢墓中發現了大量竹簡。這座墓的墓主很可能是中山懷王,其卒年係漢宣帝五鳳二年(公元前 56 年)。竹簡原在墓後東室一件竹筩中,因被盜焚,已全部炭化,但內容十分重要。1981 年發表的簡介,曾把簡劃分為八項,即:

《論語》,

《儒家者言》,

《哀公問五義》,

《保傅傳》,

《太公》,

《文子》,

《六安王朝五鳳二年正月起居記》

《日書》、占卜等殘簡^①。

這裏面前四種都是儒書,反映出西漢晚期儒學盛行的形勢。

定縣八角廊竹簡,迄今祇有《儒家者言》的釋文已經公佈^②。我寫過一篇小文,提到該書“和安徽阜陽雙古堆簡牘中的一種性質相類,內容以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爲主,且多和《說苑》及今本《孔子家語》有關,兩者應該都是《家語》的原型。”^③西漢晚期的《論語》、《家語》等書的出現,對學術史研究來說是值得紀念的大事。本文根據已知的一些材料,試就上述四種儒書略作討論。至於詳細的研究,自然要等待竹簡整理工作的完成。

我們先談《論語》。

《論語》無疑是八角廊簡中最重要的儒家典籍。從整理的情形看,

墓中的《論語》原來應該是全書，但因擾亂，有不少殘損。據整理組稱：“《論語》簡文約有傳本《論語》文字的一半。其中有的篇，簡文幾達傳本的百分之六、七十。《學而》篇只有一枚簡，二十字，是最少的了。另有尾題殘簡十枚，上書各篇包含的章數和字數，由於殘碎過甚，無法恢復《論語》的篇目次序。”^④雖然如此，西漢晚期《論語》本子的發現，價值仍然是難於估量的。

凡是對中國古代學術文化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論語》在歷史上的地位和意義。尤其是在晚清疑古思潮興起之後，孔子與六經的關係受到普遍懷疑，《論語》幾乎成為探討孔子思想的唯一依據。現在能看到西漢時期的《論語》本子，對孔子研究當然甚有裨益。

按西漢流行的《論語》，有《魯論》、《齊論》、《古論》的分別。皇侃《論語疏》叙引《別錄》：“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孔壁所得，謂之《古論》。”《漢書·藝文志》所述更為詳細：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王吉字子陽）名家。傳《魯論》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話中沒有《古論》的傳授。何晏《論語集解》序云：“《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而世不傳”，可見《古論》不像《魯論》、《齊論》那樣流行。

漢初什麼人在齊、魯傳《論語》，已不可考知。《漢志》《魯論》有《傳》十九篇，《齊論》有《齊說》二十九篇。此外，《魯論》又有《魯夏侯說》二十一篇，當為夏侯勝作；《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張禹作；《魯王駿說》二十篇，王吉之子作。另有《燕傳說》三卷，則不知其與各家的關係。這些都晚於漢初。

《論語》三家文本，篇章和文字彼此皆有不同。何晏《集解》序

稱：

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之，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爲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文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所說三家篇數，與《漢志》一致。《古論》所多的篇目，顏注引如淳云：“分《堯曰篇》後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

在三家之中，《魯論》最盛，這從《漢志》便可看出。張禹之學兼有《齊》、《魯》二《論》，如《經典釋文》序錄所說：

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宮。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⑤。

“張侯《論》”雖參取了《齊論》的優長，但仍屬《魯論》，漢末鄭玄的注本也是以此爲基礎的。今傳本即何晏《集解》，仍源出於此，所以今傳本的分篇等等，都是承襲《魯論》系統。

八角廊竹簡《論語》的內容，至今還沒有發表。它究竟屬於那一家傳本，無法判定，可是這裏不妨作一推測。

查《漢書·張禹傳》：

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宮。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

如前所說，八角廊墓的墓主中山懷王卒於宣帝五鳳二年（公元前 56

年)，而張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是在甘露中（公元前 53—前 50 年），因而懷王在世時張禹剛以經學著稱，他以《論語》授成帝是在元帝初元二年（公元前 47 年）開始的。“張侯《論》”在中山懷王時恐怕還沒有形成，八角廊《論語》不可能是張禹的本子。

整理組說，以八角廊《論語》與今傳本比較，存在不少差異，“比如以分章來說，不僅尾題所記的章數很少有相符的，而且分章也不一樣。簡文分爲兩章，傳本卻成了一章，簡文爲一章的，傳本又有分爲兩章或幾章的。在文字上與傳本不同的地方就更多了。”^⑥這也說明竹簡不會是《魯論》系統的本子。考慮到《古論》流傳不廣，《齊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在整理組的簡介中，提到了竹簡本文字與今傳本不同的幾個例子。其間比較有興趣的，是《衛靈公篇》下列一章：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竹簡“兩蹈字均作游字”。按“蹈”、“游”古音均在幽部，一爲定母，一爲喻母，音近可通。就字義而言，“蹈”訓爲履、踐，顯然比“游”更爲順適。張禹以及鄭玄不取這一異文，可能就出於這樣的理由。

下而再談《家語》。

安徽阜陽雙古堆 1 號墓出土木牘中有一塊較完整的，正、背兩面均有文字三欄，是一部書的目錄。現在可辨識的，共有章題四十六條，據整理組介紹，“內容多與孔子及其門人有關，如‘子曰北方有獸’，‘孔子臨河而嘆’，‘衛人醢子路’等等”。這些章題的內容大多能在今本《孔子家語》中見到，所以整理組認爲，“舊說以爲《孔子家語》，王肅僞作，今阜陽漢簡木牘證明早在西漢初期，已有類似的書籍。”^⑦至於這部書的內容還有多少竹簡保存下來，目前尚不知道。

八角廊竹簡也有一種書，即所謂《儒家者言》，保存簡文較多，已整理出來的有二十七章，整理組介紹，其內容“上述商湯和周文的仁德，下記樂正子春的言行，其中以孔子及其門弟子的言行爲最多。……這部書的絕大部分內容，散見於先秦和西漢時期一些著作中，特

別在《說苑》和《孔子家語》之內”^⑥。

雙古堆墓的年代是漢文帝 15 年（公元前 165 年），與八角廊墓的年代相距 150 多年，上述兩種簡書的性質卻頗相似，內容都以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爲主，且多與《說苑》和今本《家語》有關。不過，雙古堆木牘的全文至今沒有發表，兩者彼此有多少重合目前尚不能討論。

這項發現對歷史上爭訟已久的《家語》真偽問題投射了新的光明。

《家語》一書本見於《漢書·藝文志》，云二十七卷，列爲《論語》類十二家之一。十二家的前九種都是《論語》的不同傳本及傳、說，下面便是《家語》，後面還有《孔子三朝》七篇，現在《大戴禮記》中，《孔子徙人圖法》則是一種圖說。由此可見《家語》和《論語》有密切關係。按照《漢志》，記述孔門師弟言行的書，除了《論語》，祇有《家語》。考慮到《漢志》本於劉向、歆父子的《別錄》、《七略》，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 26 年）始命劉向校書，廣收衆本，其時與八角廊墓非常接近，墓中這種以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爲主的書不會不見於《漢志》。因此，這種簡書很可能是《家語》。竹簡沒有《漢志》二十七卷之多，大概祇是一種摘抄本，這在出土古籍中是常有的。

這種簡書會不會是《說苑》一類書呢？按《漢志》有“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云即“《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考證各書甚詳：

本傳曰：“向采傳記，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序次《列女傳》，凡八篇，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初學記》卷二十五）蓋合《頌義》一篇爲八篇也。《疾讒》、《摘要》、《救危》、《世頌》，蓋皆《世說》中篇目，即《世說》也。《隋志》《新序》三十卷，《說苑》二十卷。卷即是篇，是五十篇。合《世說》八篇、《列女傳》八篇，凡十六篇，又加《列女傳圖》一篇，恰符《漢志》六十七篇之數^⑦。

《新序》叙錄作於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 25 年），書則於陽朔元年（公

元前 24 年)呈上,共三十卷,一百八十三章;《說苑》書的呈上,則在鴻嘉四年(公元前 17 年)^⑩,共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新序》叙錄祇有片斷留傳,《說苑》叙錄現仍存在,其中說:

所校中書《說苑雜事》及臣向書、民間書,誣校讎,其事類衆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複重者,其餘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書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⑪

由此知道《說苑》在劉向校理前已有,劉向所作的工作祇是編纂整理,除掉和《新序》重複的部分以及被認爲“淺薄不中義理”的內容。就書的體例而言,劉向對原有的《說苑雜事》並未加以改變。他也没有採擷其他書中的材料,來補充《說苑雜事》的篇章。我們看今傳本《說苑》,書中雖有不少孔子與其門人的言行故事,在全書佔的比例不大,和《家語》不能同日而語。《漢志》把《家語》列於《論語》類,《說苑》等“劉向所序”則列入儒家,不是没有理由的。

雙古堆的那塊完整木牘,章題多與孔門師弟有關,八角廊的簡書也是如此,這顯然不同於《說苑》之類,兩者應該都是《家語》的原型。至於書中有少數部分記述其他內容,如湯與文王事迹等等,這有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這些部分本有孔子或其弟子的評論,今傳本《家語》就有相當多內容是這樣的。另一種可能是這一類事迹爲孔門所傳述,《論語》也有這樣的章節,如《堯曰》所載堯命舜之辭、湯告天之辭等等。《釋文》序錄便說,孔子弟子鑒於“夫子既終,微言已絕,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帙,謂之《論語》”^⑫。所云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即非孔子言行。所以不能由於簡牘內容有少數不屬於孔門事迹,便認爲不是《家語》的原型。

從體例來看,出土的《家語》和今本是相近似的。清代陳士珂作《孔子家語疏證》,詳細對照今本《家語》及傳世其他古書,證明該書多與《荀子》、《韓詩外傳》、《禮記》、《大戴禮記》、《說苑》等相出入。今本

《家語》是一部久成定讞的“偽書”。顏師古注《漢志》，已說二十七卷的《家語》“非今（按指唐代）所有《家語》”，後世指斥今本的學人很多。《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今本十卷，魏王肅注，即指爲王肅所依托。陳士珂則在與族人陳詩討論時指出：

夫事必兩證而後是非明，小顏（師古）既未見（孔）安國舊本，即安知今本之非是乎？且子觀周末漢初諸子，其稱述孔子之言，類多彼此互見，損益成文，甚至有問答之詞主名各別，如《南華》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惡時時有之，然其書並行，至於今不廢，何獨於是編而疑之也？^③

這話可說是公允的。

上述簡牘的發現，證明自漢初已有《家語》，《史記》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很可能有取於該書。當然，也不可能因爲發現了《家語》的原型，便以爲當時《家語》已具有今傳本的面貌。王肅所注《家語》得自孔子二十二世孫孔猛，其本子應經過擴充增改^④。《家語》和其他不少古書一樣，曾有着較長的形成過程。

在八角廊簡中還有兩篇單行的書，即《哀公問五義》與《保傅傳》，釋文尚未發表。

整理組介紹竹簡《哀公問五義》云：“此書見於《荀子》、《大戴禮記》和《孔子家語》。其竹簡形制和其它各書不一樣，可能是另一種抄本。”^⑤按《大戴禮記》所收《哀公問五義》，文字大致同於《荀子·哀公》的前半。今本《家語》的《五儀》第一段也與之略同，惟增多一部分，類於《新序·雜事四》的一章。現在還不知道竹簡和三者那一種更相接近。

所謂“五義”，《荀子》、《家語》“義”均作“儀”。《荀子》楊倞注：“言人之賢愚，觀其儀法有五也。”清王先謙《集解》：

郝懿行曰：“儀者，匹也。匹者，猶疇類也。《大戴記·哀公問五義》即‘五儀’也。古‘儀’字正作‘義’。楊注‘儀法’非是。”先謙案：儀猶等也，說見《王制篇》。

王氏之說是對的，“五儀”即人的五等：庸人、士、君子、賢人、大聖。

《荀子》一書結構有模仿《論語》之處，《論語》始於《學而》、終於《堯曰》，《荀子》則始於《勸學》、終於《堯問》。這是楊倞注本移易篇第的結果。^{②5}楊倞本“以類相從”，王先謙《荀子集解》認為其最後的《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五篇“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所以《哀公》這一部分未必出於荀子手筆，但係荀子一系學者所傳述，則是肯定的。

《保傅傳》的情況，據整理組介紹云：“《保傅傳》這部分殘簡內容，分別見於賈誼《新書》和《大戴禮記》。前者又分見於《保傅》、《傳職》、《胎教》和《容經》四篇之內；後者卻合為一篇，名曰《保傅》。簡文與兩者基本相同，但比《大戴禮記》和《新書》多出‘昔禹以夏王’以下的後半部分文字，又比《新書》多出《連語》的兩節。”^{②6}

按《漢書·昭帝紀》注引文穎云：“賈誼作《保傅傳》，在《禮·大戴記》。”是此篇為賈誼所作。《漢書·藝文志》儒家有《賈誼》五十八篇，今本《新書》目次篇數相合，但《問孝》、《禮容語上》兩篇的文字俱已缺失。宋代陳振孫以來，有些學者懷疑《新書》不是原作，《四庫總目》甚至斥之為“殊贅亂無條理”，余嘉錫曾詳加辨正^{②7}，六十年代初，北京大學一些學者也作過細心的研究^{②8}，《新書》的可信早已確定了。

《漢書·昭帝紀》載詔云：“修古帝王之道，通《保傅傳》”，可見當時此篇業已單行。《白虎通義》引此篇作《禮·保傅》，證明它早已收入禮書。以《大戴禮記》本《保傅》與《新書》相對照，前者的內容依《新書》篇名是這樣的次序：

《保傅》——《傳職》後半——《胎教》前半
——《容經》中部——《胎教》後半。

整理組所提出的“昔禹以夏王”段就在《胎教篇》的後半。至於竹簡本的結構，從介紹還不能瞭解清楚，有待於材料的公佈。

《大戴禮記》一書包含着許多非常寶貴的內容，其價值絕不下於《小戴禮記》。前人對兩《戴記》有深入研究^{②9}，但仍有一些關鍵問題沒有解決。八角廊簡可與《大戴》對勘，也說明該書的重要。

注釋

①定縣漢墓竹簡整理組：《定縣 40 號漢墓出土竹簡簡介》，《文物》1981 年第 8 期。

②同上：《〈儒家者言〉釋文》，《文物》1981 年第 8 期。

③李學勤：《竹簡〈家語〉與漢魏孔氏家學》，《孔子研究》1987 年第 2 期。

④同①。

⑤參看吳承仕：《經典釋文序錄疏證》，第 140—141 頁，中華書局，1984 年。

⑥同①。

⑦阜陽漢簡整理組：《阜陽漢簡簡介》，《文物》1983 年第 2 期。

⑧同①。

⑨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第 109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⑩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日文），識語第 66 頁，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0 年。

⑪向宗魯：《說苑校證》，序奏，中華書局，1987 年。參注文酌改。

⑫同⑤。“帙”字據盧校改。

⑬陳士珂：《孔子家語疏證》，陳詩序。

⑭同③。

⑮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第 5 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年。

⑯同①。

⑰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十，中華書局，1980 年。

⑱魏建功等：《關於賈誼〈新書〉真偽問題的探索》，《北京大學學報》1961 年第 5 期。

⑲洪業：《禮記引得序》，《洪業論學集》，中華書局，1981 年。

首屆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東 山

自從本世紀初首次發現敦煌漢簡，迄今已近九十個春秋，即使從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首次發現馳名中外的居延漢簡開始，迄今亦已整六十週年。此後，我國古代的竹、木簡牘接二連三地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截至目前為止，據不完全統計，共出土各歷史時期的簡牘五萬五千六百餘枚。而甘肅一直是我國古代簡牘出土最多的一個省，共出土了四萬七千三百餘枚，約佔全國出土簡牘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其中，1930年—1931年和1973年—1974年兩次出土居延漢簡近三萬枚，約佔全國出土簡牘總數二分之一以上。爲了弘揚祖國的優秀文化遺產，檢閱建國以後的重大考古成就，擴大“六五”哲學社會科學國家重點科研項目成果的影響，交流海峽兩岸和中外學者的簡牘研究成果，進一步推動我國古代簡牘研究工作的全面開展，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單位，於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二日在甘肅省會蘭州聯合舉辦了首屆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參加這次學術研討會的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共有一百五十餘人，其中來自我國臺灣、香港地區和日本的學者共四十餘人，約佔與會代表總數近三分之一，具有副研究員和副教授以上高級職稱的研究人員共六十六人，約佔與會代表總數百分之四十以上。

這次學術研討會從7月29日正式開會，到8月2日結束，會議日期爲五天。29日全天，組織與會全體代表參觀了《甘肅出土簡牘文物》的小型專業展覽，這是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甘肅省博物館爲

了配合這次學術研討會，晝夜兼程趕着陳列出來的，目的是爲了幫助與會者瞭解甘肅簡牘考古和研究的概況。30日上午十時，舉行了開幕式。30日下午和8月2日上午，先後舉行了兩次學術研討會的全體會議，共有八位代表在大會上作了發言，按着發言順序分別爲：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邦湖：《居延、敦煌漢代烽隧遺址考古發掘在簡牘研究上的重要意義》，介紹了1972年——1979年調查和發掘新出居延、敦煌漢簡的經過。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謝桂華的《居延新簡的整理概況》，和中國文物研究所李均明的《居延漢簡的史料價值》，扼要地介紹了1972年——1976年新出居延漢簡的整理概況和史料價值。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雙全：《居延甲渠候官漢簡的整理與研究》，從斷簡綴合、文書編冊、文書分類、分期斷代等四個方面，介紹了對破城子兩次出土的全部居延漢簡進行整理和研究的體會。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何茲全教授：《簡牘與中國史研究》，就如何更快更好地將豐富的出土簡牘資料運用到中國史研究中去，發表了富有啓發性的意見和建議。臺灣中興大學馬先醒教授：《“居延新簡”商榷》，對“居延新簡”的稱謂提出了異議，並且建議將“居延漢簡”、“居延新簡”改稱爲“張掖簡牘”或“張掖漢新簡牘”。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大庭脩教授：《再論“檢”》，在總結了自王國維、原田淑人、勞幹等中外學者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討，發表了獨到的見解。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永田英正教授：《“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考》，通過對1973年—1974年新出的“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性質的剖析，進而深入探討了有關候史的職能，很有見地。北京大學中文系裘錫圭教授：《談釋讀漢簡文字應注意的問題》，就如何準確釋讀漢簡文字方面的問題，做了精彩的發言，並總結出幾條具有規律性的精闢意見。另外，原定在大會上發言的還有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論天水秦簡中之中元“中鳴”、“後鳴”與古代以音律配合時刻制度》、美國密西根大學張春樹教授：《九十年來漢簡的發現與研究》、甘肅省博物館研究員初世賓：《甲渠塞部隧建置考略》，後因饒宗頤、張春樹教授未能到會，而初世賓則因大會時間關係，三位代表均未能發言。七

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與會全體代表，分成四組，舉行分組會議，進行小會發言和評論。在第一組發言的有十四位代表，按照發言順序，他們和發言題目分別是：吉村昌之（日本）：《關於居延新出王莽簡》；吳怡如：《一九七二年居延漢代烽隧遺址調查紀實》；侯燦：《樓蘭出土魏晉木簡綜述》；秦照芬（臺灣地區）：《省卒職責辨析》；吳昌廉（臺灣地區）：《整璽一居延漢簡摭考之一》；陸思賢：《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出土的封泥》；杜斗城：《河西漢墓記》；嵯振西：《秦漢竹簡和墓葬反映的家庭形態變化》；陸錫興：《鳩杖探微》；黨壽山：《介紹武威出土的兩件隨葬衣物疏木方》；李昭和：《王杖詔書令冊中“本始二年詔”質疑》；張俊民：《漢代西北屯田的區域性》；趙平安：《秦漢簡牘通假字的文字學研究》；劉紹剛：《從簡牘帛書看隸書的形成與發展》。在第二組發言的有十六位代表，他們和發言題目分別是：枅山明（日本）：《刻齒簡牘考略》；鵜飼昌男（日本）：《關於漢代文書的考察——“記”文書補論》；陳鴻琦（臺灣地區）：《綜論漢代居延邊塞所見之“弩”》；馬曼麗：《從居延漢簡論西漢西北邊塞守邊制度》；戴春陽：《從漢簡看前漢時期漢匈關係的變化》；吳初驥：《漢代出入關制度考略》；王子今：《關於居延“車父”簡》；徐揚傑：《談漢簡庫名簿所記口糧的性質》；高大倫：《敦煌、居延漢簡中的疫病和疾病文書考述》；劉軍：《甲渠候官掾夏侯譚》；陳松長：《馬王堆三號墓木牘散論》；林巽培（香港地區）：《漢簡中的〈蒼頡篇〉》；張東輝：《“應書”辨疑》；魏懷珩：《簡牘書體淺析》；劉信芳：《〈日書〉四方四維與五行淺說》；王鐸：《武威本〈儀禮〉與十三經本〈儀禮〉之比較研究》。在第三組發言的有十五位代表，他們和發言題目分別是：富谷至（日本）：《漢代邊境的關所》；林劍鳴：《秦漢簡牘〈日書〉與官吏》；陳守亭（臺灣地區）：《從“秦俗多禁忌”論漢簡資料中極少日書問題》；曾憲通：《居延新簡：“刑德七舍”疏證》；劉慶柱：《西漢工官初論》；楊劍虹：《從簡牘考察秦漢時期的鄉里組織》；宋豫卿（臺灣地區）：《河渠卒及其相關問題研究》；薛英群：《再議居延漢簡有關經濟的幾個問題》；胡平生：《敦煌馬圈灣西域史料辨證》；馬建華：《從敦煌漢簡試探王莽對西域的政策》；徐勇：《銀雀山殘簡〈守法〉、〈守

令》等篇軍事思想試釋》；李永良：《我國簡牘出土情況述略》；徐祖藩：《居延、敦煌簡牘的文字與美學價值》；孔晨：《簡牘書法與中國書法史一題》；朱國炤：《一份值得探索的王莽時期的俸祿簿》。在第四組發言的有十七位代表，他們和發言題目分別是：門田明（日本）：《關於居延漢簡所見的“小府”》；高恒：《漢代行政司法制度偶得》；徐世虹：《從居延新簡看漢代告劾制》；陳文豪（臺灣地區）：《大司農延與人錢贖品試釋》；邢義田（臺灣地區）：《從居延漢簡看漢代軍隊的若干人事制度》（因本人未能到會，由陳文豪代為宣讀）；徐樂堯：《漢簡所見邊郡軍事與民政系統的職權關係》；鄭蘭生：《居延新簡中有關漢律的幾個問題》；王子崗：《論漢代簡牘與中國文化和哲學》；丁毅華：《漢簡在秦漢文化史研究中的應用》；張德芳：《淺論王莽在西域的軍事失敗》；高維剛：《從漢簡管窺河西四郡市場》；魏啓鵬：《居延漢簡“愚吏”校箋》；周世榮：《試談“叢幣”與居延漢簡布帛》；張銘治：《居延漢簡曆譜中的術數》；趙達夫：《〈孫臏兵法〉校補》；盧瑞琴（臺灣地區）：《漢代河西地區的食鹽問題——居延簡牘讀後記》；謝桂華：《新舊居延漢簡冊書的復原研究》。大家本着學術平等、百家爭鳴的民主原則，暢所欲言，促膝切磋，自始至終洋溢着濃鬱學術氣氛。此外，在大庭脩教授倡議下，由謝桂華陪同，於8月1日下午，召開了與會部份中日青年學者見面懇談會，增進了互相瞭解和友誼。

這次學術研討會有以下四個特點：一、像中國簡牘學這樣專門性質的大規模學術研討會，在我國尚屬首次，在國際上也不多見；二、參加這次學術研討會的代表，不僅包括海峽兩岸和中外的老、中、青學者，而且，這些學者來自文物、考古、歷史、簡牘、書法、科技等各個學界，非常廣泛；三、這次學術研討會，除了進行大、小會學術交流外，又組織與會代表觀看展覽和錄相，還到實地進行學術考察，內容豐富多彩，形式生動活潑；四、這次提交學術研討會的論文提要共有八十餘篇，其中包括簡牘概述、湖北雲夢睡虎地和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簡牘帛書、臨沂銀雀山、甘肅居延、敦煌、武威等地出土的漢簡和樓蘭出土的魏晉簡，內容涉及到政治、軍事、經濟、法

律、文化、思想、科技等各個方面。這些論文總的特點是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和新材料、新觀點、新結論。可以相信，今後海峽兩岸和中外學者會更加親密合作，把我國古代簡牘的研究推向更高更新的階段。

（原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1 年第 12 期。）

附：首屆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學術論文目錄

序號	姓 名	國別	題 目
01	高 敏	中國	評[日]堀毅著《秦漢法制史論考》
02	周世榮	中國	試談“聶幣”與居延漢簡布帛
03	楊劍虹	中國	從簡牘考察秦漢時期的鄉里組織
04	陸思賢 張 鬱	中國	呼和浩特二十家子古城出土的封泥
05	程喜霖	中國	漢簡所見兩漢過所使用及勘發程序
06	張銘治	中國	居延漢簡曆譜中的術數
07	劉信芳	中國	《日書》四方四維與五行淺說
08	侯 燦	中國	樓蘭出土魏晉木簡綜述
09	王子今	中國	關於居延“車父”簡
10	高 恒	中國	漢代行政司法制度偶得
11	徐揚傑	中國	談漢簡廩名簿所記口糧的性質
12	丁毅華	中國	漢簡在秦漢文化史研究中的應用
13	傅舉有	中國	簡牘所見漢代紡織品
14	陳松長	中國	馬王堆三號墓木牘散論
15	林巽培	中國香港	漢簡中的《蒼頡篇》
16	魏啓鵬	中國	從居延漢簡看漢代西北風俗
17	高大倫 范 勇	中國	敦煌、居延漢簡中的疫病和疾病文書考述

- | | | | |
|----|------------|------|---------------------------|
| 18 | 吳昌廉 | 中國臺灣 | 整壑——居延漢簡撫考之一 |
| 19 | 秦照芬 | 中國臺灣 | 省卒職責辨析 |
| 20 | 劉紹剛 | 中國 | 從簡牘帛書看隸書的形成與發展 |
| 21 | 曾憲通 | 中國 | 居延新簡“刑德七舍”疏證 |
| 22 | 趙平安 | 中國 | 秦漢簡牘通假字的文字學研究 |
| 23 | 陳文豪 | 中國臺灣 | 大司農延與人錢贖品試釋 |
| 24 | 馬先醒 | 中國臺灣 | 《居延新簡》商榷 |
| 25 | 陳鴻琦 | 中國臺灣 | 綜論漢代居延邊塞所見之“弩” |
| 26 | 陳守亭 | 中國臺灣 | 從“秦俗多禁忌”論漢簡資料中極少日書問題 |
| 27 | 宋豫卿 | 中國臺灣 | 河渠卒及其相關問題研究 |
| 28 | 邢義田 | 中國臺灣 | 從居延漢簡看漢代軍隊的若干人事制度 |
| 29 | 安作璋 | 中國 | 漢簡與漢代地方官吏法 |
| 30 | 曾憲通 | 中國 | 秦漢時制難議 |
| 31 | 何茲全 | 中國 | 簡牘與中國史研究 |
| 32 | 徐 勇 | 中國 | 銀雀山殘簡《守法》、《守令》等篇軍事思想試釋 |
| 33 | 徐世虹 | 中國 | 從居延新簡看漢代告劾制 |
| 34 | 劉慶桂
李毓芳 | 中國 | 西漢工官初論 |
| 35 | 王子崗 | 中國 | 論漢代簡牘與中國文化和哲學 |
| 36 | 高維剛 | 中國 | 從漢簡管窺河西四郡市場 |
| 37 | 禡振西
呼林貴 | 中國 | 秦漢竹簡和墓葬反映的家庭形態變化 |
| 38 | 岳邦湖 | 中國 | 居延敦煌漢代烽燧遺址考古發掘在簡牘研究上的重要意義 |
| 39 | 何雙全 | 中國 | 甘肅簡牘綜述 |
| 40 | 初師賓 | 中國 | 甲渠塞部隧建置考略 |

41	徐樂堯	中國	漢簡所見邊郡軍事與民政系統的職權關係
42	何雙全	中國	敦煌漢簡的整理研究
43	林梅村	中國	漢簡中的西域史料
44	張俊民	中國	漢代西北屯田的區域性
45	杜斗城	中國	河西漢墓記
46	戴春陽	中國	從漢簡看前漢時期漢匈關係的變化
47	何雙全	中國	居延甲渠候官漢簡的整理與研究
48	大庭 脩	日本	再論“檢”
49	永田英正	日本	“候史廣德坐罪行罰”檄考
50	梶山 明	日本	刻齒簡牘考略
51	富谷 至	日本	漢代邊境的關所
52	鷗飼昌男	日本	關於漢代文書的考察——“記”文書補論
53	門田 明	日本	關於居延漢簡所見“小府”
54	吉村昌之	日本	關於居延新出王莽簡
55	李昭和	中國	王杖十簡新考
56	張德芳 李永良	中國	淺論王莽在西域的軍事失敗
57	薛英群	中國	再議居延漢簡有關經濟的幾個問題
58	陸錫興	中國	鳩杖探微
59	鄭蘭生	中國	居延新簡中有關漢律的幾個問題
60	初師寶 張東輝	中國	“應書”辨疑
61	魏懷珩	中國	簡牘書體淺析
62	黨壽山	中國	介紹武威出土的兩件隨葬衣物疏木方
63	張春樹	美國	九十年來漢簡的發現與研究
64	馬建華	中國	從敦煌漢簡試探王莽對西域的政策
65	吳初驥	中國	漢代出人關制度考略

- | | | | |
|----|------------|------|-------------------------------|
| 66 | 林劍鳴 | 中國 | 秦漢簡牘《日書》與官吏 |
| 67 | 王創業
徐祖蔭 | 中國 | 居延、敦煌簡牘的文字與美學價值 |
| 68 | 李永良 | 中國 | 我國簡牘出土情況述略 |
| 69 | 趙達夫 | 中國 | 《孫臏兵法》校補(摘錄) |
| 70 | 吳怡如 | 中國 | 一九七二年居延漢代烽隧遺址調查紀實 |
| 71 | 王 鐸 | 中國 | 武威本《儀禮》與十三經本《儀禮》之比較研究 |
| 72 | 孔 晨 | 中國 | 簡牘書法與中國書法史一題 |
| 73 | 謝桂華 | 中國 | 新舊居延漢簡冊書的復原研究 |
| 74 | 李均明 | 中國 | 居延漢簡史料價值舉例 |
| 75 | 劉 軍 | 中國 | 甲渠候官掾夏侯譚 |
| 76 | 趙 正 | 中國 | 簡牘文字的嬗變規律初探 |
| 77 | 饒宗頤 | 中國香港 | 論天水秦簡中之中元“中鳴”“後鳴”與古代以音律配合時刻制度 |
| 78 | 馬曼麗 | 中國 | 從居延漢簡論西漢西北邊塞守邊制度 |
| 79 | 胡平生 | 中國 | 敦煌馬圈灣簡西域史料辨證 |
| 80 | 李昭和 | 中國 | 王杖詔書令冊中“本始二年詔”質疑 |
| 81 | 朱國炤 | 中國 | 一份值得探索的王莽時期的俸祿簿 |
| 82 | 徐建新 | 中國 | 日本木簡的發掘與研究 |

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討論會述略

陳 松 長

時值馬王堆漢墓挖掘二十週年之際，為促進馬王堆漢墓研究的國際交流，經文化部批准，由湖南省文物事業管理局和湖南省博物館聯合，於1992年8月26日至29日在長沙舉辦了首屆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討論會。與會正式代表67人，其中有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日本、泰國，瑞典，意大利和港、臺學者23人。會議期間，與會代表觀摩了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大量文物珍品原件。並就學術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會議共收到論文57篇，這批論文圍繞馬王堆漢墓主題展開了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和探討，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和研究成果，今僅擇其要者，分類簡述如下：

一、帛書研究

馬王堆帛書研究是學術界極其關注的熱門課題之一。大會共收到有關帛書研究的專著一本（《德行校釋》魏啓鵬著），論文30餘篇，它們分別對帛書的《黃帝四經》、《五行篇》、《周易》、醫書、兵陰陽書和地形圖、駐軍圖等展開了研究和探討。

關於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四種古佚書的定名問題，余明光（湘潭大學歷史系）從《漢書·藝文志》所載的道家文獻中，把有關黃帝的書逐一進行對比研究，最後重申已故唐蘭先生的觀點，認定祇有《黃帝四經》這一書名纔符合這部古佚書的內容，因此應定名為《黃帝四經》。陳鼓應（北京大學哲學系）則提出：歷代人稱《黃帝四經》是否恰當，仍然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他認為，帛書四篇的內容，從哲學理論來看基本上是從老子出發，以老子思想為基礎的，文中雖沒直接引

用《老子》，但從其內容可看出已經融化了《老子》。這種依托黃帝，而又以老子思想為基礎的作品，正是漢代人所說的黃老之言。因此，稱為《黃老帛書》四篇可能最為恰當。關於這部古佚書的成書年代，余先生以古佚書所記內容與《鶡冠子》、《管子》、《韓非子》諸書所載的相同詞句作了一個對比研究，認為古佚書應出自戰國中期，應早於《莊子》、《孟子》，至少與《孟子》同時。對此，陳鼓應作了更詳細的論證和闡述。他認為《黃老帛書》四篇成書的年代應在戰國中期之前。對此他提出了五條很有說服力的理由：第一，從《十六經·五正》中說：“今天下大事”可以判斷，此書成於戰國時代。而《經法·六分》中多次提到“強國”、“中國”、“小國”，說明該書所反映的社會情形祇能是強、中、小三類國家並存的戰國中期或以前的景象。第二，用漢語詞匯發展的規律對《黃老帛書》四篇中有代表性單詞的出現頻率進行統計考察，說明這四篇應寫成於戰國中期或以前。第三，以《孟子》、《莊子》兩書中一些常見而關鍵的詞匯和特殊內涵來分析比較，《黃老帛書》應較《孟子》、《莊子》都早一些。第四，與《管子》一書的概念、語句到思想傾向相比較，發現《黃老帛書》與《管子》多有相似之處，並且有其淵源關係。如《黃老帛書》四篇中“因”字大約出現了 23 次，像“因天地之常”、“聖人因之”等等，都無獨立抽象的意義，而《管子》四篇則將“因”提升為一個重要概念，如“因也者，虛而待物者也”。這顯然是比帛書進了一步。因此，《黃老帛書》四篇要早於《管子》，至遲也作成於戰國中期。李學勤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則以《黃老帛書》四篇中的《道原》為研究對象，以之與《老子》、《文子》、《淮南子》等進行對比分析和文字體裁與思想等方面的比較，指出：“《道原》之作應介於《老子》與《文子》、《淮南子》之間，同時，帛書《道原》篇的文句還同長沙子彈庫帛書類似。因此，可以推知該篇的著成年代不晚於戰國中、晚期之際。關於《黃老帛書》四篇的作者，大多以為像先秦諸子作品一樣，多非一人一時之作；但陳鼓應先生則從這四篇思想的一貫性、整體一致性和一些特殊概念，詞句的重出互見等推論，《黃老帛書》四篇乃是一人一時之作。

此外，陳先生還例舉了 7 條理由推論《黃老帛書》四篇可能是齊國稷下的作品，這又是一種嶄新的推論和觀點，頗值得學術界重視。

帛書《五行篇》是帛書《老子》甲本卷後的一篇古佚書，龐樸先生曾作過極為詳密的研究。這次，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池田知久以《〈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所見的身心問題》為題，再一次對該篇的成書年代及所屬學派等問題進行了討論。首先文中用內證法，從《五行篇》中各章選取了 25 條例證，然後與《韓詩外傳》、《荀子》、《禮記》、《呂氏春秋》和定縣 40 號漢墓竹簡，賈誼的《新書》等對比分析，認為該篇的成書年代不會早於戰國末期、秦代以前，而應是西漢初期的文獻，大約在公元前 200 年—前 170 年間。其次，文章不同意將《五行篇》定為戰國初期的思孟學派、戰國中期的孟子或戰國末期的孟子後學，而認為《五行篇》是折衷了儒家的諸學派——其中特別是孟子流的“天道”和荀子流的“人道”而寫成的文獻。此外，文章還認為《五行篇》的經和傳在寫作時間上沒有時間間隔，而是同一時代由同一人物或者屬於同一學派的人們共同寫成的。至於《五行篇》的屬地，池田先生認為不能簡單地認為《五行篇》是寫於齊國，承傳齊學的文獻，而應全面綜合地進行分析。這在研究的方法上，無疑是可取的。

帛書《天文氣象雜占》是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新材料，對它的成書年代，也有不同的意見。或認為與《周禮》的成書年代相去不遠，或認為出於戰國時期楚人之手。魏啓鵬（四川大學歷史系）參證《太平御覽》卷八引《兵書》的記載和唐《開元占經》、《晉書·天文志》等典籍，對帛書《天文氣象雜占》的各國雲圖進行了分析，指出：《雜占》所列諸雲圖，代表着正在戰場上活躍的邦國。因此，雲圖所列十四國，當時均未滅之。楚滅越在公元前 333 年，秦滅蜀在公元前 316 年，這段文字的大體形成，當不晚於這兩個年代之間。此外，魏先生再一次充分肯定已故顧鐵符先生的意見，認為《雜占》屬兵陰陽家書，而其纂輯當為楚人。並且還指出：帛書《雜占》漢初流傳於長沙，疑與漢初曉兵家陰陽的歷史人物鄧弱有關。這對兵陰陽家書在漢初流傳經歷的研究是一個極有意思的提示。王勝利（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史所）

則對彗星圖及其古文作了進一步的摹繪和解釋，他認為彗星圖共有30個彗星。在席澤宗先生所釋的29個彗星圖的基礎上多一個天覺星，即甘石所謂“覺星”，在圖中頭部為地平綫所遮，祇剩尾巴。這種摹繪和解釋，無疑是對《天文氣象雜占》中彗星圖研究的一個突破。

關於帛書《五星占》，劉彬徽（湖南省博物館）認為：漢初的歲星紀年法正是五星占紀年法。我國古代的歲星紀年有一個演變過程，由戰國時期的甘石紀年法衍變為五星占紀年法，由五星占紀年法衍變為太初曆紀年法，太初曆紀年法與後世干支紀年法相接，一直延續到今天仍在使用。這就簡明地構畫出了中國歷史紀年的演變過程。

馬王堆醫書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課題。這次與會學者提供了好幾篇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的高水準論文。馬繼興先生（中國中醫研究院）在馬王堆醫書中尋找歸納出三種久已失傳的呼吸養生法：①“六氣”呼吸養生法。②呬吹呼吸養生法。③晝夜呼吸養生法。並且指出，這三種養生法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是我們今天應該珍惜和開發的古老保健學的遺產。杜正勝先生（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宏觀的角度，在傳統經脈體系形成的整體把握中，論述了馬王堆脈書的歷史地位。他指出：馬王堆脈書對應經脈和內臟，已初具《黃帝內經》之雛型，但它祇連繫五臟，未連繫六臟，差《內經》系統還有一段距離。它和江陵張家山的漢簡《脈書》一樣，代表着戰國醫學的成就，可以補足傳世文獻的缺失。夏德安（美國亞歷山大大學東亞研究所）則專門對醫書《五十二病方》中的巫術方進行了研究。他認為《五十二病方》成書的時期是古典中醫學形成的時代，其中的巫術方記載了公元前二、三世紀的實用巫術技術，而這種巫術方也就是《後漢書·方術傳》中趙炳“能為越方”的“越方”，它以氣禁為主（包括呼出的氣、口津液和祝水）具有濃厚的巫術色彩，它在中國南方至今流傳不衰。彭浩（荊州博物館）將馬王堆帛書《導引圖》與江陵張家山漢簡的《引書》相互對照研究，指出：《引書》中所記的導引術式有五個與《導引圖》上的題記相同。但兩者同名的術式，其文字與圖像並不相互對應，或許他們各有所本。通過對比、歸納出西漢初期的導引術有這

樣兩個特點：一是講求實用，有一定的鍛煉治療作用；二是有一套醫學理論作指導，迷信成分較少。李零（北京大學文獻研究所）則以《高羅佩與馬王堆房中書》為題，討論了馬王堆房中書與後世房中書的歷史聯繫。他指出：兩者不僅在一般的概念術語方面有驚人的相似，而且後者的“要道秘訣”和“九淺一深之法”，“還精補腦之術”等，實際上在馬王堆帛書中就已存在。它說明中國古代的房中術傳統是一種連貫的過程，從兩千多年以前到明代很少有改變。喻燕姣（湖南省博物館）則以帛書《胎產書》為研究對象，指出其中有關胎教、逐月養胎等胎孕理論及嬰兒產後保健法是現存最早的關於優生優育的記載，研究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馬王堆帛書《地形圖》和《駐軍圖》是現存最早的地圖之一，有的同志曾認為是“秦代江圖”。周世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認為此說不對。他分別從帛書地圖中文字的漢隸特點，長沙出土有漢代“都尉”印，圖中山河圖形各半等方面證明《地形圖》應為漢代繪製，所謂“秦代江圖”是不能成立的。李均明（中國文物研究所）則以居延漢簡中所見居延防區的情況與帛書《駐軍圖》作比較，闡述了諸如兩者的防禦體系都是封閉式的，構成軍事特區；防區內軍民共處，軍事與民政關係密切；重視通訊聯絡與後勤保障等特點。王子今（中央黨校歷史教研室）則將帛書《地形圖》和《駐軍圖》與甘肅放馬灘秦墓古地圖進行對比研究，指出他們之間在突出標示交通路線方面有某種繼承關係，而其內容又可補充史籍對於南楚交通記載之不足，因而有助於對漢代交通史的認識。

帛書《刑德》是迄今為止尚未全部發表的一部有關兵陰陽的古佚書。陳松長（湖南省博物館）首次對帛書《刑德》甲、乙、丙三篇內容進行了較詳細的介紹，並通過對帛書部分內容的考察分析，推論該篇的寫成時代大致在秦楚之際，而其抄寫的時代，甲本在高祖十一年（公元前 205 年）至漢惠帝元年（公元前 194 年）之間，而乙本則在高后八年（公元前 180 年）至漢文帝 12 年（公元前 168 年）之間。丙篇因其殘損太甚，無法明確斷定，但根據其殘存字體看，當與甲本的撰抄時代

相近。

對馬王堆帛書進行文獻學、語言學、訓詁校勘研究的尚有駢宇騫(中華書局),大西克也(日本神奈川大學),曹錦炎(浙江省博物館),廖名春(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等等,因篇幅有限,這裏就不一一敘述了。

二、帛畫研究

馬王堆漢墓帛畫曾以其奇妙的技藝、浪漫的格調、神話的色彩吸引了無數學者的潛心研究,產生了一大批研究論文。這次大會收到有關帛畫的論文雖祇有五篇,但都頗有新意和獨到的見解。李家浩(北京大學)專門對舊名為“社神圖”、“神祇圖”中的帛畫進行重新討論,並將其更名為“太一避兵圖”,同時指出:該圖是講以太一為主的避兵術,圖中的“黃龍特爐”與《越絕書·寶劍記》中的“蛟龍捧爐”有關。並認為該圖可能是戰國時代楚人的作品。何雙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馬王堆一號漢墓的T形帛畫進行了再探討。他認為這帛畫開創了以道家思想觀念裝飾墓葬之先河,從全國各地漢晉壁畫墓的內容看,這帛畫不應稱“銘旌”,而應稱“三皇圖”。帛畫的佈局結構始終貫穿着陰陽五行理論,與墓葬一致,包涵着天地日月、易卦、四方四維,五音五味、天干地支、五行五色等多層次的内容。通過帛畫,我們還可以認識到陰宅論的運用和漢初道家思想以及陰陽家、日占家、堪輿家等各學說互融一體的狀況。顏新元(桃江文化館)則對該帛畫的形製進行了新的研究。他從民俗學研究的角度出發,以古代圖騰文化到現代民間巫術心理的習慣性為錢索進行研究,認為帛畫之取T形,是取門的符號,象徵門戶,意在為亡者立龍門,以正驅邪。而將神物置於門扉正是楚人一貫的習俗,帛畫以龍的主體紋樣作為T形門戶裝飾正是這種習俗的形象描繪。

三、馬王堆漢墓的文化特色研究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文物,無論是器物形製還是圖形紋飾等方面,都有着很强的文化特色。不少學者曾撰寫過論文討論馬王堆漢墓文物的文化淵源和特色。這次會議,不少學者就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郭德維(湖北社科院楚史所)認為馬王堆漢墓有許多秦文化的因素。首先,墓道底作階梯狀,填木炭和頭向朝北,是秦的特點。其次,木槨蓋,底兩層,槨底板橫鋪和棺用暗楔、栓丁也是秦的風格。其三,隨葬品從器類、器形、紋飾、文字等方面都和秦有許多共同之處而與楚有很大區別。因此,他認為馬王堆漢墓是秦文化的繼續。柯鶴立(美國理海大學)則在文化背景的大範圍上討論馬王堆漢墓的文化因素。她認為:根據考古報告,長沙先秦時期最基本的文化層是湖南式的越文化。漢朝人最熟悉的楚國是項羽建立、孝景帝復興的楚國。這個楚國設在彭城(今徐州),它原來的文化層乃是東部式的越文化。馬王堆一號墓主可能是出身於長沙當地的貴族。她認為,馬王堆三個墓葬風俗展現什麼樣的文化背景,這沒有簡單的答案。劉曉路(中國藝術研究院)則詳細地討論了馬王堆漢墓的歷史背景諸問題,並且以《史記》、《漢書》為基本史料,將馬王堆漢墓置於漢初廣闊的歷史背景中進行分析,明確了長沙國歷代王、相與朝廷高帝、呂后、文帝的關係,長沙國和南越國的關係,中央和南越國的關係以及馬王堆漢墓主在這些複雜關係中的作用等問題。宋少華(長沙市博物館)則專門從馬王堆漢墓漆器流變這個角度進行考察,認為馬王堆漢墓漆器除蘊含着巴蜀漆器和楚漆器的因素外,還表現了對秦漆器文化傳統的繼承和發展。此外,它的“錐畫”工藝亦受到越式青銅刻劃工藝的影響,后德俊(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則持不同意見,他認為,從科技的角度看,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漆器不僅在木胎的製作,彩繪的種類與方法,顏色的使用等方面都繼承和發展了楚國的漆工藝,而且在其它方面也是這樣,如夾紵胎漆器就是戰國中期前後楚國的發明之一等等。袁建平(湖南省博物館)將馬王堆一號漢墓與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的絲紡織品進行比較研究,認為西漢初期長沙的絲織品在繼承楚國傳統紡織技術基礎上又有新的突破和發展。高至喜(湖南省博物館)通過對馬王堆二、三號漢墓出土兵器歸類整理和對有關兵器記載的遺策、木牘的分析,說明長沙地區西漢早期的兵器多是對楚兵器的繼承和發展,同時亦說明我國的兵器在漢代又有很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其中

很多是從西漢早期開始的，如弩的進步，劍的增長等等。

與上述文化淵源的討論不同，有些學者則對馬王堆漢墓文物所反映的西漢初期文明進行了描述。高漢王（上海紡織科學研究院）主要就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服飾文化作了歸納、分析。他認為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絲織品，展現了西漢初期錦繡技藝的高度成就和冠履服飾文化的發達水平。如輕薄的素紗襪衣和厚茸的絨圈錦，反映了漢初繅紡技術已相當成熟。其絨圈錦的點經根數高達 8800—11200 根，乃是科學使用束綜提花機和起毛桿工藝的佐證。而泥金銀印花紗，是我國最早的三套版印花物證。“信期繡”、“長壽繡”、“乘雲繡”、茱萸紋繡等花紋，則開創了漢繡中寓意“吉祥”的先聲。傅舉有（湖南省博物館）則從史學的角度概括了馬王堆出土絲綢所反映古代“絲國”的風貌。指出馬王堆漢墓乃是漢代“絲國”的縮影。阿米拉·斯里蘇查（泰國）則以漢代中泰文化交流之研究為題，對泰國境內發現的漢代中國文物進行了介紹和分析，引起與會學者的極大興趣。陳愛平（湖南省博物館）從飲食文化的角度對馬王堆漢墓出土的飲食實物和器具進行的分析，從中探討了西漢初期的日常飲食生活狀況和飲食習慣，並對漢初飲食文化高度發達的社會歷史原因和經濟根源進行了探索。聶菲（湖南省博物館）專就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家具進行研究，描述了漢初家具發展的種類、形貌，並揭示了當時家具發展的水準和其源流關係。

四、女屍研究和藥酒研究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女屍是迄今為止出土的身份最高，完整如生的鮮屍。對這一世界所罕見的女屍進行全面的科學研究和保護，一直是醫學界的一個重大課題。會議期間，當時參加並主持女屍解剖和研究保護的王鵬程（湖南醫科大學）對女屍研究的情況和成果進行了階段性的總結。而曾嘉明（湖南醫科大學）則對長期保存和展出女屍的科研情況進行了報告。他說：女屍保存並展出 20 年間，屍體皮膚顏色呈蒼白杏黃色，沒有腐爛或發霉現像，浸泡液維持清亮、透明，沒有沉澱物，懸浮物和絮狀物，根據肉眼觀察和生物化學指標化驗結果說

明，女屍的保存是非常成功的。

馬王堆漢墓文物不僅有極高的歷史，藝術，科學研究價值，而且其社會價值和現實意義正日益為人們所重視。與會代表中，何宗禹（株州冶煉廠醫院）作了馬王堆古養生醫酒真方《醪利中》開發研製與臨牀試驗報告。他說：該醫酒對原發性高血壓，高血壓冠心病、腦動脈硬化，腦溢血後遺症等病症有明顯療效，會議期間，與會代表專門就《醪利中》酒進行了品嘗，對這一科研成果給予了高度評價。

（原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2年第12期。）

漢簡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概況

陳 波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漢簡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於日本關西大學百週年紀念會館舉行，其中兩天為公開講演，一天為非公開學術討論。會議由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大庭脩教授主持。

應邀出席會議的有：

英國劍橋大學魯惟一博士(Michael Loewe)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徐蘋芳所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李學勤所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謝桂華研究員

中國文物研究所李均明副研究員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管東貴所長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邢義田研究員

甘肅省博物館初世寶館長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邦湖前所長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永良副所長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吳初驥副研究員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何雙全副研究員

湖北省江陵荊州博物館彭浩館長

日本方面參加會議的有：

京都大學名譽教授藤枝晃、東京大學教授尾形勇、京都大學教授永田英正、日本木簡學會會長岡山大學教授狩野久、日本書學書道史

學會理事長迹見學園女子大學教授西林昭一等，日本學術團體東方學會、日本教育書道連盟、日本秦漢史研究會等成員，還有書道家、藝術家、一般市民約八百人。

十二日開幕式，關西大學理事長上田繁潔先生致祝詞：以本校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大庭脩為主導，與各位有關專家共同商定的漢簡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如期召開，對此表示衷心祝賀，並期望這次會議能夠促進分散於中國與臺灣的學術信息之交流，對沒有漢簡實物之日本研究者予以相當衝擊機會。

大庭脩先生致開幕詞：今年正好是日本有系統地開始居延漢簡研究四十週年，一九五二年森鹿三先生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組織了漢簡研究班，此是日本漢簡研究之開端。與殷墟甲骨、敦煌卷子、清朝檔案一樣，漢簡作為本世紀中國歷史研究之新資料，其研究與日本關係特別深，一九一四年王國維、羅振玉之木簡研究及其著作《流沙墜簡》，正是在日本東京都出版。一九七三、七四年居延新簡、一九七九年敦煌馬圈灣漢簡相繼出土，還有懸泉置漢簡，同時居延舊簡之再調查也在臺灣進行，利用紫外綫釋讀疑難簡牘，對此我認為，邀請直接從事挖掘及考釋者為我們提供親身經歷及見解是極為重要的。這次會議有一個特點，即邀請從事第一綫研究者發言，而沒有日本學者登臺講演。

隨後，英國劍橋大學魯惟一博士代表應邀者致謝詞。在巴黎的胡平生先生發了賀電。

講演分兩天進行，論文發言順序如下：

中國漢簡的發現及研究 徐蘋芳

甲渠候官新出簡牘中的律令詔制 初世寶

額濟納河流域漢代長城烽隧調查綜述 岳邦湖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藏居延漢簡整理工作簡報 臺灣

邢義田

敦煌馬圈灣出土漢簡之特色 吳初驥

漢簡中的“符”“傳”及“過所” 何雙全

關於敦煌漢簡中西域史料的幾個問題 李永良

湖北江陵出土漢簡概況 彭浩

江陵張家山 247 號墓漢律竹簡 李學勤

論文發表使用中國語，現場同時日語轉譯，翻譯由關西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科的教授等擔任、在日復旦大學蘇德昌教授任翻譯總監。發言嚴守規定時間，保證了有充裕時間接受提問。

以上論文提要已發表在“日本秦漢史研究會報”第五期（一九九三・三），提要分別由大庭脩研究室木簡研究會成員松中由美子、鶴飼昌男、志賀和子、遠藤祐子、吉村昌之、松岡伸太郎、田中幸一、門田明、來村多加史撰寫。又，會議論文集編輯進展順利，除了前述的論文以外，還有由於年邁而不能與會的漢簡研究前輩勞榦、瑞典索馬斯特勒姆博士（Bo. SOMMARSTRÖM）的特約稿。論文集預定今年內由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出版。又，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先生原定《談銀雀山簡〈天地八風五行客居五音之居〉》一文，因作者未能成行而無發表。

十二月十四日，於關西大學百週年紀念會館第一特別會議室舉行了非公開學術討論，大庭脩先生主持會議，參加會議六十名成員多為從事木簡研究日本學者，討論涉及範圍廣泛，例如木簡竹簡材質及分佈問題，居延漢簡總數問題、簡牘名稱問題、居延都尉府位置問題、居延敦煌農耕問題、居延檔案中的“標記冊”問題、墓出土簡名稱問題、江陵地區漢墓問題、筆墨殘紙問題、木簡出土狀況問題、墓出土書籍問題等，因時間制約及中日學者在問題理解上有差異，不能說討論是充分的，但同時速記之故，從記錄內容來看，討論收益甚豐，速記稿亦將收入會議論文集中。

漢簡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前後，日本新聞採訪報導頻繁，簡述如下：

關西大學通信（一九九二年七月）頭版刊登大庭脩文章，標題是：守衛絲綢之路的漢代長城——訪木簡故鄉。

讀者新聞（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九日）文化版以“中國二千年前的

庶民生活之呈現”“被隱藏的邊遠地方史的重要性”為標題發了專稿。同時附有敦煌馬圈灣出土漢簡照片。

產經新聞(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刊登該報採訪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邢義田研究員專稿。報導說居延舊簡由香港運往美國完全是為保存文物,避免戰火,而不是作為國民政府(撰者注:當時蔣介石政府)向美貸款的抵押保證。新發現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出具給胡適大使之收據(一九四〇年十月廿六日)列明保管條件三項,其中一項即胡適可隨時全部或部分取回。此報導引起反響,對中國考古狀況素有研究的菅谷文則先生(奈良縣立橿原考古學研究所調查第一課長)說:歷史秘傳得以澄清,胡適大使全力保護文物,令人感動不已。

關西大學通信(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刊登該報採訪大庭脩先生、文學部尾崎實先生專稿,標題是“漢簡研究國際學術會議閉幕之後”,大庭脩認為,以居延新簡、敦煌漢簡出土為契機,漢簡研究已處於新起點,讓日本年輕研究者結識多位中國第一流學者,期待他們作出研究成果,這也是此次國際會議的目的之一。

日本出版摘要報(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日)頭版刊登大庭脩文章,標題是中國漢簡研究現狀之考察,認為此次國際學術會議為日本漢簡研究者提供了新知識,對於理解漢簡研究之現狀大有裨益。

書道美術新聞(一九九三年元旦)專稿,中國近年來新出土漢簡等,改寫了書法史上的諸多定說,日本漢簡研究泰斗大庭脩先生為使人們正視這一事實,四方奔走,得以舉辦此次劃時期的國際學術會議。然在會場上僅見到少數書法家、藝術家的身影,實為憾事。同時指出,對沒有實物資料的日本學者來說,感覺到一種差別,希望在聽取中國學者報告同時,期待有關研究資料及參考圖版盡快公開發表。

在日期間,諸位先生還參觀了天理圖書館、奈良平城京遺址、京都大學文學部博物館、京都住友泉屋博古館等。

懸泉遺址發掘又獲新成果

柴 生 芳

去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 1990、1991 年度考古發掘的基礎上，對懸泉遺址進行了全面清理和揭露。發掘面積 3800 平方米，出土漢代簡牘達 5000 餘枚，其它各類遺物 600 多件，對探索漢代郵驛制度及西北邊地社會面貌等具有重大價值。

甘肅敦煌市懸泉遺址是我國首次在中西交通大道上清理發掘的一座規模較大的驛站遺址。從發掘情況看，懸泉遺址大體可分為五期。第一期為西漢武帝後期至宣帝中期，遺址規模較大，佈局規整，由主體建築塢和兩個附屬建築倉、廄構成。塢呈正方形，面積約 2300 平方米，土坯砌築。塢門設於東壁正中。塢內有西、北兩組房屋建築，靠北塢牆一組房屋建築由三個封閉式小院落構成，每個院落各有迴廊、前堂、後室、洗手間和廁所，設計精妙，佈局合理，目前有兩個院落保存較好。此組房屋建築與塢同時設計築建。西房雖無封閉式小院，但佈局規整，晚於塢而成。後於塢東北角和西北角各增設一角墩。倉位於塢東南側，早期被毀，但大致結構尚可辨認。廄位於塢外南側，殘損嚴重。第二期為西漢宣帝中期至成帝、哀帝時期，除塢內建築繼續沿用外，南塢牆被毀，另在其北 9 米處利用地勢重修了一道寬 0.5 米的牆體。倉、廄建築均遭嚴重破壞而廢棄，未見重建倉的跡象，新建的馬廄位於原馬廄遺迹的東側。第三期為西漢平帝至王莽末年，遺址規模明顯縮小。塢內靠西塢牆的房屋被廢棄，另在西房東側 0.95 米處修築了一道寬 0.4 米的南北向牆體。宣帝時修築的馬廄遭破壞和廢棄，另在塢外西南側修築一處規模更小的馬廄。第四期為東漢光武帝至

和帝時期，除靠北塙牆的建築被改建沿用外，其餘各處建築隨意性很強，已無規模可循。從目前出土的紀年簡判斷，此遺址在東漢中期和帝永元十三年（101 年）以後被廢棄。第五期為魏晉時期。在懸泉遺址西南角漢代廢址上，發現有明顯魏晉風格的烽燧遺址，附近有房屋和馬廄等建築遺迹，因遺址遭受嚴重破壞，除烽燧遺址以外，其它建築遺迹已很難恢復其本身面貌。

遺址出土遺物數量巨大，內涵豐富。簡牘大多出土於塙東南側早期倉址上的廢棄物堆積中。另外，廁所中也出土了一部分。經過初步整理，絕大多數為木簡，簡牘形製有簡、牘、觚、封檢、削衣等，紀年簡不少。特別是前兩個年度未曾發現的紀年簡的出土。填補了遺址使用時序上的缺環。文書有詔書、律令、科品、檄記、簿籍、爰書、劾狀、符、傳、歷譜、術數書、典籍字書、醫藥方、相馬經以及私人書記等。尤其是大量郵驛文書、簿籍的出土，為探索漢代郵驛制度提供了更為豐富翔實的資料。數量巨大的各種簿籍，翔實生動地記錄了接待官員、使者的過程、支付食品、糧食、車馬、草料的數額和價值；刑徒、官奴婢名籍，為深入研究罪徒、奴婢的使用和管理制度，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地方郵亭由具有軍人身份的戍卒管理，對探索地方政府與邊郡軍事機構的關係，以及編民與軍人身份的相互轉化等問題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鄉里戶籍，尤其是具有野戰軍隊士卒——曲士身份者的戶籍和客田者的戶籍，在驛置內大量出現的事實，是研究驛置職能時需要深入考慮的問題；驛置道里簿，詳細記載了酒泉至敦煌的路綫、驛置、里程；郵書課記錄了懸泉置附近的亭置名稱，提供了敦煌至湟泉、敦煌至冥安的具體交通綫路。總之，去年出土的簡牘，大大突破了前兩個年度發現的漢簡的內涵，拓寬了漢代郵驛和中西交通研究的視野和思路，為漢代西北地區的政治、軍事、法律、中外交流、民族關係、郵驛制度、屯戍制度等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礎。

除簡牘外，其它各類出土遺物亦種類繁多，主要有銅、漆、木、石、陶、骨、革、麻、絲、紙、毛、皮、糧食等 16 大類，計有麻纖維紙、帛書、封泥、印章、絹、纜、罽、缶、鐙、刀、犁、車軛、馬具、蓋弓帽、簡鐵、獵具、五

鉢、耳杯、漆勺、木瓢、漆篋、木盆、竹編盤，梳篦、帶鉤、料珠、鞋襪、紡輪、玩具、蓆、簾、筆、硯、畫板、瓮、罐、量具、木畫杙、磨盤，以及大量大麥、小麥、青稞、穀子、糜子、豌豆、扁豆、黑豆、苜蓿、大蒜、杏核、桃核等，生動展現了當時交通大道上郵驛活動的概貌。尤其是牆壁墨書題記有大量發現，其主要出土於塢內東北角房屋倒塌堆積中，內容涉及詔書、醫藥方等，特別是西漢平帝元始五年（5年）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以赭石界欄，直行隸體，字體工整，章法嫻熟，保存比較完整，是極難得的珍品，為漢代曆律和醫藥水平的研究補充了新資料。

編者按：懸泉遺址位於甘肅敦煌與安西之間的安敦公路南側的山前砂礫沖積扇上，是西漢中期至東漢中期及魏晉時期的驛站遺址，總面積約 22500 平方米。該遺址始發現於 1987 年秋，1990—1992 先後進行過三次發掘，共計清理出土簡牘 2 萬餘枚，鐵、銅、紙等各類實物數千件，對漢代郵驛制度等的研究有重大價值。上文原載《中國文物報》1993 年 3 月 14 日，第 10 期，尚刊登了“懸泉遺址”、“漢代牆壁墨書題記”、“漢代的洗手間廁所”等三幅圖，這次轉載時予以省略。

懸泉置發掘結束 簡牘整理即將進行

玄 權

漢代懸泉置驛站遺址，位於甘肅省敦煌市五埵鄉以東 60 公里處，始發現於 1987 年秋。1990 年 10 月至 1991 年元月進行了第一次發掘，1991 年 5 月至 12 月進行了第二次發掘，1992 年 5 月至 12 月進行了第三次發掘，現已完成了全部田野發掘工作，出土簡牘約近 2 萬枚。這些簡牘大多數保存完好，少數朽壞。完整簡牘約佔三分之一，字體有清晰的，也有不清晰的。簡牘用料有松、柳、楊、竹等。形製有簡、牘、觚、策、封檢等。內容有詔書、律令、司法文書、屯戍簿籍、郡、縣、置等各級官文書、各種郵書以及書信等。最早紀年是西漢武帝太始三年（前 94 年），但武帝簡甚少，以昭帝至平帝時期的簡最多，王莽、東漢建武簡較少，集中於昭、宣、元、成、哀、平間。與敦煌、居延簡又有所不同。反映出驛置的特點。這批簡現存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將由該所漢簡研究室進行整理。

後 記

我國古代簡帛是研究從戰國到漢、晉這段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以及典章制度的第一手珍貴材料。其發現的歷史源遠流長，根據文獻記載，最早可以溯源至西漢前期從孔子故宅壁中出的戰國竹簡。《漢書·藝文志》：“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爾後，漢宣帝（前73—前49）時，河內女子於老屋得古文書，見《論衡·正說篇》；西晉初年，汲郡魏冢出土戰國魏的竹簡書籍七十五種，十餘萬言，見《晉書·束皙傳》；齊建元元年（479）襄陽楚王冢出土竹簡書的《考工記》十餘簡，見《南齊書·文惠太子傳》；北周（557—581）末年，居延出土竹簡書，見《太平廣記》卷三百六十八引唐李德裕《玄怪錄》；北宋崇寧（1102—1106）初，在甘肅皋蘭之天都山，獲後漢章和（87—88）年號的木簡札，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七；北宋政和（1111—1118）中，陝右出土永初二年（108）木簡，見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上和趙彥衛《雲麓漫鈔》卷七。其中河南汲郡古墓出土的《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至今仍是研究我國古史的重要資料。從十九世紀末以來，先後在我國新疆塔里木河、尼雅河下游、羅布泊和甘肅敦煌、內蒙額濟納河流域，發現了不少漢、晉木簡。其中，以一九三〇年居延出土的一萬餘枚漢代木簡，尤為馳名。建國以後，特別是從七十年代以後，我國古代簡帛接二連三地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截至目前為止，據不完全統計，共出土戰國、秦、漢、魏、晉等歷史時期的簡牘和帛書五萬五千多件。其中以甘肅、內蒙、新疆等地漢晉遺址；甘肅武威漢墓；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湖南長沙古墓；湖北雲夢秦墓；湖北江陵漢墓出土的簡帛尤為珍貴。並且預計我國古代簡帛今後還將大量陸續出土，定會成

爲研究我國從戰國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歷史一個豐富的資料寶藏。

創辦《簡帛研究》是我多年來的夙願。早在一九七九年，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兼戰國秦漢史研究室主任的林甘泉同志，讓我具體負責編輯《簡牘研究譯叢》第一輯時，就渴望有朝一日能夠編輯出版《簡帛研究》。自從一九九一年夏季在蘭州召開“首屆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後，這種心情便尤爲迫切。今年三月中旬，承蒙法律出版社鼎力贊助和慨然惠允我們創辦《簡帛研究》之後，迅即分別向海峽兩岸和國外長期從事我國古代簡帛整理、研究的部份前輩和同仁組稿，截至五月中旬爲止，除個別先生沒有聯繫上外，所有約稿均從天涯海角寄到北京，按照預定計劃編輯加工完畢，如期發稿。從開始組稿到最後發稿，爲時整兩個月。《簡帛研究》第一輯，承蒙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和古代簡帛研究的老前輩張政烺先生題簽、題詞；著名前輩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饒宗頤先生題箋、撰文。由我國著名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李學勤先生親自撰寫前言。在百忙中爲我們惠賜稿件的，不僅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蘋芳先生、法學研究所研究員高恒先生、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何茲全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裘錫圭教授、法律出版社林劍鳴教授、臺灣中興大學馬先醒教授、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邢義田先生、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所長大庭脩教授、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永田英正教授、英國劍橋大學魯惟一博士等衆多海峽兩岸和國外長期從事我國古代簡帛研究，並作出了卓越貢獻的老前輩或當代著名學者；而且有北京、甘肅、湖南、湖北、四川等地一大批正在從事我國古代簡帛整理和研究，並已取得傑出成就的著名中青年學者。

自從一九九一年在蘭州舉行“首屆中國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後，一九九二年又先後在湖南長沙和日本大阪召開了“馬王堆漢墓國際學術討論會”和“漢簡研究國際學術會議”，這是近兩年內有關我國古代簡帛研究的重大活動。爲了幫助大家瞭解這三次會議的情況，除轉載東山和陳松長同志所寫的兩篇報導外，此次還特約日本關西大

學大學院的陳波先生，撰寫了“漢簡研究國際學術會議概況”。與此同時，還將舉世關注的懸泉置的發掘和整理最新消息，作一扼要介紹，以饗讀者。

在《簡帛研究》第一輯的組稿和編輯過程中，還曾得到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管東貴先生、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吉星先生、蘭州大學歷史系劉光華教授、中國文物研究所文物古文獻研究部李均明主任、湖南省博物館傅舉有副館長、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永良副所長、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員徐世虹女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審張書生先生及孫曉和劉樂賢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卜憲群先生等的大力支持和協助，特此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簡帛研究》第一輯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編輯成功，這就充分說明舉世攜手合作研究我國古代簡帛的新時代已經到來，這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它宣告以往各自隔絕進行整理和研究的舊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誠然，由於時間過於倉卒，有的先生本擬組稿，因未取得聯繫而來不及約稿；有的先生雖已約稿，但來不及賜稿；這是要請大家原諒的，唯待今後再設法彌補。加之我們經驗不足，水平不高，錯誤和缺點在所難免，懇切希望海峽兩岸以及國外的各位前輩、同仁和廣大讀者不吝賜教，使《簡帛研究》這個園地辦得越來越好。

謝桂華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九日凌晨於北京